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档案文献共编为 15 个专题，时间范围从 1944 年到 1959 年。

“苏联与战后匈牙利”（1944 年 9 月至 1948 年 8 月）：专题选编了 48 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匈牙利各派政治力量（以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与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匈牙利机构，有关苏联政府内部各机构，以及苏联驻匈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批示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确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期间，苏联对匈牙利的政策以及苏匈关系的状况。

“保卢斯与苏联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1946 年 6 月）：本专题选编的档案反映了战后苏联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的一个侧面，即作为苏联战俘的著名德国元帅保卢斯接受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任务，策划在德国战俘中组建“民主中心”，以便通过宣传和教育工作，加强战俘的反法西斯力量，并使他们团结在德国社会统一党周围。

“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1947 年 7 月）：本专题只收入了一份档案，即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的苏联反间谍工作的详细规定和要求。由此，人们可以了解到苏联侦查、审讯和关押间谍分子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工作程序、方法、策略，以及相关的政策性规定。

“拉科西谈拉伊克案件及匈牙利党内斗争问题”（1949～1956年）：本专题选编了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的档案——前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部分回忆录。回忆录披露了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拉伊克“间谍集团”审判案的一些内幕，讲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匈牙利制定和完成的情况，并且从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角度评论了个人崇拜在匈牙利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和形成的过程。

“陶里亚蒂与共产党情报局”（1951年1月）：本专题的档案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关于拒绝担任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给斯大林本人的信，以及有关这个问题苏联党内机构的报告。陶里亚蒂拒绝斯大林的建议时所陈述的理由充分表明了欧洲共产党对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普遍认识。

“爱伦堡拒绝在犹太人集体信件上签名”（1953年2月）：本专题只有一件档案，即国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伊·格·爱伦堡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者在信中阐述了不宜由苏联一批犹太族知名人士联名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档案后附录了这封联名信文本）的理由。

“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关于人事问题的决议”（1953年3月）：本专题只有一件档案，即1953年3月5日，在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1953年3～8月）：本专题共选编了17份档案，主要是内务部的报告和决定，或贝利亚代苏联部长会议起草的决议，其内容涉及到对斯大林去世前一些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和对内务部机构和制度的改革问题。作为本专题的附录，还收入了1957年劳改营管理局的一份

统计资料。

“苏联对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成果的评估”（1954年6月）：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是莫洛托夫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回国后，向苏共中央报告的会议情况及对这一阶段会谈成果的评估。报告高度评价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贝利亚家属的遭遇”（1954年1月和1958年10月）：本专题选编的档案，主要是受到贝利亚案件牵连的贝利亚遗孀的申诉信和苏共中央监察部门对贝利亚儿子申诉的处理意见，反映了50年代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苏联的核政策及科学家对核武器的看法”（1955年1月）：本专题选编的档案包括，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卡皮察1955年所写的一篇关于核武器和原子能和平利用问题的科普文章，卡皮察为发表这篇文章给赫鲁晓夫写的信，以及苏联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发表该文的报告。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核武器发展的状况，苏联科学家的核观念，及苏联当时的核政策。

“赫鲁晓夫谈苏共二十大”（1956年7月）：本专题所选档案——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长时间谈话，从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主要决策人的角度，阐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秘密报告的动机、起因和当时设想的结果。

“赫鲁晓夫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1956年8月）：本专题所选档案——赫鲁晓夫与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主要反映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如何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认识犹太人问题，及所采取的对策。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1956年9~10月）：本专题收入了14件关于1956年9~10月苏日关系正常化莫斯科谈判的档案，其中包括苏联方面为这次谈判所准备的背景材料，苏日双方反

复谈判的会谈记录，苏联内部关于如何处理日方所提条件的商议和决策过程等等。

“苏联在50年代的裁军方案和行动”（1955年8月至1959年1月）：本专题收入了19件有关50年代后半期苏联裁减武装力量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决定裁军的决议，苏联给各华沙条约国（民主德国除外）关于裁军及裁减人数的指示，苏联军方关于贯彻中央文件的情况，以及苏联部队官兵对裁军的反映等文件。

沈志华

2000年12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版人：谢曙光

编审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行人：胡鹏光 王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目 录

本卷前言 26-1

苏联与战后匈牙利

(1944年9月至1948年8月)

专题说明..... 26-1

No09143 霍尔蒂关于在制定停战条件时请求宽恕匈牙利
致斯大林的信 (1944年9月11日) 26-4

No09146 匈牙利代表团所接受的停战初步条件
(1944年10月11日) 26-7

No09152 普希金和盖格关于组织匈牙利临时政府和军队
问题给杰卡诺佐夫的请示报告
(1944年11月7日) 26-8

No09154 莫洛托夫关于成立匈牙利临时政府问题与匈牙利
代表团会谈记录 (1944年11月13日) 26-10

No09158 普希金和盖格关于成立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
给杰卡诺佐夫的请示报告 (1944年11月) 26-15

No09162 拉夫罗夫关于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筹备情况
给杰卡诺佐夫的报告 (1944年12月16日) ... 26-18

- №09163** 杰卡诺佐夫关于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成立
给斯大林的报告（1944年12月22日） 26-21
- №09205** 普希金与米克洛什关于改变匈牙利政府成员
问题的谈话纪要（1945年7月3日） 26-23
- №09208** 斯米尔诺夫关于匈牙利政府改组问题给杰卡诺
佐夫的报告（1945年7月27日） 26-26
- №09220** 伏罗希洛夫关于美国将与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
给斯大林的报告（1945年9月21日） 26-28
- №09221** 普希金关于匈政府对苏美提出建立外交关系
建议的反应给维辛斯基的电报（摘录）
（1945年9月26日） 26-30
- №09223** 贝利亚关于伏罗希洛夫释放匈牙利战俘的建议
给斯大林的报告（1945年10月21日） 26-33
- №09224**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竞选运动的进程给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0月22日） 26-34
- №09225** 莫洛托夫等人关于伏罗希洛夫擅自同意匈四党
发表预选宣言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10月24日） 26-39
- №09230** 莫洛托夫等人关于伏罗希洛夫对匈政府组成的
建议给斯大林的报告（1945年11月10日） ... 26-41
- №09232**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政府组成给斯大林和
莫洛托夫的电报（1945年11月11日） 26-43
- №09235** 伏罗希洛夫关于干预匈牙利政府组成的必要性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3日） 26-45

目 录

- | | | |
|----------------|--|-------|
| No09237 |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政府组成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4日) | 26-48 |
| No09246 | 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关于匈牙利总统选举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1946年1月6日) | 26-51 |
| No11410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匈牙利缔结和约的指示 (1946年3月21日) | 26-55 |
| No09263 | 莫洛托夫与吉恩杰希关于准备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6年4月9日) | 26-59 |
| No09264 | 斯大林与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关于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4月10日) | 26-64 |
| No09265 | 克鲁格洛夫关于苏联内务部战俘营中匈牙利战俘数量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10日) | 26-77 |
| No09275 | 普希金关于匈牙利政府危机问题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6月5日) | 26-79 |
| No09277 | 弗拉索夫关于匈牙利形势的报告 (1946年6月19日) | 26-81 |
| No09291 | 莫洛托夫关于对匈和约草案的准备工作与吉恩杰希的谈话记录 (1946年8月20日) | 26-83 |
| No09310 | 普希金与费伦茨关于匈国内政治局势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7年1月24日) | 26-90 |
| No09314 | 普希金与萨卡希奇关于匈社会民主党内部矛盾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6日) | 26-92 |
| No09324 | 斯维里多夫关于匈牙利政治形势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 (1947年4月初) | 26-94 |
| No09325 | 匈牙利国家警察局长加博尔关于政治侦查情况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 (1947年4月初) | 26-99 |

- №09326** 匈共中央监委领导人基什关于监委活动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 (摘录)
(1947年4月初) 26-101
- №09327** 苏联驻匈使馆1946年度政治总结报告
(关于建立最高经济委员会部分)
(1947年4月16日) 26-103
- №09328** 苏联驻匈使馆1946年度政治总结报告
(对布达佩斯市政选举结果的分析部分)
(1947年4月16日) 26-105
- №09329** 莫洛托夫与拉科西关于匈牙利政治形势的谈话记录 (摘录) (1947年4月29日) 26-109
- №09336** 拉科西关于政府危机和纳吉辞职给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信 (1947年6月12日) 26-122
- №09341** 普希金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立场与马罗山的谈话纪要 (摘录)
(1947年6月27日) 26-129
- №09349** 谢罗夫关于拉科西请求暂时停止遣送匈牙利被俘军官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7年7月28日) 26-130
- №09352** 拉科西关于匈牙利竞选运动状况给苏联领导人的信 (1947年8月13日) 26-131
- №09355**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状况的谈话纪要 (1947年9月1日) 26-136
- №09357** 拉科西关于大选后匈牙利政府的组成给苏联领导人的信 (1947年10月2日) 26-138
- №07485** 斯大林与蒂尔迪关于苏匈关系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7日) 26-143

№07486	苏斯洛夫与拉科西关于匈共情况的会谈纪要 (1948年2月19日)	26-147
№0949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匈共民族主义 宣传的调查报告(1948年3月24日)	26-152
№09493	巴拉诺夫关于匈牙利党联合后的名称问题给 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年4月3日)	26-157
№09519	苏斯洛夫与雷瓦伊关于匈牙利两党合并问题的 谈话纪要(1948年5月20日)	26-159
№09499	巴拉诺夫关于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纲领宣言 草案意见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6月1日)	26-163
№09504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匈牙利完成两党合并准备 工作的谈话纪要(1948年6月11日)	26-168
№09508	普希金与拉科西关于蒂尔迪总统辞职的会谈 纪要(1948年8月16日)	26-169

保卢斯与苏联 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

(1946年6月)

专题说明	26-172	
№06177	科布洛夫关于与保卢斯会谈给克鲁格洛夫的 报告(1946年6月12日)	26-174
№06179	克鲁格洛夫关于德国战俘事宜给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6年6月15日)	26-176
№06178	保卢斯关于在德国战俘中进行组织工作 致科布洛夫的信(1946年6月16日)	26-180

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

(1947年7月)

- 专题说明..... 26-185
- №04568 阿巴库莫夫关于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
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7月17日) 26-186

拉科西谈拉伊克案件及 匈牙利党内斗争问题

(1949~1956年)

- 专题说明..... 26-193
- №03919 拉科西关于拉伊克案件和匈牙利党内斗争历史的
回忆片段(1949~1956年) 26-196

陶里亚蒂与共产党情报局

(1951年1月)

- 专题说明..... 26-350
- №04425 陶里亚蒂关于拒绝担任情报局总书记
致斯大林的信(1951年1月4日) 26-353
- №04426 格里戈良关于陶里亚蒂等待答复
给斯大林的信(1951年1月12日) 26-358

爱伦堡拒绝在犹太人集体信件上签名

(1953年2月)

专题说明..... 26 - 359

№06959 爱伦堡关于犹太人集体信件给斯大林的信
(1953年2月3日) 26 - 360

斯大林弥留之际

苏共中央关于人事问题的决议

(1953年3月)

专题说明..... 26 - 369

№06238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联席会议记录 (1953年3月5日) 26 - 370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

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1953年3~8月)

专题说明..... 26 - 378

№08553 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重新审理一些特大
案件的命令 (1953年3月13日) 26 - 380

- №08554** 贝利亚关于成立苏联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
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命令
(1953年3月13日) 26-382
- №08555** 贝利亚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给马林
科夫的报告(1953年3月17日) 26-383
- №08556**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
决议草案(1953年3月18日) 26-384
- №08557**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理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
前领导人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8日) ... 26-388
- №08558**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给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3月21日) 26-389
- №0855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
决议草案(1953年3月25日) 26-392
- №08560** 贝利亚关于实行大赦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
报告(1953年3月26日) 26-395
- №085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
(1953年3月27日) 26-398
- №08562** 苏联内务部长、苏联司法部长和苏联总检察长
关于实行大赦的命令(1953年3月28日) ... 26-399
- №08563** 贝利亚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给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3月28日) 26-403
- №08565** 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
体罚措施的命令(1953年4月4日) 26-407
- №08566**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
案件的命令(1953年4月14日) 26-409
- №08567** 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送反映德意志族人
状况的匿名信的附信(1953年5月27日) ... 26-412

- №08568** 贝利亚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构成给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1953年6月8日）…… 26-417
- №08570** 贝利亚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
权力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6月15日）…… 26-421
- №03638** 沃尔库塔市“列奇诺伊”劳改营委员会关于
犯人抗拒事件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摘录）
（1953年8月18日）…… 26-426

苏联对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成果的评估

（1954年6月）

- 专题说明**…… 26-435
- №0362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6号会议记录（摘录）
（1954年6月24日）…… 26-437
- №02797** 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关于日内瓦
会议的总结（1954年6月24日）…… 26-438

贝利亚家属的遭遇

（1954年1月和1958年10月）

- 专题说明**…… 26-454
- №06205** 贝利亚遗孀给赫鲁晓夫的申诉信
（1954年1月7日）…… 26-456
- №04513**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贝利亚之子申诉的
处理决定（1958年10月30日）…… 26-460

苏联的核政策及科学家对核武器的看法

(1955年1月)

- 专题说明..... 26-463
- №03960 卡皮察关于发表原子能文章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5年1月16日) 26-465
- №03962 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关于卡皮察《论核能》
一文处理办法的报告(1955年1月27日) ... 26-485

赫鲁晓夫谈苏共二十大

(1956年7月)

- 专题说明..... 26-493
-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记录
(1956年7月10日) 26-494

赫鲁晓夫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1956年8月)

- 专题说明..... 26-514
- №06180 赫鲁晓夫与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1956年8月29日) 26-516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1956年9~10月)

- 专题说明**..... 26 - 530
- No06970** 鸠山一郎关于日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条件
致布尔加宁的信 (1956年9月11日) 26 - 532
- No06971** 苏联外交部关于答复日方条件致苏共中央的
信 (1956年9月12日) 26 - 534
- No069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布尔加宁给鸠山一郎
复信的决议 (1956年9月13日) 26 - 536
- No06973**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日谈判代表团组成的
决议 (1956年10月11日) 26 - 538
- No06974** 苏联外交部呈送布尔加宁的关于苏日谈判的
准备材料 (1956年10月12日) 26 - 539
- No06975**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关于苏日恢复正常关系的
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6日) 26 - 551
- No06977**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关于苏日领土问题的
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7日) 26 - 559
- No06976** 赫鲁晓夫关于解决苏日领土问题向苏共中央
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7日) 26 - 563
- No06978** 布尔加宁、米高扬与鸠山一郎、河野一郎关于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7日) 26 - 565
- No06979**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关于苏日领土问题的
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8日) 26 - 571

№06980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关于苏日领土问题表述 方法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18日)	26-574
№06981	赫鲁晓夫关于苏日领土问题致苏共中央 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8日)	26-575
№06982	布尔加宁关于苏日宣言草案致苏共中央 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9日)	26-577
№06983	葛罗米柯关于苏日联合宣言文本给苏共 中央的报告 (1956年10月19日)	26-581

苏联在 50 年代的裁军方案和行动

(1955年8月至1959年1月)

专题说明	26-587	
№093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裁军的决议 (1955年8月12日)	26-589
№09400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军的决议 (1955年8月12日)	26-590
№09401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贝鲁特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1
№09402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诺沃提尼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2
№09403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拉科西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3
№09404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阿波斯托尔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4
№09405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日夫科夫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5

- No09406**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霍查的信
(1955年8月12日) 26-596
- No09407** 朱可夫关于裁减武装力量情况的备要报告
(1955年8月12日) 26-597
- No094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国防部所提问题的决议
(1956年2月9日) 26-600
- No09409** 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关于进一步裁军的建议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2月9日) 26-602
- No094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国防部所提问题的决议
(1956年3月17日) 26-609
- No09412** 科涅夫和热尔托夫关于军队对裁军问题的态度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6月1日) 26-612
- No09415** 马利诺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关于继续裁减
苏联武装力量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月3日) 26-614
- No09413**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继续裁减苏联武装力量
员额的决议(1958年1月6日) 26-619
- No09414**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武装力量的决议
(1958年1月6日) 26-620
- No09416** 谢罗夫关于外贝加尔军区一些军官对裁军组织
措施不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3月1日) 26-622
- No09417** 希金和佐洛图欣关于军官中的不满情绪给苏共
中央的报告(1958年3月6日) 26-625
- No09418** 马利诺夫斯基关于武装力量裁减工作给苏共
中央的报告(1959年1月8日) 26-628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匈牙利

(1944年9月至1948年8月)

1918年11月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匈牙利共和国成立。1940年11月匈牙利霍尔蒂政府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1944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匈牙利，得知霍尔蒂派出代表与苏联进行停战谈判后，于10月迫使霍尔蒂将政权交给亲德法西斯势力双箭党。12月2日，在匈牙利已被解放的地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独立小农党、公民民主党等联合成立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并召开临时国民议会，选出临时国民政府。12月23日临时政府发表“向德国宣言书”，同时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停战谈判。1945年1月20日，匈牙利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匈牙利应履行按1937年底以前状况确定边界，向苏、南、捷赔款3亿美元，并惩办战犯等义务。匈牙利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也自行解散，1944年11月恢复时只有不足3000人，而且其主要领导人都长期居留苏联，到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时也仅仅发展到30000人，由拉科西出任总书记。匈共在5月全国代表会议后调整民族团结政策，不承认公民民主党为独立阵线成员，攻击其他各党派右翼。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也都积极投入政治斗争。1945年11月匈牙利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小农党得票57.03%，社会民主党得票17.41%，而共产党得票不足

17%。对于小农党建立一党制政府的意图，盟国监督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各党联席会议最后达成协议，小农党蒂尔迪担任总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小农党各出一人担任国务部长（即副总理）。小农党在18个政府成员中占有9个，但共产党以退出联合政府相要挟得到了内务部长的职务。1946年2月匈牙利宣布成立共和国，议会选举蒂尔迪为共和国主席，由小农党政治家纳吉·费伦茨接任总理，其他政府成员不变。

小农党掌权后实施的反对土地改革的措施引起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左翼的抗议。1946年3月，在共产党的倡议下，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工会理事会共同组成左翼联盟，同时，小农党左翼人士也发表声明支持左翼联盟，从而加强了左派在议会中的地位。在左翼联盟的敦促下，议会做出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改革的举措：迫使小农党撤回20名右派议员；通过了尽快实现土地改革的法令；撤消了科瓦奇·贝拉（小农党右翼）农业部长的职务，而以道比·伊斯特万（小农党左翼）取代；国家监督银行；煤矿收归国有等等。1946年9月匈共召开三大，此时党员人数已增长为65万。大会确定了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和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12月，内务部宣布破获了一起“反共和国阴谋案”，其目标是在苏军撤离匈牙利后发动政变，建立小农党一党专政，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和总理纳吉·费伦茨受到牵连。在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47年2月小农党宣布将与“阴谋案”有牵连的20名该党议会代表清除出党，另有50名涉嫌代表退党，总书记职务由道比·伊斯特万接替。随后，驻匈苏联当局逮捕了科瓦奇·贝拉，出访在外的纳吉·费伦茨提出辞职，总统按照共产党的要求任命小农党左翼领导人丁尼斯·拉约什担任总理。这样，在8月大选时，共产党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随后组成的新政府成员中占据相对多数。随后，匈牙利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开始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过程。1948年初，大约10万社会民主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有些基层组织甚至整体转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派领导人纷纷退

出领导机构。6月两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原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萨卡希奇·阿尔帕德担任党主席，拉科西担任总书记，原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成员按二比一的比例组成。到1949年初，拉科西已经可以公开宣布，匈牙利应该实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必须激化阶级斗争，强化专政，还要消灭多党制。

本专题选录的48件档案，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确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期间，苏联对匈牙利的政策，以及苏匈关系的状况。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
张廷文、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
张木生、安新奎、沈友泰、方琼)

№09143

霍尔蒂关于在制定停战条件时
请求宽恕匈牙利致斯大林的信

(1944年9月11日)

译自英文^①

大元帅：

我以处在极端危险状态的我国人民的名义并且为了他们，向您发出请求。我是以对这场战争不应负责任的匈牙利人民的名义做这件事的。最近一千年，特别是近一百年以来，邻国德国这个庞然大物一直对我国人民的命运施加影响。正是受这一影响，我们加入了这场遗憾的对苏战争。

我应当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的贫穷国家实际上布满了德国的“第五纵队”。他们早在德国武装力量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际就已经开始大举渗透了。结果，德国的代理人密切注视着匈牙利的一举一动，一些极其重要的消息和报告从未呈送给我。我现在才知道，在空袭卡沙和蒙卡奇^②之后，莫洛托夫外长曾在与匈牙利公

① 该信件是由1944年10月1日抵达莫斯科参加停战谈判的匈牙利代表团转交的。代表团成员有：Г. 法拉格将军、Г. 泰莱基伯爵和匈牙利外交参赞 Д. 森特·伊万宁。文件上有手写的批示：“送马林科夫等同志。贝利亚”。

② 匈牙利于1941年6月27日加入反苏联的战争的借口是：当时还是匈牙利组成部分的科希策市和穆卡切沃市遭到了轰炸。匈牙利政府将遭轰炸的责任归于苏联，而实际上这是德国空军部队为达到挑唆目的而进行的轰炸。与此同时，匈牙利将军中亲德国的代表也知道所筹划的行动。

使的一次谈话中强调了苏联对匈牙利的和平愿望。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令人痛心，因为当时此事并未向我报告。

我想向您说句公道话，我们从来不想取夺任何人的不属于我们的一寸土地。^① 与此相反，罗马尼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自己盟国俄罗斯的比萨拉比亚，还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助于德国人占领苏维埃俄罗斯的一大部分。后来在1940年，当我们打算结束对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居民的骇人听闻的态度时，罗马尼亚人又求助于德国，要求希特勒通过维也纳仲裁^② 帮助他们得到这块土地的一部分。

当我派出参加停战谈判的全权代表时，我请您宽恕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我国有自己的历史功勋，我国人民与俄罗斯人民有许多相似之处。烦劳您利用对自己的盟国的巨大影响，在制定条件时考虑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尊严，确实能够服务于未来的和平生活和安全，值此机会，我仅向您——斯大林大元帅表示我崇高的敬意。

不胜感激之至。

霍尔蒂^③

1944年9月11日于布达佩斯

-
- ① 站在德国方面加入战争之后，匈牙利政府希望修正1920年的特里亚农和约——该和约确定了匈牙利在凡尔赛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新的边界线，并提出恢复匈牙利王国历史上的边界线，包括1920年划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大片土地。
- ② 指的是第二次维也纳仲裁（1940年8月），根据这一决定，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一块面积为43000平方公里、有居民2500万人的土地归入匈牙利。
- ③ 米克洛什·霍尔蒂（1868~1957），1920年成为匈牙利摄政王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专政。战争期间投入法西斯阵营，1944年3月德国占领匈牙利，霍尔蒂于10月移交政权后前往德国。

又及：由于我国家军队仍然驻扎在边境地区，德国的大量部队还在向我国进犯，在我们没有控制形势之前，我请您对我的信进行特殊处理。

№ 09146

匈牙利代表团所接受的停战初步条件

(1944年10月11日)

根据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霍尔蒂摄政王以及匈牙利政府的代表法拉戈·加博尔上将、全权公使森特·伊万宁·多莫科什博士和泰莱基·盖佐伯爵教授接受以下初步条件，并在文件上签字：

匈牙利应将全部匈牙利军队、官员从被匈牙利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领土上撤回到1937年12月31日以前存在的匈牙利边界以内。这次撤退应当立即开始，并应在匈牙利政府接到本声明之后的10日内结束。为了检查和监督这一撤退过程，三个盟国政府将向匈牙利派出自己的代表。他们将在苏联政府的领导下，以盟国联合军事代表团的身份行动。

匈牙利应当断绝与德国的全部关系并立即向德国宣战，同时苏联政府准备派自己的军队援助匈牙利。^①

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的代表：

特命全权公使森特·伊万宁·多莫科什，上将 B. 法拉戈·加博尔，大学教授泰莱基·盖佐伯爵

1944年10月11日于莫斯科^②

① 在莫斯科进行停战谈判时，匈牙利代表团交给苏联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军队停止向布达佩斯的进军，以便有可能将匈牙利军队从前线调到布达佩斯打击兵力集中的德国部队。

② 文件上有批示：“匈牙利代表团签字时，有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在场。1944年10月11日”。

№09152

普希金和盖格关于组织匈牙利临时政府和 军队问题给杰卡诺佐夫的请示报告

(1944年11月7日)

秘密

B.Г. 杰卡诺佐夫同志^①：

匈牙利驻莫斯科代表团在其最近一份照会（11月5日第35/1944号）中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被红军解放的匈牙利领土上组织匈牙利临时政府，第二个问题是打算用关押在前线附近的匈牙利战俘组建匈牙利军队。

我们认为，在布达佩斯解放之前应当反对组织匈牙利政府，反对与匈牙利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法拉戈显然考虑仅仅由霍尔蒂的支持者组织这个政府，这对我们不利。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成立匈牙利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应当向我们保证认真执行停战协议的条件，不打算在匈牙利保留反动的封建制度。我们认为，新政府应由匈牙利解放区的民主分子和匈牙利侨民中间著名的反法西斯分子组成，也不排除最初让法拉戈本人以及代表团的其他人参加政府，这样做比较有利。这样的政府只有在布达佩斯解放之后才能成立。^②

^① B.Г. 杰卡诺佐夫，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文件上有如下批示：“请主管匈牙利战俘问题的同志到我这里。杰卡诺佐夫。11月8日”。

^② 实际上，红军占领布达佩斯（1945年2月13日）之前，为了被解放地区的稳定，于1944年12月22日成立了匈牙利临时政府。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首都成立政府会加强这个政府在国内的地位，从而使萨拉希^① 充当仓科夫^② 和霍里亚·西姆的角色。

至于开始用匈牙利战俘组建匈牙利军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可以接受。为了组建这些部队，宜将早就被我们俘虏、经过考查的一批匈牙利军官派出。同时还应当考虑，组建这些匈牙利部队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期间布达佩斯的军事形势将会出现变化，届时组织匈牙利政府将会出现新问题。这个政府可以在形式上充当这些部队组织者的角色，在已经解放的匈牙利领土上继续进行这项工作。^③

我们认为，匈牙利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去拜访米克洛什^④ 将军，是不适宜的，因为由法拉戈负责组建部队会认为匈牙利代表团是我们所承认的匈牙利权力机关的代表，这在将来会束缚我们的手脚。

Г. 普希金^⑤

B. 盖格^⑥

1944年11月7日于莫斯科

-
- ① 萨拉希，匈牙利法西斯头目，1944~1945年德国占领下的匈牙利政府总理。
② 仓科夫，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曾任政府总理，1944年解放前夕逃亡国外。
③ 关于用匈牙利战俘组建匈牙利军队的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
④ 匈牙利第1集团军司令米克洛什于1944年10月16日转向红军方面，当时正在被解放了的匈牙利境内。
⑤ 普希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匈牙利事务的官员。
⑥ 盖格，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匈牙利事务官员。

№09154

莫洛托夫关于成立匈牙利临时政府问题与 匈牙利代表团会谈记录

(1944年11月13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秘密

参加会见的有：

匈牙利方面：法拉戈上将，森特·伊万宁，盖佐·泰莱基，前匈牙利第1集团军司令米克洛什上将，前总参谋长韦赖什上将。

苏联方面：B.Г.杰卡诺佐夫，费·费·库兹涅佐夫上将，翻译B.Φ.波采罗布。

莫洛托夫问，在座的所有匈牙利人在莫斯科是否都见过面。

韦赖什回答说，今天晚上他与在座的其他匈牙利人都进行了谈话。

莫洛托夫说，他知道韦赖什在写给红军总参谋长的信中所提的建议。^①莫洛托夫问，现在匈牙利人有什么建议。他们现在是否还有新的建议，或者对韦赖什将军的建议有什么修改。

森特·伊万宁以霍尔蒂派到莫斯科的代表团的名义，也就是以法拉戈、泰莱基和他本人名义宣布，他们没有读过韦赖什的信，也

① 为通报匈牙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并由于德国人逮捕了摄政王霍尔蒂，1944年11月9日，韦赖什向红军总参谋长提交一份报告，建议组建政府委员会，规定其在匈牙利全部解放之前的任务。

不知道信的内容。

莫洛托夫说，他想了解代表们对自己下一步活动有什么设想、方案或者计划。苏联政府收到了匈牙利代表团的建议和韦赖什将军的建议。这两份建议都提出了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的领土上建立领导匈牙利人的匈牙利中央机关。莫洛托夫说，他有这样的印象，匈牙利代表团的建议是一种类型，韦赖什将军的建议又是另一种类型。韦赖什将军的建议看上去比较民主。

莫洛托夫说，他想知道匈牙利人是否就这两份建议交换过意见，他们现在是否有一致的意见。

森特·伊万宁说，他、法拉戈、泰莱基和米克洛什将军都不知道韦赖什将军的信及信中所提的计划。他们只了解这封信的一般原则，也同意这些原则。森特·伊万宁接着说，首先此间在座的所有匈牙利人士都同意匈牙利人应当立即开始反对德国人的武装斗争。第二，他们还同意在民主的原则上组织匈牙利政府。但是匈牙利代表团没有成立政府的详细计划，如果有，也只是个大概，没有拟定详细计划。

森特·伊万宁接着说，据韦赖什将军说，他的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霍尔蒂摄政王表示的意见，第二部分是韦赖什的个人观点和建议。

莫洛托夫说，已经提出必须成立匈牙利民主政府的问题。也许开始它不是匈牙利临时政府，而是政府委员会，韦赖什将军也就是这样建议的。任何这些机构，委员会或者政府都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

莫洛托夫对代表们说，韦赖什将军在信中指出，霍尔蒂建议任命韦赖什·拉约什上将为匈牙利政府首脑。如果后者不能履行政府主席的职责，霍尔蒂建议任命米克洛什·贝洛。

韦赖什通过担任翻译的森特·伊万宁发表以下声明。他说，他

在自己的信中做了如下修改。他最后一次在与霍尔蒂摄政王的谈话中指出，如果政府首脑由米克洛什或者其他职务相当的高级军官担任，这也不错。从这个观点来看，除了米克洛什之外，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法拉戈。摄政王在与韦赖什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对米克洛什和法拉戈表示完全信任。

莫洛托夫说，他希望更接近问题的实质，并说，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座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莫洛托夫补充说，他想坦率地说，这一措施符合苏联和正在为反对德寇而斗争的红军的利益。他莫洛托夫深信，这一措施也符合匈牙利人民和那些反对德寇、主张匈牙利独立的匈牙利人民的代表们的利益。

代表们和将军们连连点头，齐声说“是，是”，表示同意莫洛托夫的观点。

莫洛托夫说，既然这样，他就想问问今天参加会谈的匈牙利人，怎样正确地组织匈牙利中央机关，它的名称应当是什么，办公地点设在何处。

森特·伊万宁与其他匈牙利人商量了一会儿，以所有人的名义说，代表团和将军认为政府或者委员会应当设在匈牙利领土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里。代表们认为，最合适的地点是德布勒森。它曾是科苏特政府 1849 年宣布匈牙利摆脱德国人而独立的地方。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同意这一点。

莫洛托夫接着问，将成立什么样的机构——是匈牙利政府，或者是匈牙利委员会，过一两周再将委员会变成匈牙利政府。莫洛托夫补充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名称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成立一个有助于达到共同目的——战胜德国、解放匈牙利的组织。莫洛托夫还补充说，如果匈牙利人愿意成立委员会，苏联政府将对此表示同意，如果他们愿意成立政府，苏联政府也将表示同意。

匈牙利人经过一番商量之后，森特·伊万宁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微妙，想互相商量一下，明天再回答。

莫洛托夫说，代表们可以尽量思考，需要商量多长时间就商量多长时间。莫洛托夫说，我们的目标是缩短战争期限，减少对我方和匈牙利方面带来的牺牲。每个人对我们都是珍贵的。

森特·伊万宁代表所有匈牙利人说，他们最多需要两天。

莫洛托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必须有匈牙利所有民主党和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莫洛托夫说，在莫斯科有几个匈牙利人，也许参加组建的机构会有益一些。莫洛托夫还说，我们想预先告诉一声，我们指的不是匈牙利犹太人，而是匈牙利人。

莫洛托夫接着说，韦赖什在与库兹涅佐夫上将谈话时提出了委员会的人选。他特别提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萨卡希奇，共产党人费利卡依，小农党的代表蒂尔迪。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他们能否参加即将成立的机构？还有没有人代表匈牙利特定的集团，也应当把他们吸收进委员会来。莫洛托夫建议与会的匈牙利人讨论这个问题，中央机关必须与广大的居民阶层保持密切的联系。进入委员会的人员在匈牙利享有威望也很重要。莫洛托夫说，如果在座的匈牙利人支持米克洛什为委员会或者政府的领导人选，那么苏联方面对此不会表示反对，如果已经指定了别人，那么苏方也不会表示反对。

森特·伊万宁与其他匈牙利人协商之后说，代表们和将军们同意莫洛托夫的观点。森特·伊万宁指出，各党的代表不在德布勒森，这会造成一些困难。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仍然住在布达佩斯，担心他们被逮捕或者被打死。当韦赖什离开匈牙利首都时，匈牙利政府的大部分活动家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盖世太保的特务正在追捕他们。森特·伊万宁认为，现在还不能制定成立政府的详细计划，因为现在还不知道领导人中间的哪些人现在呆在匈牙利的解放区，

假定任命了蒂尔迪或者萨卡希奇，那么回到匈牙利后发现他们无法参加活动，所有计划将无法实现。最好就地决定谁可以参加政府。森特·伊万宁举例说，据最新消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二号领导人博伊奇·日林斯基^①还在德国人手里，身受重伤，大概现在已经被杀害了。

莫洛托夫问，代表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泰莱基说，他认为，要是有一份关于现在匈牙利解放区的匈牙利政治领袖们的资料就好了。这会加速成立政府中心的工作。能有一份关于现在在德布勒森、塞格德、凯奇凯梅特等其他匈牙利大城市的政治活动家的资料也行。

莫洛托夫说，他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资料，但他认为库兹涅佐夫上将明天会提供这样的资料。

莫洛托夫问，代表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和要求。

匈牙利人回答说，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红军赶快攻克布达佩斯。

莫洛托夫说，红军正为此浴血奋战。

谈话持续了50分钟。

波采罗布 记录

1944年11月13日23时于莫斯科

^① 博伊奇·日林斯基是小农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1月领导了秘密的匈牙利解放委员会，11月22日被盖世太保抓获，在逮捕时由于进行反抗受到重伤。1944年12月被处以绞刑。

№09158

普希金和盖格关于成立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 给杰卡诺佐夫的请示报告

(1944年11月)

秘密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B.Г. 杰卡诺佐夫同志：

从匈牙利问题目前的形势出发，我们认为必须提出以下建议供您参考。

1. 在匈牙利已经解放的领土上成立享有中央政权全部职能的匈牙利中央，目前尚不适宜。

第一，我们现在还无法保证这一中央的组成既能使我们接受，同时又在匈牙利各阶层的居民中享有威望。

第二，由霍尔蒂在莫斯科的代表，即使在我们的人参加的情况下组成匈牙利中央，会给我们的军事当局以及打算前往匈牙利的人民委员部代表增加困难。

第三，如果在德布勒森成立匈牙利中央权力机关，那么盟国就会提出向那里派遣自己代表的问题。克尔^①在其最后一份关于匈牙利问题的照会（今年11月19日第395-91-144号）已经明确谈到这一点。

^① 克尔，英国驻苏联大使。

2. 宜在匈牙利成立由5~6人组成、任务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应在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或匈牙利国民委员会抵达德布勒森以后命名。

3. 该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米克洛什、韦赖什上将、代表团团长法拉戈，以及纳吉和西克莱（或其他人）。考虑到森特·伊万宁对将军们的影响，森特·伊万宁和泰莱基应以委员会代表的名义留在莫斯科。

4. 委员会的职能不应包括对匈牙利地方政府的领导问题。委员会的任务应当归结为：开展反对德寇和萨拉希分子的宣传活动，在德寇占领区组织匈牙利人反对德寇的斗争，组建与德寇斗争的匈牙利部队。

5. 委员会从德布勒森搬迁到布达佩斯之前，不应当在匈牙利领土上从事组建匈牙利政府的事情。因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掌握即将进入政府的匈牙利活动家的情况。

6. 为了尽快瓦解匈牙利军队、组织匈牙利人反对德寇的斗争，上述小组宜尽快进入德布勒森开展工作。

7. 委员会的工作应当从公布共同宣言、告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军队书开始，号召与德寇做斗争，并指出这一斗争的具体形式和方法。

宣言中应提到森特·伊万宁和泰莱基是匈牙利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并指出团长法拉戈参加了委员会。在此使用他们的名字可能有正面作用。

8. 在匈牙利小组进驻德布勒森的同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及有关机构也应当进驻，他们以后将参加未来的盟国驻匈牙利管

制委员会政治顾问组的工作。^① 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匈牙利的形势，了解由我们即将成立的匈牙利各地方管理机构的人员，并组建匈牙利政府。

9. 应向匈牙利代表解释清楚，目前尚不能由所有反法西斯民主党的代表组成能够履行全部职能的政府或者委员会，因为在匈牙利解放区尚无这些党著名的代表人物。

在政府成立之前，为完成开展反对德寇工作的一些紧迫任务，可临时成立一个不大的发起小组，其名称可以称作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或者匈牙利国民委员会。所有匈牙利的民主力量可以联合在它的周围。

如果匈牙利代表反对我们的建议，那就应当让他们明白，继续拖延解决这一问题有可能导致成立类似的委员会这一问题失去实际意义。

10. 由于成立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当通知盟国，该委员会并不是权力机关，而仅仅是一批匈牙利人士的联合，目的是进行反对德寇的宣传。

Г. 普希金

B. 盖格^②

^① 1945年1月20日盟国与匈牙利签订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其职能包括监督停战条件的执行情况等。苏联元帅克·叶·伏罗希洛夫任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

^②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提交给您审议。B. 杰卡诺佐夫。11月29日。”

№09162

拉夫罗夫关于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 筹备情况给杰卡诺佐夫的报告

(1944年12月16日)

分送杰卡诺佐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急件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B.Г. 杰卡诺佐夫同志：

普希金同志的报告^①

今天，即12月16日晚10时，普希金同志用高频电话与我通话，向我通报了以下情况。

倡议召开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的小组已经在德布勒森市成立，小组由17人组成，主席是德布勒森省省长瓦沙里·伊什特万博士（关于他的资料附后^②）。除当地的活动家之外，参加倡议小组的人员还有贝洛·米克洛什上将、拉约什·韦赖什上将、格罗·埃诺、纳

① 根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委托，1944年12月普希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这次会议。自1945年1月起，普希金成为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政治顾问。

② 所收集的文件中没有这份资料。

吉·伊姆雷、市长塞格特·瓦列季尼等。

倡议小组的所有成员现在全部在位，正在进行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准备工作，据普希金同志说，他们应于12月20日之前重新回到德布勒森市。定于12月22~23日召开临时国民大会。

普希金同志建议批准德布勒森大学教授森特·彼特里·昆·贝洛为临时国民大会主席。森特·彼德里教授是德布勒森市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匈牙利著名的科学家。他是原匈牙利议会上院议员。近三年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度曾领导过德布勒森市的执政党。他对苏联知之甚少，但很想了解苏联的情况，他在与普希金谈话时声称，在匈牙利无法找到客观介绍苏联的书籍，那些宣传作品他又不愿意读。

普希金同志建议批准德布勒森大学教授山特·加利曼为临时国民大会副主席。他是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最近没有搞过政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现年45岁。他的妻子对苏联非常了解，与我们很接近。他对苏联友好，系天主教徒。

普希金同志建议批准尤哈斯·纳吉为临时国民大会第二副主席。他是1919年卡罗伊内阁^①的司法部长，是有威望的政治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倡议小组的工作。他对苏联的态度非常友好，也许因此会参加政府。

普希金请求转告：筹备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工作搞得很好。政治形势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匈牙利社会各界对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所进行的活动感到欢欣鼓舞。

^① 米哈伊·卡罗伊，1919年任匈牙利总统，后流亡国外，战时与共产党人合作并参加了反对法西斯运动。1946年回国后出任驻巴黎大使。

普希金说，他从12月12日起开始发送情报，看来情报是在他交给军事机关转发时在那里延误了。

第三欧洲司代理副司长 И. 拉夫罗夫

1944年12月16日于莫斯科^①

① 该文件附有一封短笺，其中有杰卡诺佐夫在看过情报资料之后的指示：“应该向苏萨伊科夫和普希金同志推荐绝对可靠的人作为临时民族议会副主席，以便影响议会的整个工作进程”。

№09163

杰卡诺佐夫关于匈牙利临时 国民政府成立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4年12月22日)

分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三欧洲司。

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天苏萨伊科夫将军^①用高频电话从德布勒森市向我报告以下情况：

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于今日，即12月22日闭幕。以米克洛什·贝洛上将为首的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宣言。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

此外，大会通过两项特别决议：

1. 临时国民大会委托新成立的临时国民政府呼吁苏联政府开始停战谈判。^②

2. 将国家元首的某些职能交给临时国民政府的主席及两名副主席：

- 1) 关于任命副部长；
- 2) 关于任命将军和某些级别的国家官员。

① И.З. 苏萨伊科夫，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② 苏联与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停战谈判是12月28日在莫斯科开始的。

在回答苏萨伊科夫同志的问题——谁应当参加匈牙利停战代表团时，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先由他们就地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电告我们。

今天我们将准备公布在德布勒森市成立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和匈牙利政府的消息，并呈送您批准。

B. 杰卡诺佐夫

1944年12月22日于莫斯科

№ 09205

普希金与米克洛什关于 改变匈牙利政府成员问题的谈话纪要

(1945年7月3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第三欧洲司，归档。

摘自 Г.М. 普希金的日记

秘密

米克洛什找我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说，据他所掌握的情报表明，拉科西^①想把财政部长瓦沙里、司法部长瓦连蒂尼、供应部长法拉戈、教育部长泰莱基从政府中清除出去^②。米克洛什说，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他深信下一步要清除的就是总理本人。他想了解我对这一计划的态度。我极力向米克洛什打听是何人向他透露的这一消息，但是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米克洛什说，各种不同来源的传闻都能传到他的耳朵中，萨卡希奇、蒂尔迪等人已将部分内容说与他听，我对米克洛什说，变更任何一位部长，基本上都应由派自己代表到政府中任职的党来决定。如果党决定以新的更加称职的人选顶替自己的部长，那就未必有理由对此加以反对。我发现，他看来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即由于以新部长格罗和巴恩取代加博

① 拉科西·马加什，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政府国务部长（副总理）。

② 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1945年春天就确定了“削弱匈牙利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这一任务，以后又规定要撤换部分部长，其中包括这里所谈到的财政部长瓦沙里和供应部长法拉戈。

尔·约瑟夫和塔卡奇·费伦茨，政府只能得到加强，米克洛什同意这一点。我对米克洛什说，他作为由各民主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总理，应当考虑各党意见以及它们加强政府组成方面的措施。我对米克洛什说，我只是在总体上对这一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各党具体更换谁，这是他们的事，目前各党领导人至少还没有具体地同我谈论这一问题。至于说到米克洛什本人，我告诉他，请放心，即我们不会把他视为政府的临时人物，我提醒他说，他不止一次地有机会证明我们对米克洛什个人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对他将是一个帮助，而且会一直延续下去，如果米克洛什对此不予阻挠的话。谈到最近对他的意见时，我告诉他，他也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行动把我们置于困难境地，那时，他曾反对各民主党派采取的措施，并正是以此而使自己的处境复杂化。如果他要倾听各个党派，也就是广大居民阶层的声，那么我们支持他也就比较容易。我向米克洛什指出了匈牙利政府根据司法部的要求通过的有关将战犯和法西斯分子的案件由内务部审理转到司法部审理的法令。我向米克洛什指出，这一法令没有事先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协商，所有部长对该法令的草案事先也不了解，几乎没有讨论就提交表决。我对米克洛什说，他并不知道伏罗希洛夫元帅曾就司法部拖延与战犯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而反复找瓦连蒂尼交谈过。从那以后，情况就很少向好的方面转化。依照我们的看法，将战犯的案件由内务部（民警局）移交给司法部不会有任何好的兆头。米克洛什责难民警局，说它办事不公，逮捕无辜等等。我回答米克洛什说，我赞同他务必在民警局实施整顿。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民警局是国家在隔离战犯和法西斯分子方面采取行动的惟一机关，任何人，尤其是政府都没有帮助民警局：没有支付薪金，没有保证它的服装供应等等。为了在民警局实施整顿应当首先保证它的正常工作，政府需要从这件事做起，而不是首先通过法令剥夺民警局捍卫和保障匈牙利民主制度

的权利。米克洛什同意这一点，他说，他认为政府法令是不成功的，并保证不予签署。米克洛什说，他曾就监督民警局活动问题通过的决议而与各党领导人和内务部长协商过。谈到帮助民警局的问题，他答应向它提供帮助。

盟国管制委员会驻匈牙利政治顾问 Г. 普希金

1945年7月3日于布达佩斯

№09208

斯米尔诺夫关于匈牙利政府改组问题

给杰卡诺佐夫的报告

(1945年7月27日)

秘密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B.Γ. 杰卡诺佐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①和普希金提出了下列问题。

1. 由于匈牙利政府许多部长已易人，教育和文化部长泰莱基·盖佐就不要更换了。

2. 在8月底召开匈牙利临时国民会议。

我们认为，出于下述考虑，伏罗希洛夫和普希金同志的提议应予以支持。

原定的改组内阁计划几乎全部落实，贸易部长、运输和邮电部长、工业部长早已更换，新的恢复和建设部也已建立。7月21日，匈牙利临时国民会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财政部长瓦沙里·伊什特万、司法部长瓦连蒂尼·阿加什泰和供应部长法拉戈·加博尔等人的辞呈，并任命奥尔特瓦尼·伊姆雷（小农党人）为财政部长，任命里斯·伊什特万（社会民主党人）为司法部长，任命罗奈伊·山多尔（社会民主党人）为供应部长，同时还任命了2名辅佐总理的新助

^① 苏联元帅克·叶·伏罗希洛夫，时任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

手。

在内阁的现有组成人员中有以下几个政党：共产党员 3 人；社会民主党员 3 人；民族农民党员 1 人；独立小农党员 3 人；公民民主党员 1 人；无党派人士 2 人。

因此，在内阁新组成人员中，大多数席位属于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接近共产党人的民族农民党人。

离开政府成员的有能力差的部长（如加博尔——共产党人），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代表（瓦连蒂尼）、小农党右翼代表（瓦沙里）和反动分子法拉戈。

目前可以不更换泰莱基，他在政府的现有成员中不是危险人物。泰莱基离开政府只能强化这样一种看法，即内阁改组完全是在我方压力下进行的。

我们认为可以同意伏罗希洛夫和普希金同志关于在 8 月底召开匈牙利临时国民会议的建议。国民会议应当批准匈牙利改组政府的行动纲领和批准早先颁布的法律和法令，其中包括有关土地改革的法令。

关于制定匈牙利新的民主政府宪法的原则也日臻成熟，解决这一问题是在国民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

还应当考虑到，临时国民会议曾有过一次被推迟，因此，它再一次被推迟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委托伏罗希洛夫和普希金同志与友人一起草拟召开临时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规则是适宜的。

第三欧洲司司长 安·斯米尔诺夫

1945 年 7 月 27 日于莫斯科

No09220

伏罗希洛夫关于美国将与匈牙利 建立外交关系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9月21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我刚刚应米克洛什总理的要求接待了他。米克洛什告诉我说，美国驻匈牙利政治代表肖恩菲尔德向吉恩杰希外长递交了如下内容的信件：

“部长先生：

我国政府指示我通知阁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准备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并同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讨论这一问题，条件是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绝对保证它将确保为在匈牙利建立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而进行自由的和无障碍的选举，以及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将按照停战协定，确保建立一种给所有匈牙利民主主义政党以政治自由和集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即创造有可能在匈牙利组织自由选举的条件。

我谨此请求阁下尽快以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的名义对此信做出答复。

借此机会，我谨向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阿图尔·肖恩菲尔德”

米克洛什通报了这一情况后请求我回答该如何答复肖恩菲尔德。我问米克洛什，他自己打算做出怎样的答复。他说，他打算告知肖恩菲尔德说：匈牙利准备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匈牙利临时政府将做到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以确保自由和无障碍大选的进行。

我委婉地提醒米克洛什注意肖恩菲尔德信中的侮辱性腔调，并向他解释说，对举行自由和无障碍选举的保证乃是来自临时政府和政府机构的民主性质。米克洛什答应照此精神回答肖恩菲尔德。我向米克洛什强调，我之所以就此问题说出我的看法，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向我提出了这一问题。在谈话的最后米克洛什表示，他带着这份文件到我这里来是因为匈牙利政府希望首先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我对他的这一建议尚未答复，但是我认为我们立即并且不提任何条件地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将是适宜的。

请速予指示。

克·伏罗希洛夫

1945年9月21日8时20分于布达佩斯

№09221

**普希金关于匈政府对
苏美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建议
的反应给维辛斯基的电报（摘录）**

（1945年9月26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致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于2时30分前往会见了总理。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①交给了他。米克洛什当时正在召开政府临时会议，会上应该讨论匈牙利政府对美国人就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发来的照会的答复。政府会议因伏罗希洛夫元帅前来拜会米克洛什而中断。在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书面提议之后，米克洛什重又回到政府会议上，并立即向政府成员宣布了苏联政府关于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内阁部长们起立鼓掌欢迎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并当场确定了对苏联政府所提这一建议的答复文本。随后内阁开始讨论对美国人照会的答复。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匈牙利政府给美国人答复的副本，但此份文件的简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匈牙利政府表示同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对美国政府迈出

^① 即苏联政府与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决议。

的这一步表示感谢。接下来在答复中说，美国政府关于在匈牙利举行自由和无障碍选举的愿望是与匈牙利政府的意向相一致的。依靠新匈牙利的民主体制、民主的临时国民政府及其设在各地方的民主机构，可以保证在匈牙利进行民主的选举，并建立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常设政府（给美国人的复信内容系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产党人部长格罗的话归纳的）。

今天晚上 19 点，米克洛什总理和巴洛格副总理拜会了伏罗希洛夫元帅，并把匈牙利政府对苏联政府关于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的答复交给了他。

明天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将刊登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建议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一事的官方公告和匈牙利政府对此建议的答复，以及关于美国政府就此问题发来的照会的报道和匈牙利政府对该照会的答复。关于苏联政府建议的公告将登在头版头条。所有报纸明天都将就此问题发表社论。左翼报刊将强调，苏联政府提议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9 月 27 日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城市将组织庆祝苏联与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示威游行。

现在我报告匈牙利政府对苏联政府关于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的答复全文：

“元帅先生，

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高兴地得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此外，临时国民政府还要感谢苏联政府在通知此事的同时还承认和肯定了匈牙利对盟国反对希特勒德国斗争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并明确认定，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在认真执行 1945 年 1 月 20 日签订的停战协定。

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谨此请求您报告苏联政府：匈牙利高兴地准备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

在向元帅先生通报此事的同时，我请求您接受我对您诚挚和深深的敬意。

总理 米克洛什”

普希金

1945年9月26日2时30分于布达佩斯^①

^① 原文件上有维辛斯基的批示：“准备关于恢复与匈牙利关系的公报。文本的方式同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一样。安·维辛斯基。9月26日”。

№09223

贝利亚关于伏罗希洛夫释放 匈牙利战俘的建议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10月21日)

呈约·维·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归档。

绝密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报告说，美国和英国驻奥地利军事当局已着手从自己的战俘营里释放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战俘。

鉴于匈牙利行将举行的大选，伏罗希洛夫同志认为最好从我们设在匈牙利领土上的战俘营里释放出那些未在德国党卫军、冲锋队、讨伐部队服过役，并且没对苏联公民犯下暴行的被俘匈牙利军官。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的被俘匈牙利军官总共有10356人，其中有83人现关押在匈牙利豪伊马什凯尔市的第26号战俘营。所有关押在匈牙利领土上战俘营里的这83人均未在党卫军、冲锋队和讨伐部队中服过役，因而都可以移交给匈牙利政府。

请您予以批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5年10月21日于莫斯科

№09224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竞选运动的进程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0月22日)

秘密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兹将有关共产党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最新资料，国内共产党员的数量已超过50万人。不言而喻，匈牙利共产党的党员还远不能被称之为共产主义者。与其他群众性政党，其中包括独立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人不具备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算10名中央委员的话。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在工人当中，“左”倾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随着国内总的经济状况，其中包括粮食状况的不断恶化而日益加强。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混入了不少刑事犯罪分子和各种从前曾经支持过法西斯分子甚至参加过法西斯组织的名利熏心者和冒险之徒。这些人正以其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削弱着党的特别是各地方上党组织的影响。

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把一切混入党内的分子清洗出党。但是党的领导人没有充分彻底地进行这一工作，担心在大选前夕给党的队伍带来纷争并进而削弱其在国家中的地位，然而各种坏人在党内的存在同样对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产生消极的作用。

拉科西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极少研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只热衷于开群众大会，搞大轰大嗡。在粮食状况日益困难和面临持续不断的引起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每天都在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时刻，共产党人没有提出任何一项旨在同这一祸害作斗争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诚然，其他政党在这方面也同样是无所作为。但是正因为这样，共产党人才应该采取主动行动。当然，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显现出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共产党的领导人热衷于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他们10月6日在布达佩斯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召集起了近30万人赴会。共产党尚未学会在自己的党员中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而小农党则按另外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宣传工作：它没有去召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是挨家挨户，逐个教堂，在不同的人群当中，特别是在实际上决定了布达佩斯投票结果的妇女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在这当中显示出了独立小农党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在竞选斗争方面的丰富经验。匈牙利共产党人在我们的军队进入匈牙利之后不知不觉地成了工人群众和国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因而骄傲起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没能清醒地估量国内各争斗势力的力量对比。在布达佩斯的竞选遭到失败之后，拉科西及其朋友们一度惊慌失措。由惯于偏激行事的雷瓦伊领导的共产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开始了不能容许的反对小农党的运动，在对该党的攻击中，把该党的右翼和左翼人士混为一谈，从而使两党之间不论在首都还是在各地方，特别是在各地方上的关系大大地复杂化了。我们已要求共产党人改变在《自由人民报》文章中和共产党人在群众集会上演讲的内容，从而不仅改善了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防止了工人可能对小农党采取的过火行为。现在共产党已基本上镇静下来，领导人已掌握住了局面，纪律也已经恢复。正如从前已报告过的那样，蒂尔迪和拉科西同萨

卡希奇一道已经在三党^①合作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而不论大选的结果如何。

拉科西在国内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他作为一个并不出众的政治家，陷入了党派间无关紧要的争论，因而或多或少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应当指出，在德布勒森的时候，拉科西的威望比现在要高得多。当时所有政党都把他看成是民族英雄，而现在他越来越变成仅仅属于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在整体上非常有害于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情况是他们放在最重要位置的不是匈牙利族人。围绕这一点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其他政党的代表那里传来反犹太主义的声音及他们的反共宣传。

现在简单报告一下各政党在大选中组成“竞选联盟”的可能性。该联盟的“倡导者”是独立小农党^②的领导人。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要求我在10月19日接见他们，我同意了。在同他们的交谈中，话题涉及到了四党联盟^③问题，但蒂尔迪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党不能参加这样的联盟，否则，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的选票，甚至改变未来政府的面貌。后来，当一些大党已经就结成联盟问题相互间达成了协议的时候，我单独接见了社会民主党人。从我们这一方面没有对蒂尔迪和纳吉，同样也没有对社会民主党人施加过任何压力。我们没有接见过其他政党的代表。英国和美国记者就这一问题所做的报道是不真实的。蒂尔迪通过格里戈里耶夫同志主动请求我同意驳斥外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关于“俄国人对小农党在建立竞选联盟问题上施加压力”的说法。我同意了他这样做。10月22日将进行这样的驳斥。

① 即独立小农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② 原文如此。根据下文的意思，这里可能是民族农民党之笔误。

③ 指独立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农民党。

至于现在组成四党竞选联盟问题，我已建议拉科西同志今天立即试探一下蒂尔迪和萨卡希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拉科西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同蒂尔迪谈了话，蒂尔迪根据上次谈到的同样理由，坚决地拒绝组成四党竞选联盟。他说服拉科西相信，留在联盟之外的一些小的资产阶级政党将得到所有不满者，其中包括他的小农党的不满者的选票。蒂尔迪认为，这将意味着左翼资产阶级分子更加活跃起来，并在议会以至在全国起到重要作用。蒂尔迪建议拉科西让各党分别提出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但一定要以四个政党的名义发表一项告居民书。在告居民书中必须指出，这几个党今后仍将联合在一起共同工作，并为此目的而建立一个稳固的、有工作能力的联合政府，同时也要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个政府工作的首要纲领。此外，蒂尔迪还建议在告居民书中指出，各政党迄今为止合作得很友好，甚至曾想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但是一些右翼政党没有同意这样做，从而破坏了这一联盟。如果这一做法为大家所接受，则四个政党的领袖——蒂尔迪、拉科西、萨卡希奇和科瓦奇均应依据宣言的精神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

接着，蒂尔迪建议现在就立即达成协议，甚至最好马上着手组织新的强有力的政府。拉科西没有同意立即着手组织新政府，但是他同意就蒂尔迪提出其他所有问题再谈一次，不过是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起来谈。据拉科西说，这一谈话将于明天，即10月21日上午11点进行。我没有反对拉科西明天上午同蒂尔迪和萨卡希奇的会晤，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任何联盟均已无望组成。我认为必须同意蒂尔迪的建议，因为连拉科西都不对其表示反对，而且很可能萨卡希奇也将同意，他们的目的都是想现在就做好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将来组成联合议会和联合政府。

我已经报告过：蒂尔迪在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之后对自己的出乎意料的胜利感到后怕，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他的党得到的选票多数

是来自反动的右翼和半法西斯主义分子。他怕在议会选举中再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在选举之前就想把自己的党同其他党，特别是同工人政党通过相应的联合行动连结在一起。

各党最好的联合当然是在大选中提出一份统一的候选人名单，但是小农党将不会同意这样做，因为其右翼的敌对情绪很强烈。鉴于现在已经谈不上推迟大选的问题，而且选举日期正日益临近，所以恳请速予指示。

伏罗希洛夫

1945年10月22日

№09225

莫洛托夫等人关于伏罗希洛夫擅自同意 匈四党发表预选宣言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10月24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天我们研究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由匈牙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小农党和民族农民党发表一项联合宣言的建议，并认为发表这样的宣言是不适宜的，并已通过高频电话向伏罗希洛夫转达了这一点。我们认为伏罗希洛夫同志未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擅自同意匈牙利共产党人签署该联合宣言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建议通过如下内容的政治局决议：

“鉴于伏罗希洛夫同志10月22日就匈牙利竞选运动问题发来的两次话传电报，中央政治局决定：

1. 鉴于小农党已经拒绝同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农民党组成竞选联盟，认为发表上述四党联合宣言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发表这样一个文件可能会被小农党利用来掩盖其拒绝参加四党竞选联盟的事实。

2. 向伏罗希洛夫同志指出，他未经中央同意，擅自批准拉科西同志发表匈牙利四党联合宣言的做法是不对的。”

维·莫洛托夫

拉·贝利亚

格·马林科夫

阿·米高扬

1945年10月24日1时15分于莫斯科

№09230

莫洛托夫等人关于伏罗希洛夫对 匈政府组成的建议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11月10日)

致斯大林同志

现呈上我们刚刚收到的伏罗希洛夫的话传电报。^①

我们建议给伏罗希洛夫下列指示：

1. 不反对来电中指出的各政党在新的匈牙利政府中职位的分配方案，但要坚持由共产党人掌管原拟交给小农党的内务部而不是财政部。

2. 建议另外再设立两个副总理职位给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取代蒂尔迪原先建议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担任但遭到拒绝的两个不管部长职位。

3. 伏罗希洛夫应当集中主要注意力确保从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任命那些在个人方面能为苏联政府接受的人士为新的匈牙利政府的成员。

4. 在新政府组成之前，共产党人应当努力同其他政党就新政府工作纲领的要点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纲领无疑将能确保对苏联的

① 在电报中，伏罗希洛夫通报了关于在各党派谈判时确定下的以蒂尔迪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初步组成。拟定政府由以下组成：小农党7人，共产党3人，社会民主党3人，民族农民党代表1人。关键的职位：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都由小农党成员担任。

友好态度，确保对将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支持，确保得到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支持和根除在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残余。

请您做出决定。

维·莫洛托夫

拉·贝利亚

格·马林科夫

阿·米高扬

1945年11月10日于莫斯科

№09232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政府组成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1日)

秘密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你们的指示，今天我们的朋友向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小农党领导人提出了关于内务部长及副总理职位的问题。其余的问题均未引起不同意见，因而将获得解决。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没有答应在转让内务部长职位问题上支持共产党人，而且还表示想要得到这个他们自一开始就一直要求得到的职位。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对拉科西说，如果内务部长一职转由共产党人担任，他们的党将无法理解。他们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仅答应同本党的中央委员会商讨此事。

为争夺内务部长一职，三个政党之间将进行一场尖锐的斗争。有必要报告如下情况：

内务部下辖两个工作部门——行政部门和民警部门。对民警部门的领导权最为重要。该部共有两位副部长：负责行政机关和负责领导民警机关的。后者是共产党人法尔卡什·米哈伊（沃尔夫，青年共产国际前书记）。如果共产党人像我们现在所争取的那样，得到了内务部长一职，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民警机关工作的副部长一

职就将转由小农党人担任。此种方案可以采取，因为部长可以对民警机关的事务施加影响。如果内务部长一职交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因为后者一直力争做到这一点和因为小农党在这个问题上宁可支持他们也不支持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则小农党肯定将力争把负责民警机关工作的副部长职位弄到自己手中，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与社会民主党人事先约定互予支持。

因此，我请求你们同意，如果独立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坚决抵制把内务部长一职让给共产党人，则将此职交给蒂尔迪，以便让法尔卡什领导民警机关。小农党原定的内务部长人选科瓦奇·贝拉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同他是可以合作的。

关于把财政部长一职让给小农党问题，蒂尔迪说，他需要同自己的党商量一下，但是他个人认为共产党人不便于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因为这样将会使政府同银行，总的来说同金融界的关系出现麻烦。同时，蒂尔迪还对拉科西说，银行界的代表已经拜访过他，并且表示反对让共产党人出任财政部长。

至于再设立两个副总理职位问题（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蒂尔迪表示，他现在不能代表党做出回答，但是他预料他的党反对这一点要比反对补充设立不管部长职位更加坚决。独立小农党在大选之后曾经同意让拉科西和萨卡希奇以不管部长身份进入政府，但条件是在政府中，包括总理在内，不得打破力量对比关系——50%的部长由小农党人出任，50%的部长由其余各党派。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力图掌握拥有实权的部，因此拒绝了让拉科西和萨卡希奇以不管部长身份进入政府的想法。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听取了共产党人的要求并答应于11月11日给予答复。

克·伏罗希洛夫

1945年11月11日3时45分于布达佩斯

№09235

伏罗希洛夫关于干预匈牙利政府组成的必要性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3日)

秘密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昨天拉科西已经告知小农党领导人，他不能接受蒂尔迪关于未来政府的人员组成及按政党对职位所做分配的建议。拉科西表示，他坚持自己关于把内务部而不是财政部部长职位交由共产党人担任和补充设立两个副总理职位的建议并对这样做的理由做了相应的说明。

鉴于小农党没有对共产党人做出让步，我们被迫对政府的组成问题进行了干预。昨天晚上普希金同志先同小农党主席纳吉·费伦茨初步地谈了谈，今天我又会见了该党领袖蒂尔迪·佐尔坦。通过纳吉和蒂尔迪都保证对之予以保密的谈话，小农党的领导人已倾向于做出让步。蒂尔迪对我说，他将努力去说服自己的同志不反对把内务部长一职交给共产党和放弃此前提出的把这个部一分为二的建议。经过长时间乏味的谈话之后蒂尔迪终于表示，他将不反对任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出任副总理，但是他要求不是马上而是在国民议会会议之后再进行这一任命。在国民议会会议之前先让未来的副总理以不管部长的身分进入内阁。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

的理由是，他需要时间去说服自己的党相信这些任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他表示：“否则的话我就得离开我们党的领导岗位，而这也并不能缓和整个局势，其中包括政府组成方面的形势。蒂尔迪没有谈及破坏政府中的人数均等原则问题——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小农党的高层领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小农党作为对两个副总理职位的抵偿而要求得到两个不管部长的职位。”

接着蒂尔迪提醒我说，鉴于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在觊觎内务部长一职，故他们可能不同意将此职交给共产党人。我回答蒂尔迪说，如果小农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则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同意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现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晚些时候将举行三党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政府中职位分配问题。我将于今天夜间或者明天早晨向你们报告这次会议的结果。

如果蒂尔迪的地位在他的党内受到动摇——这是非常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好还是做出让步，同意蒂尔迪关于暂时先任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一名担任不管部长，但条件是在国民议会会议之后，他们最迟在10日内由政府发布决定出任副总理。共产党方面的副总理人选应当是格罗·埃诺。格罗在政府工作的业务素质方面胜于拉科西。另外，他们两人当中的一个必须专注于党内的的工作，而这个角色拉科西更适于担任。最后，也不便于从共产党一下子派出两名非匈牙利族^①的部长进入政府。

如果小农党的领导人坚持要保持自己的半数部长职位，请你们指示，我们可否做出某些让步，其中包括可否同意该党提出的补充两个不管部长职位的意见。如果按这个方案去做，小农党在政府中

^① 拉科西和格罗都是犹太人。

包括总理在内将有 9 个职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副总理在内各有 4 个职务，民族农民党有 1 个职位。

克·伏罗希洛夫

1945 年 11 月 13 日于布达佩斯

№09237

伏罗希洛夫关于匈牙利政府组成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4日)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通过今天同3个政党领导人的谈话及刚刚结束的各党联席会议，现已就匈牙利政府的组成人员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 1) 总理蒂尔迪（独立小农党）；
- 2) 副总理拉科西（共产党）；
- 3) 副总理萨卡希奇（社会民主党）；
- 4) 内务部长纳吉·伊姆雷（共产党）；
- 5) 外交部长吉恩杰希（独立小农党）；
- 6) 财政部长（独立小农党）；
- 7) 重建部长安托尔（独立小农党）；
- 8) 供给部长巴罗涅什（独立小农党）；
- 9) 新闻部长（独立小农党）；
- 10) 国防部长通博尔（独立小农党）；
- 11) 农业部长（独立小农党）；
- 12) 工业部长班恩（社会民主党）；
- 13) 司法部长里斯·伊什特万（社会民主党）；
- 14) 贸易部长罗奈伊·山多尔（社会民主党）；
- 15) 交通和邮电部长格罗（共产党）；

- 16) 社会保障部长莫尔纳尔 (共产党);
- 17) 教育和宗教部长克雷斯图里 (民族农民党);
- 18) 不管部长 (独立小农党)。

关于暂缺的部长职位的人选问题将于明天在三党联席会议上加以讨论。

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要求我，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不要坚持明天就宣布拉科西和萨卡希奇为副总理。他们将在新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做这件事，蒂尔迪在这次会议上将任命他们二人为副总理，然后在议会对此予以确认。在新内阁举行会议之前，拉科西和萨卡希奇将被看做是不管部长。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为自己的这一要求阐明的理由是，这样他们将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自己党的领导层对新政府组成人员的认可。萨卡希奇和拉科西都同意了这一点。考虑到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件麻烦事可能还要拖上数天，还可能出现意外的新的麻烦，故我也没有反对这样的安排。独立小农党的领导人坚持要求让他们的党在政府中再增加一个不管部长的职位。他们为这一要求提出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民族农民党在政府中拥有 7 个部长职位，而他们的党则只有 6 个。他们还说，如果萨卡希奇和拉科西以不管部长身分加入内阁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了。但是由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将以副总理的身分入阁，则他们就不能不在按党派计算部长职位数量的时候把副总理职位也算在内。社会民主党对此立即表示了同意。共产党人考虑到他们的建议已被全部接受，也难于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异议。我个人也认为，可以对蒂尔迪做出让步。在此之后蒂尔迪和纳吉又建议为他们的党设立一个合作社部的部长职位。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个建议将使小农党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仅对农村而且对产业工人施加影响。接着又提出了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设立新闻部的建议。我们将努力从小农

党中物色一位左翼人士出任此职，同时争取让一位共产党人去该部担任副部长。

克·伏罗希洛夫

1945年11月14日0时15分于布达佩斯

№09246

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关于匈牙利总统选举 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1946年1月6日)

秘密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今天会晤了总理蒂尔迪和国民议会主席纳吉·费伦茨。首先，我们请他们向我们通报一下国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和这次会议的议程。

纳吉·费伦茨说，国民议会将于今年1月20日左右开会，确切日期尚未确定。对本次会议章程的讨论将用去大约5天的时间。然后，将决定匈牙利的国家体制和通过主要的宪法条款。最后，将选出国家元首——总统。我们指出，像确定国家体制这样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国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上首先加以解决。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反对这样做，他们说，匈牙利的国民议会尚未办完手续，因为这个议会的章程还没有制定和通过。

蒂尔迪说，为了不引起对国民议会权能的任何怀疑，必须首先通过它的章程。此外，需要给各政党的领导人以同自己的议员团讨论国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的时间。他们可以在本次会议的前5天时间内做完这件事情，那时将通过国民议会章程。我们没有同

蒂尔迪和纳吉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只是说，我们还有时间同他们再次讨论议会第二次会议的议程问题。

关于匈牙利的国家体制问题，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说，绝大多数独立小农党的议员将赞成共和国，只有那么十来个人主张君主制。

我们责怪他们说，在他们的党内有反民主分子——公开的君主制拥护者。蒂尔迪和纳吉辩解说，他们党内混入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还未整顿好自己党内的秩序。蒂尔迪说，可以相信，在下次大选之后从独立小农党里将不会有一个抱有主张君主制思想的人当选为议员，因为到那时在党内就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我们直率地向蒂尔迪和纳吉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在匈牙利正统主义运动正在加强，一些独立小农党颇有影响的成员也参与其中。纳吉·费伦茨没有否认这一点，但试图自我辩解，他说，小农党的领导是有意地派一些自己的成员到正统主义者那里，目的是了解这一运动的情况。

在谈到独立小农党成员中的反民主情绪时，我们援引了沃尔加·贝洛昨天关于辞去全国最高委员会^①委员职务的声明。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争先恐后地解释沃尔加·贝洛辞职的原因，说沃尔加·贝洛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甫，不肯依法核准死刑判决。据我们所知，沃尔加·贝洛辞职是受了对政府采取的民主措施持有异议的明曾蒂大主教的影响。有材料表明，此事也有英国人插手。因此我们笼统地对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说，这一辞职带有政治性质并且具有明显的反民主倾向，这一辞职是发生在临时机构——全国最高委员会撤销之前两个星期。

^① 全国最高委员会是在1946年2月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之前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我们没有掩饰我们对独立小农党奉行的政策的不满，这一政策当前基本上也在决定政府的政策。我们还笼统地指出该党有意拖延德国人问题的解决和千方百计地阻碍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反民主分子等等。

接着我们还指出，对于苏联，这一政策导致不愿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导致不履行停战协定规定的义务和不是努力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而是试图同苏联玩花招、耍手腕。

说到这里，我们说，匈牙利的局势对于我们绝非毫不相干，因苏联曾经为匈牙利的解放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

纳吉·费伦茨和蒂尔迪表示，他们完全清楚我们对匈牙利事务的关心和我们对他们的党及政府政策怀有戒心的原因，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戒心有足够的根据，但是将尽一切努力使其得以消除。

蒂尔迪说：我们明白，只有同苏联的友谊才能确保匈牙利的繁荣昌盛，而这种友谊只有通过广泛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往才有可能建立。

最后，我们讨论了总统的人选问题。蒂尔迪和纳吉请求我们支持让一名独立小农党的成员出任总统一职。我们回答说，苏联方面将给他们以这样的支持，条件是匈牙利政府将认真地完全成自己对苏联的各项义务并真诚地与之合作。

蒂尔迪和纳吉·费伦茨千方百计地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定将履行这些条件。我们强调，关于总统确定人选提出的问题——那是他们党自己的事。

蒂尔迪和纳吉对此次谈话表示了感谢。现在，看来在独立小农党内部以及在各政党的领导人之间正开始讨论总统的人选问题。就

此问题我们将继续向您做出报告。^①

B. 斯维里多夫^②

Г. 普希金^③

1946年1月6日于布达佩斯

① 在匈牙利总统职位候选人中的两个竞争者是费·纳吉（得到右派支持的小农党中派代表）和佐·蒂尔迪（依靠小农党左派）。以大主教明曾蒂为首的天主教教士激烈地反对佐·蒂尔迪。在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农民党之间则达成了支持候选人蒂尔迪的协定。最终，小农党政治委员会和议会党团推荐了蒂尔迪。

② B. П. 斯维里多夫，时任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③ Г. М. 普希金，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公使。

№114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匈牙利
缔结和约的指示**

（1946年3月21日）

绝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出的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缔结的和平条约草案，批准给在伦敦四国外长会议上参加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缔结和平条约的副外长级协商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并作如下修改：

（1）在关于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缔结和平条约的指示中指出，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应各裁减到 50000 人；

（2）在关于同保加利亚缔结和平条约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向保加利亚索取的战争赔款不应超过 4500 万美元的现金或相当于这笔钱的实物。

1946年3月21日于莫斯科

附 件

**对参加伦敦四国外长委员会
副部长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关于同匈牙利缔结和平条约

参加四国外交部长委员会副部长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应该遵循苏联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提交外长委员会伦敦会议审议的关于同匈牙利缔结和平条约的建议（见附件1^①），以及外长委员会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缔结的和平条约适用于匈牙利的协商一致的协定。

在讨论美国和英国提交外长委员会会议审议而尚未审议的建议（见附件2和附件3^②）时，苏联代表团应该遵循：

1. 限制武装力量（英国备忘录第3点和美国备忘录第3部分）。

把外长委员会通过的美国的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如果在讨论这一建议时要说出削减军备的具体数字，那么应提出，匈牙利的军队应该裁减到50000人。

反对设立削减军备监察员。理由是，签署和平条约后匈牙利即将进入联合国。

反对限制军工生产。理由是，匈牙利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再坚持，就同意限制军事工业部门。

2. 从匈牙利撤军（英国备忘录第4点）。

不反对英国的建议，附带的条件是，留下一些部队，用于守卫红军从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撤离的交通线。

3. 特兰西瓦尼亚（英国备忘录第6点，美国备忘录第1部分第2点）。

坚持苏联代表团关于把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移交罗马尼亚的建议。

4. 关于匈牙利的边界（美国备忘录第1部分）。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②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个附件。

应在和平条约中规定恢复截至 1937 年 12 月 31 日的匈牙利边界。

5. 战争赔款（美国备忘录第 5 部分）。

同意以匈牙利在相关盟国的资产作为战争赔款。但是，反对将匈牙利在中立国的资产作为损失补偿。

反对成立监视匈牙利执行和平条约规定义务情况的盟国委员会。

6. 关于匈牙利承认多瑙河体系（英国备忘录第 6 部分第 7 点）。

如同在外长会议例会上所做的那样，不接受英国人的建议。

7. 在获取原料，进行贸易和工业生产，利用港口、河流和通航设施方面的权利平等（美国备忘录第 6 部分）。

不接受美国人的建议。理由是，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共同协商规定出适用各个国家的办法。

8. 关于主权（美国备忘录第 7 部分）

反对将恢复主权的条款列入条约。理由是，缔结和平条约本身就是恢复罗马尼亚^①的主权。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这一点已经按照同意意大利缔结的条约通过，那么就说，我们同意把关于主权这一点从所有的条约中去掉。

9. 保留或取消双边和多边条约（英国备忘录第 5 部分第 7 点）。

我们对这一建议持保留态度，直至收到具体的指示和搞清楚是指哪些条约。

10. 经济和财政问题（英国备忘录第 8 点）。

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平条约中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的篇幅，坚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匈牙利。

持保留苏联 1945 年 9 月 12 日建议的第 1、3 点。

11. 军人墓地（英国备忘录第 8 部分第 7 点）。

苏联代表团不应接受这一建议。

12. 承认取消国际联盟和常设国际审判庭（英国备忘录第 2 部分第 7 点）。

不反对英国的建议。

13. 承认联合国的权力机构（英国备忘录第 3 部分第 7 点）。

不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因为支持匈牙利作为联合国候补成员国已有明文规定。

万不得已时可以让步。

№09263

莫洛托夫与吉恩杰希关于准备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6年4月9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普希金（布达佩斯），送巴尔干国家司。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秘密

参加会见的有杰卡诺佐夫同志，普希金同志，B.H. 巴甫洛夫同志（外交部），匈牙利公使塞克费尤·久拉和匈牙利驻苏联外交代表团秘书卡缅。

莫洛托夫问，代表团抵达后休息了没有。

吉恩杰希^①回答说，代表团没有怎么休息，因为抵达莫斯科后他们要立即投入工作。

莫洛托夫问，吉恩杰希现在想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

吉恩杰希说，他想谈与准备和平条约有关的问题。首先他想代表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对于苏联给匈牙利的关注表示感谢。

吉恩杰希说，匈牙利面临如何对待自己的两个邻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同这个国家进行过多次谈判，并就某些问题，其中包括居民交换问题达成了协议。遗憾的是，这一协议

^① 亚诺什·吉恩杰希，匈牙利外交部长。

只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自愿移居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数量为5万人，而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统计数字，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数量为65万人。以前捷克斯洛伐克人奉行把匈牙利人排挤出行政机构的政策。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同意把某些匈牙利人留在斯洛伐克。可是，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45万匈牙利人面临着要么被迁出，要么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移居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匈牙利无论从经济条件或政治条件上都没有能力接收这45万人。^①

莫洛托夫问，为什么吉恩杰希把这一数量定为45万人。

吉恩杰希解释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留下20万匈牙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同意在这些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是斯洛伐克人的条件下接收他们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根据协定，有5万人将移居到匈牙利。因此，将有40万匈牙利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政府竭力不让如此众多的人移居匈牙利。匈牙利政府力争使那些无国籍的匈牙利人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得到这种权利。遗憾的是，在布拉格举行的最初几次谈判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反对这种观点，并想方设法对这些匈牙利人强行移民。吉恩杰希在布拉格的谈判中指出，如果把全体匈牙利人迁出捷克斯洛伐克，那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该向他们提供土地，因为大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居民从事农业生产。不能把吉恩杰希的这个建议视为修改版图。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要么通过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提供平等权利的途径解决，要

① 关于交换居民的1946年2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从本国迁出匈牙利人，其数量与自愿同意从匈牙利移居到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相等；1946年6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下达了一道命令，使匈牙利少数民族面临着选择：或者承认自己是斯洛伐克人并获得国籍，或者是离开斯洛伐克领土。

么通过在经济方面保障匈牙利人的途径解决。

莫洛托夫问，吉恩杰希还有什么想谈的问题。

吉恩杰希回答说，他想谈的下一个问题与罗马尼亚有关。在罗马尼亚境内居住着 150 万匈牙利人。这一数量中包括居住在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即居住在包括巴纳特和根据特里安农斯克条约^① 并入罗马尼亚的那些地区的匈牙利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占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由于签订停战协定，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公开的问题。^② 问题的难度在于，大部分匈牙利人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东部，即集中在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只有匈牙利人中的修正派才会想到把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地归还匈牙利。而对于居住在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匈牙利人来说，可以通过确定新的匈罗边界的途径解决民族问题。匈牙利政府已制定了一个方案，根据该方案，11800 平方公里的领土和 90 万人口应该归并匈牙利。

莫洛托夫问吉恩杰希，匈牙利政府有没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向罗马尼亚人提出这个问题。

吉恩杰希作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说，他给莫洛托夫看的那张地图只有匈牙利政府成员知道。

吉恩杰希指给莫洛托夫看地图上的匈罗之间的第二条边界线，如果这条边界线被接受，问题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留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的数量和匈牙利境内的罗马尼亚人的数量将大致相等。如果采取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把匈牙利人从罗马尼

① 特里安农斯克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与匈牙利签署的，是凡尔赛体系中一系列和约中的一个。

② 1944 年 9 月 12 日与罗马尼亚签署的停战协定包括将特兰西瓦尼亚（或者是它的一大部分）转交给罗马尼亚这一条款。最终决定一直拖延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署和平条约之前。

亚移居匈牙利和把罗马尼亚人从匈牙利移居罗马尼亚，或者匈牙利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各自实行满足本国的这部分少数民族愿望的政策。

莫洛托夫问，吉恩杰希还有什么问题。

吉恩杰希回答说，他没有什么问题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提出其他问题，例如，总理打算讨论战争赔款问题和其他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明天可能要商量关于斯大林大元帅会见纳吉·费伦茨总理和吉恩杰希以及总理想带的随行人员的问题。

吉恩杰希回答说，他同意这一点。

莫洛托夫问，不知道他理解得对不对，是不是纳吉·费伦茨和吉恩杰希各自提各自的问题。

吉恩杰希回答说，总理打算提出关于战争赔款的问题以及关于匈牙利的财政状况问题。格罗想讨论一些专门问题，其中包括铁路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吉恩杰希当然知道，根据停战协定，特兰西瓦尼亚已经归属罗马尼亚。

莫洛托夫问，罗马尼亚政府怎样对待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

吉恩杰希回答说，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境艰难。

莫洛托夫问，罗马尼亚政府是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对待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那样对待匈牙利少数民族。

吉恩杰希回答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受到政治迫害，而在罗马尼亚他们面临经济破产。

莫洛托夫说，因此匈牙利人在罗马尼亚感觉不好。

吉恩杰希回答说，很不好。

莫洛托夫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有什么限制。

吉恩杰希回答说，格罗查的民主政府对匈牙利少数民族持友好态度。但遗憾的是，罗马尼亚政府的下层的机关没有执行格罗查政府的指示。所以，对于不想给格罗查的民主政府制造困难的匈牙利政府来讲，这成了一个难题。同时，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抱怨说，他们陷入困难的经济处境。吉恩杰希特别指出了谢克列尔人（对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地区的匈牙利人的称呼）是纯匈牙利人，尽管在历史上这一种族是完全独立的并独立于其他匈牙利人发展起来的。

莫洛托夫问，特兰西瓦尼亚的谢克列尔人有多少人。

吉恩杰希回答说，共有将近 30 万人。

吉恩杰希说，困难在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谢克列尔人被罗马尼亚的移民走廊分隔开来。在多数情况下，特兰西瓦尼亚各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是匈牙利人。

在以后进行的交谈中，莫洛托夫和吉恩杰希就战争后果和全世界人民对德意志人，尤其是对希特勒分子，持有否定态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说，他会把大元帅的会见时间通知吉恩杰希，并补充说，会见大概在明天晚上进行。

吉恩杰希感谢莫洛托夫。

B. 巴甫洛夫 记录

1946 年 4 月 9 日 21 时 30 分于莫斯科

№09264

斯大林与匈牙利政府代表团 关于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4月10日)

秘密

参加会谈的有：维·米·莫洛托夫，格·米·普希金，Б.Я. 格里戈里耶夫（苏联外交部），总理纳吉·费伦茨，副总理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外交部长亚诺什·吉恩杰希，交通部长格罗·埃诺，匈牙利公使塞克费尤·久拉。

纳吉说，4月4日是匈牙利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周年纪念日。匈牙利获得解放要感谢英雄的红军和大元帅斯大林。匈牙利政府认识到，解放一年后应该向斯大林元帅对解放匈牙利、使匈牙利政治生活获得自由、对匈牙利国家获得独立表示感谢。纳吉说，匈牙利政府不仅应该表示感谢，而且应该报告一下匈牙利人如何利用在大元帅斯大林热情关怀下获得的自由。纳吉请求允许简单介绍一下匈牙利的形势。他说，匈牙利正在推行联合的政策，因为获得了参与管理国家权利的各政党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匈牙利民主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政党都接受了民主政治的全部要求。匈牙利的联合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广泛的基础使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成为可能。进行了土地改革，两次更换上层领导人，匈牙利政府已经惩办并将继续惩办战犯。经济生活在左派纲领的基础上得到巩固，还进行了矿山国有化，大型企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国家银行和国内大

型银行也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制定了经济计划，组建了原材料分配管理局。为了使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在经济上翻身，匈牙利政府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匈牙利的民族政策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实行的最现代化的民族政策。反动派经常对匈牙利的民主进行攻击，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反动派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正在被取缔。匈牙利的民主依然面临斗争，但是这一斗争将取得胜利。匈牙利民主是不可能战胜的，它将保证对匈牙利人民进行再教育。

匈牙利从获得解放的那一时刻起就奉行亲俄的官方外交政策。由于政府在这方面加强教育人民，使民主得到了巩固。这一外交政策（发展同苏联的诚挚而深厚的友谊）已经深入人心。除了感激之情以外，匈牙利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状况也要求它奉行现实的政策，这一现实政策的道路通向苏联。纳吉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高兴地报告斯大林大元帅，为了进一步加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今年4月8日签署了关于成立苏匈铝土和石油联合公司的协定，在此之前还签订了民航协定和航运协定。

纳吉接着说，匈牙利政治的现今领导人过去受到过迫害，现在他们坚信自己的政治原则，并汲取了反动的匈牙利奉行的外交政策的教训。纳吉强调指出，匈牙利完全信赖苏联和斯大林大元帅。作为匈牙利总理，他正是出于这种信赖才打算汇报一下匈牙利解放一周年以来的情况。

斯大林同志说，匈牙利总理不要说什么汇报了。因为苏联政府把匈牙利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苏联政府把总理先生所说的这些话看做是向苏联政府通报消息。斯大林同志感谢纳吉提供消息。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政府在稳定货币方面将采取什么措施。并且问道，苏联军队有没有欺负匈牙利居民。斯大林同志建议纳吉

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地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

纳吉说，他想首先回答大元帅的后面这个问题。他认为，占领军同匈牙利居民之间现在没有什么分歧。纳吉说，他可以坦诚地和高兴地说，最近居民同占领军之间很少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往往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匈牙利人利用占领军达到自己的目的。纳吉补充说，大量红军部队驻在匈牙利对匈牙利的经济是个沉重的负担。

斯大林同志说，照总理先生的话说来，匈牙利居民在道义方面不会抱怨红军。

纳吉说，匈牙利居民在道义方面不能抱怨红军。只是感到经济上困难。

纳吉接着说，匈牙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生活的措施。4月7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自己的经济纲领，匈牙利政府并不寄希望于通过实现这一经济纲领能够完全改善经济状况，但是寄希望于防止经济生活继续恶化，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前提条件。政府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准备国家预算。各自治行政单位也必须按照严格的预算进行工作，禁止超预算开支，这是大经济的起点，并将开始大量裁减国家机关和匈牙利军队的员额。这一措施不仅追求经济的目的，而且致力于把反动分子从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中清除出去。匈牙利政府对受国家监督依靠战争赔款开工的大工厂寄予很大希望。这些企业依靠国家拨款，所以对它们的监督将更加有效。

纳吉说，目前匈牙利正在为提高煤炭开采量和增加钢产量而斗争。工厂的开工率和匈牙利完成对苏联的义务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

斯大林同志说，匈牙利自己的煤不够用。

纳吉说，匈牙利感到煤炭短缺，而交通部长格罗·埃诺补充说，匈牙利一昼夜的煤开采量现在达到2.2万吨。

纳吉说，匈牙利在农业生产领域竭尽全力。匈牙利面临巨大短

缺，没有储备，这注定了匈牙利的货币情况将恶化。

斯大林同志问，什么样的储备不足。

纳吉回答说，商品储备和原料不足。纳吉接着说，匈牙利政府希望，如果今年有好收成，如果被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运往西方的设备、各种财产和黄金能归还匈牙利，最后如果匈牙利政府能够做到改善国家的外贸情况，以便确保匈牙利的工业有足够的原料，那么就能稳定匈牙利的货币。

斯大林同志问，被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运走的匈牙利财产有多少。纳吉回答说，据鉴定专家估计，被运走的财产总额达 20 亿美元。纳吉说，这笔钱正在天天变少，因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正在变卖这些财产。

斯大林同志问，被德国人运走的匈牙利财产现在何处。纳吉回答说，大部分财产在美国占领区，部分在法国占领区。

斯大林同志问，解决归还匈牙利财产问题取决于谁。

纳吉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归还被运往西方的小部分匈牙利财产。关于其余的匈牙利财产，我们得到的通知说，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各大国。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不反对把这笔财产归还匈牙利，同时指出，黄金不归还匈牙利是非法的。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将努力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纳吉感谢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声明。

斯大林同志说，部分苏联军队将逐步撤出匈牙利，同时又指出，不可能立即召回全部军队。斯大林同志说，留在匈牙利的军队人数不多。这样一来可以为匈牙利减轻部分经济负担。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为了减轻匈牙利的经济负担，苏联政府可以延长匈牙利的战争赔款支付期限。

纳吉对斯大林的这一声明表示深切感谢。他接着说，对于匈牙

利的经济来讲，即使是不大的支出也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匈牙利尽力履行自己对苏联的义务，同时对任何减轻这些义务的举动都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有铁矿吗。

纳吉说，匈牙利的铁矿很少。

斯大林问，匈牙利的铁矿的金属含量怎样。格罗回答说，匈牙利开采的铁矿含铁量为32%。

斯大林说，这不算少。

纳吉指出，为了作为战争赔款向苏联供货，匈牙利必须优先生产工业品。生产工业品需要原料，主要是焦炭和矿石。矿石可以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进口，这主要是指有色金属。焦炭和金属不足给生产作为战争赔款的产品造成困难。纳吉说，去年匈牙利在履行对苏联的战争赔款义务方面落后很大，经过采取措施以后，今年头几个月的战争赔款供货超过了去年的赔款供货总额。纳吉补充说，匈牙利的农产品供货量比工业品供货量多。

接着纳吉请求允许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几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说，去年匈牙利和苏联签订了商品交换协定，棉花是苏联供货的大头，匈牙利应该用纺织品支付，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把纺织品的供货期限推迟半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准备同自己的同事谈这个问题，能办的事一定尽力而为。

纳吉说，匈牙利政府将对此深表感谢。

格罗说，去年8月签订了铁路交通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匈牙利承担了为修路、火车车厢、包括缴获的车厢付款的义务。因此，匈牙利交通部国际局不久前收到了苏联交通部寄来的巨额美元的账单。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为什么要支付。格罗回答说，账单上说

为了修复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铁路，但这条铁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斯大林同志问，谁寄出这份账单。

格罗回答说，文件上的签名认不清。格罗说，账单是从苏联交通部国际局寄来的。

斯大林同志问，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匈牙利政府签订过协议。格罗回答说，去年实行临时规定，并且商定来年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格罗接着说，匈牙利的工业部门修复了1万多节受损的车厢和半数被毁坏的车厢以及600多部火车头。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有没有机车车辆厂。

格罗说，有几个机车车辆厂和机车修理厂。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这件事拖到现在才说。格罗解释说，账单是1946年3月13日收到的。

斯大林同志建议格罗同苏联交通部谈这个问题并结束这种混乱的事情。斯大林同志说，应该谈判并签订协议。应该解决问题，使匈牙利拥有足够数量的流动车厢。斯大林同志指出，缴获的车厢不应当归匈牙利所有。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这里调解和解决，斯大林同志答应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并考虑到匈牙利的经济利益。

纳吉感谢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

之后纳吉请求允许他向大元帅介绍匈牙利政府对匈牙利和平目标的观点。纳吉说，匈牙利政府知道，匈牙利取得了独立和自由好比是得到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首先是苏联赠送的。纳吉请斯大林相信，匈牙利不追求任何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目的。对于和平条约，匈牙利政府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和平条约应该为大国追求确立牢靠的和平服务。第二，和平条约的条款应该确保匈牙利人民发展的可能性。第三，和平的成果应该促进民主的巩固。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匈牙利政府才决心不仅要为自己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且要为自己找到好邻国。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予以支持。

纳吉说，他可以代表匈牙利政府声明，匈牙利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分歧。至于其他两个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政府对居住在这两个国家境内的匈牙利人表示关心。在罗马尼亚方面，甚至出现了涉及民主命运的问题。纳吉接着说，斯大林大元帅先生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生想必已经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想通过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办法消灭少数民族，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事先同匈牙利政府商量就把几千名匈牙利人交给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65万匈牙利人，其中有几十万人沿着匈牙利边境密集居住在紧挨着匈牙利的特里昂农地区。其他的匈牙利人散居在斯洛伐克，越往北人数越少。为了解决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居民的命运问题，匈牙利政府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和平谈判。责成捷克斯洛伐克像在南斯拉夫实行的那样保证匈牙利人具有能够自由居住和发展的平等条件，并像苏联那样解决民族问题。但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领导人不止一次声称要取消匈牙利少数民族，匈牙利政府被迫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二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归结为，可以把匈牙利人密集居住的部分纯匈牙利人州归还匈牙利，以便一旦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进一步取消少数民族时有安置这些居民的可能性。纳吉说，正确实行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使匈牙利人感到放心，并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睦邻关系打下基础。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人不想采用交换居民的办法吗？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交换居民，事情不在于人数均等。波兰同乌克兰和立陶宛签订了交换居民协定。想返回波兰的波兰人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想从波兰移居立陶宛的立陶宛人也应该有促进。想移居的波兰

人可能有 20 万人，而立陶宛人有 2 万人。斯大林同志说，数量不起作用。谁想返回祖国谁就可以回去，而留下的人应该享有自由和权利。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捷克人想满足不愿意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中的斯洛伐克人的所有请求。斯洛伐克人想收拾匈牙利人，而捷克人不反对这种做法。不给匈牙利人提供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不公正的。可以进行居民交换，这种方式与解决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问题的方法相类似。斯大林同志说，对于匈牙利来讲，最好接收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因为他们将面临丧失民族特征。因为，从民族政策的观点看，最好接收这些匈牙利人。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政府怎样对待这种决定。并且补充说，他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斯大林问，交换居民开始了没有。

吉恩杰希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这个问题签订了协定，匈牙利方面为了把问题解决好，已经尽力而为。协定规定在自愿和均等的原则基础上交换居民。斯洛伐克对 15 万~20 万斯洛伐克人自愿迁出匈牙利充满希望。目前正在对这些斯洛伐克人进行登记。4 月 14 日，由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进行的宣传活动即将结束，但是根据预计数字可以判断，不超过 5 万~6 万斯洛伐克人同意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其余的人不想离开匈牙利，因为他们留恋自己的土地胜过留恋自己的语言。这些斯洛伐克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同化。在交换人口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还留有将近 60 万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想接收 20 万匈牙利人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其条件是，这些匈牙利人以在斯洛伐克出生为借口宣布自己是斯洛伐克人，甚至不懂斯洛伐克语也可以。匈牙利政府不能赞同这种做法。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还将留下捷克斯洛伐克人打算调拨给匈牙利的 20 万名匈牙利人。这些匈牙利人是几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居民。对要移居的匈牙利居民进行经济补偿也很困难。作为一

个农业国，匈牙利的人口密度已经很高。匈牙利只有在自己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和以相应的经济生存能力作保证的情况下，才能接收如此大量的人。问题的实质在于保证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如果能保证公民权，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不会有分歧。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打算把匈牙利人推到匈牙利，那么就必须保证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这只能通过把部分领土交给匈牙利并向移居者提供经济补偿的途径解决。

萨卡希奇补充说，每个民族都想力求增加本民族的人口。他认为，如果65万匈牙利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且不给他们提供权利，不保证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那么这些匈牙利人将成为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体现者，这种现象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脱离匈牙利的一些州已经存在。如果匈牙利具备很好的经济条件，那么匈牙利政府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就会从捷克斯洛伐克接收这些人，因为劳动力是最宝贵的。

斯大林同志说，因此匈牙利人想就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缔结和平条约。

纳吉说，由于匈牙利相信苏联，因此匈牙利政府向苏联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因此匈牙利没有能同捷克斯洛伐克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吉恩杰希说，两个国家进行过谈判，但是谈判结果令人怀疑，因为匈牙利不可能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由于内政困难也不可能接受匈牙利的建议。纳吉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提出请求，希望苏联政府注意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保证匈牙利少数民族公民权的提法是正确的，并发表意见说，捷克人不会同意向匈牙利割让领土的。斯大林同志答应，苏联政府将尽其所能调解这件事。斯大林同志指出，捷

克人害怕斯洛伐克人，在所有的的问题上，其中包括这个问题，向斯洛伐克人让步。斯大林同志再次说，苏联政府将努力促使这个问题的解决。

纳吉对斯大林同志的这个声明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但是会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纳吉说，对罗马尼亚方面，问题要比对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大得多和重要得多。罗马尼亚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同其他国家人民没有亲缘关系。保持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和睦共处是实现东南欧和平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不能让这两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有借口因产生矛盾而导致结成集团。上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罗马尼亚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帕尔奇乌姆的一部分，造成 160 多万匈牙利人受罗马尼亚的统治。这一数字后来有所减少，因为将近 20 万匈牙利人从特兰西瓦尼亚逃出。后来匈牙利人又增加起来。目前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将近 150 万。形势恶化还由于，纯匈牙利居民——谢克列尔人分布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东部，靠近古罗马尼亚领土，远离匈牙利边境。在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除了谢克列尔人以外，没有其他密集居住的民族。沿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境有居住大量匈牙利人的小块领土。但是，在这一地区不能划定出有助于解决整个匈牙利面临难题的边界。纳吉说，匈牙利政府不想以提出这个问题来削弱罗马尼亚的民主政体和格罗查政府。同时，完全放弃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对匈牙利的民主政治也是无法承受的负担。匈牙利政府将直接提出关于重新划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领土问题，但是只是在不危及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何在。

纳吉回答说，匈牙利政府认为，应该把特兰西瓦尼亚的某一部

分领土归还匈牙利，以和平条约中的领土重新划分来安抚匈牙利人。

斯大林同志问，在同罗马尼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有关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在这一协定中说，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或大部分应该属于罗马尼亚。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一协定为匈牙利可以得到点什么提供了口实，而具体得到哪一部分，这还应该看一看。斯大林同志说，目前四国外交部副部长正在伦敦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解释说，在三国同罗马尼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说，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或大部分应归还罗马尼亚。这一条款使匈牙利有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的可能，这个问题还要讨论。斯大林同志说，莫洛托夫同志即将前往巴黎参加4月25日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并且说，在这次会议上将把这个问题提出审议。

纳吉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并且说，这样的答复给匈牙利政府以和平条款可以安慰匈牙利人民的希望。

吉恩杰希把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图展示给斯大林同志看，地图上标有按照匈牙利政府的建议划定的国界。吉恩杰希解释说，如果按照这种领土划分，特兰西瓦尼亚的8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领土将留给罗马尼亚，而2.2万平方公里并入匈牙利。地图上还特别标出总人数96万中匈牙利人数占多数的1180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这96万人中，匈牙利人占52%，罗马尼亚人占48%。在可能并入匈牙利的2.2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人口数量为155万人，其中罗马尼亚人为85万。吉恩杰希说，匈牙利方面在研究这一建议中力求作到，在划分特兰西瓦尼亚领土时使匈牙利部分的罗马尼亚人同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部分的匈牙利人在数量上同等。这可以在少数民族之间保持均衡。如果匈牙利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采用这种

领土划分的方法仍不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那么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协商交换居民，使匈牙利有可能安置从特兰西瓦尼亚移居的匈牙利居民。吉恩杰希补充说，除了出于民族方面的考虑以外，还考虑到了经济问题，再说，计划移交匈牙利的领土的自然财富可能对匈牙利的经济有极大帮助。例如，瑙吉巴尼附近有有色金属和硫磺。此外，帕尔奇乌姆有匈牙利很缺少的森林。吉恩杰希说，匈牙利的建议不仅根据民族的原则，而且也为了解决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由于特兰西瓦尼亚引起的争端。

斯大林同志说，罗马尼亚不会同意向匈牙利做出这样的领土让步。要是这样让步，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下台，甚至罗马尼亚国王可能也当不成了。

吉恩杰希说，匈牙利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并且有勇气，因为如果它不向罗马尼亚提出有关的领土要求，它就可能下台。吉恩杰希认为，如果这样解决问题，匈牙利政府就要承担巨大责任。因为一旦交换居民，匈牙利居民就要移居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部分，匈牙利就会永远失去提出修改国界问题的机会。

纳吉指出，如果罗马尼亚国王下台，匈牙利政府不会可怜他。他并且说，但愿罗马尼亚也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苏联和波兰也曾经互相交换过居民，有100多万波兰人移交给了波兰，而只有40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从波兰返回苏联，因为再也没有了。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也是迈出勇敢的一步。世界上大概没有愿意这样解决问题的政府。

吉恩杰希说，他想问一下，匈牙利提出的关于把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匈牙利的建议是否与苏联的利益发生矛盾。

纳吉和萨卡希奇建议吉恩杰希不要在苏联政府面前提出这方面的问题。

随后，纳吉请斯大林告诉他，被关在苏联的匈牙利战俘能否与

自己的亲人通信。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纳吉请求斯大林同志允许同苏联的有关当局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同意。

纳吉说，斯大林同志对稳定匈牙利货币的可能性表示关心。为此，纳吉请斯大林同志告诉他，能否向匈牙利派遣1~2位有名望的专家，以便研究匈牙利的经济并向匈牙利政府提供健全财政方面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可以考虑这一点。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同志建议匈牙利政府同苏联外交部进行谈判。

格罗说，根据在罗马尼亚签订的停战协定，查封敌方财产的问题已经解决，其中包括查封匈牙利的财产。在特兰西瓦尼亚，其中包括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佩特罗尚的煤矿，匈牙利有大量的投资，总额将近30~50美元^①。格罗问，能否建议苏联把这些投资用来抵偿匈牙利的战争赔款。煤矿的股票额存在布达佩斯。格罗解释说，在佩特罗尚开采的焦煤质量很高。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对关于佩特罗尚煤矿的建议会予以考虑的。他并且说，莫洛托夫将把对这一问题的答复通知匈牙利政府。

临走前纳吉表示，他希望在某个时候还能有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机会。

会谈持续了2个小时15分。

格里戈里耶夫 记录

1946年4月10日21时于莫斯科

^① 原文如此，疑为3000万~5000万美元之笔误。

№09265

克鲁格洛夫关于苏联内务部战俘营中 匈牙利战俘数量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10日)

绝密

现遵照您的指示将截至今年4月8日关押在苏联内务部各战俘营中的匈牙利人战俘的数量报告如下。

同时报告，根据1945年6月4日国防委员会第8921c号和1945年8月13日第9865cc号决定，我们在1945年已把177348名匈牙利人遣送回国，其中包括在此之前在战俘营中的有病战俘。

战俘营的所有匈牙利人战俘，除了将军、军官和病人以外，都在苏联各部下属的建设工程和企业劳动。

其中大量的战俘在下列各部劳动：

煤炭工业部——25000名

建设部：海军建设、重工业建设和燃料企业建设——27000名

黑色冶金工业部——7000名

武装力量部——1768名

交通部——11000名

电站部——9000名

其余的少数战俘在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其他部的企业劳动（见附件）。

晚些时候将向您呈报有关罗马尼亚人战俘的类似材料。

苏联内务部长 C.H. 克鲁格洛夫

1946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附 件

绝密

截至1946年4月8日关押在苏联
内务部各战俘营的匈牙利人战俘数量

共计关押匈牙利人战俘 232879 名，其中：

1. 关押在内务部后方战俘营共计 221975 名，其中：

将军——46 名	中级军官——12798 名
上校——197 名	士官和士兵——208456 名
中校和少校——478 名	

2. 住在专门的医院的战俘共 8862 名，其中：

上校——11 名	中级军官——256 名
中校和少校——17 名	士官和士兵——8578 名

3. 在前线网点 274 名。

4. 在武装力量部的一些劳改营共计 1768 名，其中：

上校——3 名	中级军官——134 名
少校——1 名	士官和士兵——1630 名。

No 09275

普希金关于匈牙利政府危机问题 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6月5日)

秘密

莫斯科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早晨，我应邀拜会了佐·蒂尔迪总统。蒂尔迪向我通报了联合政府经受的危机及其原因。^①蒂尔迪说，在组成纳吉·费伦茨的政府过程中，工人党向小农经济独立党许诺说，要根据在议会选举中各政党得到的票数百分比重新审议国家机构、警察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中领导职务的分配。但是工人党迄今为止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这引起了小农经济独立党的不满，最终导致联合政府发生危机。然后，蒂尔迪详细讲述了党际会议上讨论小农经济独立党要求的过程，有关情况我们已经向您报告。

蒂尔迪说，昨天晚上纳吉·费伦茨拜会了他，并介绍了纳吉同我和斯维里多夫同志交谈的内容。蒂尔迪劝告纳吉·费伦茨把原定

① 指的是小农党试图挑起的政府危机。出现危机的表面理由是小农党对党的左派集团提出的最后通牒，要求根据1945年11月选举的结果重新分配国家行政机关中的领导职位。但苏联大使馆认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挑唆的结果。在小农党领导人会议上，蒂尔迪做出了决定：在左派集团拒绝小农党提出的要求的情况下，纳吉·费伦茨将提出辞职并只有在左派集团“投降”之后才同意组建政府。

在今天上午10时召开的政府紧急会议改日进行。在政府紧急会议上，纳吉·费伦茨本来准备发表辞职声明，并试图在今天再次同三党联盟达成协议。

蒂尔迪说，现在另一个房间内正在召开各政党领导人会议。蒂尔迪最后说，我想知道你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①

我把昨天同斯维里多夫同志一道对总理说的话向他叙述了一遍。蒂尔迪回答说，他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此外他认为，联合政府危机的后果对国家可能是灾难性的危机。

蒂尔迪最后信誓旦旦地说，他对苏联怀有友好感情。并且说，他认为匈苏文化联络协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他打算亲自领导该工作，使该协会成为匈牙利人民倒向苏联一边的有效的群众性组织。

蒂尔迪说，他希望能同我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交谈，我表示愿意同他会晤。

分别时蒂尔迪指出，他正在履行一个艰巨的使命——调解党际的矛盾。

关于今天在蒂尔迪那里召开的党际会议的结果我将另行报告。

普希金

1946年6月5日于布达佩斯

^① 苏联代表对小农党的要求持否定的态度，这对其领导人的情绪产生了影响。在蒂尔迪处召开的各党派会议上达成了妥协：在把各委员会和各县警察局负责人全部职位的五分之一，以及几个副省长的职位移交给小农党的条件下，它撤消自己的要求。各党派还达成协议，于1946年秋季在各省进行市政选举。

№09277

弗拉索夫关于匈牙利形势的报告

(1946年6月19日)

秘密

匈牙利情况的汇报

据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同志报告，匈牙利小农经济独立党反动势力的活动加剧。为了这个党的民主化，他们建议把反动势力从该党分裂出去。为此他们认为，准许以前被从匈牙利小农经济独立党除名的舒约克·德杰等人成立名为“自由”的新党是可行的，一些最反动的分子有可能从小农经济独立党的右翼加入到新党中去。

我认为可以同意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同志的意见。

我还认为，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同志在这封电报中所谈的关于为了削弱小农经济独立党在农村的影响，除了改进共产党员的工作外，还应让民族农民党加紧进行活动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还认为，斯维里多夫和普希金同志的第三个建议也是可以采纳的。他们说，为了巩固我们在匈牙利的地位，应通过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加紧施加压力，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迫使匈牙利向我们要建议和援助。

请您指示。

A. 弗拉索夫^①

1946年6月19日于莫斯科

^① A. 弗拉索夫，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副司长。

№09291

莫洛托夫关于对匈和约草案的准备工作与 吉恩杰希的谈话记录

(1946年8月20日)

抄送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古谢夫、普希金，送第四巴尔干司，归档。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秘密

接见时在座的有：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普希金，巴甫洛夫（苏联外交部）

莫洛托夫问吉恩杰希，匈牙利代表团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对匈牙利和约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吉恩杰希说，匈牙利代表团关于对匈和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建议均已准备完毕并可能于今年提交委员会。政治问题方面的建议涉及匈牙利同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关于罗马尼亚，匈牙利代表团将提出自己先前关于向匈牙利让出2.2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建议，以便相应地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各有相等数量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居民。如果委员会认为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则匈牙利代表团打算建议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之间举行旨在对罗马尼亚—匈牙利边界的种族做若干修正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直接谈判。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则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对匈牙利没有提出任

何领土要求，故匈牙利代表团在关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边界问题方面也没有任何意见。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将不仅保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疆域现状，并且也将维护他们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保证这些匈牙利少数民族拥有与他们过去所享有的完全一样的权利，则匈牙利政府将不对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有边界提出异议。

吉恩杰希说：此外，匈牙利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将提出关于给那些因特里亚农条约^①而丧失国籍的人以常住国国籍的问题。

吉恩杰希表示，对于和约的第21条，即关于战争赔款的那一条，匈牙利代表团没有什么意见。匈牙利已经承担了向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赔偿匈牙利军队曾经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的义务。现在，在苏联政府放宽了支付赔款的条件之后，匈牙利政府将能够完全履行这一义务。匈牙利政府同样也承认其战前的商业债务。

吉恩杰希表示，在返还盟国财产问题上，匈牙利政府认为，匈牙利有义务返还的只是那些因为匈牙利当局的这样或那样的指示或命令而损失的财产，也就是说，匈牙利政府不负责返还被战争毁灭的财产。匈牙利的这种立场是与其支付赔款的原则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匈牙利的观点在和会上不被接受，则匈牙利将坚持主张接受苏联关于赔偿盟国财产三分之一的建议。

吉恩杰希说，关于在盟国领土上的匈牙利财产问题，匈牙利政府认为，这些财产不应受到扣押。但是，如果这些财产将受到扣押，被扣押的不应是在匈牙利签署了和约之后被没收的匈牙利财

^① 1920年6月4日，匈牙利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与战胜国签订了和约。条约规定，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东部划归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巴奇卡和巴纳特西部划归南斯拉夫；斯洛伐克和外巴尔喀什乌克兰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布尔根兰省划归奥地利。

产。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已经签署了和约之后就曾扣押了匈牙利财产。

吉恩杰希说，匈牙利政府打算要求返还被德国人运往奥地利、德国以及德国的仆从国的匈牙利财产。匈牙利政府还打算要求返还按照和约被没收的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财产。

莫洛托夫指出：总的来说，他理解吉恩杰希上面所说的话。正如吉恩杰希所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关于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匈牙利人问题。在哥特瓦尔德逗留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曾经同捷克人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而且他（莫洛托夫）坦诚相告说，苏联政府当时很难拒绝捷克人的这一请求。他（莫洛托夫）不知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是否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谈判，但他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对匈牙利一些活动家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在对待匈牙利少数民族政策的讲话颇为不满。捷克人认为，没有理由指责他们在两场战争之间没有善待匈牙利少数民族。捷克人认为匈牙利人对待斯洛伐克人的态度更坏。

吉恩杰希回答说：匈牙利认为关心在国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不仅是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是应尽的义务。至于捷克人关于匈牙利人对待斯洛伐克少数民族比斯洛伐克人对待匈牙利人的态度更坏的说法，则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就可将其驳倒，即在对希望从匈牙利移居他国的斯洛伐克人进行登记的时候，多数斯洛伐克人声明愿意留居匈牙利。如果匈牙利政府对待斯洛伐克人态度很坏，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他（吉恩杰希）认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剥夺匈牙利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那他们就做错了。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和国籍，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匈牙利政府认为，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

莫洛托夫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双边协定收到了些什么效

果。

吉恩杰希回答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电台广播、报刊和到处张贴宣传画进行宣传。结果仅有8.4万人登记移居，但其中有1万人是对斯洛伐克语一窍不通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他们之所以表示愿意移居斯洛伐克仅仅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在其居民大多数为斯洛伐克人的贝凯什乔博，连苏驻军司令部也知道，当地的斯洛伐克人不愿意离开那里而移居斯洛伐克。他们是在群众集会上和发给斯大林元帅、他（吉恩杰希）本人以及大概也发给了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表明这一愿望的。

莫洛托夫说，这样说来，这件事现在仍然是悬而未决。

吉恩杰希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匈牙利政府之所以同意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最主要的是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人关于在匈牙利有30万斯洛伐克人的统计资料不准确。根据1930年和1940年的人口普查，在匈牙利总共只有10.3万斯洛伐克人。现在，在这10.3万人中起码有一半人不希望移居捷克斯洛伐克。这表明，生活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受到欺压。

莫洛托夫问，是否有土瓦本人^①从匈牙利移居他国。

吉恩杰希回答说，已经有12万土瓦本人迁出匈牙利。预定再外迁同样数量的土瓦本人。原来曾属于他们的土地已经分给无地的匈牙利农民。目前在匈牙利共有30万农业工人没有土地。匈牙利的居民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大约100人。

莫洛托夫说，需要设法解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捷克人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南部边界就不会得到安宁。

吉恩杰希表示：他认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以完全坦诚的

^① 即指日耳曼人，中世纪曾有日耳曼土瓦本公国。

态度对待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圆满地解决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对待少数民族历来都很不好。这并非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早在捷克国家初建时期马萨利克和贝纳斯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危险。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愿意同匈牙利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但是这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不信任当时的匈牙利反动政府。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想要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并因此而竭力要摆脱匈牙利少数民族，那也不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担全部转嫁给匈牙利政府一方。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采取某些经济性质的措施，以确保匈牙利族居民的生存。或许，应当本着这样的原则来讨论这一问题，即在移交领土时应当有一定的补充数量的居民同时被接受，其数量视居住在被移交领土上的居民情况而定。

莫洛托夫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吉恩杰希表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通过将 20 万匈牙利族人移居到 50~100 平方公里狭小地域的办法来摆脱这些似乎对捷克斯洛伐克构成威胁的人，那么它就可能将会面对对之采取敌视态度的 900 万匈牙利人民。到那时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的任何相互谅解与良好关系都将不可能存在。相反，如果匈牙利族人继续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让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那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国之间建立双方都极为需要的相互谅解与合作的最佳途径。

莫洛托夫说：捷克人是对未来感到不安。

吉恩杰希说，感到不安的不是捷克人，而是斯洛伐克人。

莫洛托夫说，捷克人支持斯洛伐克人。

莫洛托夫问匈牙利的金融改革进行得如何。

吉恩杰希回答说，由于匈牙利实行的金融改革而得以稳定了通货。市场上已经有货可卖了。

莫洛托夫问，匈牙利的农业收成的展望如何。

吉恩杰希回答说，预计匈牙利今年的收成将好于去年，丰收将使匈牙利能够口粮自给并且履行赔款义务。

莫洛托夫问，美国人是否已返还了匈牙利的财产。

吉恩杰希说：美国人返还给匈牙利的只是黄金^①。昨天他（吉恩杰希）曾前往会见贝尔纳斯^②。贝尔纳斯对他说，在返还匈牙利财产的事情上遇到了困难，因为按照四大国在4月份通过的决议，应当归还的仅仅是目前在德国领土上的财产。原曾存放在奥地利的匈牙利黄金之所以被返还给匈牙利，是因为这些黄金已被美国人弄走并变成了美国人的财产。吉恩杰希说：贝尔纳斯告诉他，美国政府愿意把匈牙利的财产返还给匈牙利，但是美国政府在其他三个大国没有同意之前不能这样做。

莫洛托夫问，是谁在反对这样做。苏联是不反对返还匈牙利财产的。

吉恩杰希说：美国政府已正式声明，它将返还匈牙利的财产，法国政府也已书面通知匈牙利政府说它对返还匈牙利财产一事没有异议。英国政府也已口头向匈牙利政府做了类似的表示。现在他（吉恩杰希）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阻拦此事。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不仅过去没有反对过，并且现在也不反对返还匈牙利的财产，而且从来都主张这种返还。

吉恩杰希说，他根据莫洛托夫在外交部长委员会上的讲话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莫洛托夫说，据他所知，美国政府是在匈牙利代表团逗留华盛

① 1946年6月21日，在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达成一个原则上的协定，返还匈牙利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数额是3500万~4000万福林，以及运到德国西部占领区的匈牙利财产（工业设备、铁路机车、原材料储备、畜牧等）。

② 贝尔纳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顿期间向匈牙利许诺它将返还匈牙利财产的。

吉恩杰希说，美国人确实许诺要这样做，他（吉恩杰希）也希望这一许诺将得到兑现。

吉恩杰希说，他非常注意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正确行事并且他认为，他在匈牙利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匈牙利的立场。

莫洛托夫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吉恩杰希在和会上将发表的讲话中涉及到苏联的部分他（莫洛托夫）本人没有任何要求。

吉恩杰希说，他将感激莫洛托夫为顺利解决妨碍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困难问题而做的一切。

莫洛托夫回答说：正如他所说过的那样，苏联代表团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已经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当然，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匈牙利起初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他（莫洛托夫）希望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将来将有助于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而只要双方都有这样的愿望，这一点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莫洛托夫说：近一年来有 140 万波兰人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移居波兰，同时也有数十万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从波兰迁回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移居工作进行顺利，既未招致怨声载道，也没引起任何纷争。他（莫洛托夫）认为，拟议中的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定将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两国间良好关系的确立。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5 分钟。

B. 巴甫洛夫 记录

1946 年 8 月 20 日 15 时于巴黎

№09310

普希金与费伦茨关于匈国内 政治局势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7年1月24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秘密

纳吉·费伦茨总理举行的午餐

我方出席午餐的是斯维里多夫和我，匈方出席的有总理和外交部长吉恩杰希。

午餐后纳吉·费伦茨和吉恩杰希邀请我和斯维里多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在那里我们同他们就匈牙利国内政治局势进行了交谈。纳吉说：共产党人在千方百计地搞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查机关的优势地位来败坏独立小农党领导人的声誉，并在这个党的队伍中引起分裂。纳吉承认，在独立小农党，其中包括该党的议会党团中，确实混进了反动分子。据纳吉·费伦茨称，共产党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害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纳吉·费伦茨说：“我将竭尽全力使共产党人无法指控独立小农党是反动的。”他说，该党的领导人已经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在匈牙利解放后加入该党的新党员进行审查，并将把一切投机分子开除出党。党的领导班子在清除议会议员方面也绝不手软。纳吉接下去继续说：“这样，我们就将为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

和地方政权机关。此外，我们还希望共产党人能够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制定一项允许政党用其他人士替换被开除该党的议会议员的法案的建议。”我们对纳吉·费伦茨说，我们理解左翼民主派人士对独立小农党内业已形成的局面的担心和忧虑，同时也理解他们企望看到独立小农党在其人员成分方面更加纯洁和更加坚持民主道路的心情。我们提醒纳吉·费伦茨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忠告他把反动分子清洗出党，但是很遗憾，这些忠告并不总是受到重视。……

对于独立小农党具体地打算将谁清除出党的提问，纳吉避而不答。……

1947年1月24日于布达佩斯

№09314

普希金与萨卡希奇关于 匈社会民主党内部矛盾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6日)

分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摘自Г.М.普希金日记

绝密

副总理萨卡希奇·阿尔帕德举行午宴

我同斯维里多夫同志及布达佩斯市卫戍司令扎梅尔采夫将军一起出席了萨卡希奇举行的午宴。除了我们之外，参加午宴的还有担任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班恩、里斯和罗奈伊，以及匈牙利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社会民主党人贝姆·维尔莫什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集团领导人马罗山·捷尔吉。马罗山在同我交谈时说，他对刚刚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该党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感到不满意。左派和右派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与代表大会之前基本一样。马罗山说，下星期一将选举出社会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他希望这届政治局在人员组成方面将更为适当。马罗山请求我在2月10日以后接见他一次，我同意了。随后萨卡希奇和里斯走到我们身旁。萨卡希奇抱怨共产党人，说他们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相当不尊重。萨卡希奇一再说服我，让我相信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是比共产党人更具有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向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做出共产党所做出的那种让步。”我请他更详细

地说明他所指的是哪些让步。他回答说，维斯普雷姆市的共产党人拜见了巴纳什并祝贺他晋升为主教（很遗憾，确有其事——Г. 普希金注）。萨卡希奇接着指出，本州的共产党人甚至在自己的党校开办时还邀请牧师到场为校舍开光祝圣，他们还维修教堂甚至到牧师那里去作忏悔。关于向沙文主义的让步，萨卡希奇指出了共产党人的报刊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运动。

在谈到国内的政治局势时萨卡希奇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争取秋天在匈牙利能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萨卡希奇指出，他们同共产党人已经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据萨卡希奇说，他们将提请修改议会法案，以便剥夺 30 万反动分子的投票权，然后在编制选民名单时再漏掉某些人。萨卡希奇说，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事情有所改善。我指出，这样做并不是一种完全正当的办法。站在身旁的马罗山微微一笑说，若是让他和内务部长拉伊克组织这次选举，他们就会这样做，就会取得多数，并且让任何人都无法指责有作弊行为。接着，我指出，他们在谈论行将进行的选举，而同时却对匈牙利最大的政党——独立小农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不感兴趣。萨卡希奇回答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逐渐地教会这个党习惯于这种思维，并且我希望我们将把该党调教到同意举行新的选举的程度。”里斯听了大笑起来并说，这使他想起了一位法兰西作家，这位作家当他年满 50 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去一趟墓地并抚摸那里的土地，以便使自己习惯于自己未来的新居。

1947 年 2 月 6 日于布达佩斯

№09324

斯维里多夫关于匈牙利政治形势 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

(1947年4月初)

秘密

在匈牙利，政治斗争现在已更加激烈，在这场斗争中明显地形成了两极——共产党和小农党。后者把国内一切反动势力都网罗在一起，早已丧失了农民政党的性质。

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里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稳定通货是其最大的成就，小农党曾经想借助于通货膨胀来让美国人介入匈牙利国家的经济生活，但未能得逞。

通过在国家机关和自治机关中进行的清洗，共有8.5万名官员被赶出这些机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才得以进行的。

在匈牙利，已将矿山、电站收归国有，正在准备对面粉和肥料一类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已经把某些大型工业企业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

稳定通货的计划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协助下由共产党人制定的。制定此项计划的工作进行了8个月。在这项工作中格罗同志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通货的稳定工作是由共产党人进行的。但是如果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协助，共产党人未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此项工作。

共产党人由于自己处处积极主动而使小农党无法实现其一系列的计划。例如，小农党曾经打算按照意大利的法西斯农业行会的模式（在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建立所谓的“农民代表处”。再比如，曾经计划要对所有被判处两年以下刑期的犯人实行大赦，而由于法西斯分子中没有被判处两年以上徒刑的人，所以很显然，所有被判了刑的法西斯分子均将在被大赦之列。这些计划小农党都没能加以实现。

共产党人争取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小农党里的反动分子，削弱它，直至使之分裂。为此目的拉科西曾一再要求我们适时地加速批准给舒约克的党^①进行注册。纳吉·费伦茨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拉科西以为舒约克将会从小农党中拉走一半人马，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自由”党很长时期没有发展壮大起来。美国人没有给它以帮助。只是在两个月前该党人数才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现在它已经拥有近 10000 名^②党员。舒约克发表的反动演说遭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在印刷舒约克的报纸《霍尔诺普》的印刷厂工作的工人已宣布罢工，拒绝印刷反动的报纸。印刷工人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舒约克甚至对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了抱怨并就此事在议会发表了讲话。

最近纳吉·费伦茨已开始谈论要共同与舒约克进行斗争，显然，他是害怕舒约克真的会把他的党拉走大半，同时他也是试图转移由于阴谋活动的被揭穿而名誉扫地的小农党的注意力。共产党人把舒约克痛斥为法西斯分子。整个左翼集团以及小农党的部分成员对他群起而攻之。舒约克也公开站出来攻击小农党，道出了各式各样的

① 即 1946 年 3 月被小农党开除出来的部分领导人建立的“匈牙利自由党”，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

② 原文如此。

个人恩怨和委屈，但是所有他们这些人都只不过是在为细枝末节花费精力而已。舒约克的党正在发展壮大这一事实，以及该党的日益活跃证明：第一，反动势力在匈牙利是有力量的；第二，追求修正主义的势力在匈牙利也还是很强大的。卡罗伊伯爵不久前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曾经说过，匈牙利人仍然对修正主义怀有好感，修正主义涉及的与其说是边界问题，不如说是国家的内政问题。

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人的盟友。在该党内佩耶尔的右翼势力依然相当强大，尽管此人现在不像在代表大会之前那样活跃。还应当把谢德尔、凯特里和基什哈吉也归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之列。以马罗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是相当强大的。萨卡希奇作为中派分子，他不同右派进行严肃的、原则性的斗争，而是力图使左、右两派言归于好。萨卡希奇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经常到盟国管制委员会这里来讨主意。他有时一来到盟国管制委员会就一连两小时地大骂共产党人。他声称，共产党人常常令他很恼火，他们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还是不希望同他们决裂，并不得不同他们合作。他不止一次地赌咒发誓说他将继续这种合作。目前看来他还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

共产党人的另一个比较可靠的盟友是民族农民党。这个党两年来一直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该党领导人韦赖什·彼得是一个很坚定的人，虽然他自己发誓说他内心深处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农民党的前领导人科瓦奇·伊姆雷是靠近小农党的，不久前退出了民族农民党。该党选举埃尔德伊·费伦茨为总书记取代了他。由于韦赖什担任着国家重建部长职务因而其大部分时间都将在部里工作，故埃尔德伊可以放开手脚地干。民族农民党内的情况已得到改善。令人欣慰的是，小农党里的某些集团正在转人民族农民党。

最近一个时期，共产党人已大大加强了自己在农村的地位。向农村派出工作队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威信。纳吉·费伦

茨认为共产党员部长是政府中最优秀的部长。美国人也承认，政府中最优秀的部长是受过俄国训练的共产党人（指拉科西和格罗）。由于有4名左派人士进入政府，所以共产党人得以在政府中取得对他们有利的力量对比。现在在政府中可以认为，代表右派的有：纳吉·费伦茨，埃列什，巴罗涅什（来自小农党），班恩，里斯（来自社会民主党），与之相抗衡的是政府中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左派：4名共产党人，萨卡希奇和罗奈伊（来自社会民主党），韦赖什（来自民族农民党）以及其余来自小农党的左翼部长（米哈伊菲，丁尼斯，奥尔图泰等）。这样，政府中的力量对比现在是相当有利于共产党人的。

现在最尖锐的问题是关于把宗教选修课引进学校的问题。目的是剥夺教会在教育青年一代方面的重要地位及其优势（教会仅仅靠发行教科书一项每年即可赚得2000万福林，只此一例足可说明其特权之大）。

共产党人经过努力终于使纳吉·费伦茨主动提出了这个得到左派集团支持的法律草案。一开始共产党人非常热情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已开始讲一些非常泄气的话了。如果说从前拉科西一直在讲，群众希望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希望采取攻势，希望行动起来就义无反顾，那么他在不久前，在周游各省并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已开始说，群众已经感到疲劳了，希望休养生息云云。他开始抱怨说，由于共产党人支持关于宗教选修教学的法律草案，妇女们已经不再去参加共产党的群众集会，因而共产党人现在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共产党人错过了时机。他们耽误了该法律草案在议会里的讨论事宜。现在议会已经休会去度复活节假期。这样一来，时机被错过了。共产党人目前尚未明确地向盟国管制委员会说明其今后的计划，但是可以感觉到，在宗教选修课教学问题上，他们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并担心自己是过早地开始了这场运

动。看来他们实际上是些前后不一，反复无常的人。

应该考虑到，匈牙利的天主教会是欧洲最有组织的教会。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是最狂热的和非常团结的。农村里的大多数妇女都受到他们的巨大影响。天主教会——这乃是一支共产党人已经与之发生冲突的不可轻视的力量，现在共产党人暂时还未找到开始与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途径。

斯维里多夫将军还指出，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找到他，请求向他们提供武器。共产党人控制的警察机构武器装备很差，弹药所剩无几，拉科西多次指出，一旦反动派武装起来，警察当局将难以制服反动分子。斯维里多夫认为拉科西的理由是完全充分的。他认为可以给匈牙利警察当局一些武器，但是，当然不是苏制的，而是缴获的。在苏军中央集群的武器库里存放有许多这样的武器。库拉索夫将军不会拒绝给匈牙利警察发放必要数量的步枪、手枪和子弹，但是没有莫斯科批准他不能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拉科西准备在莫斯科提出这一问题，但是他将于何时前往莫斯科尚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Г. 科罗特克维奇^① 记录

^① 科罗特克维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官员。

№09325

匈牙利国家警察局长加博尔关于政治 侦查情况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

(1947年4月初)

秘密

匈牙利的政治警察 80% 是共产党人。这样，它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诚然，警察局的两名副局长是隶属其他党派的——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是小农党的党员。但是他们主管一些次要的问题，而我们则尽力做到使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该知道的事情。

警察局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手。他们都没有经验，因此工作起来相当困难。我们从苏联同志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别尔金将军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我们认为我们在进行侦查工作时的主要任务是在不耗费物质力量的情况下达到预期的目的。尚不能说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情况都很顺利，但是若同我们从前的情况相比，那无疑还是有进步的。

我们把事先探知一切并上报我们的领导视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为此目的我们建立了相当密集的情报员网。在所有的政党中都有我们的人。我们招募了其他政党的政治人士。招募工作主要靠的是我们掌握着可以使这些人名誉扫地的材料。他们由于害怕被揭露而不得不同意同我们合作。但是在农村，我们的情报员网就比较弱。在政府的所有各部，甚至在教会的教士中间，我们也都安插了我们自

己的人。这样，我们得到的情报就是相当全面的了。

在警察机构中我们实行了严格的制度，建立了必要的集中制，虽然我们认为这还很不够。

政治警察对党有很大帮助。我们能够在党派之间举行的会议之前了解到我们政敌们的意图和打算，从而把一切及时报告共产党的领导人。我们组织了对电话谈话的窃听。现在我们可以窃听到政府总理及各政党领导人的所有重要的电话交谈并择其中最重要者报告拉科西同志。首批有关一项反共和国阴谋的情报就是政治警察局获取到的。我们将这些情报转给了我们在国防部的同志们，就这样，开始了对该项阴谋的调查工作。

最后，加博尔·彼得同志指出，政治警察现在拥有相当高的威信，对此甚至连总理纳吉·费伦茨都不否认。

Г. 科罗特克维奇 记录

№09326

匈共中央监委领导人基什关于监委活动 向科罗特克维奇的口头汇报（摘录）

（1947年4月初）

秘密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目前还带有局限性。我们现在只负责对国家机关和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查。但是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扩展我们的活动。政治局已经决定在各州建立监察委员会特派员网。最近我们就将把自己的特派员派往4~5个州。

早在一年之前，一些所谓的“小独裁者”就曾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这基本上是一些参加过建立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人。在很长的时期里他们一直停留在从前的水平上，完全没弄清新的形势。红军到来之后，他们在各地展开了自己的“活动”。他们又重犯了自己在1919年曾经犯过的全部宗派主义错误，开始了实质上的“独裁”。他们又重操起在1919年导致其失败的旧业。我们不得不同他们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们已经撤换了这些人。但是他们“活动”的结果至今仍然流毒未消。凡是这些人工作过的地方，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政党的关系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44年我们进行了清党。这次清党的原因是当时在党的组织中存在有严重的营私舞弊现象。有些人靠聚敛民财、贪赃受贿而发财致富。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人清除掉。现在我们党内的营私舞弊现

象至少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仅举下面一例即可证明这一点：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我们共处理了100件纠纷案件，其中只有10%涉及营私舞弊；而在一年前同一时期则有50%是涉及营私舞弊的。……

我们党内最薄弱的部位是中间环节的干部——乡级组织的书记。在200名乡级组织的领导人中起码有一半需要撤换。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提高我们干部的素质，把他们送去学校学习2个月，这将使他们学到些东西，但是毕竟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干部方面的情况目前还是困难的。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匈牙利，在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工程师、厂长经理等人中间向来就几乎没有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因此我们不得不撤换许多反动分子，但又无人可用以接替他们，因为没有专家。主要的困难就在于此。

Г. 科罗特克维奇 记录

№09327

苏联驻匈使馆 1946 年度政治总结报告 (关于建立最高经济委员会部分)

(1947 年 4 月 16 日)

绝密

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建立

由于小农党在全国普选中得到绝对多数票，并在议会中占有了 60% 的代表席位，在政府成员中得到了 50% 的部长职位，我们对以这样的比例组成的匈牙利议会和匈牙利政府将能否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没有把握。考虑到一贯我行我素的小农党早在 1945 年底实际上就已经走上了与匈牙利民主派相抗衡的反对派之路，这种担心就更加有充分根据了。

国家面临着决定匈牙利民主制度今后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涉及国家的迅速复兴问题的金融改革，某些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建立国家对私人生产的监督，巩固和加强重新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单位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匈牙利建立一个被授以特殊权力的，在人员组成上较之政府有更多民主派人士参加的，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难题的国家机构。根据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建议，并依据议会赋予匈牙利政府的特别授权，按照政府 1945 年 12 月 10 日的决定建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初的组成人员有：蒂尔迪·佐尔坦（小农党），拉科西·马加什（共产党），萨卡希奇·

阿尔帕德（社会民主党），格罗·埃诺（共产党），瓦恩（社会民主党）和瓦什·佐尔坦（共产党）。

最高经济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具有政府法令的效力，其所涉及到的政府各部必须执行。最高经济委员会在向我们移交前德国财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最高经济委员会，我们连我们现在在匈牙利拥有的前德国财产的一半也不会得到。

这样，最高经济委员会就等于取代了匈牙利政府并确保了解决一切关系到在民主的原则基础上复兴国家的主要问题。匈牙利的反动势力在议会选举时投票支持了小农党，但却在实际上根本无法对国家事务发挥影响，对这样一种状况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开始为取消最高经济委员会而斗争。小农党的领导人秉承国内反动势力的旨意，试图说服盟国管制委员会相信有必要解散该经济委员会，其理由主要是：最高经济委员会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条件下作为一项非常措施而有必要建立的，而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了。另外，他们还断言，最高经济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构，因为它限制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在就此问题得出的最终结论中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办法。在1946年3月让财政部长戈登·埃内和供应部长巴罗涅什·卡罗伊加入了最高经济委员会。这种变化并没有反映到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去，因为在委员会里照样还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3名共产党人和2名社会民主党人对3名小农党成员。最高经济委员会现在仍在继续进行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7年4月16日于布达佩斯

№09328

**苏联驻匈使馆 1946 年度政治总结报告
(对布达佩斯市政选举结果的分析部分)**

(1947 年 4 月 16 日)

绝密

……共产党至 1945 年下半年之前共有党员 50 万人，在组织方面胜于其他政党，但是由于成员的急剧增加，其中央委员会还不能牢牢地掌握住被接收入党不久、尚未经过培养教育的广大党员。党内成员的这种快速增长显然是不健康的。共产党员在各地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其中包括共产党应对之负责的警察局里的过火行为，使共产党的威望大受损害，因为警察局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共产党的一个严重不足是：尽管人所共知，任何其他政党都不会去专心于复兴国家的经济计划问题，但共产党也一直没有一个这方面的具体计划。共产党仿效其他政党，也醉心于空洞的宣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州里，共产党人做事过于绝对而无灵活性，忽略同其他党派的合作，从而自己把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究其原因可以说根源于此。共产党人一方面过高估计自己在国内，其中包括在布达佩斯的实际影响，同时又对独立小农党及在匈牙利代表着巨大政治力量的天主教会的影响估计不足。这导致共产党又犯了新的错误，其表现是拒绝一些主要的民主政党关于建立竞选联盟参加布达佩斯市政选举的尝试。匈牙利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所采取的共同方

针，在这些国家里均曾建立了民主政党的竞选联盟。这样的联盟完全符合我们的政策，并在匈牙利各地的市政选举之前曾经在形式上存在过。但是在竞选运动期间，共产党人却认为仅仅同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组成竞选联盟比各民主政党的广泛联盟更好。匈牙利共产党有一种撇开苏联的总政策去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明显倾向，并且时而表现出对这一政策的不理解。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自己在匈牙利政府中拥有应当拥有的代表。很显然，共产党由于仅仅是在数月之前才开始自己的合法活动的，因此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居民的广大各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因此也就不能指望在选举中赢得大量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有通过同众多的民主政党结成联盟才能够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匈牙利在国家今后的民主化方面，在恢复被破坏的经济和混乱不堪的财政金融方面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任务要求它必须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民主政党的联盟，即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同民族农民党，特别是一定要有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独立小农党）参加的联盟，才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同该党在市政选举中结成联盟将会为各党在全国普选中的合作奠定基础。毋庸置疑，这样的联盟定会招致独立小农党右翼分子的抵制，这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将右翼分子和公开的反动分子与该党分开，从而加强独立小农党队伍中真正的民主派，进而也在整体上加强国内民主阵线的地位。这样一来。在匈牙利也就会发生在罗马尼亚已经发生在马尼乌的民族农民党身上的那种情况。然而共产党人，很遗憾，不仅对整个国内的，而且也对布达佩斯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关于布达佩斯的市政选举

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于 1945 年 10 月 7 日举行。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而独立小农党则同刚刚组建的名为人民民主党的反动天主教政党结成联盟。民族农民党、公民民主党、激进党在这些选举中都各自独立地参加竞选。投票的结果不仅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对于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者——独立小农党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独立小农党得票 51%，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得票 42.4%，所有其他政党共得票 6.5%。

原先就曾做出过结论说，独立小农党已经不再是像战争之前那样仅仅代表匈牙利农村一定阶层的政党，而且也在同样程度上成了城市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次选举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小农党在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独立小农党被匈牙利的反动分子看成是其他许多民主政党中最右翼的政党。这些反动分子担心共产党人的影响增强，在布达佩斯居民中进行了有利于独立小农党的大力宣传鼓动，把该党首先是看成反对国家未来民主化的保证。

2. 天主教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积极参加了选举前的竞选运动。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反动势力的支柱，特别是在那些在政治生活中经验不足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的首都女性居民中，他们成了独立小农党的自愿宣传员。在布达佩斯的市政选举中支持独立小农党的选票有 2/3 是妇女投的票。当然，从天主教会的这种做法中并不能得出它是把独立小农党看成为符合天主教会政治观点的政党的结论。天主教会充其量是把该党视为与其他民主政党相比较少为害的党，并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认为站到该党一边

是有利的。

3. 在匈牙利首都所处的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布达佩斯的居民曾经对在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上发言最为积极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抱有很大希望，指望他们能使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但是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只热衷于空泛的宣传，对经济问题并无兴趣，他们为确保首都的粮食供应、公用事业的及时恢复等等没有做任何事情或者至少是做得很少。其结果是在居民的某些阶层（家庭主妇、小官吏等）中出现了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失望情绪。

4. 按照新的选举法给予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选举权也促进了左派民主政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失败。

5. 不能低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匈牙利的反民主活动。贝文和杜鲁门在讲话中关于匈牙利社会制度的非民主性的声明，在匈牙利得到了反动势力和天主教会的广泛响应。驻此间的英国和美国代表处心积虑地散布流言说，如果在布达佩斯的市政选举中左派民主政党取得胜利的话，英国和美国将不向匈牙利提供任何经济援助，并且将不承认匈牙利政府。看来，英—美集团也参预了关于一旦左派政党获胜苏联将使匈牙利苏维埃化的挑衅性谣言的制造。

1947年4月16日于布达佩斯

No 09329

莫洛托夫与拉科西关于匈牙利 政治形势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7年4月29日）

拉科西：当前在匈牙利，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仍然集中在不久前揭露出来的反共和国阴谋。我们确实知道，总理纳吉·费伦茨同样也是阴谋的参加者。从被捕者的供词中可以看出，纳吉·费伦茨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值得注意的是蒂尔迪的妻子现在正在美国。她去那里是为了为贫困的匈牙利加尔文教徒募捐。不言而喻，这只是一个借口。除此之外还有，总理纳吉·费伦茨的女婿现在是匈牙利驻美国公使馆的首席参赞，他也像蒂尔迪的妻子一样，正在那里进行交涉。小农党的政策我们很清楚，该党领导人希望国家面临的所有困难在条约批准之前统统暴露出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把一切都提交联合国去解决。

他们在自己的宣传中试图把情况说成是这样的：苏联只是从匈牙利索取战争赔款而不给匈牙利任何东西，可是美国却是匈牙利的恩人。另外，反动分子还计划要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取内务部。作为过渡性步骤，他们打算先把该部转到社会民主党人手中。

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一直在向它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工党人士近来非常频繁地造访匈牙利（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来）。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则与美国人有联系。

现在，由于我们的努力，生活水平已稳定下来。现在的生活水

平相当于战前水平的50%。不言而喻，这比通货膨胀时期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是，很遗憾，对从前的情况人们已经淡忘了。而1938年的水平（即战前的水平）也并不很高，因此工人们现在感到不满意。社会民主党人利用这一点，蛊惑性地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实际上，现在除了我们共产党人，所有的人都在扮演反对派的角色。法西斯分子也在乘机利用这一点。例如，不久前我们的一位书记向一个采煤矿区的工人发表演讲。我们的这位同志力图论证说提高工资将损害通货稳定工作。这位同志遭到了痛打。这毫无疑问是法西斯分子煽动的。应当说，在工人中我们的工作还是滞后的。

莫洛托夫：你们的通货确实已经稳定了吗？

拉科西：是的，通货是已经稳定了。

莫洛托夫：粮食的情况如何？

拉科西：粮食的情况目前尚没有改变。马铃薯的价格上涨了，但每逢春季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在粮食方面我们还是能够摆脱困境的，因为我们尚有若干国家储备。

我们的通货无疑是稳定的，但是人们还是不满意，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实惠。所有的反动势力现在都集中力量想破坏通货的稳定和让美国进行干预。现在有人散布流言说，只要在匈牙利结束“共产主义专制”，美国人将向匈牙利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

我们很想知道，我们何时能够指望条约得到批准。这对于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需要知道，苏联军队还将在匈牙利驻扎多长时间。

莫洛托夫：目前的形势可以认为对我们是有利的。同奥地利的和约在今年内是不会签署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最快也得在明年年初才能签署，而由于我们的军队将驻扎在奥地利，所以，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同样也将驻扎苏联军队。甚至在对匈牙利的和约批准之后，一部分苏军也将留驻匈牙利。所以，整个1947年，形

势大致将同现在一样。

拉科西：这对我们无疑是有好处的，但请您不要忘记，为保障占领军的生活我们的开支数额相当不小。

莫洛托夫：在和约批准之后你们的这些开支将会下降。条约大概将在5月份得到批准，然后还要经过条约规定的90天，在这90天里驻军应当撤出，但是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你们就已将不再为占领军承担任何开支了，所以从物质方面来说你们肯定将会减轻负担，因为留下来负责保护我们的交通线的苏联军队的供应将由苏联开支。我们已经同英国人达成了在5月15日批准和约的协议。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拖延。现在在美国正在大肆散布传言说，美国甚至打算推迟批准同意大利的和约。但是同匈牙利的和约毕竟还是极有可能在5月15日得到批准。

拉科西：反动分子的策略是要赢得时间。我们现在不能加速选举工作，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选举能变得更加壮大和巩固。我们已经加强了对农民的影响。现在可以说，在农村我们感到自己比以前要稳固得多。共产党对手工业者及部分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增加了。但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人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摇摆不定。

莫洛托夫：是大部分人吗？

拉科西：是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小农党中的许多人都投向了右派，城市里的小农党党员的70%左右投向了右派，而投向左派的人也不是投向共产党人，而是投向了社会民主党人。许多转向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农党前党员大致是这样考虑的：现在在匈牙利是两种影响在争斗——美国的和苏联的。假定，美国的影响取得胜利，那时我们将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美国人是不会去触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如果取得胜利的是苏联的影响，则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又是一个同共产党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党的党员。

这些人同时还反对工人的团结。

据我们估算，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左翼联盟将获得50~52%的选票，其余的选举将由小农党和舒约克的“自由党”获得。美国人现在正千方百计地努力不让小农党队伍中出现分裂。他们想在匈牙利拥有一个统一的反动支柱。不久前美国大使同舒约克进行了交谈并建议他停止反对小农党，因为他们美国人需要这个党。他们需要一个反动的党。所有这一切大大地鼓舞了小农党，它感到了美国的支持。蒂尔迪也同意这一政策。

战争赔款占去了匈牙利预算的50%。很难继续这样支撑下去了。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一点。就是说，这种情况大大地削弱着我们的声望。此外还有一个我们为在匈牙利的前德国企业所背的债务问题。两天前我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萨卡希奇交谈过。他对我说，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无法在工人群众面前为苏联提出的关于替德国企业还清债款的新的要求进行辩护。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拉科西：……现在反动分子已经把关于内务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企图把该部从共产党人手中夺走。

莫洛托夫：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他们能够得手，那将会怎样？

拉科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要经由议会通过一项相应的法案。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干，我们将需要动员群众，因此我们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迄今为止，每逢关键性时刻反动势力都会退让，但是肯定也有反动分子坚持不退让的时候。我想，在关于内务部的问题上他们一定不会退让。

共产党人成功地在国内建立起了一种经济上的专政。人所共知，没有我们的同意，银行是不能发放贷款的。我们在各个方面都相当牢固地控制着局势，如果反动分子开始对我们进行威逼，那将是一场政权之争。

美国人曾经由于匈牙利国内反动派叛国阴谋被破获而向斯维里多夫同志多次发出照会，这在当时就宛如一场政治性的决斗。这场决斗以美国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现在美国人已经任命了新的驻匈牙利大使，此人将以与其前任不同的，比其前任灵活得多的方式行事。

一旦我们不得不动员群众，则我们想知道我们能够指望从贵国方面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莫洛托夫：这将取决于当时的形势。事情的前景如何？预料什么时候可能发生冲突？

拉科西：在农作物收获期间政治生活会平静些。如果将有降雨以缓解干旱并且将有一个好收成，那么紧张状态将会有所缓和。我们尚缺一个月的谷物，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能够摆脱困境的。

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武器装备问题。我们的3万名警察没有武器。我们现在正在组建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2~3个大队的警察。其中一个大队已经组成，但是这个大队的战士却还没有步枪，说得确切些，有步枪，但数量很少，而且是各种不同制式的。我们直至今日仍不能得到武器。应当指出的是：匈牙利的各种犯罪分子全都是用优良的苏式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尽管这令人感到很奇怪：他们是从哪里搞到这些武器的——这不得而知。与此同时，警察也没有装甲车，连军队也没有装甲车。工人们手中没有武器。然而法西斯分子却拥有武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在两年内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藏匿在各地的200多门炮。毫无疑问，这些炮是法西斯分子藏匿的。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藏匿的武器比这要多得多。我们非常希望能拥有哪怕是2千~3千支好的冲锋枪，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的工厂并不生产武器。形势十分严峻，而我们却没有武器。

莫洛托夫：如果你们想得到武器，那么这事该怎样办？

拉科西：这可以把账记入贷款账上。需要指出的是：苏军驻匈部队曾经给了我们一些缴获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都是些完全不能用的。过一段时间以后盟军管制委员会就将撤离匈牙利，我担心到那时我们的民主制度将会因失去依托而受到动摇。我们的总数为11000人的军队装备也很差。

莫洛托夫：军队现在在谁手中？

拉科西：国防部长丁尼斯属于小农党左翼。但军队中的所有主要的关键性职位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许多师长也是共产党人。

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其人可靠吗？

拉科西：我认为他是个可靠的人。丁尼斯撤换了巴尔特——一个老反动分子。……

莫洛托夫：就是说，你们既需要警察用的武器装备，也需要军队用的武器装备？

拉科西：是的，警察和军队的武器装备都需要。我们想把军队加以扩编，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将增加军队员额。我们打算借鉴南斯拉夫的某些经验。

莫洛托夫：南斯拉夫在匈牙利很受人们欢迎吗？

拉科西：是的，南斯拉夫在匈牙利很受人们欢迎。应当说，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甚至比苏联还要受欢迎。其原因在于：匈牙利人民不怕南斯拉夫人，而对俄国人的传统恐惧则至今尚未能根除。如果我们同南斯拉夫有一个相应的条约，那该有多好。但是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令人不快的关系妨碍着这样一项条约的签订。南斯拉夫现在不会同我们签订任何条约，因为这样做将被视为是旨在损害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行动。总的来说，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现在两国之间正在交换居民。这项工作使我们耗资2亿福林，占预算的7%。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两国相互移民中

从我们这里接收的是无产者，而他们给我们送来的却是富农。我们尽一切努力试图改善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一直受到迫害。例如，教会可以在斯洛伐克印刷匈牙利文的祈祷书，而匈牙利共产党的报纸却不允许印行。我们认为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就像一群疯子。匈牙利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发生冲突的契机，他们在寻找借口，以便让联合国干预此事。……

拉科西：……关于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我还想补充以下一些情况：通过交换居民，捷克斯洛伐克人给我们送来的是可以成为法西斯分子良好基础的人。铁托帮助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关于自愿交换居民的协议，但是他无法再进一步帮助我们了。他曾答应在党的方面帮助我们，但是目前还未见任何成效。

捷克斯洛伐克人曾打算把匈牙利人送往苏台德州，使他们分开居住，但后来又改变主意了。当时他们就开始把匈牙利人当做做粗活的工人使用。事情陷入了僵局。我们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没有接触。形成的印象是：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迫害、排挤匈牙利共产党人。小农党正在利用这一点来进行自己的宣传。力图证明所有的灾难均是出于共产党人而产生。我们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没有联系。

莫洛托夫：就是说，你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没有良好的关系？

拉科西：不仅仅是没有良好的关系，而是总的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我请求您帮助调解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莫洛托夫：在关于移民的问题上？

拉科西：是的，哪怕就在这个问题上也好。例如，不论是南斯拉夫人还是罗马尼亚人，都没有向外迁出匈牙利人。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人已经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柱，他们都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

下，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却在给我们制造巨大的困难。

莫洛托夫：而我自己，老实说，也想向您抱怨一下捷克人。

我们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定问题上曾经感到十分为难。当时在巴黎曾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斯兰斯基去了巴黎。进行了谈判，但一切毫无结果。只是到了现在，当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来到莫斯科，我们给哥特瓦尔德发出相应信件的时候，才终于得以在我们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目前同捷克斯洛伐克很难讲话，也许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但是眼下捷克人确是非常固执的。

拉科西：我想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战俘的问题。反动分子正在非常积极地利用这个问题反对我们。……

拉科西：……我们还打算把纳吉·费伦茨揭露出来。我们掌握有可以使这位总理名誉扫地的科瓦奇·贝拉的供词。但是科瓦奇·贝拉现在在苏联手里。我们希望你们把科瓦奇·贝拉交给我们哪怕是一天或者2~3个小时都行，以便他能够以证人的身份在匈牙利人民面前讲一次话并提供证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得到您的批准。到那时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就将会重新被提到首要地位，将会证明纳吉·费伦茨同阴谋分子是有联系的。

莫洛托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局部性的、无关紧要的细小问题。毫无疑问，你们能够利用科瓦奇的证词，但这样做将产生的效果是短时期的。此外，他本人将在匈牙利法庭上说些什么也不得而知。

拉科西：我们在重新提出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人民已经感到疲惫，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安宁，因此我们不

希望在群众面前扮演一个破坏安宁者的角色。

士瓦本人^①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曾打算让他们移居德国，但是据我们所知，美国人反对这样做。

莫洛托夫：是的，美国人不想这样做。

拉科西：这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我们仅仅使三分之一的士瓦本人移居出了匈牙利。

莫洛托夫：你们错过了有利的时机。

拉科西：原先，我们应当经由奥地利使士瓦本人移居出去，但是苏军卫戍司令又把他们遣返回匈牙利，而且还把在奥地利的德国人同他们一起送了回来。

莫洛托夫：但是现在美国人坚持不让把士瓦本人移居德国的美国占领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性是很小的。

拉科西：现在在匈牙利的600个村庄里都住有士瓦本人。应当说，多数士瓦本人已经转向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多数领导人按民族均为德意志人（里斯，班恩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不太久以前都已把德意志姓氏改成了匈牙利姓氏。

莫洛托夫：萨卡希奇表现如何？

拉科西：他动摇得很厉害。

莫洛托夫：但是党的领导人目前仍然还是他？

拉科西：暂时是这样，但是在他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需要非常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班恩·安托尔。

能否就从匈牙利向德国的苏联占领区迁移士瓦本人问题商定一项协议？

莫洛托夫：但是要知道，匈牙利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并不接壤。

^① 中世纪曾有日耳曼士瓦本公国，这里指的是居住在匈牙利的德国人。

拉科西：那么可以经由捷克斯洛伐克迁移他们。如果把此事告诉士瓦本人，则他们将会吓得魂不附体，因而自动逃往美国占领区。

莫洛托夫：这不太可能。如果我们这样做，则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将成为某种令人闻之丧胆的鬼门关。

拉科西：不，士瓦本人只不过是喜欢任何形式的苏联而已，我们缺少土地。已经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况：匈牙利人来到农村以便得到土地，但是在这些农村里仍然有士瓦本人在生活。于是匈牙利人同士瓦本人就像狗和猫一样在一起生活。

莫洛托夫：就是说，他们已经从自己的家中迁移出去了？

拉科西：是的，我们已经开始采取外迁他们的措施，我们设想将能够向美国占领区迁移10万士瓦本人。士瓦本人对于我们来说是敌人。而共产党人的敌人却把士瓦本人看做是某种盟友。

莫洛托夫：这个问题在政府里讨论过吗？

拉科西：共产党人表示赞成外迁士瓦本人，而所有其他人都反对。社会民主党人默不作声地反对，而小农党则大张旗鼓地反对。

莫洛托夫：在这件事情上前景很渺茫。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们执掌了政权，那就应当承担一切困难。这就像我们民间常说的那样，“头戴皇冠，勇挑重担”。你们那里的情况的确是复杂的。……

莫洛托夫：那么，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计划？你们现在注意力的中心是什么？

拉科西：我们现在注意力的中心是三年计划。去年我们进行了通货稳定工作，现在我们想要实现三年计划。在成功地稳定了通货之后群众开始信任我们了。他们现在相信我们定能实现三年计划。

其次我们希望粉碎反动势力和重新提起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非匈牙利族法西斯分子就有1500多人。这些

人是一些种族主义者、教授、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必须给他们以打击。

莫洛托夫：也就是说，大部分匈牙利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阴谋？如果你们将要与整个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为敌，你们的处境将会很困难。

拉科西：不，我们不会同整个匈牙利知识分子为敌。我们将要触犯的主要是反动的官吏们。

莫洛托夫：我认为你们必须牢牢地把两个武器掌握在手：第一是三年计划，第二是内务部。

拉科西：社会民主党人固执地想要染指内务部。他们要求在对该部的领导方面实行均等原则。由于这一点我们同他们之前一直在进行着经常不断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向小农党领导人提供所有重要的秘密。例如，他们曾想预先告知小农党，说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有关叛国阴谋的情况。在布达佩斯曾经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被击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是谁向他开的枪——这不得而知，我认为是美国人。因为这个人发现了在英国使团驻地的阴谋分子的避难所。另一个情况是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了解的重要机密情报首先告知的不是萨卡希奇，而是美国人。

我还想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我们为德国企业承担的债务问题。这一债务数目颇为可观。现在的分歧在于这笔钱的兑换率。苏联同志要求我们按金本位，也就是按4马克等于1美元的比价来还清所有债务。如果人民得知，除了战争赔款之外我们还得向苏联支付20万美元来替这些企业还债，那时候这件事将使他们反转来把矛头对准我们，美国人也将利用这一点。

莫洛托夫：那么，您认为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拉科西：调整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和战俘问题。

莫洛托夫：战俘问题的解决对你们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拉科西：不管怎样，战俘们迟早将返回祖国。但是如果他们早些并且是根据共产党人的倡议而归国，将更好一些。此外，在苏联现在还有数千名从匈牙利运来的匈牙利妇女。

莫洛托夫：她们大概是被当作德国妇女被运走的。

拉科西：这事是在混乱中发生的。有时是把她们当作德国妇女运走的。例如，在苏联的一个城市里现在就有300名匈牙利妇女在劳动。

莫洛托夫：但是我们并没有运走匈牙利妇女。

拉科西：事情的起因是，当时一些地方自治政权的反动分子想方设法把有进步思想的匈牙利妇女，特别是女共产党员当作德国女人交给苏联军事当局，以便摆脱她们。而某些苏联同志则在缺乏警觉和没有弄清真情的情況下把她们作为德国女人运走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问题、战俘的遣返问题、为德国企业承担的债务问题以及武器装备问题。

莫洛托夫：给你们一些武器，这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此事该如何去做？

拉科西：我想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

莫洛托夫：给你们什么样的武器更好些？苏联的还是德国的？

拉科西：当然是苏制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更好一些，但是给德国造的武器也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被武装得像当时波兰军队被武装的那样。

莫洛托夫：波兰是另外一码事，现在形势已经变了。请你们不要忘记，在外长委员会上我们曾表态反对用外国武器武装奥地利军队。

我认为，在1945年，在议会选举时你们没有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莫洛托夫：当时应当打破他们的阻碍。如果你们当时结成联盟参加竞选，你们就不会出现让一个党取得多数的这样一种局面。我认为这是你们的错误。

拉科西：是的，也许是这样罢。

科罗特克维奇 记录

1947年4月29日于莫斯科

№09336

拉科西关于政府危机和纳吉辞职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47年6月12日）

译自德文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自5月初以来我们党的路线已有所改变，即党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加强阶级影响，扩大其在群众中的基础，并开始集中比用于处理国家事务更多的精力来加强和巩固党本身。与此相适应，已提出了这样一些号召，诸如“富人应当掏钱！”，“大银行应当收归国有”等等；同时还进行了一场强化运动来证明小农党内存在耍两面派手法，以及该党内仍然存在着幕后领导班子。

5月23日拉科西提出，应当利用政府总理逗留瑞士而不在国内的时机加速危机的发展。根据“行动要迅速和坚决”的原则，决定由当天选举出人民会议定下调子，并在同一天制定了包括有加速和引导危机的各项细节的计划。人民会议有一部分是同社会民主党人共同主持的。在借助于人民会议而出现了适当的局面之后，5月28日，代行总理职权的拉科西收到了斯维里多夫中将附有科瓦奇·贝拉的供词的照会。^①拉科西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副总理萨卡希

^① 关于科瓦奇·贝拉指控纳吉·费伦茨在战时有叛国罪行的供词，是拉科西要求苏联提供的，因贝拉关押在苏联。参见本卷本专题№09329文件。

奇通报了该照会及其附件的内容（此事是在一直进行到 14 点 30 分的会议期间做的）。随后萨卡希奇离开了会场，而半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发觉由于萨卡希奇的泄露，敌人已得知了某些风声。

拉科西下令在晚上 7 点钟召开部长会议紧急会议。当晚人们无法找到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他当时据说是在外地某个地方钓鱼。他同样也猜到了些什么。

部长会议毫无思想准备。实际上，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拉科西向部长会议通报了照会的内容，接着列举了对纳吉·费伦茨各种指控的最主要部分。同时他建议“现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目前只是想办法使纳吉·费伦茨回国”。这一建议使小农党的成员们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因而也为他们所接受。只有副总理巴洛格·伊什特万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并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咳，就这一点已经足够了！”会议公报和所做出的决议立即予以公布，由广播电台播发并引起了相应的强烈反响。

翌日，决议被告知纳吉·费伦茨，拉科西通过电话同他谈了话。拉科西向他说明了所通报的事实的严重性，以及在工人和农民中出现的对纳吉·费伦茨的巨大愤慨，并建议他立即返回匈牙利。拉科西向他许诺，警方将保护他免遭人民群众对他可能的袭击。所通报的这些情况给纳吉·费伦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些在匈牙利的同谋者也给他打了电话，向他暗示他一旦回国将被送交法庭受审。29 日晚小农党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纳吉·费伦茨必须立即返回匈牙利。但是就在同时，小农党政治局竟又委托巴洛格·伊什特万副总理同时给纳吉·费伦茨打电话让他不要回来。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他回国之后很可能做出严重损害该党声誉的供词。

巴洛格·伊什特万完成了这一委托。在对待纳吉·费伦茨的态度方面，共和国总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5 月 30 日联络委员会召开

了两个工人党的联席会议，会上决定要求纳吉·费伦茨辞职，并组织一次群众集会。

同时向纳吉·费伦茨提出的要求是：立即回国或者辞职，并在下午3时许向他发出了某种最后通牒。匈牙利驻伯尔尼公使报告说纳吉·费伦茨向他表示愿意辞职。据此报告，匈牙利官方通讯社报道了这一情况，共产党的报纸出了号外，电台也做了广播。关于辞职的书面声明纳吉·费伦茨是过了两天，在他的4岁的儿子被送往瑞士之后发回的。

这个报道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31日早晨我们决定支持提名丁尼斯·拉约什担任总理。根据我们的建议，民族农民党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经过一段犹豫后，社会民主党也同意了此事。在这一提名已为人们所共知后，小农党的左翼成功地控制了其党内在总理人选问题上的局面。下午4点，被授权提名新总理人选的议会政治委员会在全部程序只用了5分钟的会议上一致提议蒂涅什·拉约什出任总理。其他政党对此是如此的惊慌失措，以致连半法西斯主义的“自由党”领导人舒约克都未发一言，提名即获通过。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就是于两天后出逃的那个沃尔加·贝洛。在事情的准备阶段，自己曾希望担任总理的奥利特瓦尼·伊姆雷和曾指望得到共产党人的帮助以便留任副总理的巴洛格·伊什特万添了许多麻烦。

晚上7点钟，代行总理职责的拉科西前往会见共和国总统，告知他根据宪法被授权提名总理人选的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他是带着未来的政府成员一同前往的。双方争执了半个小时，因为共和国总统坚持要让小农党的总书记巴洛格·伊什特万同时被任命为副总理。此人被看做是秋千政策的最后防线而把赌注压在了他身上。

拉科西坚定地陈述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丁尼斯·拉约什的支持。最后总统做出了让步，于晚上8时30分新总理按照宪法规定的所有程序正式就职。广播电台立即播发了相关的报道。

我们之所以加速危机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当时有理由担心，任何拖延和耽搁都将给我们的敌人以转入进攻的机会。在这场危机期间，前美国大使肖恩菲尔德已奉召即将离任（拉科西在纳吉·费伦茨辞职的当天曾以总理身分为肖恩菲尔德举行送别午宴）。而新任大使尚未到任。我们已获悉：当在布达佩斯已经成立了新政府的同时，在伯尔尼的纳吉·费伦茨曾接到指示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辞职。由于我们行动的迅速，这一主意传到时已为时过晚了。

我们曾坚持新政府不增加新的成员，因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攻击。我们曾经希望新政府将直接接续其前任的工作。此外，每提出一个新的人选都会拖延问题的迅速解决。我们只解除了吉恩杰希的职务，但我们安抚他说他将可能被任命为驻外使节。

议会主席沃尔加·贝洛于次日出逃，这更进一步加强人们对此次事件的印象。对有关所谓共产党阴谋的欺骗性消息，以及发生在布达佩斯街头冲突等，我们的处理办法是由在总统蒂尔迪主持下的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由新任总理丁尼斯·拉约什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和由总统蒂尔迪发表广播讲话。根据我们的要求，纳吉·费伦茨和沃尔加·贝洛被小农党政治局痛斥为叛徒并被开除出党。我们已下令于6月10日召开议会会议。到目前为止议会主席一直是我们的同志科沙，他同时还任共和国副总统。如果蒂尔迪提出辞职，就可由他来取代蒂尔迪出任总统，这一情况很重要，因为蒂尔迪一直试图以暗示他将辞职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而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小农党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己的主席并任国家总理的纳吉·费伦茨、任议会主席的沃尔加·贝洛和自己的总书记巴洛格·伊什特万。他们因非常惊慌而不知所措。今天未经辩论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关于授予政府全权的法案。这意味着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丁尼斯·

拉约什纲领性的讲话在议会中反响不错，已于昨天获得通过。

有些小农党的领导成员虽然曾采取两面政策，但尚未使自己名誉扫地到被开除出党的程度，对这些人我们将打发他们出国任职。例如，我们已经同意让曾被总统蒂尔迪提名担任总理的奥尔特瓦尼出任匈牙利驻开罗公使。我们打算任命吉恩杰希为驻莫斯科的使节，因为他还有一定的名声。这样做也可以使那些以为我们的对外政策路线将会迅速改变的人安下心来。在这种情况下，现任匈牙利驻莫斯科的使节塞克费尤将担任外交部长。蒂尔迪已经同意了对他的提名。这也将使美国人难以对新政策进行攻击。

现在我们正在着手对小农党进行清洗。一些副部长和州长已被撤换，已开始将他们清除出党。该党党内现在为一派茫然不知所措的情绪所笼罩，在财务方面该党已经破产，我们正试图帮助该党的左翼实现民主派分子的重组。

社会民主党对事件的进程不大满意。在危机的日子里我们党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主动精神和如此之大的力量、毅力与决心，致使社会民主党退居次要地位而黯然失色。社会民主党人非常害怕我们党取得巨大优势，害怕丁尼斯这个在匈牙利报刊上被称为“可怕人物”的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们。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采取一种能使他们成为大部分已脱离小农党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集合点的政策。右翼势力希望社会民主党将能够取代小农党的位置来充当美国人手中的工具并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帮助。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支持他们的这些希望。我们正在动员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以反对这些计划。

从笼罩在小农党内的一派混乱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民族农民党。在该党的报纸上每天都在公布转而加入民族农民党的小农党各级组织的名称和各州领导人的姓名。他们指望，如果在3个月之内举行大选的话，他们在本次大选中得票的数量将能翻一番。

我们党同样得到巩固和加强。党员的情绪更加高涨。党的威高已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当然还要预先警告人们防止过分乐观。

我们的计划是争取在8月的下半月或者8月底举行大选。我们已经向所有政党，其中包括小农党提出了建立民主力量竞选联盟的问题。小农党和民族农民党主张按保加利亚模式建立联盟。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样做。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也把社会民主党人吸收进这一联盟中来。我们已经通过该党的左派力量向他们施加了压力。这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将取决于美国和英国对这一联盟施加的压力。

我们担心保加利亚模式在我们这里不会取得像在保加利亚那样的成功，因为我们党还不像保加利亚党那样强大。

我们不希望制定新的选举法，因为我们怕对以前的选举权进行缩减的新选举法会为别人的攻击创造有利的土壤。我们打算利用现有的选举法剥夺大约50万名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选举权。我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他政党的候选人提名。我们打算允许舒约克的党仅仅在某些州提出候选人并有意让2~3个其他右翼政党参加竞选。

为了改善政治形势使之对我们有利，我们预定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我们已经确定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三年计划，在开始实施此项计划之前的数天内拉科西将在自己的讲话中宣布：从8月1日起粮食定量将增加一倍，在8月份将凭票供应食糖600万公斤，还要将食用油定量增加1倍，组织生产1500万米纺织品和600万双鞋以及其他物品。我们将通过各种渠道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建立食品储备并将其投放市场。我们所制定的三年计划将这样开始。经过两年的干旱之后今年看来丰收在望，这将给人们带来乐观的情绪，而这种乐观情绪同样对我们有利。

在政治方面我们将保护小私有制和普通百姓。如果在8月份能

有2.5万名战俘返回匈牙利。这将对我们有很大好处（释放战俘的做法迄今以来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我们希望在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上能达成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的谅解，这将会给知识分子造成良好的印象。如果苏联在这一时间之前能像已经许诺的那样让4万名（或者更多一些）土瓦本人迁入德国的苏联占领区，那对我们来说同样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帮助。

同志们对取得成功都充满信心并希望这一次不再重犯1945年的错误。当然，也存在许多尚不得而知的因素，例如英美的阴谋，同盟国之间监督委员会的撤销等等。这一次，由于共产党的影响大大加强，民主力量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多数，进而加入进步邻国的行列。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马·拉科西

1947年6月12日于布达佩斯

№09341

普希金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立场与 马罗山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7年6月27日）

绝密

会见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副书记马罗山。

马罗山向我通报说，社会民主党政治局已经决定单独提出候选人名单参加即将举行的大选。马罗山抱怨说，他提出的关于按保加利亚模式由4个联合的政党组成联盟参加大选的建议未被接受。我对马罗山说，社会民主党已走上了一条不论是对匈牙利民主制度还是对社会民主党自身都很危险的道路。我指出，看来过去的教训并没有使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学到多少东西。马罗山请我出个主意，告诉他该怎么办。我回答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确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就该把这一立场坚持到底。

后来才弄清楚，马罗山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局内坚决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致使政治局多数成员被迫放弃自己的决定转而同意按保加利亚模式组成由4个联合的政党参加的竞选联盟。

1947年6月27日于布达佩斯

№09349

**谢罗夫关于拉科西请求暂时停止遣送
匈牙利被俘军官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7年7月28日)

绝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按照匈牙利总理关于在1947年7~8月间暂时中止从苏联遣送被俘军官返回匈牙利的请求，苏联内务部向您报告：

从1947年7月17日起已暂时中止遣返被俘匈牙利军官。

目前尚有在收到拉科西关于暂时中止遣送军官的请求之前被内务部遣返而正在途中的近800人，这些人将到达遣返机构设在福克沙尼和锡盖图—马尔马切伊（罗马尼亚）的中转营地。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伊·谢罗夫

1947年7月28日于莫斯科

No 09352

拉科西关于匈牙利竞选运动状况 给苏联领导人的信

(1947年8月13日)

译自德文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这里的竞选运动正在紧张进行着。在小农党内出现了某些混乱和惊慌失措。除了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竞选联盟的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农民党之外，还有6个反对党。其中2个党——公民民主党和激进党——已经参加过1945年的选举，前者获得了2个议席，后者一个议席也没得到。新的政党是：人民民主党，其领导人是巴兰科维奇。这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党，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人都支持它。匈牙利独立民主党的领导人是前副总理巴洛格·伊什特万。这个党希望代表那些由于小农党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不够坚决有力而对该党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士。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曾经把社会民主党当成反共政党并因而试图同该党联合。领导匈牙利独立党的普法伊弗·佐尔坦是前司法部副部长，此人于今年3月被开除出小农党。该党希望得到作为小农党极右翼的法西斯和反动分子的选票。还有一个叫做天主教妇女联盟的党，领导该党的什拉赫塔·马尔吉特是一名前国会议员。这是一个由修女、女护士等组成的党。

此次选举的前景如何？现在，离选举还有两个星期，经济形势

比1945年秋天要好得多了。1945年选举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已经被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所取代。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农民当中对民主制度和共产党的态度也已有所改变。

但是更为重要的情况是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已经分裂。在1945年的选举中，农民的大多数以及广大守旧的、沙文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城市居民都一致投小农党的票，罗马尼亚主教会给明曾蒂大主教的信中曾号召当时的信徒们投票支持小农党。现在，同小农党一起并存的还有7个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数字表明了目前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存在的分裂和混乱状况。

至于我们共产党人在大选中的前景，可以说要比1945年时好得多。党在国家西部地区农民中的影响已大大增强，而在1945年时我们在那里还曾势单力薄。只有现在才可以说，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绝大多数是跟着我们党走的。我们在产业工人中影响也增强了，这一点已为生产委员会及工会的选举所证实。我们在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在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中也赢得了不错的声望。战俘的返回祖国也使我们党受到了赞扬和好评。这件事使得居民中各阶层的人纷纷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将匈牙利土瓦本人移居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增强了我们在那些土地改革之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无地农民中的影响，他们现在正指望得到被移居的土瓦本人的土地。处于这种状况的匈牙利农民在20万人以内。所有这些因素确保了我们党的发展和壮大。所有关于选举的预测都认为共产党的得票将会增加。但是这些预测都很少认为共产党会得到多于25%的选票。我们在揭露叛国阴谋期间取得的政治成就以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吓住了一部分人，使人们心中感到害怕，这自然有碍于我们的工作。

我们打算根据新的选举法把选民中12~15%的反动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从选民名单上删除。由于被授权负责竞选运动和审查

选民名单的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所以，所有的政党都感到自己在受到威胁。我们曾尽可能地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进行从名单上勾掉选民的工作，试图以此来缓解这一印象，当然，这样做也削弱了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尽管勾掉了一些人，但是选民数量仍将比1945年的要多，因而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就好似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

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在产业工人及在1945年投票支持过该党的农民中的影响。在小农党败北之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正指望得到那些城市居民中大多数人的选票——这些人在这方面对小农党感到失望，因而在寻找一个强大的反共、反苏政党，而最近又在指望得到农民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特意地做出各种努力，以求迎合反动的群众，而且该党是在那些它能够避开社会监督的地方干这种事情的。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民中散布流言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将意味着立即组织集体农庄。他们的宣传鼓动因佩耶尔和其他一些极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退党而受阻。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退党将给该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尚不得而知。

根据最乐观的估计，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将因此而失掉的选票不会超过6~8%。在投票时将土瓦本人排除在外，同样意味着该党将失去若干议席，因为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土瓦本人的党。

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这次选举中的得票能多于我们若干个百分点。在由于小农党的分裂而出现的混乱形势中，目前很难进行任何预测。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毫不留情地力图在选举中超过我们。据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比1945年选举时的名单略好一些。而我们对这一名单则并不满意。

民族农民党希望在选举中取得较大成绩，持乐观态度的人议论说，该党在这次选举中得票的比例将比在上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增加

一倍。该党在1945年得票率仅为6.7%，而当时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寻常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党得票比例增加一倍是不大可能的，但我们仍然希望这一比例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民族农民党的候选人名单中，可靠的左派分子的数量远比1945年时要多。至于说到小农党，则看法不尽一致，因为该党现在正处于某种分裂瓦解的阶段。在纳吉·费伦茨被揭露之后，上台的该党新的领导班子主要是由老的动摇分子所组成。这个党的新闻记者和在各州的领导人迄今为止大部分都是叛国阴谋的参加者。自纳吉·费伦茨下台的两个月以来，该党的领导人没有在小农党的广大党员中进行任何认真的工作。该党选民中只有一部分，而且是不大的一部分转向了左派——转向民族农民党或者转向我们，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则处于消极状态或混乱状态。这一部分人究竟有多少，目前还很难确定，因为该党的分裂瓦解过程只是在竞选运动开始两个星期之后才显露出来。乐观主义者认为，持消极情绪的广大农民绝大多数以后仍然将会习惯性地投这个党的票，因而该党甚至能够得到40%的选票（在1945年它的得票占57%）。悲观主义者则说，能得到30%的选票他们就知足了，而这意味着该党将失掉几乎50%的选票。在小农党的候选人名单中补充了数名左翼民主派人士，但是该党里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数不多。

其余的6个政党正处在办理组织手续的不同阶段。其中的任何一个党都没指望自己能得到5%以上的选票，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也没有人认为所有这6个党加到一起会得到总共15%以上的选票。对于这些党中的某几个政党来说，他们是否将在大多数选举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问题尚未解决。

反动势力正在竭尽全力，试图事先就把这次选举搞臭。在舒约克的所谓“自由党”指出选举法不民主并宣告该党自行解散之后，美国人正在极力促使普法伊弗的党也采取同样的步骤。

近日来，他们还试图怂恿小农党也拒绝参加这次选举。做为借口，他们利用的事实是一些反动分子被从该党的选民名单中勾掉了。这一措施被说成是消灭小农党的一种办法。在该党动摇不定和受到非难时，其领导班子中的某些人在困难和即将失败的选举面前低头畏缩了。我们现在正不得不同这一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

我们预料在选举之后将出现如下困难：小农党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部分选票，不是转向我们，而是转向那些新建立的反对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小农党将不再是最大的政党，则马上就会产生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总理的问题。在小农党的候选人当中，有一些相当不可靠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将陷入右翼反对派的影响之下。这样一来，小农党就会重新表现出两面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动摇不定的因素。当然，主要的困难将是同社会民主党人打交道，因为由于小农党的败北，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性将会增加。

总之，综合上述的一切，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预测选举结果还不可能，许多事情取决于最后两周所做的工作。我们党的士气很高，信心十足。我们确信，这次选举将大大加强和巩固可靠的民主派人士的阵地。

致以热烈的共产主义敬礼！

马·拉科西

1947年8月13日于布达佩斯

译者：对外政策部科员 Г. 科罗特克维奇

№09355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领导层状况的谈话纪要

(1947年9月1日)

摘自普希金的日记

秘密

9月1日

会见马罗山·捷尔吉。

马罗山告诉我说，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遭受的失败，党内已经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萨卡希奇患病，已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露面。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安娜·凯特里、班恩、里斯和贝姆·维尔莫什决定利用业已形成的局面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他们力图摆脱萨卡希奇和马罗山，竭力把党在大选中遭受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们两人身上。右翼分子认为，萨卡希奇和马罗山在竞选运动期间曾经听命于共产党人，没有反对剥夺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及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士的选举权，没有阻止共产党人制造假选举。说到这里，马罗山表示，他对右翼分子的这种看法无力进行任何反驳。我对马罗山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党的领导人在竞选运动期间拒绝同共产党人合作，并进行积极的反对共产党的宣传，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把反动势力的选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社会民主党采取这样的政策，从中得利的只有反动派。接着我对马罗山说，关于剥夺大量社会民主

党拥护者选举权的论点根本不值一评，因为当时被剥夺选举权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任何情况都只会把选票投给反对政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马罗山说，他同意我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的原因的看法，并补充说，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该党内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确保在竞选运动期间同共产党人进行正常合作的程度。马罗山说：“在竞选运动期间，调子是由我们党内的右翼势力定的，而他们从来都是反对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马罗山继续说：“在这样一个党里，我很难进行工作。我将辞去党的副总书记职务，也可能我将退出该党。”我建议马罗山在迈出这样一步之前先认认真真地想一想。

1947年9月1日于布达佩斯

№09357

拉科西关于大选后匈牙利政府的 组成给苏联领导人的信

(1947年10月2日)

译自德文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业已举行，我于9月11日在会上做了报告。全会之后，新的政府已经组成。

毫无疑问，不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小农党都曾秉承英—美主子的旨意竭力想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新政府的组建，并在此期间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已查明，有人甚至怀着敌意在向民族农民党的右翼施加影响。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社会民主党向我们施加压力的企图被我们击退了。社会民主党人本想用来排挤我们的一些条件来换取自己参加竞选联盟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们向他们做出了某些非实质性的许诺，但是这些许诺是根据我们的一些要求提出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点什么，他们就必须满足我们的这些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已开始重组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队伍，并帮助他们夺回和巩固原已失去的或者已变得不稳固的阵地。我们打算不仅在社会民主党的高层领导中，而且也在其下属的基层组织中，将统一战线的支持者们团结起来。

我们尤其注意竭力地在组织方面给身处作为右派势力堡垒的布

达佩斯市郊所谓“红色地带”的统一战线支持者们以帮助。我们打算在首都以外各地也同样这样做，目的是在不时发生的危机中不再出现我们在选举之后才能够发现其存在的那种动摇不定。

目前该党内以谢利格为首的右翼势力还很强大。他们试图通过提出自己一系列的要求来怂恿统一战线的支持者——萨卡希奇的追随者们起来同我们进行斗争，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既然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充当右翼的遮盖布，那么我们就常常不得不对这样一些攻击予以驳斥。

我们的报纸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激烈论战使工人们感到有某些出乎意料。我们在论战中论据充分，很有说服力。这肯定将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转入我们党的势头在减弱。社会民主党人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威胁、强迫等，以便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转而加入共产党。这种做法已经使转党人数减少了，而在某些地方则已经完全停止了这种转党。但我们相信，社会民主党人转而加入我党的进程不久即将重新开始。

至于说到小农党内的情况，可以说该党党内关系现在相当混乱。该党所得选票从 57% 降到了 15%，这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首都以外各地，这一失败被归咎于该党参加了竞选联盟，而且许多当选并来到布达佩斯的议员也宣称，该党今后再也不应当参加竞选联盟了。该党议会党团由 68 人组成，其中民主派分子比在旧议会该党议会党团中人数多一些。但是这些左派分子多少还缺乏信心。他们不得不维护这个联盟，尽管他们的党在联盟中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失败。

右翼势力在选举进行完毕的 10 天之后召开了一次某种类似党代表大会的会议。有近 500 名代表来到布达佩斯参加会议，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无疑是曾经投票赞成反动党的人，而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个党的人，在小农党各级党的组织目前所处的状况之下也无法进行

查证。这些人的活动是由给他们下达指示的普法伊弗的党和美国人领导的。这些人曾经打算选出一个由右翼分子组成的新的政治局，并由这个政治局立即出面反对联盟或者造成参加联盟的假象，以达到破坏并搞垮它的目的。右翼势力当时曾占有多数。但是我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于是在左翼领导人，其中包括党的主席道比·伊什特万以退出该党相威胁之后，组成了一个作为折衷产物的政治局。

在组成政府时，这个政治局的大部分人——无疑是按照美国人的主意——曾试图争取不让小农党占据总理的职位。他们希望以此来延长政府危机和犹疑不定的状态。在经过适当地施加压力之后，他们放弃了这种打算，但是拿定主意不提名左翼人士出任4个部长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转向了按其人员组成来说比政治局更为偏左的议会党团，从而争取到由丁尼斯出任总理，奥尔图泰出任教育部长，尼亚拉基出任财政部长，萨博·阿尔帕德出任农业部长。我们曾打算提名道比·伊什特万来取代属于党的中派集团的萨博。但是当时没有可能实现这一点，因为道比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出任部长，他将不能很好地履行党的领导者的职责。我们还曾准备像以前一样让他担任不管部部长，但是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把部长的数量增加到19个，不过，这一点很难做到。在举行的内阁首次会议上我们已做出决定：将邀请他列席内阁会议。

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原先的4个部长席位。民族农民党除原先的重建部长一职之外还得到了原由韦赖什·彼得担任的军事部长职位。民族农民党曾提议让韦赖什·彼得作为党的领导人担任副总理。我们和小农党都同意了这一建议，但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予以拒绝。

所出任部长的人有：我们党的奥尔特·卡尔，他迄今为止一直担任我党中央干部部部长，以前曾在国家主管在职人员社会保障的部门工作过，现在他将出任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长。莫尔纳尔同志由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长改任外交部长。出任农业部的是小农党的萨

博·阿尔帕德，此人现年 70 岁，他属于该党的中派集团。来自民族农民党的新部长是达尔瓦什·约瑟夫（重建部长），此人是匈牙利—苏联文化交流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我们暂时取消了供给部，将其与农业部合并，将新闻部并入外交部，还取消了不管部长职位，各副职的数额也将予减少。争夺这些职位的斗争近日内即将开始。

至于反对派，他们暂时表现平静。毋庸置疑，反对派现在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活动而给人以借口，使两个工人政党或者整个联盟在反对他们的共同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加强。除此之外，据我们所知，反对派正在等待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的结局及四国外长 11 月伦敦会议的结果。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反对派可能是按照美国人的主意，正在根据由于这些会议而出现的复杂情况制定一些重要的计划。目前我们在报刊上同反对派进行的斗争是孤军奋战。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材料，并打算依据这些材料通过法律途径宣告大部分普法伊弗的党的议员资格无效。

我们正面临艰难的政治斗争。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出现了裂痕。我们认为这个战线已经不如选举之前那样牢固了。我们打算像加强和巩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一样加强和巩固小农党内部的左派力量。就某一方面而言，同小农党的合作进行得比同社会民主党人要好一些，因为小农党的民主派分子比较倾向于公开寻求我们的帮助。

在和约批准之后，反动势力变得大胆起来。美国人活动得更加卖力和更加公开。共产党人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在我们的对手那里引起了恐惧，这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我们。

作为一个团结一致并且拥有明确目标的大党，加之借鉴已经取得的利用议会民主的各种可能性的某些经验，我们相信在其他政党

目前普遍心慌意乱和缺乏信心的形势下，我们定能坚持住自己的路线。毫无疑问，也将会出现一些我们无法严格遵守某些表面的民主准则的情况。

我们确信，在选举之后形成的目前局势下，我们一定能使我们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化和巩固，而这一基础恰恰是匈牙利民主制度今后发展的惟一可靠的保证。

最困难的形势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已经是第三次遭受严重的旱灾了。我们面临着克服粮食供应方面的巨大困难。自10月1日起我们已不得不大大减少粮食配给定量，但是即使在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新粮收获之前的粮食供应仍无法保证。我们没有必要的种籽，我们的牲畜饲料也严重不足，以致影响到畜牧业的发展，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农业歉收的影响，国家财政已开始不稳。我们的赤字在不断增长，致使我们不得不对三年计划从一开始就大力缩减，目的是不使我们的通货稳定受到威胁。农业歉收引起了物价上涨，而由于物价上涨，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增加。

我们将提议派政府代表团于今年11月份前往莫斯科，以便引见在最近危机期间的不利条件下大显身手的新任总理，同时也为了加强和巩固今后成为主权国家的匈牙利同苏联之间的关系。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马·拉科西

1947年10月2日于布达佩斯

译者：对外政策部科员Г.科罗特克维奇

№07485

斯大林与蒂尔迪关于苏匈关系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7日)

秘密

参加人：维·米·莫洛托夫、蒂尔迪·佐尔坦、丁尼斯·拉约什、拉科西·马加什、萨卡希奇·阿尔帕特、莫尔纳尔·埃里克、韦赖什·彼得、道比·伊斯特万、塞克费尤·久拉，和 Г.М. 普希金、Б.Я. 格里戈里耶夫（翻译）

斯大林同志问旅途如何。

蒂尔迪回答很顺利。有很多新印象。

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代表团有什么问题需他回答。

丁尼斯说，昨天匈牙利代表团研究了由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转交给拉科西和莫尔纳尔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草案。匈牙利代表团认为可以接受这个草案并准备签署条约。但是，丁尼斯说，按照匈牙利宪法，条约要在国家议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所以请求对这个条约草案做相应的修改。

斯大林同志说可以。

丁尼斯请求斯大林同志将匈牙利战俘遣送回国，从4月份开始，以便在今年秋天结束。

斯大林同志回答可以。

丁尼斯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将匈牙利驻苏公使馆和苏联驻匈牙利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声明这个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匈牙利

和苏联的友好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应可以。

拉科西用俄语表示，还有其他问题看来可以通过主管部门而不用在这次会见中解决。

斯大林同志请翻译把拉科西的话翻译给代表团听。

然后斯大林同志问，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如何。

蒂尔迪回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关系很好，在此补充到：匈牙利还有一个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希望和它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请斯大林同志协助此事。

斯大林回答说，按他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人本身不会反对与匈牙利建立这样的关系，答应协助此事。

蒂尔迪再次强调匈牙利希望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斯大林同志答应给予协助，但说捷克斯洛伐克未必会反对改善关系。

莫洛托夫同志补充说，友好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斯大林表示对匈牙利国内情况感兴趣。

蒂尔迪回答说匈牙利国内的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

斯大林问，福林是否坚挺，工业近况如何。

蒂尔迪说，福林是稳定的货币，工业在发展，农民工作得不错。

斯大林问国内有没有怠工的情况。

蒂尔迪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说匈牙利今年种植面积比往年有所增加，虽然由于干旱，匈牙利的秋播工作延迟了，但后来已经成功地弥补了这些损失。

斯大林问农民的情绪如何。

蒂尔迪说，大部分农民情绪很高，特别是分到土地的农民。

斯大林指出，他们会保护自己。

接着斯大林问，预算增加了没有。

拉科西回答，增加了预算，并说明预算问题一直是匈牙利政府关心的事。

斯大林同志对匈牙利军队的问题很关心，并问匈牙利政府是否想过削减军队。

丁尼斯说，正相反，政府想发展军队。今年要发展到3万人，并对此解释说，由于预算紧张和武器不够，很难执行这个措施，并请求帮助发展匈牙利民主军队。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将给予帮助。

莫洛托夫同志问，什么时候可以签署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丁尼斯回答，明天可以签署。

斯大林问，根据“和平条约”，匈牙利可以有多少军队。

拉科西回答，7万人。

斯大林问，苏联武器对匈牙利是否适用。

丁尼斯回答，适用，还说苏联武器是最好的。

斯大林答应帮助，并说苏联所关心的是匈牙利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特别是在签署条约后。

斯大林问，还有别的问题吗？

莫洛托夫同志说，主要的问题都研究过了，因为没有不同意见，可以认为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拉科西说，匈牙利人和铁托进行谈判，铁托有一个意见，由于必须建立匈牙利军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匈牙利的战争赔款或按贷款条件提供匈牙利武器。

斯大林指出，看来铁托说的是自己的赔款和自己的武器。

拉科西说，他也正是这样理解铁托的。

斯大林指出，由此看来，匈牙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关系不错。

代表团主席和团员承认这点。

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丁尼斯问，明天什么时候进行条约签字。

莫洛托夫说，打算明天晚上7点签署条约。

丁尼斯表示，这个时间对匈牙利代表团也合适。

谈话进行了30分钟。

普希金 记录

1948年2月17日19时于莫斯科

№07486

苏斯洛夫与拉科西关于匈共情况的会谈纪要

(1948年2月19日)

机密

与苏斯洛夫同志谈话开始时，拉科西·马加什谈到一些问题，想了解联共（布）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意见，然后简短地讲述了国内的情况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策略及近期的前景。

拉科西·马加什的问题是：

是否可以召开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例会，讨论一些已成熟的问题。拉科西在此说明，他与铁托和西罗基（捷克斯洛伐克）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他们也承认有必要召开情报局协商例会，但谁也不想开这个头。

按拉科西的意见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例会上应该讨论下列问题：

1. 关于承认民主希腊的马科斯政府的问题。拉科西同志就此告之，马科斯的代表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一起来到匈牙利，他们请求就帮助希腊民主军队向匈牙利转移基地做些工作。拉科西通知说，除了匈牙利的社会组织过去和现在给予马科斯的帮助外，我们同意每月从预算中拨出200万福林。拉科西说明，这个事他已与总统蒂尔迪达成一致。

按拉科西的意见，当希腊共产党组建马科斯政府的时候，毫无疑问，它主要考虑的是对这个政府的承认问题，而首先是来自新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

2. 关于成立巴尔干国家的联邦问题。

拉科西说，虽然我们没有发言，没有支持季米特洛夫同志发言谈到的，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想法^①，但我们想知道，匈牙利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比如，罗马尼亚政府总理格罗查在与我谈话时，同时提出匈罗关税同盟的问题，我们暂时没有答复这个建议。

3. 拉科西同志说，接着必须讨论和调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拉科西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按他的观点批评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说他们对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居民，采取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不利的错误和有害的政策。

由此拉科西同志还讲了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大选前的形势分析，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不利于共产党。所有的资料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只处在防守状态，最近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②证明了它已陷入被孤立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拉科西认为暂时不宜同捷克人去谈匈牙利居民的问题，但在大选后这个问题应得到最终解决。

然后拉科西估计了近年来力量分布的方向改变，说明了匈牙利的局势。

拉科西声称，我们有一个转机，即使资产阶级也开始承认，共产党人会很好地工作。现在有大量的社会民主党员转到共产党的队

① 1948年1月17日季米特洛夫对记者讲到了关于所有东欧国家建立联邦或同盟的前景（希腊可待革命成功后加入），以及缔结关税同盟的问题。1月20日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声明发表在《工人事业》报上，1月23日《真理报》进行了转载。

② 指194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采取的争取大多数民族参加即将举行的1948年选举的方针。

伍中。为了争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站到我们一方，现在我们给该党领导层内的右派分子以打击，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做得很成功。鉴于匈牙利共产党在其他党派内有很大的影响，将来的任务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拉科西说，我们认为，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没有危险，因为我们可以保证通过其他党派，对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产生影响。

接着拉科西谈到共产党对天主教会及其领导人红衣主教——明曾蒂的立场。他说我们暂时没有公开反对教会，如果他们开始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我们会找到很好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会鉴定明曾蒂是精神病。

谈话结束时，拉科西提出一些请求。

第一，他请求尽快允许现在在苏联的、过去被镇压的政治侨民和他们的家属回到匈牙利，这些人有几百个。同时，拉科西引证了斯大林同志对阿巴库莫夫的指示，说斯大林同志同意释放这些人回国。

第二，拉科西请求瓦尔加^①同志4、5月到匈牙利出差2~3个月，财经工作者要向他咨询匈牙利的金融流通和价格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请求对在苏联学习的匈牙利学生免收学费，理由是因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收留学生学费，如苏联收，则不好办。

拉科西提出可以有同等数量的苏联学生免费到匈牙利学习。

苏斯洛夫同志答复拉科西同志的问题时说，他将把谈话内容汇报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他个人认为，有关召集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例会的事，必须在党中央委员之间交换意见。

^① 叶·萨·瓦尔加，苏联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经济问题》杂志编委。

关于承认马科斯政府的问题，苏斯洛夫向拉科西提问：“是否早了些？是否会促使英、美对匈牙利的军事侵略？”苏斯洛夫说，“必须把对游击队的帮助和正式承认马科斯政府区别开。”拉科西同志同意这些意见。

至于巴尔干地区国家的联邦问题，苏斯洛夫说，正像你们知道的，这完全是个臆想出来的意见。^①

我们按照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决议，所有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拉科西同志也同意苏斯洛夫同志的这条意见。

接着苏斯洛夫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比较困难，所以在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不一定合适。如果这个问题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扰和互相谈判的基础上解决，一般来说好一些。拉科西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他说，如果捷克人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未必还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苏斯洛夫告诉拉科西，关于同意政治侨民返回匈牙利的问题是肯定会解决的。拉科西所请求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允许出境。

拉科西同志转交了新的政治侨民名单，请求也允许他们回国。苏斯洛夫答应尽快研究拉科西的请求。

苏斯洛夫答应研究瓦尔加出差匈牙利的事，及匈牙利学生在苏

① 1948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对季米特洛夫提出的联邦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索非亚很快对这个批评做出了反应。1月29日季米特洛夫通过苏联使馆向维辛斯基转达了保加利亚通讯社声明的全文，文中专门强调季米特洛夫认为，“建立联邦和同盟是一个为时尚早的和非当务之急的问题”，至于降低关税问题，季米特洛夫也不是指所有东欧国家的关税同盟，而是指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签订的协议。2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祖国阵线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承认，《真理报》的批评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是“及时的、重要的，有利于防止危害人民民主的倾向”。

联学习的费用问题。

苏斯洛夫询问拉科西关于派遣苏联作家代表团赴匈牙利的事是否合适，这是苏联作家协会收到匈牙利作家的邀请信后提出的建议。

对此，拉科西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

巴拉诺夫 记录

1948年2月19日于莫斯科

№0949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关于匈共民族主义宣传的调查报告

（1948年3月24日）

绝密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错误和资产阶级
对匈牙利共产党报刊的影响

随着苏联红军1944年对匈牙利领土的解放，匈牙利的共产党组织在被解放的领土上恢复了自己的活动。匈牙利共产党走出地下状态开展工作，并宣布了自己的目标——为自由和独立的匈牙利而斗争，也就是为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利益而奋斗。这样，在匈牙利解放后，匈牙利共产党便是作为匈牙利民族的党在人民中开始活动的。后来，党的领导人自己所有的发言和声明中经常强调和展开的就是这一观点。同时，反对派的宣传活动一直都在诋毁匈牙利共产党，说共产党就像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不是匈牙利的党。匈牙利共产党人面对这种敌对的宣传，更加强调自己党的民族性。这在共产党的宣传中特别明显。在共产党的宣传画上，经常看到科苏特、裴多菲和其他匈牙利独立运动战士的画像。共产党的招贴品上一般都框有绿红白三条颜色（匈牙利民族旗帜的颜色）。而不久前党的标志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也画出三种颜色来代替红色。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匈牙利共产党是匈牙利独立斗争和为匈牙利人民民族利益斗争的优秀战士，是继承科苏特和裴多菲及过去其他革命民主党人的优良传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样强调的同时，极力在本国人民面前以民族党的面目出现，经常脱离正确路线，滑入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上。

拉科西、法尔卡什、雷瓦伊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的正式发言中，强调了匈牙利共和国与苏联友好的必要性，讲述了苏维埃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斯大林同志的作用。但在日常的工作中，大多数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害怕被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排斥苏联，尽量闭口不提苏联，还时而做出他们与苏维埃国家毫不相干的姿态。

苏联监察委员会驻匈牙利的代表斯维里多夫同志和苏联派到匈牙利的公使普希金向我们报告了一些事实，当共产党领导人想表现他们是代表匈牙利民族利益的时候，曾经阻挠将过去在匈牙利的德国人的财产按波茨坦决议移交给苏联当局。比如，去年一位匈牙利工程师向苏联当局通报说，在匈牙利凯奇凯梅特市的罐头工厂是德国人的财产，并带来相应的证据。按照共产党中央委员瓦什同志的指示，匈牙利警察局逮捕了这个工程师。他的行为被指控为损害了匈牙利的民族利益。由于斯维里多夫同志的干预才释放了这位工程师。拉科西同志和其他的领导人都被告知了所发生的事情，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好像是在默认类似的行为。这件事，正如已经查明的那样，并不是孤立的。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忽视苏联和苏联的利益，特别表现在他们在匈牙利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的文化，但是对于书籍和出版物中大量严重歪曲苏联现实及反对苏联的内容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比如，1946年共产党出版物《西克拉》发表了蒂波尔·杰尔克

的小说《地下世界的游戏》，这部小说描写了布达佩斯居民在防空洞中的生活。小说中有一章是写苏联军队到来的情景，红军被写成粗野的人和强暴者。对这种恶意诽谤苏联人的书在出版时却冠以赞赏的前言。

1946年布达佩斯出版了大部头的《苏联百科辞典》，由作为共产党员的教授波尔加尔主编。这部书严重地歪曲了苏联的现实。可以说，书里接连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发明”，比如说，在苏联北方生活着野蛮的萨莫耶德人，俄罗斯小伙子消遣时喜爱拳斗等等。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的这些“发明”，是源于德国人上个世纪出版的关于俄罗斯的书。

去年底，布达佩斯图书馆出版了《俄罗斯文学图书索引》，书中历数了用匈牙利文出版的所有俄罗斯作家的书籍。在历数俄罗斯古典和有名的苏维埃作家的著作的同时，索引中还列有皮利尼亚克^①、特列季亚科夫和柯伦泰的书，甚至还有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书。在俄罗斯作家的目录里不知为什么列入了德国作家普利文，而这个人去年从德国的苏联管辖区跑到了比左茨。

对于类似的事件，共产党领导人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如上所述，共产党领导人对宣传苏联的事不感兴趣。匈牙利文化交流协会与苏联的联系很薄弱，共产党中央对此也无帮助。协会总书记桑托同志只到共产党中央的组织部听过一次报告，在这之后，协会这方面的工作也无改善。

“玛菲尔特”电影公司属共产党管辖范围，布达佩斯的大多数电影院都归它管。这个公司没有很好地发行和放映苏联电影。电影要经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们事先审查，很明显，许多好的苏联电影以各种借口未能被他们通过放映。最经常的理由是匈牙利观众不喜欢

^① Б.А.皮利尼亚克，苏联作家，其作品在苏联被认为具有自然主义倾向。

看战争电影，而大多数的苏联电影都是战争片。在这个借口下很长时间没有放映电影《誓言》，只是在斯维里多夫同志和普希金同志的坚持下才在匈牙利放映，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苏联的好电影《带枪的人》也未被允许放映。而在“玛菲尔特”的电影院却放映了很多美国和英国的电影，其中也有战争片。

共产党的刊物完全不宣传苏联的情况。在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没有登载任何有关苏联人、苏维埃生活和联共（布）的材料。同样，在共产党出版的其他报纸上，像是规定一样，都闭口不谈苏联。

所有报纸都登载了苏联与匈牙利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刊登了莫洛托夫同志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团成员的声明及相应的照片，但接着就没有下文了。在共产党的报纸上照样没有关于苏联资料的报道。

文学杂志《论坛》的编辑部成员卢卡奇是共产党员，杂志登载了内容广泛的西方文学和哲学，但完全不谈苏联的文学和文化。整个1947年的杂志只登过两次不大的关于苏联文学的文章。

匈牙利共产党的报刊这样对待苏联是要造成其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的印象，好像它们是与苏联隔绝的。

因此在其他的重要问题——共产党的报纸刊物的宣传方法上，它们也坚持这种做法。

共产党的一些从事出版宣传的领导人（雷瓦伊等）都曾长期生活在苏联，但他们不仅没有掌握布尔什维克办报纸刊物的方法，连向这方面学习一点方法的努力都没有做过，反而排斥这些方法。甚至可以说，匈牙利共产党在出版宣传中，大量采用庸俗市侩的和资产阶级的方式和方法。

日报《自由报》是共产党领导的，却经常登载一些轰动一时的充满市侩习气的绯闻逸事。共产党办的画报《匈牙利时代报》通常在第一版上刊登凶杀、偷盗和其他刑事犯罪的照片，“宣扬”这些

罪行。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半裸体女人的照片。根据以下事实，就可以判断出这家报纸对于重大问题的态度。在2月21日的报纸上，对于鲁达什·劳斯洛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的报告只摘引了10行，旁边还配有英国女歌手的照片。而在此前后，报纸上都没有对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加以任何报道。

共产党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别什基·伊泽》，在形式上是一份私人杂志，但布达佩斯人人都知道它的出版者是共产党员。这份杂志从头到尾是淫秽的内容，大多数版面的画都是裸体女人。在这些画里有时有个别的揭露反动派的政治讽刺画，但这些讽刺画都淹没在淫秽的海洋中。共产党对出版这样的杂志解释为考虑读者的趣味，在特殊的条件下进行宣传。

就这样，匈牙利共产党出版刊物的领导人没有同无原则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做斗争，而是大量采用庸俗市侩的办报刊杂志的方法，自己本身也就成了无思想原则的资产阶级俘虏。匈牙利共产党负责出版工作的领导人极力适应被资产阶级培植起来的反常的嗜好，尾随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他们对文化方面的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也不去进行研究。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无原则的思想正是在匈牙利的这个领域里泛滥。

上述材料使人感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无疑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采用资产阶级办报刊的方法，在对西方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上严重认识不足。

Г. 科罗特克维奇

С. 扎沃日斯基

1948年3月24日于莫斯科^①

^① 1948年3月25日，巴拉诺夫将该报告寄给苏斯洛夫以便使其了解情况。

№09493

巴拉诺夫关于匈牙利党联合后的 名称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4月3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苏斯洛夫同志

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同志在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①中，于提出其他一些问题的同时，征求了关于未来党的名称的意见。

拉科西同志通知说，在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对合并后的党的名称提出了两个建议：“匈牙利工农党”（拉科西同志提议）和“社会主义党”（格罗同志提议）。

我们认为，这两个建议所提的统一后党的名字都不能采纳。

拉科西同志提出的党的名称——“匈牙利工农党”不能采用的原因是：它不能反映出列宁的建党原则，不能确定新建立的党的性质，不能够确定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作用。

所提议的名称不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把党混同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以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平等权利为目的。

所提议的名称不能反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模糊了无产阶级与农民关系上的领导作用。

^① 1948年3月22日，拉科西给苏联领导人写信，通报了匈牙利1947年议会选举后的情况，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的过程。

格罗同志提出的将来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党”，也不能被采纳。很明显，1919年3月匈牙利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成立了“社会主义党”。

更清楚的是，进入统一了的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采取了使工人阶级失败的活动，推行变节、和解的政策，成了革命的破坏者。所以采用上面这个名称会使工人阶级，首先是共产党员回忆起他们1919年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错误。

“社会主义党”的叫法没有强调党的国民性。采用这个名称会被评价成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某种让步。应当指出，处在欧洲所有社会主义的党派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都出卖工人阶级和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党的这个名称在匈牙利劳动人民中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我们认为，将来统一后的党最可接受的名称是“匈牙利工人党”。

这个名称强调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它是联合和发动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

这个名称符合两个现有工人党的阶级成分。在共产党中有44%的工人，在社会民主党内有近50%的工人。在两党联合后，工人阶级将是大多数（应当看到共产党在1948年进行了党证的更换，所以党清洗了招募来的分子，而社会民主党在联合前开除了右派和反动分子）。“匈牙利工人党”的名称强调了党的国民性质。

担心“工人党”会吓走劳动农民是没有根据的。很清楚，劳动农民支持匈牙利共产党，成为党的成员，在1947年8月的国会选举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获得了大多数农民的选票。^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副部长 И. 巴拉诺夫

1948年4月3日于莫斯科

^① 在1948年6月大会上，联合后的匈牙利党的名称定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No09519

苏斯洛夫与雷瓦伊关于匈牙利两党 合并问题的谈话纪要

(1948年5月20日)

绝密

谈话于今年5月20日进行。参加谈话的还有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Л.С.巴拉诺夫。

雷瓦伊同志在谈话时通报了以下情况：

1.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制定了纲领性宣言草案，即将提交匈牙利共产党与匈牙利社会党合并代表大会通过。^① 宣言草案已于今年5月13日由雷瓦伊同志通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普希金同志寄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雷瓦伊受拉科西的委托，请联共（布）中央转告对宣言草案的意见。

苏斯洛夫同志告诉雷瓦伊，联共（布）中央已于5月20日收到这一文件，但没来得及研究。如果研究之后有意见，将向匈牙利共产党通报。

随后，雷瓦伊通报了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进展过程以及合并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他还说，合并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现在，企业内的党的合并大会已经开始，随后将举行各地区和各州的合并大会。各州党代表大会将选举出席

^① 关于合并的问题是1948年2月在与苏斯洛夫会谈时由拉科西提出的。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两个大会将于6月12日同时开幕，次日（6月13日）将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大会，届时将实现两党的合并。

雷瓦伊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请求联共（布）中央向即将举行的合并大会派出代表。苏斯洛夫同志问“那些名人还会不会把联共（布）的代表出席会议看成是共产党在合并问题上以独特的方式向社会民主党施加压力？”雷瓦伊同志对此回答说，他们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危险性。他同时还指出，联共（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将提高新党在匈牙利劳动群众中的威信。

苏斯洛夫同志对雷瓦伊说，他将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向代表大会派遣联共（布）代表的请求。

2. 雷瓦伊说，匈牙利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形势感到担忧，并准备倡议召开情报局例行会议，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与联共（布）的关系，如果联共（布）认为这一做法是适宜的。

苏斯洛夫同志告诉雷瓦伊，联共（布）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形势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建议，并送给了拉科西同志。

经过这一说明之后雷瓦伊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但请转告联共（布）党中央，匈牙利共产党认为召开合并代表大会最合适的时间是6月中旬，即12~14日举行合并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将忙于大会的准备工作。苏斯洛夫同志说，他将把雷瓦伊同志的这一建议报告联共（布）中央。

在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时，雷瓦伊阐述了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一些意见，并通报了一些情况。他特别指出：“我们不了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哪些计划？难道他们想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帮助建成社会主义？”

雷瓦伊在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行为，谈到他们的反苏观点和情绪时指出：“这不是别的什么，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只有

一点区别，南斯拉夫的托洛茨基分子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随后雷瓦伊说，他们得到的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布兰科夫提供的情报表明，南斯拉夫某些共和国的党组织正在着手工作，其目的是制造舆论，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但许多党员迫于铁托、吉拉斯^①等国内著名的民族英雄的威望，不敢贸然行事。

雷瓦伊还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共产党持敌对态度。

3. 雷瓦伊说，匈牙利共产党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于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迄今仍然没有解决。他说，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关于在相互谈判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企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顽固地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捷克斯洛伐克新宪法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宪法没有为50万人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提供任何权利。

雷瓦伊说，匈牙利共产党中央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可以提交情报局讨论，因为两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是人民民主国家统一战线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缺乏一个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的协议，阻碍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苏斯洛夫同志说，如果匈牙利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选举^②前向捷克的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那未必合适。雷瓦伊同意苏斯洛夫同志的观点。

① 米洛凡·吉拉斯，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战后任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1953年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被撤销一切职务。

② 指的是1948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立法会议的选举。

至于把这个问题提交情报局解决，苏斯洛夫同志说，消除分歧的最好方法是两党之间达成协议。对此雷瓦伊回答说，他们同意这一观点，但在没有联共（布）或其他兄弟党帮助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他们缺乏信心……

1948年5月20日于莫斯科

№09499

巴拉诺夫关于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纲领宣言草案意见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6月1日)

机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关于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纲领宣言草案^① 意见的简要报告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纲领宣言的草案是由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政策委员会提交给合并大会讨论的，这个草案本身有严重的不足。

在一些地方没有准确地提出原则性的观点，削弱了这个文件的意义，掩盖了匈牙利沿社会主义道路顺利的发展需要正确解决的主要问题。

文件中最实质性的不足有以下几点：

1. 在纲领性宣言草案中对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提的不够确切，对党应有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强调得不够。比如，第4章在党的政策要求中，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参加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形式。

2. 在纲领宣言草案中对匈牙利的现实经济做了简短的鉴定，但分析得不够清楚。没有确定国家经济的经济结构。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很难搞清匈牙利共和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① 纲领宣言草案由拉科西于1948年5月13日通过普希金大使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参见本卷本专题№09519文件。

3. 纲领宣言草案正确地强调了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在此却有附加的条件：“在符合匈牙利的情况下”（第24页）。这个附加条件给了机会主义在适合匈牙利的情况下执行马列主义的借口，以此修改马列主义。

也是在这一章中，确定党的性质时，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党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第24页），因为这就肯定了党混同于群众的论点。

4. 在整个文件中很少强调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的背叛。

在解释德国法西斯夺得政权的原因时（第4页），没有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其他的因素一起为法西斯掌权铺平了道路。

在讲到1919年革命（第7～8页）的章节中，没有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失败的原因。很清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的背叛造成的。

在纲领宣言草案中提到“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完全没有对这种西欧右倾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加以批评。包括对那种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卖力传播的所谓“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进行批评。由于“民主的社会主义”被散布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批判这种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过去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不进行批判，宣传纲领的作者甚至还添写上本来不属于社会党的功劳，在第2章里正是这样肯定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十年中，社会民主党把匈牙利的工人组织成了阶级”（第8页）。

众所周知，阶级是历史形成的范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在工会和党里团结起工人，怎么也不可能“组织阶级”。

5. “工人阶级不是最受压迫的阶级，它的大部分都在民主国家的企业里工作，再也不受剥削”（第11～12页）。纲领中这个提法

没有现实的根据。在匈牙利现在的条件下，只有国家大银行和 100 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国有化了，商业还都在个人手里，这种提法会使工人重新产生有害的幻想并使他们丧失警惕性。

只能这样讲，要在匈牙利建立起那样的环境，使工人不再受压迫，而他们的剩余产品不再流进资本家和商人的腰包。

·6. 在纲领宣言草案中除很少的情况以外，对农民总的来说，没有区别分类。在纲领中没有确定党对农村中贫农、中农和富农的态度。虽然，很明显，特别是在土改以后，富农在匈牙利增加很快，富农经济占了商品粮生产的很大比重。但对富农和对富农斗争的手段一点也没有提及。

肯定“匈牙利的农民阶级已经改变”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第 12 页）。只能说因为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变。

在纲领宣言草案中，农业经济计划实行的主要任务（第 17 页）都是技术性的措施（土壤改良、肥料等），而不是社会性的措施（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提供贷款等等）。这也应该认为是不正确的地方。

在这个章节中提到了建立国家农业机械站，但没有强调它必须首先给农村的贫苦阶层以帮助。

7. 纲领宣言中说，匈牙利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与其联盟的劳动农民手里”（第 10 页）。在此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及先进的知识分子。

8. 在第 4 章里，党的对外政策的目标（第 22 页）是与新的民主国家紧密地团结和友好相处，这些国家中没有提及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上做了附加说明：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合作取决于解决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状况问题。对这个说明，无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首先，说明中所涉及的

这个问题是暂时的；第二，在纲领宣言中附加这样的说明会给两国兄弟党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9. 在纲领宣言草案中含糊不清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党对艺术的态度问题（第4章第21页）：

“党坚决反对反动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有生命的艺术必须在更高的水平上表现现实生活，也就是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寻求真理、宣告人民民主思想必定胜利的艺术”。

“寻求真理的艺术”的表述为形式主义艺术和歪曲真理的异己艺术的影响创造了可乘之机。“艺术是表现现实生活，也就是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说法也不够准确，艺术还可以有表现形式主义的艺术。

党在纲领文件中没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斗争。

10. 纲领宣言草案在正确地强调美帝国主义带头反对民主阵营的反动本质的同时，对美国资本渗透欧洲国家的政策揭露得不够深刻，没有指出“马歇尔计划”旨在奴役欧洲人民的本质。

对于现在的匈牙利，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不能够认为第4章关于党的要求中的这个内容——“专业技术强的劳动应比相对专业技术含量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物质保证和社会承认”（第16页）是完全妥当的。

如果不在这里讲明，党将建立为提高工人专业技术的条件和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组织培养工程技术干部的话，这个观点的实际效果将大大减弱。

除了这些意见，还应该在文本中进行一些编辑方面的修改：

1. 在第4章（第22页），讲党在国防方面的任务时，提出确保“民族独立”，防止“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进攻”，应该更准确地指出，依据苏匈友好互助合作协议的精神，防止（“来自德国或可

能与其结盟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行为”）。

2. 在纲领宣言第 1 章里，有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提法：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的总危机，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更加尖锐和深化”。

应当更准确和有所发挥地提出这个论点。

很清楚，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应当指出这样的事实，正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链条的断裂，加重了危机、失业及其他。

3. 此外，在文本中，还有不准确的术语。

比如，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地方叫法不一，应统一地正确称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主义”（第 7 页）应改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副部长 И. 巴拉诺夫

1948 年 6 月 1 日于莫斯科

①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巴拉诺夫提出的第 1、4、7、9 点“意见”，对纲领进行了修改。对其他意见，部分地接受了，有一些则完全不同意，包括编辑性质的更正。

№09504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匈牙利 完成两党合并准备工作的谈话纪要

(1948年6月11日)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送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归档。

摘自Г.М.普希金的日记

绝密

马罗山笑着对我说，他到我这儿来是一次告别拜会，因为他明天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副书记，而是劳动人民党的副书记了。马罗山通知我，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大会的准备工作一切正常。所有问题，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进入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位置分配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马罗山告诉我，明天他就卸下了在共产党面前维护单独的社会民主党的包袱。马罗山解释说，过去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认为他（马罗山）在统一的党内，在某种程度上会代表统一的党内社会民主党部分的利益。他声明，他不会这么做的。

马罗山问我，继续我们与他的会面，是否合适。从来讲——他说，由于两党的统一，我们的关系不要有任何改变。我回答说，这也是我们的愿望。马罗山表示了感谢。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Г.普希金

1948年6月11日于布达佩斯

№09508

普希金与拉科西关于蒂尔迪 总统辞职的会谈纪要

(1948年8月16日)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送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归档。

机密

拉科西向我讲述了有关蒂尔迪总统辞职的情况。这次讲的事主要是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

按拉科西的说法，匈牙利政府决定向蒂尔迪总统提供在城里的住所和别墅，提前发给他5个月的总统年薪，再安排每月5000福林的退休金。

我问拉科西，对总统办公室主任埃尔内·米哈伊费如何安排。拉科西说，据他观察，米哈伊费看来知道切尔诺基和总统夫妇的行为。米哈伊费是国家小农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朋友们不想伤害他。暂时米哈伊费还留在原职位上，然后将调到外交部代替博尔基扎尔·伊万任出版署署长，后者不被朋友们所信任。

拉科西努力向我证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提出萨卡希奇为总统

候选人的行为是理智的，尽管我并没有提出怀疑这个决定是否正确。^①同时拉科西还声明，在提出萨卡希奇为总统候选人时，起关键作用的远不是这种情况，即匈牙利的朋友们想用这一方式来巩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新的民主制度下的合作。我以为，朋友们也不是这么想的。

谈到匈牙利政府人员改组时，拉科西强调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因拉伊克对苏联不友好的态度，撤消了他的内务部长职务，并直接对他讲明了这一点。我对拉科西指出，对拉伊克讲明这是免除他内务部长职务的主要原因，这种做法未必是正确的。这会给拉伊克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被撤消内务部长职务是因为我们的要求，而实际上并不是那样。我接着对拉科西说，这将影响到我们和拉伊克的合作，特别是考虑到， he 现在是外交部长。拉科西说，对拉伊克还指出了他工作中其他的错误，然后补充说，他认为，拉伊克现在再做所有的事情时，都会表现出他是苏联的朋友。拉科西指出，共产党在国内的影响现在明显地提高了。按他所说，在劳动人民党的号召下，农民上缴的新粮食在两个星期内堆满了所有的仓库、合作社门市部和学校等地。朋友们决定现在在农村开展合作社的工作：他们联合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组成统一的农业合作社，清理了地方上有很多富农参加的合作社的领导人，准备成立管理合作社的专门的部。照拉科西的话，过两年，匈牙利将有 12000 部拖拉机。到那时，拉科西说，我们再解决全面集体化的问题。他

^① 实际上，苏联外交官对 A. 萨卡希奇是不信任的，认为他是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分子。还在 1947 年 2 月，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普希金在自己的日记中就写到：“不能相信萨卡希奇是真诚的，因为根据所有的材料，他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普希金在苏联大使馆 1948 年的政治报告中写道，在 1948 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前夕，萨卡希奇使用的政治“手腕”使苏联方面有可能产生麻痹思想。

现在已经预见到了与富农斗争的困难，富农没有地方可迁走。按他说，国内共计有 40000 户富农家庭。

最后拉科西抱怨说，西方对匈牙利的影晌太大了，应当加强发展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来抵消这种影响。拉科西说，应当送 2000 名匈牙利学生去苏联学习，增多匈牙利至苏联、苏联至匈牙利参观游览的火车，以及交换运动员、演员等等。拉科西答应把所有这些仔细想好，然后写出具体的建议。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Г. 普希金

1948 年 8 月 16 日于布达佩斯

【专题说明】

保卢斯与苏联 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

(1946年6月)

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1890~1957），德国元帅，1942年调任德国陆军第6集团军司令，负责主攻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被苏军俘虏，1944年8月加入了反纳粹组织“德国军官联盟”。

从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以后，苏德战场的战局开始扭转，而在苏联战俘营中的德国官兵也越来越多。为了瓦解德军，以及在德军战俘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苏联建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负责领导这些组织的是联共（布）中央的一个主管战俘工作的委员会，化名“99研究所”。该委员会在组织上从属于联共（布）中央办公厅，而在具体工作中归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领导。委员会的主席是米哈伊尔·科兹洛夫，他同时还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挂名，职务是“办公厅主任”。

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感到这些组织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1945年9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建议，解散“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而这两个组织在战俘营中

保卢斯与苏联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

对德国战俘的教育和宣传工作，转交给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负责。经过讨论，10月26日，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部长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阿马亚克·科布洛夫中将，向贝利亚提交了关于解散这两个组织的报告。10月30日，联共（布）中央对此做出了决议。

然而，此后不久，负责在战俘中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的科布洛夫就感觉到，解散“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的决定做得有些仓促。在利用几百万战俘作为劳动力从事大规模经济恢复工作时，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显然还需要在战俘本身中建立相应的组织。由于原来担任“德国军官联盟”主席的瓦尔德·冯·扎伊里茨将军经常流露出对苏联当局的不满情绪，有人考虑成立一个以保卢斯元帅为首的在战俘中进行宣传工作的中心。

1946年6月11日，在莫斯科郊外托米利诺村保卢斯的别墅里，前来的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代表帕尔帕罗夫上校提出了上述建议。保卢斯元帅没有任何犹豫，第二天就提交了组建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的民主中心的草案。尽管科布洛夫对保卢斯的计划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还是及时向其顶头上司克鲁格洛夫报告了成功地与保卢斯会谈的情况。

6月15日，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就此向日丹诺夫提出建议，主张在苏联的德国战俘中组建一个“民主中心”，其宗旨是“必须在德国社会统一党周围团结和加强战俘的反法西斯力量”。

1946年6月16日保卢斯向科布洛夫提交了补充和修改的文件。然而，这一计划后来并未实施，所谓“民主联盟”也没有成立，其原因尚待考察。作为战俘的保卢斯则很快转入了他更习惯和更熟悉的工作：编写过去战争的军事历史书籍。1953年保卢斯获释，并定居民主德国。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177

科布洛夫关于与保卢斯会谈 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

(1946年6月12日)

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

在6月11日与保卢斯谈话时，试探了他对参加在战俘中进行宣传工作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是这样对保卢斯说明的：在战俘中间出现了倾向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热情。

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使这个运动具有组织性并为此建立以他为首的由真心赞成民主原则的被俘士兵、军官和将军组成的组织中心。

当时曾特别强调指出，同他的谈话是初步的，因为下一步如何将取决于领导人的决定。

得到保卢斯同意后，建议他在方案中说明战俘中民主中心的组织构成和宣传活动的范围。

保卢斯今天交给了帕尔帕罗夫同志一份由他制定的方案，这一方案超出了向他所提建议的范围。

这个方案是从建立一个从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正规支部出发制定出来的。

当时向保卢斯指出了这个不适当的地方，他表示同意并接受了我们的提法。

中将 科布洛夫^①

^① 阿·科布洛夫，时任苏联内务部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

№06179

克鲁格洛夫关于德国战俘事宜 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6年6月15日）

致日丹诺夫^① 同志

苏联内务部已经掌握了能够说明战俘营中在押的前德军战俘政治情绪的材料。

这些战俘在集会和会议上提出的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威廉·皮克本人的声明中表示拥护德国统一社会党。

关押在内务部第190号战俘营（在弗拉基米尔州）的德国战俘们写道：

“正值我们这些德国战俘在苏联以自己的工作部分地补偿作为希特勒罪行参与者的德国人所造成的损失时，我们获悉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这一事件不仅对德国工人阶级，而且对全体德国人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只有全体劳动人民团结一致，才能根除法西斯主义，保障和平，重新振兴德国经济，达到文化复兴和保持德国的统一。”

“因此，我们这些前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欢迎作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的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它将正确地解决我国人民非常重大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个党保证建立一个摆脱压迫和剥削，摆脱经济危机、赤贫

^① 安·安·日丹诺夫（1896～194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和失业，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德国，一个和平的并与各国人民和睦相处，首先与苏联——没有帝国主义目标的劳动者国家和睦相处的德国。”

决议由 777 个士兵和军官署名。

内务部第 168 号战俘营（在明斯克州）的 247 个士兵和军官声明如下：

“我们这些战俘从苏联向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祖国致敬。”

“我们希望能把西部地区的劳动者也吸收到这个统一的联盟中，并以此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以反对厚颜无耻、卖身投靠的大资本家和为自己的性命提心吊胆的法西斯分子破坏我们党的民族团结和经济统一政策的图谋。”

“我们这些来自德国各州和各地区的德国人蔑视和谴责所有这些图谋，并通过你们请求我们的亲属帮助统一社会党的联合和复兴。我们在这里努力以自己的工作赎回自己个人的罪过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罪过。”

我们在这里同时也在进行自身的修养，为的是成为反法西斯者，作为真正的人回到家里并在那里参加我们祖国的重建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这个新德国应该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大国的影响，这些大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成为我们不幸的根源。”

从第 286 号战俘营（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苏联内务部发来由 91 名士兵和 1 名军官署名的决议，其中说道：

“第一个关于两个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决定联合的消息在我们中间得到完全的赞同。”

“我们气愤的是，在德国西部地区仍有舒马赫^①这样的人，不

^① 库特·舒马赫（1895~1952），1946年起担任联邦德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反对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

顾血的经验和痛苦，至今还在工人运动中搞阴谋和实行分裂政策。”

“我们深信，只有工人阶级的联合力量才能真正战胜反动派。”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作用在我们中间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令人特别满意的是下列要求：分配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剥夺大资本家的权力和根除所有的军国主义势力……”

“你们可以在我们归国时满怀信心地期望，我们中间经过政治上再教育的大部分人将充实你们党的队伍并将同你们一道致力于建成一个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苏联内务部的其他战俘营里也通过了类似的声明。

与战俘营中民主情绪高涨的同时，反动的法西斯分子，主要是前德国军官和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也活跃起来。

这些法西斯小组在进行工作的同时，还在战俘中间进行主张倒向西方大国和主张与英国和美国结盟侵略苏联的宣传。

为了加强和联合战俘中倾向苏联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分子及制止法西斯宣传扩大，苏联内务部认为成立一个名为“在苏联的德国战俘民主同盟”的战俘组织是适宜的。

为实行这一措施应进行以下工作：

(1) 由战俘中值得信任的士兵、军官和将军组成以前元帅保卢斯为首的倡议小组（保卢斯对此已原则上同意）。

(2) 委托倡议小组拟定“在苏联的德国战俘民主同盟”章程草案，该同盟将来应该在战俘中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吸收最大数量的战俘加入统一的反法西斯阵线，促进战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把他们团结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的周围。

(3) 筹备并于1946年7月间以倡议小组的名义在莫斯科举行战俘营反法西斯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来讨论以下问题：

审议并批准“在苏联的德国战俘民主同盟”章程。

通过关于“民主同盟”宗旨和任务的宣言。

保卢斯与苏联在德国战俘营中的宣传工作

通过告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人民书。

代表大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的参与下举行。

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在为战俘们出版的《纳赫利赫滕》报及苏联占领区的德国报刊上发表。

请您批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克鲁格洛夫

1946年6月15日

№06178

保卢斯关于在德国战俘中进行组织工作 致科布洛夫的信

(1946年6月16日)

莫斯科

对我1946年6月12日建议的补充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在苏联的战俘

在上面提到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个过于极端的观点，因为那里谈到了建立一个从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特殊党组织。这部分地是由于误解引起的，因此也是由于以下看法，即现在就应当为此进行广泛的组织准备引起的。

然而，如果设想对这个问题采取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在这些办法中占第一位的也许是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招募人员，即建立某种类似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运动”的组织，那么，可以对上述建议做一补充。

这类组织的任务主要还是宣传党的原则和目标，招募和训练“拥护者”，以及“朋友”（同情者）。

一、一旦开始进行任何一种有利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就应当预料到，站在其他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立场上的战俘们，甚至那些不理解1943年后发生的新情况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拥护者们，都将提出允许进行有利于其他政党的类似活动的要求。

即使允许其他的反法西斯—民主政党加入表明提前具备了在德国进行政治工作的条件，而且在这种合作中也存在着对人员进行政治培训的可能性，然而，还有以下几点不利的情况：

1. 这样解决问题可能唤起人们对 1943 年那个已经过时的“全国委员会运动”^① 的回忆，特别是有可能再次产生有关均等和平等的模糊概念，那个时候，同现在一样，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进行合作的暂时性策略。

2. 在作为俘虏的情况下，不存在这种合作的具体条件。这样一来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即正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在这种混合的集体内部产生不希望发生的原则性分歧。

3. 不得不考虑到，在其他反法西斯—民主政党各派中可能有法西斯和反动力量公开地或隐蔽地渗透进来。

二、在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精神建立组织时会产生一个原则性问题：是在着重于组成非常可靠的从事紧张工作的坚强核心的同时，有意识地限制运动拥护者的人数，还是吸收尽可能多的人，而有意识地允许他们中间存在相当比例的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

1. 根据以前的指示和按照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在德国首先有一个建立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说在培养必需的骨干的同时，重要的是在为扩大影响而与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的斗争中首先争取最广泛的拥护者和选民群众。在战俘中间的工作也应遵循这个方针。在这方面适合作“骨干”的是可靠的和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适合于作党员的是“拥护者”，适合于当选民的是“同情者”。

2. 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立场出发在俘虏中进行的工作，并不

^① 指“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该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反法西斯的政治和组织中心，是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倡议于 1943 年 7 月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

意味着赋予战俘这样一种权利，即回到德国时不经审查就可以被接纳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是对那些不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战俘。这样的审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执行非纳粹化命令时，战俘本身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

3. 所有战俘都同样地不够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德国各个占领区内当前差别很大的情况和影响。

因此，在进行战后重建工作的同时，按德国统一社会党精神进行的活动可以大体上仅限于组织战俘进行理论学习和对他们进行教育。

三、根据第二条，不论战俘组织的最后形式如何，1946年6月12日的建议须作以下补充：

1. 主要任务是从战俘中尽量吸收并联合坚定的和经过考验的“拥护者”以及“同情者”。他们应该同意并将能够在祖国或安排他们去的地方按照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去工作。

2. 另一方面，应当避免大批战俘出于自私的目的和获取个人利益的意图（如希望遣返后有更好的前途或更有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参加这个运动。这种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出于更重要的普遍原因而不允许组织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拥护者（见前面第一条）。

3. 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拥护者”和新加入将来该党为战俘成立的组织的人，适用1946年6月12日建议的有关条款。

现在，关于那些参与所有措施但仅在不涉及“成员资格”的问题上（如组织战俘营小组，接受新“拥护者”等等）享有表决权的“同情者”的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同情者”小组应作为各战俘营小组的下属分支机构。

4.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作为一种促进因素及道德责任，应给予可靠的和经过考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积极分子和拥护者，首先是

在战后重建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以特别对待，如：

(1) 根据战俘营积极分子或拥护者自己在表决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列出优秀者名单。

(2) 在调动或遣返时，表现突出者可以按(1)项得到相应的证明书。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证明书应使持有者在德国被接受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持有者是属于按非纳粹化命令处理的人，在对他的过去进行必要审理的条件下其政治可靠性可以相应的方式加以考虑。

既然在用非纳粹化的观点来评价所有战俘时，应该考虑到其在战后重建工作中的成绩，那就应当研究是否可以对经过考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拥护者给予更多优惠的问题。

四、1946年6月12日建议的其他条款，包括有关“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等的条款适用于将来任何形式的组织。

如果领导机构成员有可能到各战俘营去——这是大家特别希望的，那么他们的人数应从35人增至50人。

五、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允许公开建立拥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组织（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个组织与该党公开联系，对战俘营和对德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么对最广泛的德国居民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一部分战俘中进行上述活动，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保持暗中联系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很大好处，这就是：

(1) 德国战俘会以具体的形式去研究德国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特别是他们会弄明白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未来整个德国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2) 在苏联的德国战俘应该清楚地理解他们在苏联所做的战后重建工作与建设新德国的工作之间的联系。

(3) 此外，有关的苏联机构允许这种有利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运动，会成为这些机构关心未来德国的一个证明，并能增强对苏联的好感。

保卢斯

1946年6月16日

【专题说明】

苏联反间谍工作的有关规定

(1947年7月)

本专题只有一份档案，然而，这却是一件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苏联反间谍工作的详细规定和要求。由此，人们可以了解到苏联侦查、审讯和关押间谍分子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工作程序、方法、策略，以及相关的政策性规定。

1947年7月正是美苏双方冷战政策确定的关键时刻。显然，苏联国家安全部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此时对苏联各地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工作情况进行审查，并重新强调被某些肃反工作人员忘记了、甚至曲解了的侦查工作规则，以改善苏联的整个反间谍工作，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没有收集到与此相关的其他档案，但对这一文件的研究可以使人感觉到，冷战的态势正在逐步地、全面地形成。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刘明翻译)

№04568

阿巴库莫夫关于苏联反间谍工作的 有关规定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7年7月17日)

绝密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国家全部机关对特务、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暗中进行反苏活动的人员进行了侦查，现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向您汇报如下：

一、在逮捕犯罪分子之前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使逮捕具有出其不意的性质，目的在于：

1. 防止逃跑或者自杀；
2. 防止企图通知同谋者；
3. 防止销毁有关的犯罪材料；

在逮捕国家的重要罪犯时，如果必须瞒着其周围的人，或者是不可能同时逮捕其同伙，但又要做到不惊动他们，不使他们有可能逃脱罪责以及销毁有关的犯罪材料，秘密逮捕可在街上或者是在其他的某种专门制造的环境下进行。

二、在逮捕犯罪分子时要没收下列物品：

1. 私人文件；
2. 通信、照片、地址和电话号码记录这些可供研究罪犯私人联系的范围及其性质的材料；

3. 复印器、密码书写工具、破译工具、密码电报收发机、武

器、进行爆破和投毒用的物品；

4. 没有在住宅里保存的秘密的和专门的文件；

5. 反苏传单、标语牌、书籍、日记、信件和其他的有助于揭发罪犯的文件；

为了切断犯罪分子的外部联系，在必要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实施逮捕的过程中，还是在逮捕之后，都可以在罪犯的住宅里埋伏下肃反工作人员，把所有来到住宅的人放进屋里，然后对其进行检查。

在许多情况下，逮捕犯罪分子的工作都有执行人员和侦察人员参加。在实施逮捕之前执行人员对罪犯进行研究，而侦察人员的责任是进行侦察，了解案件的特点，以便使他们在进行搜查时发现可以用于揭露罪犯的犯罪材料。

当发生恐怖和破坏活动、出现反苏传单、国家特别重要的机密文件被盗或者丢失的时候，侦察人员和执行人员要亲临出事地点进行检查和拍照，找出犯罪线索和证据，查明现场的目击者，对其进行盘问，并立即采取措施逮捕罪犯。

进行秘密搜查，对于能够暴露罪犯进行犯罪活动的文件进行查抄并拍照。

这些措施主要是在情况不允许进行公开搜查的时候采用。例如，对于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间谍人员的住宅。

在必要的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之前对其本人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一切特务和敌对活动进行拍照，以便在对其进行审讯时用这些材料揭发罪犯的犯罪事实。

三、着手进行工作的侦察人员要仔细地研究现有的全部间谍情报和其他的可作为逮捕依据的资料，以及物证、私人文件、通信集和在搜查时没收的物品，以便在进行调查工作时使用这些资料。

对罪犯的衣服，以及在对其搜查时没收的可疑物品要进行专门

的检查，以便发现隐藏其中的机密。

在逮捕外国间谍机关派遣到苏联领土上的特务、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时，对没收来的文件和物品要在国家安全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专门的检查，以便发现隐藏其中的机密、暗号、口令，并确定这些文件是否含有毒剂和有毒物品。

四、在审讯罪犯时，侦察人员要力求从犯罪分子嘴里得到真实的和坦诚的交待，即不仅要确认自己本身有罪，还要揭露与其有关的其他罪犯，以及那些指使他进行犯罪活动的人和他们的含有敌意的阴谋。

为此目的，在审讯的最初阶段，侦察人员要劝告犯罪分子坦白交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全部犯罪事实，揭露所有与其犯罪有关联的人员，而侦察人员在一定时间内不要表现出侦察机关感兴趣的内容，也不要出具已经拥有的全部犯罪材料。

与此同时，侦察人员要研究犯罪分子的性格，力争做到：

在一种情况下是对罪犯减轻监狱制度所带来的压力：转交其家人送来的食品、允许看书、延长散步时间等等；

另一种情况是对罪犯施加压力，并警告其如果不承认所犯罪行，将从严处理；

其他情况是利用罪犯的宗教信仰、家庭、个人爱好、自尊心、虚荣心等等因素来劝说其交待罪行。

当罪犯不进行坦白的交待、回避正面和诚实地回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为了给罪犯施加压力，侦察人员可以使用国家安全部机关所掌握的关于罪犯过去的生活和活动的、被罪犯隐瞒的有损于罪犯声誉的资料。

为达到此目的，有时需要以巧计战胜罪犯，给其造成这样的印象：关于他的一切国家安全机关都清楚，侦察人员可以提示一下罪犯私生活中的某些隐私细节以及他对周围人隐瞒的一些恶习等等。

五、为了不使被逮捕的人知道国家安全部机关对其犯罪活动了解的程度，通常，在审讯时都是逐步地引用侦察机关所拥有的犯罪材料。

与此同时，侦察人员应考虑到罪犯的心理状况，并从这一点出发，在最佳的时候向罪犯出示犯罪材料。

作为犯罪材料国家安全部机关经常使用的是：

1. 其他罪犯和证人的供词；
2. 搜查罪犯时所没收的材料：通信、记录、书籍、照片和其他的物证；
3. 鉴定专家所做的结论；
4. 来自间谍机关的情报以及通过跟踪、技术工具和其他途径所获得的资料。

六、为了摧毁罪犯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在审讯过程中通常采用当面对质的办法，同时，在多数场合下，为了揭露罪犯是在说谎并利用这一时机弄清案件，只是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当面对质。

七、对于顽固抗拒侦察机关要求的罪犯，以及表现出挑衅情绪和用尽各种办法极力想使侦察机关误入歧路的罪犯，在关押时要对其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些措施有：

1. 将罪犯投入到具有最严厉制度的监狱，在这里睡眠时间被缩短了，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很差；
2. 关进单人囚房里；
3. 取消放风时间，不转交家人送来的食品，没有权利读书；
4. 关进单身禁闭室 20 昼夜；

附注：在单身禁闭室里，除了钉在地板上的凳子和没有被褥的单人床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设施；犯人每昼夜只能在板床上睡 6 个小时的觉；关押在单身禁闭室里的囚犯，一昼夜只能得到 300 克面

包和开水，3天给一次热的食物；禁止在单身禁闭室里吸烟。

八、对待那些已被侦察机关揭露的特务、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其他的苏联人民活跃的敌人，他们厚颜无耻地拒绝揭露自己的同伙，拒绝交待自己的犯罪活动，国家全部机关根据联共（布）中央1939年1月10日的指示，可在肉体方面采取措施。

在中央——要经苏联国家全部领导的批准。

在地方——要经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和国家全部边区和州管理局局长的批准。

九、为了检查罪犯是否诚实地对待审讯，其证词是否具有真实性，也为了更充分地揭露他们，可在罪犯的牢房里安插国家全部的特工人员，也可在牢房里安装秘密窃听器。

可利用坦诚地交待了自己罪行的囚犯，以及被判处短期徒刑的囚犯作为牢房内的特务。

对于被囚禁的和被判刑的罪犯，在吸收他们充当牢房内的特务之前，要通过另外一个侦察机关以及借助秘密窃听器对其进行检查。

在某些时候，为了研究牢房内囚禁的犯人，将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以及自愿充当特工人员的人以罪犯的身份投入监牢。

十、国家全部机关在进行侦察工作时非常重视犯罪活动的性质。

这样，在审讯特务分子时，不仅要弄清楚外国间谍机关的全部代理机关，还要弄清楚他们来到苏联境内的渠道、他们感兴趣的目、他们任务的性质和完成任务的方法，以及外国间谍机关进行颠覆苏联的活动的的方式和手段。

对于恐怖和破坏分子的案件要特别注意详细弄清其犯罪活动的策动者和同伙，研究他们完成犯罪活动的方法和手段，发现并确定是谁提供给犯罪分子楼房和住宅的地址、行动方案、党和政府领导

人行综的情报、军工企业的生产示意图、武器和爆炸物品等等。

对于敌对组织和小组参加者的案件，首先要弄清楚其政治派别，与外国间谍机关或者国外的反苏白军中心的联系，是否扩大和传播敌意的文学作品，保存武器、爆炸物品的地方，集会和接头地点，联络暗号等等。

十一、在整个侦察工作进行过程中，侦察人员要确定犯罪分子的身份，审查其以往的活动。

为此目的，要对在搜查时所没收的、确定犯罪分子身份的文件真实性进行检查，通过询问罪犯从前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的方法来核实其供词的可靠性。

除此而外，还要向罪犯的亲属和朋友所在地发去罪犯的照片让他们辨认。

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其他的罪犯和见证人之中认识罪犯的人对罪犯本人进行辨认。

十二、应将罪犯的证词形成完整的文件，并通过下列方法进行审查：与调查案件中现有的其他文件和代理机构的材料加以比较；审问其他被告和见证人；必要情况下要获得技术鉴定的结论；收集新的书面材料和证据，根据罪犯的证词寻找和确定有关人员以及实施作战侦察行动。在必要的情况下，侦察人员要将罪犯的证词转交给国家全部作战处，以使他们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对罪犯的证词进行核查。

十三、为了完全彻底地揭露犯罪活动，国家全部机关在进行侦察工作的同时还要对处于自由状态的罪犯的其他关系进行积极的侦察研究，并将重新获得的、对于揭露罪犯具有重要意义的情报转交给侦察人员。

侦察人员本人要做到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利用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用巧计战胜罪犯，抓住他的一些矛盾的地方，以达到对其

彻底的揭露。

必须指出，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各地对国家全部机关的侦察工作情况所作的审查，即今年6月2日致您的第2820号报告中讲述的那样，表明某些肃反工作人员忘记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曲解了进行上述侦察工作时的一些规则。除此而外，在最近这几年重新回到国家全部工作的一些同志也不知道这些规则。因此，上述所说的某些现象在目前正制定的苏联国家全部关于改善国家全部机关侦察工作的命令中有所体现。

命令稍后向您呈报。

阿巴库莫夫

1947年7月17日

【专题说明】

拉科西谈拉伊克案件及 匈牙利党内斗争问题

(1949~1956年)

本专题选编的是俄国杂志《历史档案》发表的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的档案——前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部分回忆录。

拉科西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投入了政治运动，并在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拉科西移居到苏联，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工作。1924年底返回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后不久被逮捕，一直到1940年都在霍尔蒂的监狱中度过。获释后再次来到苏联，领导着由于斯大林清洗运动而人员急剧减少的匈牙利共产主义侨民组织。1945年1月拉科西回国，并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1948年6月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统一代表大会上，拉科西被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是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匈牙利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对拉伊克“间谍集团”的审判。斯大林去世后，拉科西受到苏联新领导人的批评，并于1956年7月被迫提出辞职，不久后

就前往苏联“进行休养和恢复健康”。匈牙利事件平息后，拉科西并没有东山再起，而是继续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监督下被辗转送到苏联各地“冷冻”起来，最后来到高尔基州，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期。

拉伊克案件是1948~1949年匈牙利发生的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对党内领导人采取刑事手段处理的冤案。拉伊克·拉斯洛原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曾持与苏联不同的意见。苏南冲突公开化以后，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按照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指责南共是叛徒，并在自己党内开始清洗“铁托分子”。拉伊克首当其冲，成为清洗的对象。7月，匈共政治局会议指责拉伊克对苏不友好，因而免去其内务部长的职务，改任外交部长。苏联方面对处理拉伊克的理由颇有意见，认为这样会引起对苏联的不满。（参见本卷“苏联与战后匈牙利”专题№09508文件。）1949年6月16日，拉伊克以“阴谋叛国罪”被捕，9月6日进行公开审判，9月24日被判处死刑，10月15日被送上绞架。由此拉科西开始进行党内清洗，萨卡希奇、马罗山、卡达尔等大批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近50%的中央委员被撤换。对原匈牙利各党派活动家也进行了同样指控。结果2人被判死刑，26人被判长期监禁。从1949年至1953年，共有470万人遭到清洗，20万人受到株连，近百万人成为怀疑对象。拉伊克案件还引发了东欧各国党内的一系列大清洗行动，直到斯大林去世前，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党内都揭露和惩处了一批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的代理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导致了各国对这次大清洗受害者的重新评价。1956年3月29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对拉伊克的指控是捏造的，10月7日匈牙利政府为拉伊克平反并举行了国葬。

解决了党内政治问题以后，匈牙利开展了以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拉科西完全照搬苏联工业化的模式，大幅度盲目地提高计划指标，人为拉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强行实行农业合作化。其结果，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

拉科西谈拉伊克案件及匈牙利党内斗争问题

也带来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所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积累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2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食品供应紧张，全国耕地10%撂荒，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度不满。从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反对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中，引发了匈牙利新的党内斗争和社会动乱。

作为拉伊克案件时匈牙利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在自己十分详尽的回忆录中透露了许多有关这一案件的内情，在此前后匈牙利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他本人与斯大林接触的情况。拉科西去世以后，其家属将这部大约3000页的回忆录转交给苏共中央。在这份材料中有一些缺页和段落删节，据拉科西的遗孀及义子说，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就销毁了。尽管如此，这还是一份相当有价值的史料，因为它披露了许多世人无法知道的历史细节。《历史档案》选登的回忆录片段包括了拉科西及匈牙利共产党1949到1956年的活动情况，以及他本人对个人崇拜兴起的原因和过程的认识。我们这里选编的正是这部分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因无法判断文献形成的日期，这里标明的文件时间实际上只是回忆录所反映的事件发生的时期。

由于认为拉科西在回忆中明显地带有一些偏见，并有意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历史档案》在发表回忆录的同时，对其中一些没有谈到或被歪曲的事实通过注释进行了补充和校正。本专题的注释主要是在原发表者注释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王希礼、王英杰、徐元官、高增训）

№03919

拉科西关于拉伊克案件和 匈牙利党内斗争历史的回忆片段

(1949~1956年)

1949年4月，当时领导国防部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列维斯·格扎^①将军转给我一份绝密的情报。这是国防部一名瑞士特工提供的情报，说是战争期间肖尼·基博^②在瑞士曾和当地美国间谍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艾伦·杜勒斯^③一起工作过。这份情报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肖尼的名字是由列维斯亲手写在虚线处的。这个微小的细节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和准确，是因为读完这几行字以后，我是真正惊呆了。我脑际闪过的念头是：“这就是说，1937年在苏联发生过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也可能出现！”

肖尼1949年在党内主持干部部的工作。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们在1945年以前不了解他，正如同留在匈牙利的多数人都不了解

① 列维斯·格扎（1902~1977），1948~1954年任匈牙利国防部政治军事处（自1950年起为侦察总局）主任，中将；1957~1960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1960~1963年出任匈牙利驻苏联大使。

② 肖尼·基博（1903~1949），心理医生（回忆录作者错误地称其为工程师），自1930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员，二战期间为瑞士的匈牙利共产党小组的负责人。自1945年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自1947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干部部部长。1949年5月被逮捕，在对拉伊克等人的公开审判中（1949年9月16~24日），被判处死刑。1955年被追认平反。

③ 艾伦·杜勒斯（1893~1969），1942~1945年美国在欧洲政治侦察局的负责人，1953~1961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根据有关研究学者的意见，杜勒斯从未与肖尼见过面。

他一样，因为解放前他多年住在奥地利，后来又在瑞士，履行着党的一名联络员的职责。他是一位有知识分子气的、很有教养的工程师。1945年当我来到布达佩斯时，肖尼已经在党内工作了。我，以及据我记忆还有其他人，同他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而且也不曾对他产生过丝毫怀疑，特别是因为当时我们满怀喜悦心情热烈欢迎所有能够参加工作的同志，从未考虑去研究他们的过去。得到这份情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问列维斯·格扎，能否相信他的这一名特工^①并认真对待他的情报。列维斯向我保证说，可以相信这名特工。为防万一，我同法尔卡什·米哈伊^②交谈了一次，他当时担任国防部长。他确认说，这名特工是可以信任的。他已经得悉了这份情报。为此，列维斯或法尔卡什（我已记不得，是其中哪一位）甚至表示出不满情绪，说我竟然有所怀疑，并以为他们会花费宝贵的、好不容易才弄到的瑞士外汇雇用不可靠的特工。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格罗·埃诺^③、雷瓦伊·约瑟夫^④、卡达尔·

-
- ① 指的是特工人员埃德曼·费伦茨，后来此人留在了西方。
- ② 法尔卡什·米哈伊（1904～1965），1945～1955年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匈牙利国防部长。作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镇压运动的一名组织者，1956年7月被开除出匈共中央，1957年被判处16年监禁，1961年被赦免。
- ③ 格罗·埃诺（1898～1980），自1945年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49年担任匈牙利运输部长，1949年担任财政部长，1953～1954年担任内务部长，1952～1956年担任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7～10月担任匈共中央第一书记。自1956年10月底到1960年期间在苏联。1962年，作为镇压运动的一名组织者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 ④ 雷瓦伊·约瑟夫（1898～1959），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匈牙利共产党的思想家之一，1945～1956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1945～1953年和1956年7～10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50年担任《自由人民报》主编，1949～1953年担任人民教育部长。自1956年10月底到1957年4月在苏联。自1957年6月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

亚诺什^①（他那时是内务部长）和拉伊克·拉斯洛^②。我约请内务部机关中苏联顾问的负责人来商谈（可惜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这位负责人已经得知了这份情报，而且还向莫斯科作了通报，因为当时根据协议，所有涉及间谍活动的情报都要译成俄语转报给苏联。我十分重视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苏联顾问的意见，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本部门的优秀专家，而我们的同志，可惜，没有经验，当时只是刚刚转入这项工作，还不能对他们做出这样的评价。因此，我和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相当矛盾：在公开场合，当敌人攻讦他们时，我努力维护他们，而面对面时，我一直对他们说，我不满意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最重要的地方都有经验丰富的顾问，他们的人数有时达到20~30人，我希望他们的经验会逐渐为我们的同志们所掌握。

这位顾问负责人对有关肖尼的情报丝毫也未感到惊讶。他解释说，如此严重的事件在他们那里也曾经出现过，尽管他们的党要有

① 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战争年代是地下共产党中央书记之一，自1945年为政治局委员，1946~1951年担任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1948~1950年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1951年被判终身监禁，1954年被平反。自1956年7月重新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1956年10月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自10月30日到11月4日担任纳吉·伊姆雷政府中的国务部长。1956年4月4日领导成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担任其领导至1958年。同时至1957年6月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临时中央主席。1957~1985年担任第一书记，后为总书记，1988~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主席。

② 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二战期间是匈牙利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自1945年到1949年，是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46年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副总书记。1948~1949年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1946~1948年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后担任外交部长。1949年5月30日被逮捕，同年的9月在公开审判中被判处死刑。1955年获平反。

经验得多。此外，他还隐晦地暗示说，他们那里目前正在调查一件可疑的案件，这个案件涉及一些负责人。此后几个月内，从各种不同渠道我得知了有关沃兹涅先斯基^①，以及后来有关洛佐夫斯基^②失踪的消息，我十分痛心地看着，在苏联存在30年之后，仍然还会出现这类的事情。这位顾问建议我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案子，因为杜勒斯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开始进行调查了，首先要搞清楚肖尼在瑞士干了些什么。彼得·加博尔^③和他的工作人员就是在国内的工作中也没有很多的经验，更不用说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与境外相关的案件了。此外，年轻的国家安全机关并未受过足够的考验，应该考虑到有些事情可能会事先泄露出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查明了，肖尼在瑞士确实同杜勒斯进行过合作，确切地说，是同他的工作人员诺埃尔·菲尔德^④合作过。此人据我们所知，是美国驻瑞士间谍组织中分管工人运动问题的专家。同时还获悉，肖尼及几名和他在一起的瑞士籍匈牙利人曾经同在瑞士的南斯拉夫侨民一

-
- ① 安·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1947～1949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被镇压。
- ② A. 洛佐夫斯基（原名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1878～1952），1921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45～1948任苏联新闻局局长。
- ③ 彼得·加博尔（1906～1993），二战期间为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自1945年担任政治警察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处长，1948年9月担任国家安全管理局局长，中将。1953年1月被捕，1954年3月被判终身监禁，1957年在对案件审理之后被判14年剥夺自由。1960年被赦免。
- ④ 诺埃尔·菲尔德（1904～1970），美国共产党员，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941～1947年为慈善组织领导人，战争年代在瑞士工作，与艾·杜勒斯有关系。同时帮助来自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1940年以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同时搞密谋活动，并因此而被怀疑是双料间谍。1949年5月11日根据拉科西的建议，并在苏联特工机关的参与下，在布拉格逮捕了菲尔德，并转交给匈牙利国家安全机关。1954年之前处于被监禁的状态，在出狱之后获得了在匈牙利的政治避难权。曾得到过菲尔德帮助的来自东欧国家的数十名秘密共产党人，都遭到了逮捕并被交付法庭。

起工作过。1949年夏天，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因此一切与南斯拉夫有关的事都令人产生怀疑。当得悉肖尼及其一伙曾在战争期间，2月或3月份，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瑞士去过南斯拉夫时^①，怀疑就进一步加深了，虽然显而易见，美国人通过把侨民从瑞士撤走的办法所表现出的最细小的帮助对加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过程中还得知，在贝尔格莱德，他们交出旧的证件而换上新的证件，有人向他们交待了在匈牙利应当进行的工作，然后把他们送到塞格德，他们就从那里开始介入匈牙利的运动。经调查得知，肖尼在塞格德向自己小组的成员下达指示说，关于他们在瑞士的工作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也不要告诉党，因为他自己将就此撰写一份单独的报告。当时也没法找过这个报告。没有人收到过这份报告，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份报告的任何踪迹。

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不得不对肖尼进行审问。当把这些事实向他说出以后，他供认曾同杜勒斯进行过合作，而且甚至在回到匈牙利后也曾为美国从事过间谍活动。当时的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彼得·加博尔给我们看了由肖尼亲笔签字的供词。几天以后，彼得·加博尔告知，当问及在匈牙利谁是他的上级联络员时，肖尼回答说，是拉伊克·拉斯洛。从这时起就发生了拉伊克的案件。

据我所知，在60年代初曾仔细复查过拉伊克案件的全部细节。这次调查是否真正确有实据，揭露出什么情况，我自然不得而知。恐怕这次调查并不是真正严肃认真的，因为我从自身的经历确知，其目的之一在于，尽可能给我抹黑和有利于将我开除出党。很可

^① 1945年初，一个匈牙利共产党人小组根据匈牙利民族解放阵线的请求，在美国军队的协助下返回了匈牙利。为了这件事，肖尼通过诺埃尔·菲尔德与杜勒斯进行了会晤。但是，关于这次与美国侦察机关领导人的接触，他曾向党的领导人做了汇报。

能，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会查明，彼得·加博尔有关肖尼的情报在细节上，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是伪造的。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1949年5月期间，我们的头脑中从没有产生过这类的怀疑，而且相信了彼得·加博尔的报告^①。

今天，经过15年以后，我认为很有可能是，肖尼和他的战友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以为这样做有助于同德国纳粹分子作斗争，便同菲尔德且间接地同杜勒斯进行了合作。我也能清楚地设想，那一帮老奸巨猾、久经磨炼的极具经验的间谍们，不必费力便能够把肖尼和他的小组引入歧途。但在当时，在1949年，冷战的火焰已经开始大肆蔓延，同南斯拉夫人的冲突已经激化到了极点，要预见到这一点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9年夏天，我得到一本艾伦·杜勒斯写的书，叙述战时他在瑞士进行的间谍活动。杜勒斯写道：他的一部分间谍人员作为瑞士一家生产果胶工厂的职员在希特勒德国工作。果胶是用于给伤员治疗时止血的。瑞士这家工厂独家垄断了这种药品，所以德国人准许该厂工作人员进入德国。杜勒斯在书中说，他的人为了获得盖世太保的信任，自己也向盖世太保提供一些材料。杜勒斯暗示，这些材料涉及德国的地下共产主义运动。换句话说，杜勒斯把他在瑞士获悉的关于进行地下活动的德国共产党人交到了盖世太保手中，从而使自己的间谍便于进行工作。我们就这个问题找过瑞士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劳动党，而且直接告诉了沃格^②本人），同时惊奇地获知，瑞士共产党人在战争期间也从这家果胶厂得到相当巨额的物质上的资助（如果我记得不错，总数约为

① 1956年和1961~1962年的复查工作，以及卡达尔、法尔卡什、彼得以及其他人的证词表明，拉科西亲自领导了这次案件的调查，并对审讯的性质下达了指示。肖尼的认罪是屈打成招。

② 沃格·埃德加（1898~1973），1946~1949年担任瑞士劳动党中央副主席，1949~1968年担任瑞士劳动党中央总书记。

100万法郎)。我们提醒瑞士同志注意这桩不平常的案件，从此以后，我们就同他们开始了长时间的杂乱无章的通信往来，而最终未能取得结果。如果说杜勒斯能够成功地把熟知当地情况的瑞士同志搞得晕头转向，那么他们要让侨居在那里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上当受骗应当是更容易做到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不能排除肖尼是在彼得·加博尔的压力下，而且有可能是在某一个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把拉伊克牵扯进了这个案件。同时我应该说明，在内务部系统工作的苏联专家，准确地说，凡是我认识的顾问（除了一个惟一的例外，我曾亲自请求斯大林将他调回，随后他就被召回了），都是诚实、忠诚、精通自己业务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又都是在同一间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个学校的课程之一，根据1937年事件可以知道，正是体现为：也应当在党的内部，甚至在领导人中间寻找敌人，特别是曾经去过国外，并且已有可疑迹象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我很快看出，是贝利亚^①在处理肖尼的案件，后来也是他在处理拉伊克的案件。他知道他们的供词，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和有意思的内容向斯大林报告（这一定也涉及其他国家：有一次贝利亚曾当着我的面提醒斯大林说，他的工作人员曾大力协助揭露渗透到人民民主国家党内的敌人）。今天，我完全可以设想，贝利亚得知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之一肖尼涉嫌间谍活动后，便介入这个案件，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拉伊克进行此类诬陷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作为西班牙一个国际支队（具体的是拉科西支队）的战士曾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领到通行证，并且从集中营出来后是经由纳粹德国

^① 拉·帕·贝利亚（1899～1953），1946～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1945年和1953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同时自1941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回国的。此外，他同南斯拉夫人关系良好，而且他的哥哥又是双箭党^①执政时期的国务秘书。所有这一切我们原先也多少知道一些，但在肖尼招供以前并没有予以重视，对拉伊克是完全信任的。后来，在拉伊克被捕以后，我自己曾不止一次认定，贝利亚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但是，在1949年谁能想道，贝利亚，一个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苏联元帅，会是一名内奸。我和贝利亚有过不止一次的冲突，但对这方面我连想也不敢想。

诚然，应当指出，在人们把肖尼的供词告诉我时，我曾怀疑过在获取这份供词时彼得·加博尔可能起了作用。我同彼得·加博尔相识是在1945年4月，当时任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的卡达尔·亚诺什把作为自己副手兼政治警察负责人的彼得·加博尔介绍给我。人们告诉我，彼得是一个异常机智的地下工作者，他总有办法从匈牙利警察，确切地说，是从霍尔蒂警察的魔爪中逃脱。后来，卡达尔转到其他工作岗位，彼得·加博尔仍留在政治警察局长的位置上。在1948年秋天以前，我与他直接接触较少，因为在政治局内国家安全方面的事务由法尔卡什·米哈伊分管。直到法尔卡什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才由我主持这方面的事务。由于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不应当经常前去国家安全局（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这几个月一直不曾介入彼得·加博尔直接经办的工作^②。就是竭尽全力搜索我的记忆，我也记不起彼得·加博尔在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会议上什么时候发过言。不过，在有所接近以后我发现，他过分地追求虚荣，

^① 双箭党，1938~1945年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

^② 拉科西在1945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承认，他本人曾亲自向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传授侦察和审讯的专业经验。而拉科西在1949年10月30日布达佩斯党员骨干分子大会上的发言，证明他参与了拉伊克案件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公开承认：“对于搞清这类案件，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轻信。……制定审查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应该说，在这个计划没有最终具体落实之前，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而且很没有教养，虽然我曾多次建议他提高修养和多学习，但在这方面他毫无改变。

当时，彼得和内务部中的几位部长经常发生冲突。按照苏联的模式和苏方的建议，国家安全局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内务部，实际上几乎拥有各方面的自主权。彼得·加博尔带着病态的忌妒心理，极力防止内务部长干预国家安全局的事务，即使有必要时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在拉伊克·拉斯洛担任内务部长以后，摩擦更见加剧。此外，国家安全局甚至对党搞阴谋活动。在贝利亚被捕以后我才意识到，在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开始消除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时，我也听说有这种现象。

读了肖尼提供的指控拉伊克的证词以后，我怀疑有可能是彼得·加博尔所指使。除我以外，有4名政治局委员知道肖尼的供词：格罗·埃诺、卡达尔·亚诺什（他当时接替拉伊克担任内务部长）、法尔卡什（作为国防部长，他有权获得一切情报），……^①

1920年11月，列宁在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章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对十月革命直接“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提起了。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②也许，“个人崇拜”可以算作是这种已经被改正了的错误，因而人们不愿意再提起它了？但未必如此，在苏联、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崇拜问题一再被提起，一次又一次，但是还没有确定个人崇拜的概念本身，还没有揭示出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

① 此处档案原件缺页。知道肖尼供词的第4位政治局委员是雷瓦伊·约瑟夫。

② 指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关于准备武装起义决定的举动。参见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二版，第415页。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通常把个人崇拜看做是对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崇拜，比如对斯大林、哥特瓦尔德^①、拉科西等人的崇拜。与此同时，也把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归罪于“个人崇拜”。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1949年保加利亚逮捕和处决了中央第一书记科斯托夫^②和他的小集团的成员，虽然当时保加利亚并不存在个人崇拜。在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之一、司法部长帕特拉什卡努1948年或1949年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后来被处决了。^③他曾是1944年8月23日反德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那时在罗马尼亚哪里有什么个人崇拜呢？1949年在波兰，哥穆尔卡无端遭到指控，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随后被投入监狱。^④波兰当时也没有个人崇拜。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我国拉伊克案件是怎样发生的。显而易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许多，甚至恐怕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在没有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开始的。这样看来，个人崇拜

-
- ①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自1929年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主席），1946～1948年担任政府总理，自1948年6月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 ② 特拉伊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4～1946年担任总书记，自1945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1949年12月成为在反南斯拉夫运动中进行的公开审判的牺牲品。
- ③ 卢克列奇乌·帕特拉什卡努（1900～1954），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1928～1934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44～1948年任罗马尼亚司法部长，1945～1948年为罗共中央委员，1946～1948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2月被开除出中央，同年的3月被逮捕。帕特拉什卡努被称为“罗马尼亚的拉伊克”，1954年4月，帕特拉什卡努作为间谍和阴谋集团小组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
- ④ 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1905～1982），1942年为波兰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1943～1948年为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8年夏季因被指控犯有右倾民族主义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1949年11月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1年8月被逮捕。1954年12月获释，1956年7月得到平反。自1956年10月到1970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存在简单的有机联系。

我部分地出于亲身的感受，部分地是根据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实际事例，目睹了个人崇拜是怎样产生的。我是在1920年认识斯大林的。当列宁把我介绍给政治局委员们的时候，斯大林在场。他当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但还没有显现出他后来所起到的那种巨大作用的任何外部特征。他外貌简朴，甚至有点土气。他穿着一件军便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裤腿始终塞在靴子里。我发现，他在同我，总之在同所有外国人交谈时，彬彬有礼，平静谦和，虽然有时我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在握一只蜡制的手套，而手套里面似乎藏着一只铁甲般的手。我看出，他是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和执行者。当库恩·贝拉^①抱病从乌拉尔^②回来，并欠了一身债时，谁也不愿意关照他。我找了季诺维也夫，他打发我去斯大林那里，因为这类事归斯大林管。斯大林用带有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十分准确的俄语问我，为什么库恩·贝拉本人不提出这些问题，并随即采取了措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二天就有中央工作人员到库恩·贝拉那里去了，关照解决他的物质供应和医疗问题，一句话，问题解决了。我在其他一些场合也看到，斯大林善于迅速而果断地解决问题。列宁生病以后，他成为党的总书记^③，一开始没有任何

① 库恩·贝拉（1886~1938），匈牙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16年在俄罗斯被俘虏，参加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并加入了俄共（布）。1919年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是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自1920年中期居住在苏维埃俄罗斯。作为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克里木革命委员会主席，他领导了恢复克里木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1~193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大清洗时被镇压。

② 库恩·贝拉1921~1923年是乌拉尔地区党的领导人。

③ 经列宁的批准和赞成，斯大林在1922年4月全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迹象表明一棵成长中的树将把影子投向何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发言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还是在由季诺维也夫而不是由斯大林作政治报告的党代表大会^①上，所有与会者都以一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理应得到的尊重听取了他的讲话。我没有看出他的行为或其他同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1924年，我前往匈牙利。1940年末，通过交换^②我得以回来。还在边境上，在西安基村，我就看出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边防部队指挥员彼得罗夫少将和旅政治委员巴扎罗夫建议我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为我的获释向他表示感谢。我同意了，并随即草拟了一份文稿。但是，同志们看了以后很不满意，而且我发现，他们还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建议我作些修改——称呼斯大林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等等。当我为自己辩解说，斯大林看了这样一些阿谀奉承的修饰语一定会大为生气时，同志们笑着说，可以感觉到我确实16年不在这里，并说我可以放心，现在时兴这一套。当我到达莫斯科以后，这种场面又重复了一次。人们建议我，除了从边境地区发来的问候电以外，再写一份。在这封信中，我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③为他们作出努力使我获释表示了谢意。临发出

① 指1923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俄共（布）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了中央组织工作报告。列宁因病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② 1924年底共产国际派拉科西前往匈牙利领导地下工作，一年半以后他被逮捕并被判处8年半的监禁。这个期限结束之后拉科西再一次被审判，1935年1月因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从事革命活动被判处终身监禁。拉科西案件的两次诉讼都伴随着出现了国际性的抗议活动，使他免遭死刑的判决。1940年10月，为了交换过去被沙皇军队俘虏的匈牙利战俘，拉科西被交付给苏联。

③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1935~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自1946年担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48年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前，我把信交给同志们看了一下，他们提醒我说，把这两个名字并列是不正确的，因为斯大林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我接受了这个忠告，几天以后我得知，我这封充满颂扬词语的信已经复制分发给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1945年以后，我经常有机会和斯大林单独会见，有时也有政治局委员在座。^①这时，我发现只要他在场时，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尽量回避答话，或仅限于发表赞同的意见。我想，这只是在有局外人在座时如此，而且受到党内纪律的约束。在同我会见时，斯大林始终是神情关注地倾听我的讲话，即使在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时也是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直率的、同志式的关系。但我也发现，政治局委员们对此却有所不满，也可能是认为我不够尊敬他。当然，我们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我们总是同志式地进行讨论。例如，当同南斯拉夫人的冲突火焰已经熊熊燃起的时候，斯大林对我说，铁托的哥哥仍然安然无恙地在匈牙利生活着（肯定这一切是贝利亚向他报告的）。我告诉他，铁托的哥哥是退休的铁路工人，已经70多岁了，住在多瑙河以南的小村子里，不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斯大林想了一下，就此作罢。大约一年之后，他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态度更加坚决了。我再次回答说，由于对铁托的哥哥没有任何指控的理由，所以我不认为应该对他采取某种措施。斯大林沉思了一会儿，沉默不语，此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回家以后，我仍然关注这件事。结果发现，铁托的哥哥，这个退休的铁路工人，曾多次前往贝尔格莱德，而

^① 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簿里，自1940年到1953年期间，有5处记录是斯大林接见拉科西的，即1946年4月1日、1947年12月9日、1948年2月17日和12月16日，以及1949年8月20日。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0卷。

1947年甚至曾带过一封什么信给纳吉·费伦茨^①，纳吉还接见了。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对他提出指控，而在此其间，铁托借口我弟弟为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而缺席判处他20年监禁，连他的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些朋友也为此被判刑10~15年不等。

在涉及南斯拉夫问题上也是这样。有一次我提起，在铁门附近有一艘装载水泥的南斯拉夫驳船沉没，南斯拉夫运输部门打捞工作十分缓慢，致使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交通中断。多瑙河上有近300艘船只受阻滞留，我们的专家声称其间存在蓄意的消极怠工现象。斯大林仔细地听了我的叙述后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转向米高扬^②说：“你知道这件事吗？”米高扬回答说是第一次听到。这时斯大林生硬地对我说：“您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应当注意自己的讲话。”这种突然变得生硬的口气使我颇为惊讶，我平静地看着斯大林，稍停了片刻回答说：“我知道我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也正是据此说出自己的意见的。”斯大林关注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用习惯的动作从桌子上拿起火柴，点燃那只始终熄灭着的烟斗。问题就至此结束。

当然，也发生过一些更为严重的事件。在调查拉伊克案件过程中，逮捕了帕尔菲^③将军。人们告诉我，在帕尔菲那里发现了一

① 纳吉·费伦茨（1903~1979），1945年担任匈牙利独立小农党总书记，后为主席，1946~1947年任匈牙利总理。1947年5月因被共产党人指控与反国家的阴谋有联系，提出辞职并移居国外。

② 阿·伊·米高扬（1895~1978），1926~1953年任苏联贸易、对外贸易、供应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长），1937~195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③ 帕尔菲·杰尔吉（1909~1949），自1942年起为匈牙利共产党，反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1945~1946年任匈牙利国防部军事政治处（反侦查局）领导人，自1948年起任匈牙利国防副部长，中将，1949年7月5日因拉伊克案件被逮捕，10月10日与其他三名军人一起被判处死刑，1949年10月21日被处决。

架无线电台，他说是从招募他的苏联情报人员那里领到的。我甚至因为我们一些部门的幼稚而生气了，他们竟认为，当在我们军队里到处都有苏联顾问的情况下，苏联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发报机一定是西方的，而帕尔菲为了迷惑我们，故意说是从苏联情报部门领到的。不过为防万一，我还是决定把事情弄清楚，结果恼火地得知，那确实是苏联的无线电台。在会见斯大林时我提到这个问题，并且抱怨了几句说，当有人秘密招募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时，怎么能建设起军队和党呢？采用这种方法的情报机关算是怎么回事？我向斯大林说，建议他关心一下这方面发生的事情。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斯大林处于这种可称之为忸怩不安的状态。他说，他知道这事，已经下达了相应的指示，目前有人已在草拟一项建议，以便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份关于相互交换军事情报问题的建议。问题就到此结束了。

我曾经常去斯大林那里进午餐，确切地说应是晚宴，有时是他一个人在座，但更多的时候是和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聚会。例如，1951年夏天有一次我在他那里，是在博尔若米，我看到政治局委员们——当时有莫洛托夫^①、布尔加宁^②、马林科夫^③、米高扬、贝利亚、赫鲁晓夫^④等人——是乘飞机或汽车来出席这种宴会的。

① 维·米·莫洛托夫（1890～1986），1930～194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1939～1949和1953年至1956年6月期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后为苏联国家监察部长。

② 尼·亚·布尔加宁（1895～1975），1938～1941和1947～1953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自1944年起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武装力量副部长，自1953年起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5～1958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③ 格·马·马林科夫（1902～1988），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④ 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1953～196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己取用，斯大林也是如此。他好奇地一个个揭开盘子上的盖碗，提醒我选用某一种食品。每天晚上，斯大林都要喝上一点酒。我有时看到，他用一种不适宜用来喝香槟酒的高脚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齐姆良红葡萄酒或香槟酒。不过斯大林的这种动作过程，正如同他吸烟时一样，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拆开“黑塞哥维那”牌烟卷，装烟斗和不断点火，而真正抽吸的时间并不多。他对格鲁吉亚的各种葡萄酒很熟悉，让我注意“齐南达利”牌白葡萄酒、“赫万奇卡拉”牌红葡萄酒，平常他也会派人给我送来几瓶，不过瓶上贴的不是铅印的商标，而是一张打印有酿制年份的纸条。（我也曾给他送去优质的匈牙利葡萄酒，他表示十分感谢。）在这类晚宴上，气氛轻松随便，大家讲一些奇闻逸事，有时也有人讲些淫猥的话，引起在座的人们一场哄笑。有一次他们想把我灌醉，但葡萄酒打不倒我，在座的人服了我的酒量，并有些惊奇。最后一次这样的晚宴是在1952年秋天。当凌晨3点以后斯大林从房间里出去时，我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斯大林已经73岁了，这种宴会一直拖到深更半夜，能不影响他的身体吗？”同志们安慰我说，斯大林是有节制的。果然，斯大林回来后不久，过了几分钟便站起身来，聚会的人们便开始散去。而半年之后，我再次看到斯大林时，他已经躺在追悼会的遗体架上了。

我常常想起铁托举行晚宴时的情景，我曾经在1949年夏天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我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4月29日瑞士《他和她》杂志关于铁托一次举行宴会的报道。参加了这次在前保罗大公宫廷举行的晚宴的一名记者写道：“大厅里有300名将军列队站立，他们身着礼服，从头到脚全是金银饰物，胸前挂满勋章和奖章。在他们身边则是美艳的夫人们，穿着式样别致的华贵的晚礼服。所有这一切，连同身穿带镀金镶边的雪白色燕尾服的侍役们，让人想起某一部好莱坞轻歌剧电影的布景场面。在80种各类冷盘之外，还

有用巨大的金制或银制托盘分别盛着的种种佳肴，在丰盛的菜肴的重压下，桌子都被压得几乎要断裂了。饮品也应有尽有：托考伊甜葡萄酒、波尔多红葡萄酒、弗拉斯卡季酒、雪利酒，当然还有香槟酒。”

总参谋长什捷缅科^①将军也描述过一次斯大林招待自己的将军们的晚宴，他说这次晚宴十分简朴，几乎可以说是斯巴达式的。

我发现，斯大林对于他必须明确表示某种态度的问题都审慎仔细地研究过。他每次都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就我在场时所见到的他做出的决定，据我记得都是正确的。这包括他对匈牙利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他是按照独特的方式喜爱匈牙利人的。当1952年在赫尔辛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南斯拉夫足球队战胜苏联队而匈牙利人击败南斯拉夫人时，斯大林对我说：“好样的！多有气魄的民族！解了我们的围！”顺便说一下，1948年为了签署友好条约^②而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代表团可以证明这一点。斯大林的平易简朴、率直亲切，以及斯大林的智慧和韬略给代表团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驻莫斯科大使、历史学家塞克费尤·久拉曾经以怀疑的态度，并且内心存有很多保留意见地接受了苏联的现实，也曾多次会见过斯大林，他在向我谈及斯大林时，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和斯大林谈话时，我总是带着笔记本，事先把问题写在上面，然后按顺序一个个提出。每谈完一个问题，我就在这个问题上打个勾。到最后我说：“完了，我再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开始自由

① 谢·马·什捷缅科（1907～1976），自1940年起在苏联总参谋部工作，1948～1952年任总参谋长，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

② 1948年2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期限为20年的苏匈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成员有：匈牙利总统佐·蒂尔迪、总理拉·丁尼斯、副总理马·拉科西和阿·萨卡希奇等。

交谈，其间会涉及有关政治、国际工人运动、苏联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难点和回忆。之后，照例是共进午餐或晚餐。斯大林把我看作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成员，和我谈话时，根据我的判断，他是真诚的，并无戒心，即使谈到最为敏感的问题时也是这样。由于他同我谈话不需要有翻译，这就使气氛更加轻松，有一次他甚至提到，有翻译在场谈话反而随便不起来。斯大林往往以批评的态度评论别人，评论自己的工作人，但他同时也承认他们的能力。他亲切甚至充满激情地评论的惟一的一个人，那就是列宁。当话题一涉及列宁时，斯大林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

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由列宁培育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党怎么会产生个人崇拜？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我心里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所谓的列宁遗嘱^①，也知道写遗嘱的过程，因为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记，人们把这事告诉过我。根据列宁的意见在推选总书记时应予考虑的人选——斯大林、布哈林^②、皮达可夫^③、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④和加米涅夫，我都十分熟悉，和其中许多人共过事。这些人中，有一些在素质上高于斯大林。布哈林有极好的理论鉴别力，擅长写作，是机敏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与他直接交往十分令人愉快，但是他完全没有组

① 指的是列宁1922年12月口授的札记“致代表大会的信”，在信中列宁对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作了评价，特别是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1987年中文第二版，第337~343页。

② 尼·布哈林（1888~1938），1924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 格·列·皮达可夫（1890~1937），1921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国民经济方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④ 列·达·托洛茨基（1879~194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1925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被驱逐出国。

织能力，而且很容易陷于惊慌失措的地步。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如列宁所说，他是党内最受喜爱的人，但是谁也不曾想过让他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也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在举行阅兵仪式的时候，他的充满激情的声音能够响彻整个红场。他擅长写作，学识渊博，而且了解西方。但是，当提出列宁的继承人的问题时，党的老近卫军们还记得，他多次反对过列宁。他同工人也没有联系，在他身上显露出一种普通无产者立即就能感觉到的知识分子的高傲。皮达可夫距离群众就更远了，由于他有点驼背，戴着一副眼镜，留着尖尖的淡褐色的胡须，所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究。季诺维也夫感觉敏锐，具有实际工作能力。加米涅夫特别勤奋。相比之下，斯大林身上则较好地集合了对这样一个大国的共产党总书记所要求的那种多种多样的和综合的能力，这就像五项运动的世界冠军一样，他在每一个单项比赛中可能得不到第一名，但其总分仍然超过自己的所有竞争对手。1922年4月列宁恰恰推荐他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并非偶然。

当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他已经有了差不多20年的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罢工、游行、武装斗争、坐牢、西伯利亚流放，而且同奸细、暗探、内奸、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斗争。1917年以后，在所有领导人中他去前线视察的次数最多，经常被派到最需要钢铁般毅力、意志坚强和具有更多的毫不留情精神的人的最危险的地方。列宁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严酷无情的人（1919年所写的致匈牙利工人的信^①，是由萨穆利带回，经我翻译的。），我当时曾经想了很长时间，如何把“严酷

^① 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标题为“向匈牙利工人阶级致敬”的信，其中说道：“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二版，第374~378页。

无情”这个词更确切地译成匈牙利文)。但列宁同时又是异常注意分寸的人，善于洞察并理解人的弱点，他的能征服人的微笑常常比任何话语或任何论据蕴含着更深的内涵。斯大林则几乎完全缺少这种分寸感和谦逊。在他身上一直到生命结束时都始终保留着哥里村鞋匠儿子的某种作风，始终保留着他那种像被追逐的野兽一般在20年中所养成的冷酷作风，始终保存着经常顾不上讲分寸、顾不上讲委婉的国内战争时期的严厉性，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类似的分寸和委婉的品性能够带来的好处不多，而相反会造成危害。当我参观哥里村时，看到了斯大林出生和生活的那间狭小的房间，以及他曾置身其中的极其贫穷的环境，我立刻看到了斯大林性格中的某种异样的东西。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严厉、钢铁般的坚强，甚至严酷无情都是非常优秀的品格。斯大林运用这些品格收益甚大，例如在反希特勒战争中，而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事业都会造成损害。

我目睹了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最初2~3年的工作情况。我能看出来，那些从国外，从侨居地回来的领导人让斯大林感觉到，自己不懂国际问题，对西方文化也了解很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常需要得到莫斯科的建议和帮助的那些年里，上述情况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在那个严峻的岁月，斯大林还不具备必要的素养，但是也没有犯什么特别的错误。不过，那时他还没有那种让别人容易接受其建议（包括正确建议）的权威。这一点我是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辩论时发现的。也有过其他一些冲突的苗头：列宁知道这一切，所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设法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求缓和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当我于1940年末回到苏联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斯大林的威望和实际能力已大大高于他的战友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以后，这种威信又无与伦比地大大提高了。

斯大林个人崇拜形成时期，我正在坐牢，因此未能直接观察到这个过程本身。但是，我可以想象到，清除竞争对手，对他们采取必要的或不必要的行政措施，不利于人们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发扬自由批评的精神。相反，这类措施只能导致人们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以及不暴露真实思想、虚与委蛇的应付行为的出现，而这一切距离阿谀奉承和曲意吹捧仅仅一步之遥。我们知道，在初期斯大林曾和这种做法进行过斗争，把这类问题提到社会舆论面前，但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也有过一些例外。有一次萨卡希奇^① 对他说了一些恭维话，他很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您给我听着，我不是法兰西人，用不着给我讲恭维话！”在此之前，颂扬斯大林的土壤早已存在。1925年，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28年出版了伏罗希洛夫元帅^② 的书《斯大林是统帅》等等。

当我于1940年底从监狱回到苏联的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至高无上了。在我经过的苏联边界的西安基村里，军官的妻子们当听说我几天之后就要同斯大林见面时，几乎兴奋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她们当即决定同我一起给斯大林发一封致敬信，并且以一种对我来说是新的、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热情，建议在信中写进最为精彩绝伦的歌颂词汇。这一切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或装模作样，我看见了一种真诚的、自发的热爱和尊敬，甚至还有某些崇拜的因素。对于苏联同志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只有我觉得是新

① 萨卡希奇·阿尔帕德（1888～1965），1945～1948年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书记。在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联合后，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49年出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1950年逮捕，1956年得到平反。

② 克·叶·伏罗希洛夫（1881～1969），1926～1960年为联共（布）、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1940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

鲜事。很快我自己也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了，如同对空气那样习惯，而且随着战胜纳粹分子的胜利日益来临，我对斯大林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大部分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举止说明，他们认为，似乎他们也应当分享一部分斯大林的威望。我曾经会见过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两名书记——格拉金和费留宾。1924年时，我去当时位于原合作社大楼的中央委员会，出示党证后无须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去。如今，去莫斯科委员会大楼却需要通行证，而且要事先申请。战争期间我曾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州委书记帕利采夫，一个很能干的同志，大约35岁左右，约我去他那里。当然，他也有警卫队，入口处要检查证件，要在接待室等候。原来他感兴趣的是我对州的党员积极分子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不难明白，他认为出席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有损自己的身份，并有意让我感觉到我在跟谁打交道：讲话慢条斯理，显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也曾和党的区委书记们交谈过，表现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区一级领导人的架子。在斯大林死后，这类党的工作人员的形象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如潘菲洛夫的小说《伏尔加河——母亲》。电影艺术也涉及到这些问题。可惜，这也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出现。关于在赫鲁晓夫时期这种风气仍然继续存在的事实，可以以柯切托夫的小说《州委书记》为证。

我曾经写过，当我获释后着手处理被镇压的匈牙利人的案件，首先是库恩·贝拉的案件时所遇到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跟谁都无法开诚布公地讨论。季米特洛夫是我十分亲密的朋友，他曾于1940年向斯大林提出释放我的问题。但当我一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他立刻就闭口不谈，并且板起了面孔。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叶夫

根尼·瓦尔加^①有一个女婿已经被处死，他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诚恳，但显然有些偏颇。他认为，正派人是不会去从事侦讯工作或担任秘密警察的。只有社会渣滓才会去干那种事，当然这种人想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的升迁，千方百计总想对更多的人进行怀疑，把他们关进监狱，直到最后造成这样一种气氛，即所有的人都成为形迹可疑的人，不是被别人怀疑，就是怀疑别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对他说，我认识捷尔任斯基^②、明仁斯基^③、温什里希特^④他们都是作风正派、思想坚定、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毫无疑问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看法选择工作人员的。当然，后来的内务部长或人民委员，如我不认识的叶若夫、亚戈达，或者，比如说，贝利亚，都不是这样的人。在这里，瓦尔加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1935年基洛夫^⑤遇害后，当时的气氛不用说变得十分紧张。1936年德国法西斯已经开始张牙舞爪，要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迹象已经显露。在这种形势下，毫无疑问，随着警惕性的提高，多疑心理也随之增强。伟大的卫国战争史记载着战前年代从境外派来或在境内被揭露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人数飞跃式地急剧增长。这也刺激了破坏法制行为的加剧，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外国人时更是如此。但是，无根据地镇压无辜者竟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斯大林无疑难辞其咎。

① 叶·萨·瓦尔加（1879～1964），苏联经济学家，匈牙利族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担任财政人民委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费·埃·捷尔任斯基（1877～1926），苏维埃俄国初期担任契卡委员会（国家政治管理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和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③ 维·鲁·明仁斯基（1874～1934），自1923年起担任契卡委员会副主席，1926年起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

④ 约·斯·温什利赫特（1879～1938），1921～1923年起担任契卡委员会副主席。

⑤ 谢·米·基洛夫（1886～1934），1930～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

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他出席过一次斯大林为欢迎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及其夫人玛尔塔而在克里米亚举行的晚宴或午宴。在谈话过程中，哥特瓦尔德提到有一个名叫科尔曼的捷克侨民住在莫斯科，他经常不断地对捷克中央领导人第一书记斯兰斯基^①诽谤和指责。斯大林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把他逮起来。”玛尔塔插了一句话：“那太好了！”科尔曼后来果然被捕。赫鲁晓夫接着说：“斯兰斯基作为人民的敌人早已被处决，而科尔曼仍然还关在我们这里。”我旁边坐的是格罗·埃诺。我们两人都认识科尔曼，我们不得不确认，连赫鲁晓夫也没有料想到为什么即使在他赫鲁晓夫出任第一书记以后，科尔曼仍然没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给专政一词下过定义，专政“是依靠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的政权”。（当1960年我向山多尔·诺格拉迪^②和焦尔季·阿采尔^③引用这句话时，他们一开始认为这个定义是我杜撰出来为自己辩护的）。当然，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以此为据应当把无辜的人们投入监狱或处决他们，但发生类似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列宁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壮大而必然无疑和不可避免要出现”错误，这种错误也涉及国家安全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这也可能是1937年发生大规模镇压的因素之一，但是这本身不是一种解释或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把这个复杂问题交由社会公众裁判的方法则是一种

① 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自1945年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1951年被逮捕，1952年在进行公开审判时，与其他10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一起被判处死刑。

② 山多尔·诺格拉迪（1894～1971），1959～1966年担任匈牙利社会工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③ 焦尔季·阿采尔（1917～1991），1958～1967年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

典型的事件，如果服药后病情更加严重，那么再怎么服药病也不会好起来。恰恰是在这里，本来应当运用列宁的一个提法，即“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1956年，这些错误尚未完全被纠正，但正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进行纠正。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必要非得采用把这个问题提交社会公众裁判那种形式，而赫鲁晓夫却在应当使用精巧的医用手术刀的地方抡起了石斧，而且也不能把他搞不清楚的情况说成是事态已经得到缓解。除了石斧之外，他的粗鲁愚昧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1964年赫鲁晓夫受到打击，被排挤出领导层，他所犯下的错误还没有得到纠正，而大部分错误甚至还没有被揭露出来，但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决定不把赫鲁晓夫在他所参与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下的重大错误公之于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未能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问题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今后的许多年代里还将成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和负担。

1962年8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了我的党籍，同时企图指责我搞个人崇拜。这份文件未必就会成为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地讲述这个话题，但想涉及其中的某几个问题。在关于开除我的决议中对于个人崇拜作了如下的定义：“这种崇拜将个人神化，而轻视群众在历史上的变革作用。”决议断言：“拉科西集团的成员还在解放以前就决定把党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以后，他们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这是法制遭到破坏的首要原因。

个人崇拜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变革作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开始，就错误地宣扬伟大人物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变革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

个问题已经澄清：他们指出了创造历史的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同时也承认而不是否认个人的作用。谁要是想更加仔细地了解这个问题，他可以去读一读列宁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5章，这一章的标题就是：《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例就可以看出，个人或者说领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领袖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依存关系：领导人越是清楚地了解并善于代表自己阶级和群众的利益，他就能更好地起到自己的历史作用。我们的阶级敌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清楚地知道共产党领袖的作用：因此他们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①，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他们力图谋杀列宁和陶里亚蒂^②。赫鲁晓夫和他的小集团陷入了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企图用这种办法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抗衡。只要存在阶级，而阶级的利益是由政党来代表的，那么这些政党就会有自己的领导人，或者领袖。在共产党中，这样的领导人就是政治局委员；而领袖，那就是总书记，如果他具有为此所必须的条件和功勋的话，他就是与他平等的领导人中的为首者。列宁在50年以前解释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时补充说，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就应当这样来认识。

指责我是利用集团或者说在集团的帮助下实施领导的说法，我是到1956年以后才听说的。至于这是什么样的集团，有哪些人参加，是多少人——说得不很具体，但是总的来说指的是早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建立的国外局的4个成员：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和雷

①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国际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15日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②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自1926年起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35～1943年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

瓦伊。^① 我只有一次有机会向“权威人士”提出这个问题，那是1960年山多尔·诺格拉迪和焦尔季·阿采尔受党的领导机构的委托来通知我，自即刻起我无论写给任何人的信件都必须交给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而同我偶尔在克拉斯诺达尔遇到的那些匈牙利人谈话必须事先经过大使馆允许。我现在并不想举例说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类似的处理办法是多么的少见，以及这一点证明了臆想出此种处理办法的人是多么的胆怯，而同时又在社会公众的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民主骑士的角色。当在同这两名使者交谈过程中提出了“集团”的问题时，我提请他们注意：4本身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例如在把真正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也只有5个人。列宁在提到这一点时曾开玩笑地指出：“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② 看到两名使者听了这话后并不相信时，我说明在列宁著作中哪一部分可以找到这句话，并说，假如在1920年时一个拥有1.4亿~1.5亿人口的国家领导权集中在极小范围内的5个同志手中，那么900万人口的匈牙利有4个人也就足够了。不过熟悉匈牙利共产党历史的人知道，在诸如内政部长、党的布达佩斯市委书记、我的第一副手等重要

^①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拉克西在莫斯科受到批评。为此，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召开了六月中央全会，拉克西作为总书记出席了会议，并参与了决议的准备工作。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于1953年6月28日做出的《关于党在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以及纠正错误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个人领导的原则有碍于以党和国家为首的真正的集体领导的形成……实际上领导层像一个小集团，权利集中在四位同志——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和雷瓦伊手中”。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公布。直到1956年10月，“拉科西——格罗集团”这个定义才出现在匈牙利的政治词典中。在亚·卡达尔的坚持下，“拉科西集团”这种提法被列入了在莫斯科准备的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匈牙利人民书的文本中，这符合当时的群众情绪，并使匈牙利新领导人在取缔纳吉·伊姆雷政府之后夺取领导权变得容易了。

^② 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二版，第27页。

的关键岗位上任职的是拉伊克·拉斯洛、卡达尔·亚诺什和其他人，也就是说不是“集团”的成员。这时立刻就可以理解，“集团”——根本就不是“集团”。

“集团”这个词的概念本身是同这样一种情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参加“集团”的人本身不配担任所从事的工作，没有“集团”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关于我本人最后再说。众所周知，格罗和雷瓦伊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霍尔蒂^①统治时期，他们两人因参加地下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判长期监禁，曾在莫斯科和国外从事了10~15年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了最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磨炼。法尔卡什是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书记，此前曾因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坐过8年牢。季米特洛夫在吸收他们参加国外局时，多年来早已对他们都有所了解。可以对他们，对其中每个人或对整体，提出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1945年及此后的许多年内，比他们更有经验、经受过更大的考验、更加优秀的同志，在匈牙利还不曾有过。正因为如此，而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他们才得以进入领导机构。

关于我自己我也想说上几句，而且甘冒被指责为不知谦虚的风险。但是，虚假的谦虚也可以是一种指责。我自幼小时起就和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1910年成为党员。1911年，当我19岁时，在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机构作斗争中被选为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为基础而成立的伽利略小组^②的书记。将来从事编写伽利略小组历史的人，也会写上以前掌握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共济会式领导机构手中的伽利略小组为历史提供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运动和共产

① 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57），1920~1944年期间匈牙利的摄政王。

② 伽利略小组是匈牙利进步学生联盟，成立于1908年，赞成捍卫自由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

主义运动的战士，诸如奥托·科尔温、尤若夫·克连、伊姆列·沙拉伊、山多尔·拉廷卡等，而我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有两年时间是在汉堡和伦敦度过的。这两个城市的工人运动，我都参加了。在伦敦，我是国际共产主义工人俱乐部领导机构的成员，正是这个俱乐部的前身于1847年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在被俘期间我仍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我的学生之一西克·恩德烈任外交部长，是列宁和平奖的获得者。1918年，还在库恩·贝拉回到匈牙利之前，我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19年2月，和库恩·贝拉一起被捕。1919年3月22日，从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中获释后，我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①（后来是人民委员）。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干涉一开始，我就立即奔赴前线。人民委员会于5月2日派萨穆利·季波尔和瓦吉·伊什特万去索尔诺克，委托我组织绍尔戈陶尔扬的防御，这个任务，众所周知，我完成了。

公社失败后，我和库恩·贝拉及其他人一起被拘留。所有以前的人民委员都被释放了，而库恩·贝拉和我仍然处于被拘禁状态。获释以后，党的领导机构委托我通过封锁线去向列宁通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和汇报匈牙利党的问题。

1920年底，列宁委托我和保加利亚的卡巴克奇耶夫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去里窝那参加代表大会。意大利社会党是与共产党人实行联合的最大的西方国家的政党。我当时28岁，稍后，又和阿尔巴里·杜拉一起代表共产国际去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7月，根据列宁的提议，我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当时，我29岁。1922

^① 据有关资料记载，拉科西于1918年5月从俄国返回匈牙利，11月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负责外省工作的中央书记。

年，墨索里尼上台后，我被派往意大利帮助党工作，接着又在德国工作两个月之后前去法国。在法国期间，我仍然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开展活动。回来后，作为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以苏联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小组的派别斗争停止后（对此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将我派回匈牙利工作。我自己提出回祖国工作的愿望，并且谢绝了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从事本职工作的提议。

15年以上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把我摧垮。拉科西案件的诉讼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我为执委会委员（选举关在监狱中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这是惟一的一次），我才开始认识到这次诉讼的意义。在西班牙作战的一个匈牙利营以我的名字命名。有一次，一名叫拉卡斯的法国政治家来狱中探望我，带给我一本巴黎红衣主教韦尔吉的圣经，说红衣主教以此表示对我的深切敬意。罗曼·罗兰派人送来贝多芬传，安里·巴比塞寄来左拉传，安德烈·纪德也几次转来问候。1940年末，我获释后，只过了3周就同左尔坦·申赫尔茨就他返回祖国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在疗养院小住后，我当即投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同时从事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改组事宜。当1942年季米特洛夫60岁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其中有威廉·皮克^①、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莫里斯·多列士^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马努伊尔斯基^③等）委托我代表共产国际在庆祝大会上向季米特洛夫祝贺。

① 威廉·皮克（1876～1960），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1935年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1946～1954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1960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②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30～1964年担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③ 德·扎·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自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年为书记。

带着这样的经历，我回到祖国，担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总书记。必须怀有什么样的恶意偏见和具有多么卑劣的灵魂，才会宣称：我一开始就篡夺了党的领导权，随后又建立起个人的政权！

当然，匈牙利也曾有过个人崇拜。在关于开除我的决议中，“仅仅”说到神化而已。既然这份决议并没有提出要说明真实情况的任务，甚至相反，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诽谤我，那么这种委婉的夸大其词是可以允许的。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曾经有过个人崇拜，而且我曾相当详尽地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讲到过这一点——今天已经几乎不可理解，然而在当时是十分清楚的，而从那以后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就已经不再时髦了。^①在对各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个人崇拜和颂扬之中，也包含有获得解放的工人和农民的欢乐心情和他们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党的感激之情，而总书记们正是这些党的代表。在这类颂扬之中也有对这些总书记的感激和爱戴之情——如果他们曾经出色地工作过，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完全可以确定，在所有这一切之中肯定有极端的做法，而且很有可能存在骄傲自满和阿谀奉承。这类感情的流露无法以毫米为单位精确测量，也难以防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发生。同样可以确定，这样方式形成的氛围肯定妨碍了开展自由批评，迎合了对总书记作用的夸大，而与此密切相联的则是妨碍了对劳动群众的作用做出相应的评价，使得奉承献媚、丧失原则的风气有机可乘。苏联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也不难理解，在人民民主国家，当斗争的结果有利于无产阶级时，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客体和身不由己的主体。众所周知，在我们的邻国，斗争结束得比匈牙利早。在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

^① 拉科西指的是在1953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他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发言。实际上，这样做是迫于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压力。

尔德早在 1945 年就担任了总理，在南斯拉夫是铁托，在保加利亚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是彼得·格罗查^①。而在我国，直到 1948 年夏^② 天才取得胜利。由此可知，形成个人崇拜的可能性，在我们的邻国要比在我们国家出现得更快一些。那时，这些国家的党的第一书记已经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党和人民的英明领袖，而我们使用这类口号要有节制得多。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正的，因为我刚一回到祖国就看到了这类东西。在 1945 年 5 月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我看到一幅大标语，写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拉科西·马加什万岁！”当我指出这个问题时，人们回答我说，在几个邻国都是这样做的，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党的工作。后来，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英明领袖”、“人民的英明领袖”这样的限定修饰语，而且一切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相应地有所发展。我已经写了，一开始我对这些东西感到不习惯，讨厌过，反对过。但是，由于其他国家都是这样，所以很快我们这里也认同了这种做法。因此所有关于我是这类事物的首倡者或者我曾经坚持这样做的言论，都是诽谤。而那些认定我曾经把对我提出批评意见或持不同意见的人，抓起来并关进监狱的讲法，也是诽谤。1956 年以后当他们意识到谁也不敢驳斥这一切，而我又没有反驳他们的可能性时，就把所有罪过都归咎于我了。

因逮捕了拉伊克而得到的证词，特别是拉扎尔·布兰科夫的供

① 彼得·格罗查（1884～1958），自 1933 年起担任罗马尼亚民主农民组织《农民阵线》的领导人，自 1945 年起担任民主力量联合政府主席，1947～1952 年，担任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自 1952 年起担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② 1948 年夏，匈牙利共产党确定了关于消灭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和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6 月召开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统一代表大会。7 月总统佐·蒂尔迪被逮捕，接着被软禁在家中 8 年。

词，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因为南斯拉夫问题而点燃的烈火越烧越旺。^① 铁托和他的同伙对我们的攻讦尤为激烈，因为匈牙利是惟一的一个有南斯拉夫大使转到我们方面来的国家，他们因而预见到这一步骤对于他们就意味着揭发一切。报刊和电台上的论战日益激化，而边境冲突事件也愈益频繁。关于这一点我曾在6月份写过一篇文章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②上发表，《真理报》和《人民自由报》也刊登了这篇文章。^③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对铁托分子的指责，这就是希腊问题。希腊爱国主义者在这几个月里处境十分困难，他们把这一点部分地归咎于南斯拉夫人。^④ 我们按照希腊同志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可能去验证他们对南斯拉夫人的抱怨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希腊同志说，南斯拉夫人已经处于同他们发生冲突的4个人民民主国家^⑤的包围之中。南斯

① 拉扎尔·布兰科夫，1948年担任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代办，南斯拉夫国家安全部门驻外机构的首领。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1948年6月）做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局势的决议之后，请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避难，后来在苏联大使普希金的坚持下转往莫斯科。1949年6月19日被逮捕，而7月19日在拉科西的坚决要求之后又被转交给了匈牙利安全机关。在审讯拉伊克时，布兰科夫的供词几乎把所有的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的许多外交官和军事家都说成是美国间谍，还揭露出铁托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里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布兰科夫于1956年4月被释放，此后他很快到达了法国，在那里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② 该报于1947~1956年期间用14种语言出版，1950年以前该刊物的主编是帕·费·尤金，此后是马·鲍·米丁。

③ 拉科西的文章《南斯拉夫的托洛茨基分子——帝国主义的冲锋队》发表在1949年6月1日第11期《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6月5日《真理报》和6月8日《自由人民报》上。

④ 1946~1948年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一起，积极支持希腊共产党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但随着苏南冲突的开始，南斯拉夫改变了自己在希腊问题上的立场，而在1949年夏彻底取消了对希腊游击队的帮助，拒绝为他们提供自己的领土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和修整。

⑤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拉夫人也知道，希腊共产党人支持与他们相对立的斯大林的立场，因此不向希腊游击队员提供援助。当1949年夏季与南斯拉夫接壤的战线地段形势危急时，希腊人也对南斯拉夫人提出过指责，说美国人指挥的希腊国王的军队是通过南斯拉夫领土绕到他们后方的。

我重复一遍，在我们布达佩斯没有可能去验证，这一切是符合事实呢，或者只是没有根据的责难。但是，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贝尔格莱德和雅典有靠拢的迹象。（后来，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建立起某种联盟^①。）夏天，我在同斯大林谈话时提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说，希腊游击队的形势不好，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战术不正确。他们不是建立一支支人数不多的游击分队，而是组建起几个团，甚至几个师，不断要求获得炮兵，而没有相应的空中支援，这样炮兵只会更容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他们又不能从当地居民中得到人员补充，而一部分来自国外的侨民志愿者并不完全可靠。我清楚地记得，到8月份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大部分希腊游击队员被迫转移到阿尔巴尼亚。当我把斯大林的意见告诉给希腊政治局的一名成员时，斗争已经结束。关于不善于从同情的居民中组织人员补充的意见，这个同志回答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美国人从南斯拉夫人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中总结出教训，把游击区附近的居民全部迁走，从而造成无人区，这就使他们无法得到补充。

在上述那次谈话过程中，斯大林说到中国游击战争的经验。他说，毛泽东请求给他们提供火炮，十分自然，他从苏联得到了火炮，但是那只是在已经具备了使用火炮的条件的时候他们才提出要求的。在此之前，尽管空军的作用在中国比在希腊要小，他们还是在没有火炮的条件下进行游击战争。1949年夏天，中国革命的胜

^① 指的是1954年8月在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之间签署的巴尔干公约。

利已经开始完全显现出来：4~5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杭州、上海，种种迹象说明，美国人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军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在混乱之中四散逃亡，寻求庇护之所。我主要是通过美国的报刊注视着中国事态的发展，美国报刊惊慌失措地报道着中国的局势，认为反革命势力的处境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各种代表团开始纷纷前来。我记得有一个代表团带来一张大型中国地图，上面标示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建立的游击区。当时代表团成员说，这张地图已经陈旧，因为人民解放军在此期间又向南推进了很远。尽管中国距离西欧很远，但是我们开始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不安地，有时甚至是惊恐万状地谈论着资本主义世界因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临近而面临的危险。斯大林不喜欢自我吹嘘，但在这年夏天，有一次谈到中国革命时，他非常愉快地问道：“嗯，您认为中国的事态怎样？工作不错吧？政策正确吧？”

1949年6月，“斯坦达尔德”工厂揭露出来的美英间谍集团问题^①引起了匈牙利社会公众的注意。这个间谍集团的头子是福格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被指控的还有他的同伙一个叫做桑德斯的英国人，是英军的上尉。一开始，福格勒千方百计抵赖。经侦讯查明，他的助手中也有匈牙利的贵族，他还和一个男爵夫人存在暧昧关系。这个福格勒是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亲戚，因此这个案件更加使人感兴趣。当福格勒意识到，在审判过程中他的风流韵事将要被公诸于众时，他说他供认一切罪行，但请求不要把他间谍活动中的个人生活问题加以曝光。国家安全机关同意了，于是在公审时福

^① 1950年2月，在匈牙利的“斯坦达尔德”匈美电机制造工厂发生了一起间谍集团案，经过审理，厂长美国人福格勒以及其中的一名英国人桑德斯被判处长期监禁。匈牙利方面的厂长H.盖格尔及部门主任3.拉多被判处死刑。在这一诉讼程序完成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国有化。

格勒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间谍活动。

案件宣判以后，美国大使馆竭力打听需要什么样的代价才能释放福格勒。经过长期的谈判后商定，我们可以得到德国纳粹分子运走而现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的一批匈牙利的珍宝，此外，我们还可以重新在纽约和芝加哥秘密地开设匈牙利领事馆。当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同志们都抱着十分美好的希望：他们都信以为真，认为可以收回全部失去的东西。我则告诉他们说，这对于同志们来说将会是一次认识美国外交政策道德特点的直观课程，他们将会看到此类协议到底有什么价值。果然不出所料，刚把福格勒释放回去，在归还珍宝的问题上便出现了种种障碍。很快，归还珍宝的行动完全停止，我们总共只得到了他们答应归还的东西中的一小部分。领事馆也只工作了3个月，随后又因某种原因而被封闭。

桑德斯的情况有所不同。英国人手头没有抢去的珍宝，所以他们没有提出交换的要求。想出了一个用他来交换被英国人逮捕的殖民地斗士或政治家的打算。当我们将这个想法通知英国政府时，丘吉尔在议会大声疾呼地宣称，他不用间谍作交易。但英国大使在向我讲到这一点时补充说，这都是漂亮话^①，不值得认真对待，并且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当时肯雅塔，现今的肯尼亚总统，被判7年监禁。于是，提出了由他交换桑德斯的建议。当我把这事告诉莫洛托夫时，他笑着说：您真是习性难改的共产国际的人。他解释说，要是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改就更加正确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一名年轻中国姑娘的命运，她在新加坡被判处死刑。人们是通过一张从马来亚游击队营地找到的照

^① 这里使用的是英文 flourish。

片认出她的。新加坡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① 当我们这项建议在新加坡公布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轰动，当地的中国居民更是兴高采烈。不久我们获悉这名女游击队员被赦免，我们就释放了桑德斯。

福格勒有好几个月成为美国新闻记者关注的中心，他毫无顾忌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甚至还写过一本关于匈牙利奇遇的书，但很快就消失在美国生活的漩涡中。桑德斯的命运也大致如此，在他获释后我有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他向记者抱怨说，英国情报机关居然如此毫无心肝，在他被释放后让他复员了，以致于作为一名普通司机要设法赚钱才能买威士忌酒来喝。还有一名间谍雅科布森，遭遇也是如此，他曾是布达佩斯国际犹太人和美国人慈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以“琼特”的名义开展活动。当他被破获时，美国报刊掀起一阵喧闹，说对他无辜进行迫害。一段时间以后，雅科布森再次声名鹊起，不过已是一名间谍学校的教员了。

1949年6月末，我率代表团去布拉格签署匈捷友好互助条约。为了使这项条约更加显得很有分量，哥特瓦尔德请我前去布拉格。代表团受到十分诚挚的欢迎，我们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与贝奈斯^②担任共和国总统时相比政治气氛已大不相同。使我极感高兴的是，我有机会再次与党的新老领导人会晤，如哥特瓦尔德、安托宁·萨波托茨基^③（我同他还在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立时期就

① 1949年根据马来亚共产党的倡议建立了解放军，英国殖民主义者投入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来镇压这支军队。当时在马来亚有大量华侨，其中不少人参加了游击斗争。

②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1935～1938年和1946年6月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48年二月革命后，将政权移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

③ 安托宁·萨波托茨基（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政府总理，1953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一起工作过)、威廉·西罗基^①、科佩茨基^②等等。为了庆祝条约签署,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我说:“我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因为1920~1921年期间我曾和现今的总理萨波托茨基及老近卫军的许多其他代表一起亲自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诞生地活动过。”我还讲到,“我们同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签署了条约,但是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约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必须预先克服过去历史上的一系列困难^③。”在谈到匈牙利的局势时,我提到党内的清洗,这一次我们在清党过程中开除了18%的党员^④。我用当时的习惯用语结束了我的发言:“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及其伟大领袖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万岁!”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人民阵线的竞选宣言中曾经许诺要搞一部新宪法,于是我们在5月末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党的领导机构再一次研究了供讨论用的宪法草案,并且在各种会议上提出了种种建议和修改意见。新宪法草案由我呈报给国务会议。这时,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可以公开宣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国家。匈

-
- ① 威廉·西罗基(1902~1971),自1945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1948年起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196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1963年因为滥用职权被当局免除了所有党政职务,1968年被开除出党。
- ② 瓦茨拉夫·科佩茨基(1897~1961),1939~1943年为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45年起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和文化部长,自1953年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③ 1945~1948年,对于在斯洛伐克境内居住的几十万匈牙利人的去向问题,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始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对匈牙利人采取了取消国籍、强迫迁移等强制手段,引起匈牙利人的极大不满,并损坏了匈牙利共产党人在国内的声誉。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3卷“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专题,及本卷“苏联与战后匈牙利”专题的档案文献。
- 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的大清洗运动是于1948年秋天,在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进行的。大约有30万人被开除出党,其中有许多人曾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

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劳动人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提请人们注意宪法草案中巩固各民族的权利，以及关于妇女和青年地位的那一部分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我特别强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我说：“要求教会与国家分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一要求早已实现……在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因宗教信仰或参加宗教仪式而受到追究。以前是这样，将来也应当是这样。”我也单独谈到了草案中涉及保护家庭权益的那一部分内容：“反动派吓唬胆小的人说，社会主义伴随着婚姻与家庭制度的破坏。匈牙利劳动人民可以用切身体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相当详细地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因为我们不仅了解这个居民阶层的作用，而且也意识到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服他们。考虑到全民讨论时提出的各种意见，我们给宪法草案增加了这样一个条款：“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对于服务于劳动人民事业的科学工作，对于反映人民生活、人民斗争和人民胜利的艺术，将给予有效的帮助，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忠于人民的知识界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国务会议和全国人民面前，我开诚布公地说：“社会主义改造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措手不及，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我们开始以优秀的工人、农民去补充知识分子队伍时，曾使他们感到不快，甚至产生某些恐惧。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而来的将是降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意义。没有什么比这种偏见更加错误的了。”我谈到，根据我们的计划，知识分子的数量将急剧增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居民阶层将更加扩大：劳动人民，即工人和农民的优秀子女将进入大学学习，而在今天以前他们是被有意识地从大学里排挤出来的。这类新的输血行动，健康的补充力量，将使匈牙利知识分子得到再生，

使知识分子的威望和作用进一步提高，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有人甚至要求剥夺各种教会的神甫的发言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接受这类建议。

我十分重视新国徽问题。1956年以后，为了证实我不尊重民族感情，有人提到1949年通过的新国徽。我说：“有些人建议保留1848年科苏特时期的国徽。宪法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从科苏特时期的国徽中去除了象征那些早就不属于1848年匈牙利的领土的标志，也取消了王冠……但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徽，如同宪法一样，必须反映现实状况。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贵族时，国徽上布满了剑和盾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如果在自己的国徽上清楚而明白易懂地反映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象征：大锤、红星、用民族颜色，即红色、白色、绿色的带子围绕起来的麦捆和金穗，这才正确。任何人一看到这枚国徽，不必解释就能知道，这是劳动人民的国家的国徽。”

有些人以传统为由要求保留‘古代’的国徽。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最为珍惜的感情保持和尊重上千年匈牙利历史的进步传统。我们特别珍惜与我们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传统。”举出历史事例加以说明后，我补充说：“新的国徽反映了对几千年来以自己的鲜血作为代价捍卫祖国但几千年来又一直遭受剥削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尊敬。”

正因为如此，在1956年反革命势力猖獗时期，反革命分子对国徽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在反革命被镇压以后，卡达尔及其一伙再次规定使用科苏特的国徽，但在有觉悟的劳动群众的压力下不

得不收回成命^①。最简单的办法是恢复1949年通过的国徽，但是这样做无疑等于承认科苏特国徽是在反革命分子的压力下恢复的。为了避免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一点，最为容易的做法是，解释说1949年的国徽没有反映出民族特色，因而必须重新设计一个符合民族传统的新的国徽。去掉了劳动的象征而代之以盾牌的新国徽，既不能反映出任何民族传统，也同样不能反映出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还想补充说明，1949年国务会议十分赞赏地通过了我关于国徽的意见。当时就决定，将8月20日^②规定为宪法日加以庆祝。……

9月份，对拉伊克的审判开始了。尽管并没有在报上发布逮捕拉伊克及其同伙的新闻报道^③，但消息不胫而走，因为在侦讯过程中逮捕了一些涉嫌人员。不久在军队里也开始进行逮捕，帕尔菲和其他一些将军被关进监狱。布兰科夫所陈述的铁托的计划不仅涉及匈牙利，而且关系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拉伊克的私人秘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叫切列斯涅什^④，以前也曾参加过西班牙的

① 匈牙利事件中，卡达尔政府发表的纲领许诺，1956年11月4日以后保留科苏特国徽，但1957年5月当政治局势稳定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确定了新的国徽，其中结合了共产党的标志（红星、麦穗）和三色的徽章盾牌。

② 8月20日是匈牙利国家创建人斯提芬一世的纪念日。

③ 关于审判的消息的在审判开始前3个月出现在报刊上的：1949年6月19日《自由人民报》报道了关于将拉伊克和肖尼——“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开除出党并予以逮捕的消息，而6月26日自公布了关于布达佩斯党的骨干分子大会和“劳动人民要求”无情地惩罚叛徒的材料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准备对付社会舆论的工作。

④ 山多尔·切列斯涅什（1909~1971），是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曾在北非的英国军队中作战，自1947年任匈牙利内务部新闻机构的领导人。切列斯涅什在回国后，向党组织汇报了关于自己在战争结束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侦察机关的接触，以及该机关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利用他在匈牙利收集情报的所有情况。在1949年5月24日被逮捕之后，切列斯涅什提供了诋毁拉伊克的供词。切列斯涅什1950年和1955年两次被判刑，1963年被彻底平反。

拉科西营，承认他是被招募的内奸（1953年后也未予平反）。这件事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应该审查曾在西班牙作过战的人。对他们也开始产生怀疑。斯大林特别提醒我说，如果在侦讯过程中发现有涉及其他党的材料，必须向苏联进行通报。我们就这样做了。为了处理这些问题，相邻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都来过。我记得，捷克斯洛伐克为此派来布达佩斯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如果我没有搞错，他叫施瓦布^①、斯韦尔马的遗孀^②和这个同志不仅有权查阅档案，而且被许可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同被捕者谈话）。也出现过不愉快的事情。在审判过程中，拉扎尔·布兰科夫在谈到铁托计划涉及波兰问题时提及哥穆尔卡的名字。^③第二天，波兰内务部机关负责人之一鲁宾乘专机来到布达佩斯，他以共和国总统贝鲁特^④的名义要求立即提审。鲁宾转交给我一封贝鲁特的信，他在信中指责我们没有及时向他们通报案件竟涉及哥穆尔卡的名字。信件卷成筒状，甚至没有装入信封。当我向鲁宾问起信封是否是他拆开的，他回答说，是他本人直接从贝鲁特手中拿到的，贝鲁特十分气愤地说，这样的问题他竟会是从无线电广播中知悉的。

-
- ① 卡列尔·施瓦布（1904~1952），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内务部副部长，在审判鲁·斯兰斯基案件时被判处死刑。
- ② 斯韦尔马·马利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捷共著名的活动家、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中牺牲的扬·斯韦尔马的遗孀。1954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为数众多的一次审判时被判处终身监禁。
- ③ 在布兰科夫的证词中，他声明说：“……南斯拉夫的代理人不仅仅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匈牙利，他们还将自己的魔爪伸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罗马尼亚他们将赌注押在了司法部长帕特拉什卡努身上，他同意执行铁托的计划，但是，被及时发现并被开除出党。……最大的指望还寄托在波兰工人党内的分歧上。他们认为，哥穆尔卡能够成为有助于实现铁托阴谋的人，但是，哥穆尔卡承认了自己路线的错误”。
- ④ 博列斯拉夫·贝鲁特（1892~1956），1948~1954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1954~1956年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47~1952年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和总统，1952~1954年是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我对鲁宾说（也给贝鲁特写了信），在侦讯过程中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哥穆尔卡的名字，我们也是在审判过程中才听布兰科夫提到这一点的。尽管鲁宾当即被准许立即亲自同布兰科夫谈话，随后飞回本国，但这一切令人不快。

在审判开始前，我同审判员和检察长谈了话，问他们是否发现在侦讯过程中有什么违反法制的情况，如对被告或证人施加逼迫的行为。我特别关心，他们是否亲自面对面地同最重要的被告谈了话。在这次谈话时，除了审判长扬科^①和他的同事以外，还有检察长阿拉比^②参加。他们安慰我说，他们处理这个案子是认真仔细的，同犯人当面谈过话，而且一切都符合程序。扬科说，他认为，拉伊克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所以据他推测，拉伊克实际上姓列依希^③。

……^④他说，他对起诉书有许多意见。我们一页一页地审阅文本，我把提出的修改意见记在匈牙利文的那份草案上。对于我不同意的问题，我们再进行讨论。这是一项很花费时间的工作。然后斯大林问，对于判决是否已经有了某种意见。我说，我和审判人员及陪审员谈过，形成的意见是没有必要判处死刑。斯大林表示同意，但随即补充说，一切取决于审判时查清问题的情况，以及对劳动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并且建议在审理结束和宣判之前再讨论这个

① 彼得·扬科（1907~1955），布达佩斯人民法庭主席，主持审判了拉伊克案件。后自杀。

② 阿拉比·久拉（1911~1976），布达佩斯国家检察院检察长，拉伊克案件以及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其他许多类似案件的公诉人。

③ 拉伊克的祖先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德意志人，在审判他时，这个细节作为确定拉伊克似乎对纳粹分子怀有好感而被提出。

④ 档案原件此处缺失一页。

问题。^① 第二天我回到了布达佩斯。^②

拉伊克的案件是公开进行审理的，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外国记者前来旁听，在公众席上有来自大企业的工人。审判并没有把为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作为重心，而主要是败坏铁托及其同伙的威信。所有的被告和证人都确认了侦讯期间的口供和材料。我曾6次亲自出席庭审，并十分认真地注视着在匈牙利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所有政治审判，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即被指控的共产党员每天都在详细而且前后连贯地（没有矛盾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同伙提出假供词。然而，经常出现与此相反的情景：被告利用种种借口否认在侦讯过程中提出过的供词。在拉伊克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1953年以后我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拉伊克及其一伙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1962年，山多尔·诺格拉迪

① 1949年9月24日，法庭判处拉伊克、肖尼和萨拉伊死刑。杰·帕尔菲案件被交付给军事法庭，10月10日军事法庭对他及其他三名军官做出了死刑的判决。在9月14日法庭审判开始之前，拉科西致函斯大林，通报了预先确定的判决：“拉伊克案件的判决后天9月16日开始。显然，在9月24日星期六将进行判决。看过材料之后，法庭主席认为，除间谍奥格涅诺维奇之外，其他人应该判处死刑。在我们看来，7个死刑判决太多了。我们认为，拉伊克、肖尼和萨拉伊应该判处死刑，布兰科夫和尤斯杜斯应该判终身监禁，奥格涅诺维奇应该判相应的监禁，而在宣判时将把帕尔菲和科隆迪交付军事法庭，在秘密审理案件之后对他们做出判决……”。直到9月22日晚上，在完成了案件审理的主要工作之后，斯大林才对这封信做了答复。在斯大林的电报中写到，他不反对这样的判决，并放弃了在莫斯科与拉科西交谈时就拉伊克问题所表达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最后的发言权是属于斯大林的，但是，决定拉伊克以及其他被告命运的主动权正是掌握在拉科西的手中。至于在他信中援引的法庭主席的意见，拉科西本人并不否认，关于判决的指示，法官彼·扬科是在宣判前从拉科西本人那里得到的。

② 根据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簿记载，1949年8月20日，拉科西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马林科夫参加了从19点到21点20分进行的讨论。从20点45分开始，出现在办公室里的还有布尔加宁，而在会晤即将结束时，也可能是为了获得与准备审判有关的指示，还邀请了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阿巴库莫夫和苏联内务部的克鲁格洛夫参加。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0卷的相应文件。

和焦尔季·阿采尔对我说，党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仔细的复查。我当时的印象是，复查的目的与其说是想查明真相，不如说是为了企图进一步给我抹黑（当然，如何复查的细节并没有告诉我）。尽管如此，有可能拉伊克及其一伙这样做的原因已经查明，但我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无所知，而且在哪里也看不到有关材料。^①

从表面上看，审判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似乎党和整个运动清除了混入自己队伍的敌对分子，并且揭露出铁托分子的真实面目。从这个观点看，审判是加强了党和工人运动。但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打开了随便怀疑的大门：在这次审判以后，要求立案起诉的申请报告如滚滚流水涌向打开的闸门，到处都是疑神疑鬼。^②。党内有数以千计的同志曾去过国外，他们都有不少“疑点”，但过去在地下工作的条件下是无法查明的，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有污点”的案件。这些人立即成为怀疑的对象。这股怀疑风对任何人都是无情的。如果相信当时送到我那里去的申请报告，那么按照这些报告中的提法，应当把中央领导机构和部长会议成员中的大部分人都送到警察局去。而一年以后，当我们对这种怀疑和“构想性”审判的浪潮设法加以阻止时，又揭发出了萨卡希奇案件，这又导致了一场对社会民主党人怀疑的新浪潮。害怕和恐慌情绪主要出现在知识分子

① 根据匈牙利有关研究人员的看法，拉伊克提供假供词，不仅仅是因为在被捕的最初遭到了严刑拷打。拉伊克最终同意参加事前策划好的审判，是因为他自信必须为党的事业服务和协助揭露铁托的“反苏政策”。

② 实际上，这种风气起初正是拉科西本人倡导的。在拉伊克审判开始很久以前，1949年6月11日，召开了揭露“反苏民族主义的托洛茨基集团”，即肖尼-拉伊克集团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内务部长卡达尔在会上做了报告，报告指出：“在拉科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两年时间里，为揭露和揭发这个集团进行了顽强的工作”。拉科西在自己的结论性发言中也明确地说：“既然杂乱无章，就去找寻原因，不可能有其他出路。怀疑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们不怕这一点。是的，在我们这里也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值得怀疑的事情，这也没什么可怕的。要做大事，就不能顾及小节。”

之中，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霍尔蒂时期和解放初期出现过某些政治上的失误，而现在则认为人们将会提起这些事。这种情况无疑迟滞了知识分子与人民民主政权接近的过程。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而由于1953年以后的错误，这道裂痕到1956年秋季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并没有立刻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是顺利的。粮食丰收后取消了粮食供应卡。在研究三年计划执行情况时，可以肯定将比原订计划提前7~8个月完成。（这里想提醒一下，1956年以后人们对每一句话都要吹毛求疵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过我们对完成三年计划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因为显而易见，在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犯错误是难免的。至于说到五年计划，情况就不同了：批评不少。）正在拟定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规模和设想无疑要大大超过三年计划，也确实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时我们准备发行第一次国债，想通过国债收集5亿福林资金，来保证计划实现。一句话，生活蒸蒸日上。

为了从拉伊克案件的审判中吸取教训和对全体党员进行通报，1949年9月30日我们召开了布达佩斯积极分子会议。

拉伊克案件的情况我是根据审判材料得知的。我的报告就是根据材料的精神讲了拉伊克案件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查出了危险的间谍。在报告中对铁托进行了特别尖锐的批评：我们对铁托及其一伙的行为十分气愤，因为在与拉伊克案件相关的事件发生以前，确切地说，在苏南冲突以前，我们竭尽全力在真诚的同志式的基础上同他们建立关系，而现在我们感到他们践踏了我们的信任。完全可以理解，南斯拉夫人因为在审判期间受到猛烈和严重的指责（而且后来得知是没有根据的指责），就对我们大肆攻讦，特别是对我本人大肆攻讦。同他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恶化了，冲突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苏联，当然还有匈牙利，以及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撕毁了友好条约，这些国家的公民把南斯拉夫颁发的各种奖项退了回去，等等。现在回顾往事，可以说，毫无疑问这是帝国主义者挑拨活动中最为成功的一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害，其严重后果至今仍能感觉得到。不难看出，渴望复仇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于是在1956年竭尽全力支持一切能够使他们以雪过去所受羞辱的行动，从而帮助了纳吉·伊姆雷^①和反革命分子。

拉伊克案件最为重要的教训之一，我认为是必须提高警惕。下面一段引文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我的讲话是以什么精神来谈论这个问题的：“联系到保持警惕问题，应当知道，敌人能够通过多么细小的缝隙打进我们内部来，又能以什么样的手段来麻痹我们的警惕性。看不到错误的骄傲自满和自以为是、个人崇拜、不能容忍批评、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警惕性不高的结果。谁没有经过常备不懈的社会主义训练，谁就不会具有足够的警惕性，因为他不能察觉出敌人利用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作为自己的武器，看不到敌人竭力利用旧的反动世界遗留给我们的反社会主义的、私有制的本能来毒化劳动人民。”

与此同时，我在讲话中称赞了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英勇斗争和所取得的成绩。当然，帝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给我们同南斯拉夫人的冲突火上加油。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其

^① 纳吉·伊姆雷（1896～1958），1945～1949、1951～1955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一系列部长的职务。1947～1949年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国民议会）主席。自1951年底担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主席。1955年4月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被免去了一切职务，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24日，担任政府首脑，因苏联的军事干涉该政府于1956年11月4日被取缔。1958年6月，受到秘密审判，被指控犯有“背叛祖国和组织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并被判处死刑。1989年被追认平反。

他情况。例如，已经知道，南斯拉夫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游击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长阿尔索·约万诺维奇站出来反对铁托，并在企图逃亡时被打死。游击战争的英雄之一、南斯拉夫空军司令波皮沃达将军转到我们方面来了。他向我们所说的关于铁托、兰科维奇^①、吉拉斯^②等人的情况证实了在拉伊克审判过程中针对他们所提出的指控。总之，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僵。

我向与会者介绍了我国经济在健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情况，以及处于准备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报告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期国债的有关情况，这期国债恰好在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前夕开始认购。这是我们第一次发行的国债，总数定为5亿福林。由于在发行前做了切实的解释性的政治工作，结果5亿福林的国债在发行第二天就超额完成认购。当然，1956年以后，这也成了我的一项罪过。“至今为止收到的消息表明，我国城乡劳动人民对这次发行国债的意义认识深刻。他们知道，在目前情况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认购国债是匈牙利劳动人民政治上成熟、准备做出牺牲、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标志……同志们自己能够看到，认购国债在全国各地无处不是以极大的热情，无处不是在节日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认购时人们以政治性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例如：‘我们不需要马歇尔计划的借款，我们自己帮助

①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1909～1983），自1940年起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委员。1948～1953年担任内务部长和秘密警察局的领导人。1953～1963年，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政府）副主席。1966年因滥用职权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② 米洛凡·吉拉斯（1911～1995），自1937年起为南共中央委员，1940年到1954年1月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批评铁托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免去了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此后，因反对铁托政权而多次遭到监禁。

自己。’一名工人说，‘我认购国债，等于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去。’还有许多得到土地的农民在认购时宣称：‘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从民主政权得到东西，而现在我已经可以多少给它一些东西了。’”……

1949年10月22日，高级党校开学。这时，我们正在筹备即将在匈牙利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急会议。^①如同前一次在罗马尼亚开会一样，会议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筹备的。为什么要如此保密（无论是会议地点，还是会议时间，甚至后来也没有公开报道过），我当时不理解，现在也同样未能理解。但是，由于斯大林坚持这样做，我们自然也就支持了他。盖伊雅捷吉奥山上的疗养院拨归开会使用。为了不引起任何怀疑，在会议开始前几周就借口必须修缮而关闭了疗养院。与莫斯科建立了直通电话联系，为了从技术上保证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11月份，会议参加者陆续到达。苏联代表团由米·安·苏斯洛夫^②率领。会议包括三项议题：第一，捍卫和平和与战争贩子做斗争。报告人是苏斯洛夫。他指出，帝国主义者鉴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发起猛烈的进攻，而为了改变事态的进程还准备发动战争。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是反对新战争的威胁，团结一切主张和平的力量反对战争。这几个月来，帝国主义者看到，苏联正在迅速地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它的实力正在迅速壮大。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使美国反动集团中关于必须通过发动新战争来阻止这个过

① 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是于1949年11月16~19日召开的。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形势问题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是于1948年6月19~23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

② 米·安·苏斯洛夫（1902~1982），自1947年起担任联共（布）、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同时1948~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对外关系部部长。1952~1953年和自1955年7月起一直是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

程的主张得到加强。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危险。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威胁相抗衡，这几个月来全世界开展了争取和平的运动，结果有约 6 亿人在要求维持和平的声明上签了名。^①

第二项议题的报告人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谈到，工人阶级的统一和民主力量的团结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主要任务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由乔治乌-德治^②担任报告人的第三项议题，是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乔治乌-德治在自己的报告中多次引用了拉伊克案件的材料，并根据当时的认识要求加强反对铁托、卡德尔^③、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的斗争，以及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警惕性。当然，南斯拉夫党的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草案措词激烈尖锐，具有谴责的性质，实际上参加会议的所有党的代表都就此发了言，讨论之后草案被一致通过。谁也没有其他的看法和怀疑。当时人们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党做了很好的工作。以后的事态表明，这种赞扬是不应得到的。

我们在政治局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考虑，要不要邀请萨卡希奇参加情报局的会议。老共产党员不信任他，怕他把会上的情况过早地

① 指的是全世界和平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卫和平的宣言（巴黎-布拉格，1949年4月）。

②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1901~1965），自1945年起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自1948年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总书记，自1955年起担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在1952~1955年，担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自1961年起担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在会议上乔治乌-德治做了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间谍和杀人犯手中》的报告。

③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自1938年起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委员，党的思想家。1953~1963年期间，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政府）副主席。

泄露出去。^① 另一方面，也无法设想，一旦萨卡希奇从报纸上得知在国内召开了如此重要的会议而他竟一无所知，又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我们决定，在会议最后一天让他参加。由我亲自把他介绍给与会者，萨卡希奇虽然意识到他参加会议的形式不同寻常因而在这背后必定隐瞒了什么，但他似乎还感到满意。会议严格保密，开幕和闭幕均不为外人所知，以致会议决议公布后，西方资产阶级报纸的主要话题是：会议是什么时间、在哪里召开的。据我所知，共产党情报局的这最后一次会议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是它却使我们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请求我在会议结束后写一篇文章，介绍匈牙利的局势和匈牙利争取和平的斗争。在这篇文章中，我援引了当时我们广泛使用的话语说：“匈牙利是争取和平战线的坚强堡垒”，并且强调指出，争取和平运动甚至在农村妇女中也已深深扎下了根，匈牙利的教权主义反动派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我提起认购国债的事，说明认购国债的250万人中，有100万以上是农民。我在文章中说到，约有25万人参观了布达佩斯的苏联电影展，这在我国的情况下是前所未有的事，证明广大群众对文化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似乎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没有必要开展广泛的争取和平运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家机构和军队就是保卫和平的。我提到和平主义者的问题，提出他们不理解，防止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十分重要的手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且装备精良的军队。联系到这一点，我提醒说，在匈牙利的南部边境，铁托分子没有办理服役期满士兵的复员，在南斯拉夫有60万人手持武器。“我们应当

^① 当时，萨卡希奇是政治局委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以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但是，作为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萨卡希奇是不受信任的。

提高警惕，我们将常备不懈。”

南斯拉夫的军队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因为我们才刚刚着手组建军队，而面对南斯拉夫的 32 个师我们一共只有 2 个师。我本人同铁托很熟悉，知道他是一个相当谨慎的对手（像波皮沃达将军这样一些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南斯拉夫同志也证实了这种意见）。但当时我并不能就此排除发生某种突变事件的可能性。一个星期六晚上，国防部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的巡逻队突然遭到南斯拉夫方面的扫射。我们的人已开枪回击。不久我又接到新的报告，说交火持续了共约一刻钟。我们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但一夜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星期天，我看到匈牙利通讯社发自纽约的报道说，星期六晚上（我们那里已经是夜里了）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贝勃勒耸人听闻地宣称：匈牙利武装力量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发起了进攻，战斗仍在进行之中，等等。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在星期日纽约各大报纸的第一版上占据了显要位置。我又一次核查了有关边境形势的消息。我得到的回答是：那里一切正常，边境线上一片寂静。我懂得了，南斯拉夫人策划整个边境事件的目的，无非是让贝勃勒有一个借口。

一个小时以后，直通莫斯科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莫洛托夫。他询问我们同南斯拉夫边界的情况，因为维辛斯基^①从纽约发去一封相当令人惊慌的电报。我安慰他说，我们这里一切正常。他问我，是否对消息进行过认真的核查。我告诉他，我们同那个边界地段有良好的通信联络，我一个小时以前还同当地的军事首长通了话。莫洛托夫这才相信了我的通报。半个小时以后，莫斯科又来电话，这次是苏军总参谋长打来的，好像是什捷缅科将军。他也是

^① 安·亚·维辛斯基（1883～1954），1949～1953 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53～1954 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询问南斯拉夫边境的交火事件。当我告诉他说这只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小规模挑衅，他还不相信在纽约竟有人如此小题大做，直到我保证说绝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他才放下心来。

这次爆炸性事件总共持续了24小时，因为我们立即发表了正式声明，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声明中指出，有人策划这次事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让联合国产生错觉。声明强调指出，贝勃勒在这类事情上颇为能干，正是这个贝勃勒在拉伊克案件审判期间因布兰科夫的证词而被揭露了出来。^① 星期一，我们的声明由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加以宣读，当然加上了相应的说明。局面立即发生了不利于南斯拉夫的改变。维辛斯基后来告诉我，在他发言以后，贝勃勒走到他面前，向他解释说，布兰科夫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维辛斯基回答说，时间一到，就会成立一个人民法庭来审理所有这些问题，他（贝勃勒）可以在那个法庭上进行辩解。在萨瓦河（或称穆拉河）地区还发生过一次冲突。南斯拉夫人硬说，在最后一次签订边界协议以后，这条河改变了流向，因而这条河的航道已不再是边界线了，于是他们对河北岸的一片土地提出了要求。人们知道，我国外交部的档案在战争期间被毁，南斯拉夫人看来是期望我们拿不出相应的载明边界线准确走向的地图和记录。由于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一带南斯拉夫和我国的军队都在集中，我们急切寻找作为边界协议附件的该边界地区地形图。我们的寻觅最终获得成功：地图找到了，地图上详细描绘着边界位置，而且有双方的相应签字证明有效。地图的标注清楚地表明，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把地图用照相复制了下来，送往南斯拉夫，并同时把地图和详细的说明在报纸上予以公布。很快，一度引起轰动的边境事件也就烟消云散了。由于

^① 在审判拉伊克案件时，贝勃勒以及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都被称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从我们方面而言，同南斯拉夫的边界是完全开放的，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任何工事和天然障碍物，特别是在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那一段更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拟订出一个工事构筑计划，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这些计划。鉴于我国军队和国家整个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上述计划，而当时又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我便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商定由一个苏联航空兵师重新部署在绍莫吉州。这样的调整部署自然无法完全保密，南斯拉夫人很快了解到这一点。从这时起边界冲突的次数开始减少，局势也变得平静多了。

1949年12月初，通过了拥有工人10人以上的（此前归私人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决议。决议规定，对企业所有者将支付赎金，而在赎金具体数字未确定之前，他们可以得到一笔预付款，但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相应的政府机关登记。我们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企业主提出要求支付预付款的申请。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决议所做出的承诺。但是，当少数几名企业主小心谨慎地提出给他们支付预付款的要求并得到了预付款以后，立即有大批人愿意仿效他们。

通过没收上述企业，我又一次发现，由于没有必需的干部来贯彻实施，在计划、设想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极大的差距。我收到不少申诉，抱怨说被没收企业的企业主常常拿不到赎金，因为负责执行决议的财政部考虑到拖欠的税款，总是把不动产估价过低，或者采用别的办法计算，使原来的企业主几乎剩不了多少钱。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卡罗伊·奥尔特。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政治局进行讨论，同时邀请有关各方代表参加，经过核查发现申诉是合理的，而财政部则如同当时所说的那样，“超额完成了任务”。我对财政部的做法表示十分不满，（奥尔特辩解说：“只不过我们开炮射击时，使用的火炮的口径比所需要的稍大了一点。”）并解释说，人民民主制度不

能不把曼弗雷德·魏斯或乌尔曼男爵^①这样的资本主义大鲨鱼同小企业主区分开来。我们立即采取措施纠正所犯的错误，但是，即使这样，后来也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不是所有的私有主都得到了他们完全有权可以指望得到的相应的物质补偿。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同被没收了企业的那些人比较接近）引起了一定的不满。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岁生日。我们在广大工人群众中间组织了竞赛来庆祝这个日子。在这几个月内，匈牙利也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把这个运动同斯大林的生日联系在一起，使这一运动具有一个新的规模。在这几个月内，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制造原子弹成功（我们当时称之为“和平闪电”），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苏联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斯大林的威望达到了最高点。斯大林的崇高威望甚至对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产生影响。苏联为了庆祝斯大林的生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各人民民主国家希望参与这些活动。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准备以生产成绩来庆祝这个日子，并为斯大林准备礼物。我们也进行了准备：日格蒙特·基什法卢迪·什特罗布塑造了一尊象征匈牙利人民的感激和尊崇之情的全身雕像。生日之前从苏联以及直接从全世界各地送去的礼品，陈列在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内。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礼品分别单独陈列。展览开幕时，气氛热烈隆重，各国代表团都参加了。参观礼品展时，我们试图判断，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陈列室布置得最美观。我们满意地认定，在这场不公开的竞赛中，匈牙利取得较好的名次。在礼品中有一只在赫伦德

^① 曼弗雷德·魏斯和乌尔曼都是匈牙利的大企业家和金融家。

制作的花瓶，是我太太的手艺。花瓶用俄文写着：“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我们设法使花瓶里一直插着鲜花，很快别人也学我们这样做了。

今天，经过许多年以后，又经历了种种变化，我仍然不时激动地回想起这次展览，劳动人民直接从世界各个角落给斯大林和苏联送来了象征着自己热爱、感激和尊敬之情的礼品。我不止一次亲眼看到，参观展览的普通苏联人心情激动地在这些无数的象征着感激之情的各种礼品面前流连忘返。

为了庆祝斯大林的生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请求我写一篇文章介绍斯大林的生平事迹。一开始我本想谢绝这个建议，因为我坐了16年牢，对斯大林的活动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但是，同志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向我提供了一本书作为参考材料，书中收集了1939年斯大林60岁生日前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写的文章，以及一批中央政治局委员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而为《真理报》写的文章。我看了所有这些材料，并借助这些材料，但又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刊登在《真理报》^①、《人民自由报》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上。

这篇以《斯大林诞辰70周年》为题的文章是借用15年前法国大作家巴比塞描写斯大林的话开头的：“我们时代的列宁、我们的最伟大和最最杰出的时代骄子，从那时以来的这些岁月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个人物的伟大。”在文章中，我几次援引了米高扬的话（大家知道，斯大林死后他180度大转弯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

^① 《真理报》没有刊登被援引的文章。1949年12月13日《真理报》刊登的拉科西的文章是《匈牙利——和平阵营的坚实堡垒》。《斯大林诞辰70周年》一文发表在1949年12月21日的《自由人民报》上。

以及基洛夫、波斯科列贝舍夫^①的话。我没有引用赫鲁晓夫的话纯粹属于巧合，因为他写的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和布尔加宁的文章或其他当斯大林在世时对他大加歌颂，而在死后则唾沫四溅地对他任意糟蹋的人的文章如出一辙。我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夸大庆祝生日活动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篇文章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我坚信，到一定时间，我的观点定会获胜。我写了以下内容：“关于看来似乎是次要的，甚至是第三等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不要忽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中产生的。’斯大林具有这样一种第六感觉，这种感觉有助于认识到不易察觉的变化，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看到种籽在发芽，便能预见到它将来长成大树以后影子投向哪个方向。如果我不知道在斯大林能力的背后有着整整一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武库，那么我就不会觉得他的每一次声明都是一种预见。1927年秋天，整个帝国主义反动阵营大肆叫嚣说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失败，斯大林却发表了预言性的讲话断言，只有瞎子和信念不坚定的人才会怀疑中国的工人、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事实……”根据多年来和斯大林共同工作的亲身感受，我充分肯定地描绘了斯大林的特点：“他所具备的洞察能力能帮助他在小事中看到大事，在发芽的胚胎中看到今后发展的全过程，这种洞察力又同高超的组织才干，同善于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本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列宁的特点。列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这恰恰发生在革命胜利后他正在筹划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际。此后所有工作的重担落到了斯大林肩上。马克思说过，只知道目标还不够，应当知道达到目标的途径。斯大林在各个方面都解决了这项任务：在各个发展阶段他都拟定了向社会主义前

^① A.H. 波斯科列贝舍夫（1891~1965），自1930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保密处主任，斯大林的助手。

进的道路。首先，他捍卫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免遭托洛茨基分子的攻击，并在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过程中实现了列宁关于可以在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斯大林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劳动的新方法、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竞赛，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盛的工业大国。为了落实列宁关于农村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他制定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斯大林宪法是应该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国家建设的范例，并在此基础上澄清了一系列涉及人民民主制度的原则问题。”

我还写了作为统帅的斯大林。当时我所写的文章与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我的文章与6卷本《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说的观点也不一致。（这本书是在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而凡是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以这本书为基础就不可能获得对斯大林所起作用的正确认识。在整整6卷中，往往只有当谈到斯大林的工作或活动中的错误时，才会提到斯大林，而这些错误又为批评斯大林提供了根据。凡是正确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大本营做的，但是人所共知大本营的领导人是斯大林。阅读这本书时不难发现，赫鲁晓夫的名字要比斯大林的名字多提一两倍。^① 照片也是如此的比例)。还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前，我本人就认识大多数苏联军事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戈罗多维科夫、铁木辛哥、罗科索夫斯基、沃罗诺夫、梅列茨科夫、索科洛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崔可夫、比留佐夫和其他多数元帅。我不止一次同他们谈到作为统帅的斯大林。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同斯

^① 据俄国学者查阅，在6卷本的《伟大卫国战争史，1941~1945》（莫斯科，1961~1965年版）前5卷中，有122页提到了斯大林，而赫鲁晓夫的名字有127页提到。第6卷是于1965年1月出版的，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个领取退休金的人了。在这一版的书中，赫鲁晓夫的名字只被提到一次，而斯大林的名字在50页上出现过。

大林谈论过军事问题。我读过西方政治家和军事家论及斯大林的评论。（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在集团军政治部工作。即使在前线的时候我也不穿军服，但是我的级别——军官证上注明为“高级指挥人员”——相当于将军军衔。我经常见到的苏联统帅和元帅当然知道我的过去经历，知道我是列宁很亲近的战友，在同我谈话时好像把我看作是一位苏联领导人。另一个情况也促使了这一点，那就是通常我身旁没有翻译，而在跟我谈话时也不需要翻译。）

下面摘引一段我所写的作为统帅的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为创建苏联军队所做的工作可以专门单独列为一个章节。在这方面，他同样表现为列宁的忠实战友，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他的军事天才早在十月革命之后随即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战争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还在保卫察里津时期，他就显示出自己的狮子般的锐利，正是这种狮子般的锐利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使德国法西斯禽兽受到了致命的创伤。作为一名统帅，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向所有的人展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军事指挥的优越性。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是苏联军队战胜了帝国主义军队，苏维埃国家战胜了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战胜了资本主义工业，集体农业战胜了个体农业，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斯大林军事科学也战胜了被认为所向无敌的德国将军们，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领导艺术取得了胜利。这种军事领导艺术，除了众所周知的战争规律以外，还考虑并巧妙地调动了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争取自由的愿望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军事武库。强大的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阻止并粉碎了法西斯分子的野蛮进攻，这场胜利的斗争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苏联武装力量用奋不顾身的战斗阻止并继而粉碎了凶残的法西斯强盗，从而挽救了欧洲文明，正因为如此，苏联才成为整个进步人类的领导者。人类的记忆永远不会忘却，全世界是怎样屏气敛息地注视着斯

大林格勒城下的大会战，以及获悉法西斯匪徒被粉碎后又是多么如释重负地置身于幸福之中。”

这些话是我许多年以前写的。从那时至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就斯大林问题所作的报告，以及随之而发生的一切，还有把斯大林格勒战役改称为伏尔加格勒战役的让人痛心的事实。今天已十分清楚，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正如同当年的波尔塔瓦会战一样，也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波尔塔瓦战胜瑞典人以后，古老的俄罗斯跨入了伟大的欧洲强国的行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可以和苏联相提并论：所有其他国家都变成为二流国家。斯大林格勒战役确实是历史的转折点，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我真希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至今还保存着总参谋部那张由斯大林亲手划上两个箭头，即导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合围德军的两个突击方向的地图。我不知道，对于作为统帅的斯大林的作用的重新评价（这在苏联将军们和元帅们的军事回忆录中已经逐渐形成）何时会得到官方的认可，或者会不会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我在1949年末所写的关于斯大林的文字，我自己从来都不曾否定过，今天我仍然肯定同样的内容。人天生是会犯错误的，我也如此，但是我坚信，我上面所说的关于斯大林的话，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不会被修改的。

在那篇庆祝文章中我提到：“感激不尽的匈牙利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是苏联和伟大的斯大林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匈牙利从可怕的死亡边缘和法西斯分子的野蛮统治下拯救了出来……我们为庆贺斯大林同志生日而带来的那些礼品，是我们民族各阶层人民，工人和农民、工程师和演员、男人和妇女、青年和老人在相互竞赛中以极其兴奋、满怀热爱的心情制作出来的，但也只能稍稍地聊表满怀感激之情的匈牙利人民的心意。”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比斯大林劳动竞

赛更好地表明，斯大林的名字对我国劳动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几个月来，我们竭尽全力想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但是很长时间未能取得显著成绩。可是，当我们向劳动者提出以义务劳动来庆祝敬爱的斯大林的70岁生日时，坚冰立即被打破了。恰如冲决堤坝的洪水一般，生产劳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好像经魔棍一指，匈牙利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当即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如穆斯卡等等。直到现在，当人们纷纷将斯大林劳动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时，劳动在我们这里才成为光荣和豪迈的事业。

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党的领导机构派出了除我以外还有佐尔坦·瓦什和米哈涅·别尔基组成的代表团。中央领导机构派出佐尔坦·瓦什是为了表彰他在监狱中坚持斗争了16年，在国家重建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主要是在担任总经济委员会书记职务时所做的工作。别尔基代表劳动农民和妇女。隆重的生日庆祝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除斯大林外，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布琼尼同志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为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台上就座的，有毛泽东、陶里亚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①、乔治乌-德治和我。一开始由于组织工作有些混乱，没有事先通知我，所以我就不想上主席台，但是米高扬走下来把我拉上台去，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就一直坐在一起。剧院里挤满了身着节日盛装、非常兴奋的代表们：除了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外，那里还聚集了伟大的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以及党、军队和共青团等等的代表团的代表。每个人都想亲自转达来自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的敬意，而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大会严格规定每个人讲话不得超过3分钟，但这个计划当即被推翻，因为外国人的祝词要经过翻译。台上讲话的人不断改换。我甚至都没法描写这些祝词所抒

^①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自1942年起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发的高昂热情、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喜悦和爱戴。西方的外交家们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难以平静下来的隆重庆典，所发生的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经过斯大林身边走向讲台，他对我说：“您一定要用匈牙利语讲。”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商定我将用俄语发言。身边没有翻译。比如，陶里亚蒂是用意大利语讲的，但当他结束讲话时，并没有人翻译。他说，那好吧，我自己来翻译，他又用俄语将所说的话讲了一遍，他以“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的口号结束了讲话。我一面走一面做出决定：开头几句用匈牙利语讲，随即转用俄语，而最后几句再用匈牙利语讲。在3分钟的讲话中，我向“我们的父亲斯大林”转达了匈牙利人民的感谢和敬意。当我用匈牙利语开始讲话时，大厅里（许多人都认识我）出现了喧哗，直到我用俄语讲话之后才安静下来。后来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俄罗斯同志告诉我，人们都在期待我用俄语致祝词，结果一听我开始用匈牙利语发言时都感到很失望。

第二天庆典继续进行，苏联最优秀的演员、歌唱家、舞蹈家、合唱队作了精彩的表演。我坐在主席团的包厢里，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中间，斯大林让我坐在他旁边，以便照料毛泽东。这并不简单，因为毛泽东当时只懂中文。在他身后站着精通俄语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履行翻译的职责。在节目之间休息时，我同毛泽东谈话，向他介绍了一些匈牙利的情况，提及民族迁徙的风暴把匈牙利人从东方吹到多瑙河一带，在匈牙利语中有几个汉语词，等等。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一切，也听着我所说的关于匈牙利工业能够向中国提供某些东西的想法。毛泽东说，希望这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正式提出来。我是生平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所以很注意地观察着他。他是一个慈祥的中等身材的男子，肩宽背阔，前额宽大，约有50岁，容光焕发，生机勃勃，手势迅速有力，有一双能洞察一切的智慧

黑眼睛。看得出，舞台上的某些节目中独唱演员和朗诵演员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比较喜欢合唱队员和舞蹈演员。而当魔术师们上台表演起各种各样的引人入胜的魔术特技时，他就完全变了样：专注地注视着他们的手法，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手势，而在每一个节目成功的表演之后高兴地、几乎是忘情地大笑。

中国大使介绍说，毛泽东来到苏联已经几周了，他能一连几天一场一场地观看苏联的影片，因为他认为这是熟悉苏联情况的最简单、最迅速的方法。当毛泽东登上发言台时，大剧院响起了肯定是从从来没有过的热烈掌声。我看出，这次庆典和这样的接待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代表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和无往不胜的革命者向斯大林致敬，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回顾了苏联和斯大林本人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当毛泽东和斯大林谈话时，以及当他面对斯大林站着时，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感觉到他对“老大哥”（他那时就是这样谈论斯大林的）的尊敬和热爱。斯大林在同他谈话时也显然十分亲热，与自己平时的举止有所不同。

关于庆祝大会本身我不准备再写了：当时的报刊从第一天起就登载了最详尽的报道和照片。佐尔坦·瓦什写过这方面的满怀激情的介绍文章刊登在《人民自由报》上。关于毛泽东，我曾多次听多年在中国担任大使的尤金同志作过详细的介绍。尤金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一名车工，最后成了一名最突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哲学家。例如，斯大林就曾委托给他这样一项任务：担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政治助手和顾问。派他到中国去是为了让他看一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究竟如何。尤金帮助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俄文版。当时，50年代，尤金极为佩服地谈到毛泽东，认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善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帝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关于自50年代后期开始同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和

恶化的情况，我在这里不准备写了，因为那时在 1949 年看到的只是积极的一面。

下面简单说一说毛泽东对待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北京大使是埃马努埃利·沙弗兰科。当时北京有几座与前奥匈帝国的实力相称的使馆大楼。除匈牙利外，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即几个“继承国”^①都对这几栋楼心存觊觎。问题报告到毛泽东那里，他当即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对匈牙利有利的决定，虽然无论从领土面积还是从居民人数来看，我们都是最小的国家。第一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黄镇一到布达佩斯，就转交给我一封毛泽东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黄镇是一名军人，这次是他的第一次外交出使，为此请求我予以特别的支持。我当然这样做了。有一次，大使本人或由大使陪同的一个代表团拜会了我，并向我转达了毛泽东的一个请求：要我对中国的政策提出看法和建议。我当时回答说，我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从远处看，一切都做得很好，并且是正确的。至于建议，那我连比较熟悉的匈牙利问题有时也搞不清楚，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敢向毛泽东提建议。

毛泽东不止一次给我送来小礼物，精美的瓷器茶具、象牙制品，等等，我相应地也有回赠。可以肯定，毛泽东仔细地听取了我对黄镇说的话。有一次黄镇受毛的委托向我介绍了中国的土地改革的情况，其中说到按照土改的规定大地主都留在原地，并给予一定的土地，让他们得以自食其力。我指出，我们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土改，我们这里做的不一定正确。（我们这里凡是少于 1000 霍尔特^②土地的地主，可以给自己留下 100 霍尔特的份地，但是很快分地的风暴把这些份地也吞掉了）。两个月以后，中国大使受毛的委托来

① 意指的是 1918 年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国家。

② 霍尔特是匈牙利丈量面积的单位，相当于 0.57 公顷。

拜会我，并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采取这个措施的原因。

1956年春天，我们不得不消除纳吉·伊姆雷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时。^① 我们的措施之一便是向苏联和中国发去一份所需商品的明细表，其中的商品在此以前只能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得，另外一份则是我们可以用来付款的商品清单。我们当时请求中国提供3000万卢布的商品，返程邮班当即带来回信，同意如数接受我们的建议。我曾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54年9月，当庆祝中国革命胜利5周年时，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前去北京，参加庆祝大会的都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特别邀请我前去，我当时正有病在身，未能接受邀请。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谁率领匈牙利代表团前去的，但后来他告诉我说毛泽东对我未能去北京深表遗憾。1956年10月，参加中国国庆盛典的是卡达尔·亚诺什和桑托·佐尔坦^② 去的。回来后桑托·佐尔坦告诉我，如果我花一点时间去中国一趟是会有很大收获的，因为他看出，中国对我怀有特殊的好感。1956年11月4日以后，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与欧洲各国共产党有所不同，对我的事情采取了克制和没有任何敌意的态度，同时还指出了铁托分子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中所起的作用。我通过三四个人的辗转得到消息说，似乎毛泽东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声明：我们当时的错误之一是，我们不加分析地接受了斯大林（或苏共）的所有建议和劝告。这里面确有合理的成分，至于毛泽东是否确实讲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无法加以核实了。

① 指的是自1953年下半年起到1955年初实行的经济政策，当时宣布放弃过度的工业化并实行了一系列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措施。自1955年春天，纳吉被免去总理职务之后，匈牙利又开始恢复到从前的经济政策上，同时把一切困难都推在纳吉身上。

② 桑托·佐尔坦（1893~1977），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匈牙利共产主义侨民中的著名活动家。自1945年起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为庆祝斯大林 70 岁生日，我们把建筑在多瑙潘泰莱的一座大型铸钢联合企业及其附近的工业城命名为斯大林城。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局进行过讨论。有传闻说，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有意把一些历史古城甚至整个州改由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例如，保加利亚人改掉了瓦尔纳市和瓦尔纳州的名字，罗马尼亚人改掉了布拉索夫市的名字等等。我认为我们不必走得那么远。于是就选中了多瑙潘泰莱，因为那里的设备主要来自苏联，又是苏联人帮助建造的，等等。当我们向多瑙潘泰莱工人提出这个问题时，立即得到最热烈的响应：劳动群众不仅表示赞同，而且为他们的联合企业将冠以斯大林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工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起义务劳动，很快开始在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请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城市。我已经不记得，由优秀的生产模范组成的代表团送交给书记处的请愿书上有几千人签了名。我们又将这项建议昭告广大社会公众，很快就得出明确结论，劳动群众热烈赞同这项建议。同时，这一活动对于开展劳动竞赛是一个新的推动力。

1949 年末，我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第一个五年计划。4 月 2 日，政治局建议中央领导机构仔细研究五年计划，因为可以观察到的发展速度表明，三年计划不需要 36 个月就可以完成，早早地甚至于可能提前到年底就能完成。在着手研究制订五年计划时，我们只拥有编制了那个三年计划中的两个年度计划的经验，而三年计划是从 1947 年 8 月开始实施的。三年计划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在于，达到并在某些部门超过最后一个和平年份即 1938 年的生产水平。在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也规定了类似的任务，即到 1950 年 8 月 1 日达到 1938 年的水平，并略有超过，即超过 8%。因为我们首先是利用资本家遗留给我们的旧的生产资料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而新的计划必须依靠创办新的企业和利用它们的产品来实现，所以我们是根据最后两年的经验来编制计划的。有鉴于此，我们每走一步都

必须依靠苏联计划专家们的经验，何况我们的计划基本上有赖于苏联的原料，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赖于苏联的设备。这就是说，涉及基本建设的所有最重要的项目，我们都必须同苏联的计划部门和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苏联经济机关事先进行磋商。

当这项工作开始时，我把整个问题都同斯大林一一进行了商谈。我告诉他，由于我们不会编制三年计划，以致我们将大大提前完成三年计划，我们又没有相应的力量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请求苏联给予全面支持。斯大林专注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表示为我们的经济成就感到高兴。他再次重申，他认为：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就，比保加利亚人或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就更加珍贵，因为在我们这里那种使匈牙利成为希特勒最后一个仆从国的力量和原因还继续在发挥作用。斯大林说，你们应当勇敢地继续前进：你们可以从我们这里获得任何物质援助，如果有什么东西必须在西方采购，你们可以得到黄金，甚至美元。他告诉我，他将向苏联相应的主管机关发出指示，要它们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匈牙利同志。我当然对这种支持十分高兴，我表示谢意后，立即把这一切通报给我们的计划编制人员，首先是格罗·埃诺。

1949年12月9日，我们把第一个五年计划^①拿到国民议会上讨论。在政治局做了最后修改之后，部长会议批准了该计划。格罗·埃诺在议会里做了五年计划报告。三年计划^②规定到1950年8

① 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工业化计划（1950～1954）是根据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制定的。计划的最初方案，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从国家的现实经济能力出发的。但根据匈牙利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1年2～3月）决议对其所作的修正即把重工业生产增长提高了三倍，使该计划未能完成。结果，匈牙利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4年5月）未能通过下一个五年计划，而不得不宣布1955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准备年。

② 经济恢复三年计划预定从1947年8月1日至1950年8月1日，最后只用2年5个月便完成了该计划。

月 1 日，工业生产水平超过战前最后一年的 27%。但到 1949 年底，工业生产已比 1938 年高出 40%，而且许多部门，其中包括钢铁，已超过战前最高指标。在农业领域，三年计划的任务是，接近战前 10 年内农业生产的平均水平。在制定计划时，这一指标显得是很大胆的，因为在战前，大地主的生产平均要比农民生产高 25%，而现在这些土地都掌握在新主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手里，他们没有地主的生产工具和经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结果：农业生产实际上到 1949 年底几乎达到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使我们能够取消食品凭本供应，稳定了食品价格。让我们看看，这在数字表示中意味着什么，准确的统计学家们查明，按原计划规定，到 1950 年 8 月 1 日，投资额为 65.85 亿福林，而到 1949 年底，按不变价格计算，基本建设已集中 78 亿福林，即增加了 18.4%。

按计划，到 1950 年 8 月，生活水平平均应达到战前水平，甚至超过 8%。而结果是，到 1949 年底，生活水平已超过战前 37%。战前 10 年对肉的年平均需求是 23.7 公斤，而 1949 年达到 28.5 公斤。对糖的需求由 9.25 公斤增加到 17.6 公斤。对卷烟的需求几乎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死亡率在下降，人口和学生的自然增长率在增加。一句话，所有领域都出现了积极的结果。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生活水平超过计划水平的 30%，这一事实自然是好的。但这一数字本身也表明，我们没有把领导经济坚定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生活水平超前了。由于我们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靠的不是提高战前的生产能力（很多领域的生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靠的是 300 万乞丐^①，他们以前找不到工作，每年损失

^① 在一些文章中，称 30 年代的匈牙利为 300 万乞丐的国家。当时最贫困的居民阶层——无地的贫雇农、季节农业工人和失业者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数亿个工作日，现在他们参加了生产，工业部门结束了失业现象，所以说，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上不是充分巩固的。提高劳动工资，同时减轻劳动定额等要求以闻所未闻的自发力量出现了，如群众希望生活得好一些，希望在长期贫困之后改善生活水平。我们年轻的、还不成熟的经济机关当时还不能对抗这种自发势力。许多工人出身的厂长以及知识分子的代表，不能站在整个经济利益的立场上对待这个问题，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努力把生活水平的提高控制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所确定的限制范围之内。听到生活水平提高37%，我立即就说，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当时我开始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提醒人们，“我们正在宰一只下金蛋的鸡”，或是正在炸一只未来可能下金蛋的鸡。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在我身上突然发生了什么，而在1956年之后，首先是那些不懂经济的人，对我这只下金蛋的鸡说了不少可笑的话。

众所周知，1952年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原因首先在于，春天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霜冻，而夏天又发生了战后最大的旱灾。因此收成大大减少，比上年歉收33~35%。这一生活水平的提高，1953年后经常作为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不周的例子被提及，而且后来也被多次引证。至于三年计划也编制得不好——因为从各个方面看我们的指标都定低了，却从来无人提及。而且也不提出发点——1949年的生活水平比原计划提高了30%，因而比较的基础是不现实的。

谈谈我们的统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53年底或1954年初，公布了统计局关于1950~1952年生活水平的通报。我被其中的统计数据惊呆了，按照这些数据，实际工资，即工厂工人——从阶级的观点看是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如果以1949年为100%，那么1950年上升到107%，而1952年则下降到85%。我找统计局局长焦尔济·皮克列尔谈话并问他，他们根据什么计算出

生活水平下降 22%！如果我没记错，皮克列尔是这样说的，这一结果是根据挑选的 1500 家的调查数据得出的。我详细地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开始要求减少 22% 的面包，肉和糖？或衣服、住房、交通涨价这么多？原来问题不是这样。还查明，整个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也没下降这么多，因为工作人数增加了许多，准确些说，增加了 15 万人。在统计过程中，歉收被摊到整个国民经济头上。经过进一步盘问，我查明粮食价格是根据收获前几个月的价格计算的，这几个月价格最高。我弄清了为什么这样做。这些数据是有人向皮克列尔索要的，目的是显示生活水平的最大降低。我责骂了皮克列尔一顿，并警告他，以后数据应反映实际情况，不能为某些索要者服务。而且我没要求作任何更改，因为当时生活水平已大大好转。顺便指出，两年之后，在经互会的一个小册子里公布了人民民主国家生活水平的比较数据。原来，在 1952 年，罗马尼亚和波兰生活水平也下降了。

但很快提出了修正：两国代表通报说，尽管经互会的统计数据是根据各国统计局的原始资料制定的，这些资料属第一手资料，但生活水平并没有降到以前指出的这个水平。1956 年夏天我们把这一矫正问题提到政治局，《自由人民报》主编霍瓦特·马尔顿也以主编资格出席了政治局会议，他建议重新讨论这些资料。但当时我们有不少其他事情，于是我说，我们最好把精力用到其他方面。结果保留了以前的数字，从而为说我们经营管理差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在 1949 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我们总投资为 350 ~ 350 亿^① 福林，而且见了报。这发生在我们打算到 1950 年 8 月 1 日完成三年计划的时候。但是，由于这一计划不仅能完成，而且将超额完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于是在 1949 年，自然提高了初始基

^① 原文如此。

数。因为国民收入也迅速增长，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在劳动生产力增长方面也呈现出新的后劲。所以，在其他辅助因素的基础上，最终投资数额确定为509亿福林。工业生产5年里应增长86.4%，农业生产应增长42.2%。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7.2%，这一指标显得不算高，因为1949年增长拟为28%，生活水平按照计划应提高35%。按照计划，考虑到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划拨80亿福林。这一数额加上满足农业需求的其他投资，达到125亿福林。

在今天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绝对数字显得很保守。但当时这些规模，至少在我们眼里，显得很巨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使习惯于大手笔的苏联顾问们感到振奋，5年里钢产量从89万吨提高到160万吨，这没有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一计划的指标和前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例子，他们明白了社会主义生产给他们提供了多么大的机遇。

在农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影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发展产生矛盾，只是我们不少时候没有预先看出它们是什么样子。当1945年分配土地的时候，一些在农业领域，准确地说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服务的“大”专家们已失去根基，他们在新主人小农户的份地上不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尽管这时农民们非常需要这些知识。所以，由于没有工作，农业专家们转到了其他部门。他们一部分人得到了土地并企图在上面生根，但总的来说，这一重要阶层离开了生产领域，而且在分地后的最初几年甚至看不到前景。我们企图寻找临时解决办法，但不能根本改变形势。但现在，当计划规定迅速发展生产合作社，从而建立现代大商品农业之时，这一阶层的前景立刻出现了，比国营农场给他们的影响还大。

我的任务不是详细叙述五年计划的细节，但某些东西也应提一

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突然的：存在许多我们几乎不知道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预见的因素。这不仅涉及农业，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向生产合作社过渡有多大把握，为此必须规定多少投资。在许多计划指标后面隐藏着一系列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或由于没经验，我们不能预先知道它们。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只为“尚未准确确定的投资”拨款 250 亿福林，为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拨款 330 亿福林。

计划里没说国防费用的增长。这有一些原因，首先当时我们没有明确的国防发展的概念，准确些说，这方面的概念还不确定。和平条约只允许我们保持一支不大的军队，当时它的费用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大，为的是不妨碍完成五年计划。正是因为规定可有 6 万部队的和平条约批准才 2 年，所以计划里没提扩充部队的费用问题。一年之后，确切说是 1951 年 1 月，华约各成员国^①为加强冷战，对付北约挑起的军备竞赛，开始增加部队数量（确定匈牙利部队增加到 15 万人），从而打开了未预见的花费闸门。在制定五年计划时我们不可能考虑到这一点。

计划中没有规定要发展必要的国防工业，尽管国际紧张局势要求在这方面采取措施。一句话，我们没考虑同国防迅速发展有关的费用。坦率地说，当时我们甚至不知道，拥有汽车、坦克、喷气式飞机的现代化军队其发展数字意味着什么，结果在通过五年计划 13~14 个月之后，开始消耗而且是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消耗未列入计划的几十亿资金。

但那时，1949 年底，这些乌云还未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地平线上出现。国内情绪是非常乐观的，五年计划的目标——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触及到匈牙利每一个劳动者。

^① 华沙条约签订于 1955 年 5 月。这里表述有误。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退休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党顺利地说服了人们，坚信国家正着手解决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任务。这成为目标，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家带着这些任务进入了1950年。

1950年开始了。全国像受惊的蜂群一样动了起来。重要的是关注广泛掀起的斯达汉诺夫和突击手运动不夭折。农村开始建立生产合作社，因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建起了机械拖拉机站，出现了国营农场。去年到苏联访问、考察过集体农庄形势的农民代表团成员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他们不得不在千百次会议上讲演，回答无数的问题。如果有姑娘开拖拉机，那么整个村则分成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反对。五年计划首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由于没有经验，这些计划经常变动，造成麻烦。一些变动常常是国际形势变化引起的。例如，斯大林城^①开始我们计划在莫哈奇市附近建设，因为这里离苏联克里沃罗格铁矿和迈切克^②焦炭煤最近（通过多瑙河大桥）。当建设顺利进展的时候，发生了同南斯拉夫的冲突。很快提出在离南斯拉夫边界几公里的地方建设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是否正确的问题，那里每天都发生边界冲突。不得不做出决定，停止已开始的建設，在这里建设另外的工业项目。经过长时间讨论，我们决定在多瑙新城村地区建一个冶金厂。出于同一种考虑，改变了塞格德城的发展计划：我们决定只在那里建轻工业企业。

全面高涨导致以前根本或几乎没见到过的问题突然变成了现实的问题。艺术开始了全面发展，科学出现了高涨。犹如雨后春笋一

① 斯大林城——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工程之一，1951年11月为庆祝多瑙城冶金企业第一期工程投产而以斯大林名字命名，在此之前称多瑙城，1956年之后称多瑙新城，现在又改称多瑙城。

② 迈切克煤田位于迈切克山地，匈牙利南部，靠近匈南边界。

般，文化之家、图书馆不断涌现。艺术家们、电影和剧院管理部门频频向我们进攻，他们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追回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失去的机会。他们怀有健康的兴趣，心怀各种发展计划，自然要求物质援助。当提出建立新电影院、修复费斯季^①透景画和其他诸多项目计划时，布达佩斯还有被破坏的桥梁未被修复。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诸多未做的事情，我只是在1956年之后才知道，这时可随意给这一时期抹黑了。为了实现当时各方面提出的无数建议，工人们即使长十只手也不够用。

而且，有时还出现突然的困难。我们感到很骄傲，我们顺利地修复了全国主要道路上的桥梁和高架桥，但军队同志们突然告诉我们，在修复桥梁时，没考虑到新重型坦克的重量和尺寸，因此有的桥梁需要重修。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梁根本未列入我们的计划，但出于考虑，必须建造。还应建科马罗姆多瑙河大桥，尽管它的修复完全可以推到以后……

1950年初，为了五年计划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经过详细准备之后召开了农业生产队和机械拖拉机站劳动者会议，以及斯达汉诺夫分子会议。为动员全党我们召集了中央领导集体全会，为召开此次会议准备了几个月。我同生产小组和机械拖拉机站的代表们认真地讨论了过去一段时间所积累的经验，讨论了成绩和缺点，还指出了今后发展的路子。类似的会议这还是首次。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因为这是详细了解新运动的最佳机会。有意思的不仅是发言，休息时的会见以及吃饭时同一些人座谈也使我了解了不少东西，因为在这种场合，代表们说话都没有拘束。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一运动没过两年已广泛地推广开来，深深地扎了根，有了众

^① 纪念匈牙利人来到喀尔巴阡地区的透景画，由画家阿尔伯特·费斯季（1856～1914）于上世纪末完成；毁于1945年初强攻布达佩斯时。

多追随者。会议气氛非常友好热烈。大部分发言人和报告人不是职业演说家，但他们的发言反映了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活经验，首先是他们的喜悦心情：经过如此的怀疑和动摇不定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之路。

在会议结束工作的那天，1950年1月21日，我发了言。在给会议作总结时我指出：“大部分发言者都从指出运动的第一阶段他们不得不克服的巨大困难开始自己的发言。”他们讲，他们是怀着怎样的疑惑和踌躇心情走上了这条路——集体经营之路的。所有发言者都异口同声地这样结束自己的发言，过去几年各方面的总结使他们坚信，他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惟一一条引导他们摆脱昔日贫困的道路。发言者们还异口同声地说，背弃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在我前面发言的纳吉·约瑟夫娜说，她现在想起未入社以前她所处的状况都可怕。另一名同志也声明，给多少钱他也不回到以前单干的路上去了。

在指出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之后，我还特别指出：“团结在合作社里的农民，正如这个讲坛上的发言所证明的，不仅看到了经济成绩，而且还为他们是首创者、在为别人开拓着道路而感到自豪……工作在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现在深刻意识到，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保障，可以对明天充满信心地工作了，对于他们来说，对明天没有信心，经常担惊害怕的旧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弱肉强食的可怕时代过去了”。

我指出了新的发展过程所引起的现象。这些现象随着合作社运动的诞生很快便显出来了。“在这种气氛里，农民的生产力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两三年之前每个人只为自己盘算，其生活准则是尽量捞。联合成生产小组的劳动农民完全是另一种观点。这些农民的视野宽了，同工业工人一样，他们知道个人命运是同整个国家的命运相互联系、相依为命的。他们成了新人，在生产过程中，他们看待

事物的眼界开阔了。如同工业工人一样，站在机器车床旁，现在想的是如何更合理地利用设备，增加生产；现在在多数农业生产小组里，社会主义农民想的是如何扩大生产，怎样更多更好地生产。他们进行试验，探索哪些新的作物可以栽培，哪些新的生产方法可以利用”。我还列举了谈论类似事情的代表们的姓名。

我请与会者注意其他一些新现象。生产小组的成员们不仅考虑个人的直接利益，在我们这里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利益的最可靠途径是增加合作社的财产。洛松齐同志（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讲，巴奇村“红星”生产合作社积累了增加合作社财产的丰富经验。约瑟夫·科尼同志说，生产合作社的成员们决定，宁可暂时受穷，但每人拿出10万福林增加合作社的财产，因为他们明白，这一投资很快会得到厚报。

在会议上不难看出，给生产合作社定调的是最贫困的农民阶层。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及在土改中分得地的农民，在我们粮食还不富裕的时候，加入合作社时没考虑个人的得失，须知当时他们拿到市场上的东西立刻就能找到买主。最先入社的人的功劳非常之大，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走上了这条陌生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同旧的传统和习俗决裂。相当一部分农村保守势力反对他们，威胁恐吓他们。走上新的经营道路也使许多家庭产生不和，因为有的丈夫反对，而妻子赞成。这些农民在各方面都是逆水而行，只有经常帮助他们，而党本身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先驱者们是完全值得赞颂的。

除成绩之外，在这次会上自然也谈到了错误和缺点。缺点首先在于劳动报酬问题。某些地方实行平均主义，结果劳动好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还谈到了收成低，合作社里年轻人和妇女少的问题。“本次会议成员也表明，生产小组里妇女少，尽管每一位发言的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洛松齐和瓦尔加同志强调指出，吸引妇

女加入生产合作社可带来明显的结果”。

我自然谈到了盲目乐观。“生产合作社的成绩如此之大，在合作社工作的同志们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心，因而对敌人和我们面前的困难估计不足。可以预言，如果我们沾沾自喜，如果我们安于既有的成绩，敌人就会重新聚集力量掐住我们的咽喉”。我谈了富农反对合作社的斗争，结合会议过程中举的例子，我指出了富农在这一斗争中如何行动，他们如何钻进采办机构，钻进育种农场，他们如何伺机行凶和纵火。我说，“所以，无论成绩多大，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不应安于既有的成绩……对于生产合作社的行动，在今后许多年里，周围的人都将密切地窥视着，都企图颠倒黑白，把芝麻说成西瓜。如果生产合作社有一霍尔特玉米没有种好，就足以使富农把它宣扬得全省都知道。生产合作社主席没有很好地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合作社的财产，或靠损害合作社自己发财，那么就会给整个生产合作社脸上抹黑。生产合作社每一名成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是未来的开拓者，都应该给全体匈牙利劳动农民做出榜样：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

我详细谈了学习问题，因为可以看到，再过1~2年，知识不足将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之一。在这次会上我已谈到，埃列克村生产合作社有耕地1200霍尔特，已决定耕种面积不超过1500霍尔特，因为现在的领导人没有能力领导有更多耕地面积的合作社。我详细谈了机械拖拉机站的作用和活动，谈到机械拖拉机站有1霍尔特土地耕作不好会带来多大危害。在讲话结束时，我谈到了国家对合作社的援助问题。“合作社里尤其令人高兴的事是，它们努力尽快站起来，尽量少靠国家援助。一位发言者讲，他们不想永远依靠政府。自然，政府乐意无条件地扶持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正确的思想是，首先依靠自身力量的生产合作社才是最有力量的生产合作社”。同时我还讲到，我们首先打算在农业机械和拖拉机方面保障

生产合作社。我还通报说，1950年我们打算向苏联派一个200人的农民代表团，以便让更多的农村劳动者能够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农业的最新成果。我是这样结束自己的讲话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好好工作，不骄傲，不安于已有的成绩，那我们将逐步地遵照自己的信念，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使所有劳动农民走上这条道路。”

这次会议不仅总结了在此以前的经验，同时还赋予合作社运动以新的力量。只要注意到会议召开的日期，就会发现，那时正处在被今天称之为个人迷信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领导人似乎已脱离群众，安于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听取群众的意见等等。客观的历史学家将面临复杂的任务，如果他把这些指控同事实相对照。这些年我到过全国（从尼尔舍格到佐洛州）^① 很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

我最后一次到巴尔奇村“红星”合作社和伊叶士·久拉歌颂过的拉察格列什村“草原上的人们”合作社是1956年6月。关于这些访问报刊上没出现一行报道，因为这也属于个人崇拜。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是完全对的，因为通常指出在这些访问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对别人并无害处。但我们没有经验，同时我也不喜欢记者、摄影师、电影工作者在场，因为这妨碍工作，使访问太正规，组织一些不必要的招待，破坏访问的自然气氛。同我一起访问拉察格列什村的是道比·伊斯特万，他当时任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我们驱车到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找到社长勃留尔。从猪舍到学校，他带我们参观了整个合作社。饭后（吃的土豆和红辣椒）在他的新家里举行了座谈，交换了参观的印象，讨论了今后的任务。这时田野上的工作还在平静地进行着，只是以后社员们才知道谁到合作社来过。自然，我们没带记者。

^① 尼尔舍格——匈牙利东部州；佐洛——匈牙利西南的一个州。

说到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这里还有一段往事。每次斯大林和我谈话，可能和其他同志谈话也是这样，总是表现出健全的思维和客观的态度。当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考虑到你们的农业比我们发达，而农民居住和其他生活条件都很好，您是否认为，这些参观有助于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于是我回答说，匈牙利农民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听了许多关于集体农庄的坏话，因此参观后他们的印象可能是积极的。此外，我们的农民对任何东西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考虑的和想看到的不仅是集体农庄现有的东西，他们还想看到集体农庄的发展前景。当然，我又补充说，如果给他们看看搞的好的集体农庄也不错。斯大林考虑了一下，转着手中的烟斗说：“好，您说的对”。我们一开始向苏联派去的不是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但从苏联回来之后，他们都参加了生产合作社或自己组织了这样的合作社，总的来说成了这一思想很好的宣传者。我经常同到过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们谈话。我给维雷什·彼得^①也提供了这种访问的机会。（他描写这次访问的书，自然有给我的赠言题记，伴我渡过了流放之旅）。

但出现了一次意外。一个大的代表团在莫斯科被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分赴几个集体农庄。不知是搞错了还是出于故意，一个小组被安排到中亚访问，在那里代表团成员吃惊地看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农村的土房子，既没抹泥也无窗户。该小组回国之后，没有一个人想加入合作社。这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我过问了此事，警告今后再派代表团时要杜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我很乐意同从苏联回来的代表团们座谈，因为我对他们看到的

^① 维雷什·彼得（1897～1970），作家，政治家。1945～1949年任国家农民党主席。1947～1948年任国防部长。1954～1956年任匈作协主席。1951年到苏联旅行，后发表《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采访记一书。

东西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在 1945 年之前，我只到过集体农庄两次。我第一次到集体农庄是在 1941 年，那次是到离莫斯科 180 公里的改良水渠建筑工地参观。这一工程是几个集体农庄一起搞的，集中了 15000 人。当我从汽车窗子里看到了田野上的情况之后，我明白了多么需要修建这一水渠。在几十公里干旱的土地上，绿草如茵。在群众大会上我给聚会者谈了国际形势（这是在战争前夕），但关于集体农庄的生活和活动我未做任何观察，因为当天夜里我们就赶回了莫斯科。第二次是在巴什基尔集体农庄，因为疏散到乌法的部分外国共产党员必须安置到附近的农村去，考虑到我的俄语知识，这个不轻松的任务放到了我的肩上。农庄非常富足。我只在库班见过如此肥沃的土地，但详细地研究集体农庄的生活，这次我也没有时间。再说时间也不合适，因为所有的男人一律都到前线去了。所以 1945 年之后我带着很大兴趣听取从苏联集体农庄参观归来的农民的汇报。但是，有一次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如果译员的翻译都是正确的……”

这种意见我记在了心里，于是我决定，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即邀请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到匈牙利来，具体说，就是邀请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人。赫鲁晓夫向我夸奖过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人。他说，1945 年之后，在有匈牙利人生活的居民点，较乌克兰人生活的居民点集体农庄建的顺利，建的快。（我甚至想到，大概对他们施加的压力比乌克兰人大）。赫鲁晓夫向我特别夸奖过种玉米的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人，其中包括扬名全国的安娜·拉达妮。她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斯大林时，他沉思起来并以探索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我善于看透他的意思。他在掂量，这一不大的请求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是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我多次在斯大林面前提出在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家所居住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而且我总是这样提出问题，以至使他

产生这种想法：在这方面我是否越过了共产主义界限)。但我向他说明为什么提这一要求时，他同意了。他说，农民对世上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因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屡遭欺骗，以致怀疑成了他们的天性。关于斯大林对农民的深刻了解，1948年在签署友好条约之后在招待会上讨论这一问题时，维雷什·彼得对我讲过。

显然，在这次成行问题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看法是矛盾的。斯大林立刻明白，对一切事物持批判态度的匈牙利农民，将权衡集体农庄的前途并将以此为出发点。对此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表示过讥讽。他说：“我到过匈牙利，亲眼看到，你们那里的农民生活得很好，房子、家具都不错，所以不应该派这些农民到我们农庄来，因为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東西将打消他们加入合作社的念头”。当我对他说，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毫无掩饰自己的怀疑态度。同样，下述情况也同他这种态度有关：我请求赫鲁晓夫派一个外喀尔巴阡匈牙利人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团到匈牙利来，结果他派来的代表团不是由匈牙利人组成的，自然这没有带来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赫鲁晓夫清楚苏联人生活的一切细节，其中包括农民的生活，庄员们的生活。但他不会辩证地看待问题，不能脱离本土，所以他不信匈牙利农民在看到现实情况之后，其中包括一些消极因素，能够更深入地看待它们，甚至看出它们的前途。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深信，斯大林晚年所做的一切都不好，拼命寻找他的错误，甚至吹毛求疵。我有机会看到，努力促使赫鲁晓夫坚持这一思想的是贝利亚。

正如上面提到的，我本人对集体农庄确实是一无所知。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除其他罪名外，1956年之后给我加的罪名中还有一条，即不考虑匈牙利条件，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匈牙利。坦诚地说，我想平静地承担这一罪名，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我们没有好的经验，至于照搬，毫无疑问应允许有一定的机械重

复；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承担莫须有的罪过。1945年，在我回到匈牙利之后，我不了解苏联的经验——无论是农业方面的，还是工业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所以我不能照搬这一经验——无论是机械地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批评我的人们忘记了，1940年之前我在霍尔蒂监狱里关了15年。可以相信我的话，在这些监狱里，我没有机会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1940年我最终获得释放时，我想一头扎在新材料的烟海里，开始学习15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但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辅导员的季米特洛夫（关注一切的斯大林亲自请他做我的辅导员），看到我的意图后进行了干预。季米特洛夫说，1934年他从希特勒监狱里出来之后，他曾想填补坐狱期间所出现的知识空白。结果，季米特洛夫说，各方面向他“进攻”：请他讲课，出席群众大会，写文章，等等。结果是，季米特洛夫说，由于过分劳累他得了一场大病。尽管他身体结实，宽肩膀，身材高大。季米特洛夫说，他整天感受到出狱后不懂工作方法的苦恼。季米特洛夫说，“您经过15年监禁之后特别要注意健康”。而且在到苏联之后的第一阶段我也没有机会学习，因为医生们把我摆弄来摆弄去，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又把我送到普通疗养院疗养了几周。这样，一直到1941年2月底我才开始工作。这一时期，我研究的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是共产国际、匈牙利共产党问题，还有匈牙利侨民问题，以及关押在法国集中营里的拉科西营的战士问题。4个月之后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无需证明，在这一战争期间，我还有比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更为迫切的其他任务和其他事情。我必须补充一点，假如我有这种可能，假如我进行了这一研究，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从事的是不需要的事情，因为很清楚，战争胜利之后匈牙利的首要任务，不是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是在此之前的东西——夺取政权。一句话，我不能在解决日常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苏联的经

验，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它，我仅仅知道比如说生活在巴黎或纽约的每一位有修养的共产主义者所应该知道的一般的发展方向……

我提前插几句。在庆祝党诞生50周年之际^①，为总结党整整半个世纪的活动写了一批文章。在这批文章里，摘引了我60岁寿辰^②祝词中的一些词句，其中例举了我所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倾向是当时在所有问题上只有一人表现出主动。我当然记不清祝词中列举了我哪些主动。但我清楚地知道，在党的领导班子里，我的工运“年龄”最长，所以我的年龄最大，最知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熟悉几十年来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我坐过监狱，在共产国际领导集团里工作过，一句话，我与其他的人相比最有经验，不仅从书本上而且从直接的源头上懂得列宁主义：所以选举我为总书记。因此我可以表现出更多的主动。在我那个时代，主动是总书记作用中绝对的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我希望现在也是这样。

由于我党在欧洲是惟一的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没有一天是合法的党，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从头做起。必须建立中央领导，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部和相应的州和地区机关。必须关注这些机关正确地执行职能。国家可以乱作一团，把百余年千余年的建制搞个底朝天，但政治局是稳定的，它的会议每周一次，定时召开，会上通过最重要的——集体的——决定。在这些会议上不允许吹牛，不允许空谈，发言言简意赅，深思熟虑而有内容。主要问题事先由专门小组或专家准备好。最重要的问题在每季度召开的中央领导全会上讨论。还经常邀请旁人参加全会。形成了一种做法，在中央领导全会上，被邀请的人通常比中央委员多。政治局会议也有这一特

① 即1968年。

② 拉科西六十寿辰是1952年3月9日。

点。这样做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好处，因为个别被邀请的人努力炫耀自己的知识，或认为事情同某些未被弄清的人有关，发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是，由于这对我们是一个好学校，好处大大超过了浪费的时间。除会议和每月党的活动日外，主要问题还拿到全匈牙利会议上讨论。斯大林非常关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党的生活，不时根据苏共中央收到的记录看某些党日程上出现的基本问题，看是否开会，对决定的执行是否实施监督。可以肯定，在这方面他对我党没有意见。

谈谈我的工作。由于从1925年起我坐了15年多监狱，然后又在苏联度过了4年，所以我必须补上这些年未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这里说的是严肃的事情，不能每次当问题找上门来都推说坐监狱。所以工作应该集体去做，所有重要问题解决都是共同研究。定期会议和党领导机关的系统工作保障了这一点。1953年之后我听说，在苏联已经13年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时5年不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常常被投票表决所代替。我不知道其他党这方面情况怎么样，反正在我们匈牙利没有这种事情。我如果不想经常犯错误，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其他人也不是不需要这么做。我还必须尽量多地常到群众中去，因为这帮助我挽回我失去的东西。紧接着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感到在任何地方也没在群众之中好。如果有人统计一下，这些年我到过哪里，那么大概会得出难以令人置信的数字。由于很快得知，在收到我到来的预先通知后，工厂、机关、合作社“临阵磨枪”，我尽量突然出现。1948年陶里亚蒂遭到暗杀。^①因此，斯大林下达指示，检查各人民民主国家对第一书记的保卫状况。结果查明很不得力。根据这种状况，国家安全机关要求

^① 1948年7月14日，当时身为意大利议会中共产主义党团主席的陶里亚蒂遭一名右倾过激分子大学生暗杀，身受重伤。

关于我的突然来访也要事先通知，以便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有一次我决定到位于山坡或地下的军工厂去看看。因我听说那里违犯制度。等我驱车两个小时突然到达后，没有发现任何缺点。两天之后我才得知，我驱车两个小时这已足够了；等我到达时，已把有问题的生产车间入口封死了。在这种突然到达的情况下经常是：在州委会里只有打字员，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都到田里去了，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成行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碰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在绍莫吉州一个农村，我顺便走进一家合作社商店：柜台很脏，售货员们正来回溜达，几乎不注意顾客，对我也是一样。当我同一名售货员说此事时，他不满地问我：“怎么，您是监督员？”我回答说，“是监督员”。这一位售货员不满地瞥了我一眼，对着门大喊：“这里来了一位监督员”。商店经理进来了，喊着叫我拿出个人证件。当我拿出带照片的个人证件时，主任开始结巴了，说他立刻认出了我。呆在商店里的妇女们也以怀疑的目光接受了我突然出现在农村商店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谈话总是显得很有趣和直接。

有一次，如果我没记错，是在包劳奇考镇，我同伏罗希洛夫元帅乘车同行，同我们一起的还有作家 B. 波列伏伊。车子从一个大牲畜市场旁经过。我们停下来，下车走近人群。我当翻译。围拢我们的人群中一名妇女喊到：“这是拉科西同志！”我问她怎么认识我。只见她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钱包，从中拿出了红色的党证。“您看我从哪儿认识您！”她显然地自豪感地说。旁边的商人和农民们惊奇地观看着这一幕。这种情景出现过无数次。一次在陶陶巴尼奥，清晨换班时我来到矿井，一开始人们没认出我，我不慌不忙地同走出浴室和洗衣服的矿工们交谈。过了愉快的 15 分钟还没人认出我来，但后来很多人怀疑，我怎么如此突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种现象不断出现，我经常突然出现在收割或除草的农民中间，或走近和牧羊人聊天。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是自然的，没有拘束。对

于我来说，这要比冗长的关于群众情绪的报告有意思得多，有益得多。每个月——或在布达佩斯，或在某州某个地方——我要亲临一次市场，接触一下顾客；在这种情况下多发生一次不大的聚会，这时人们自然说出心中各种牢骚、建议和意见。1954年夏季之后我病了，遵照医生的要求我被迫改变这种工作方法，尤其减少了出行的数量——因出行时必须起早，但我还是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我也参加部长会议开会，因我还兼着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①部长会议每周一次，会议日程提前拟好，每一个问题都请报告人和专家。这里还有严格的和详细的工作程序，必须保证对问题准备好和讨论好。这一切意味着，我经常同很多人打交道，听取各种意见，“脱离群众”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的工作方法不能容忍这一点，会议日程上经常提出所有重要的问题，认为我不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不能容忍反驳或迫害勇敢的发言，这纯属天方夜谭。会议记录整理得言简意赅，这也是我的严格的工作方法的一部分。后来在记录里不仅写上出席者和被邀请者的姓名，还记录他们的发言。只要看一眼这些记录就足以确定，对某个问题有多少人发了言。我还要补充一点，领导机关和工作机关——这不是辩论俱乐部，大多数发言者不仅证明了集体工作的情况，有时还能证明对问题准备不足。我总是努力追求让所有想说话的人说出自己的意见。后来我注意到，如果我第一个发言，那么被邀请者就会感到拘束，尤其是我发表的观点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所以我改变了策略，尽可能在会议后期，在讨论完了之后或形成决议的时候讲话。这成了我的习惯，例如，假如我第一个发言，那我要附带说明，这样做是违背形成的规则的。

^① M. 拉科西作为党的总书记，1945～1952年兼任国家部长，然后兼副部长，1952～1953年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1956年之后对我百般刁难，吹毛求疵，企图证明我们做的一切都不好。这显得很容易，因为当时不可能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诬蔑和不公正的指责，甚至今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不可思议的“指责”不仅来自临时派来工作的记者，还来自“历史学家”和文学工作者。例如，政治局委员、院士、历史学家И. 内梅什^①指责说，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排除了吸引昨日富农的一切可能性”，“这种政策好像是阶级斗争的政策，……但实质上是胆怯的政策。胆怯，即在各种危险面前退却，是最动摇不定的政策”。这真是不可辩驳的杰作！看来，当我们同资本家、大地主、教会和富农的统一战线作斗争时，我们不是胆怯者。但我们消灭了他们而只剩下一个富农的时候，我们突然变得魂不附体，我们开始害怕起这些昔日的富农们了——“他们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孩子寻找在新制度下正常生存之路和平静的生活”。（说得多么轻松：善良的热爱自己家庭的富农，胆怯的共产主义者们迫害他们。）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富农是一种政治因素，按照列宁的说法，富农是粉碎资本家之后所剩下的最危险的力量，一个富农可能是奉公守法的，但一帮富农——这就是敌人，对待他们应以此为出发点。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1956年之前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正确地贯彻了这一政策。个别“守法”的富农很好地适应了所变化的条件，但我可以补充说，有敌对情绪的富农也学会了适应，内梅什如细心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也会确定这一

^① И. 内梅什（1908～1985），匈牙利政治家，历史学家，拉科西执政时期先后任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匈牙利版编辑（1948～1950），党的出版社“火花”杂志社社长（1953～1956）。1957～1985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1959～1980年任《人民自由报》主编，1965～1966和1980～1983年两次任党史研究所所长。

点。但正如列宁教导的那样，这只是在富农确信新制度已经巩固，能够收拾他们，并不允许他们过以往的剥削生活方式之后才会成为可能。这是阶级政策，我们必须贯彻执行。

自然，这在较大程度上属于资本主义分子。他们中间有“奉公守法者”，但这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分子的阶级本质。必须说，内梅什在这些问题上是彻底的。他说，劳动社会有如此大的教育影响，以至最后阶级异己分子“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民主制度服务”(《匈牙利的解放》，第264页)。内梅什很快地忘记了霍尔蒂、海牙什^①、奥尔戈万和希欧福克^②、奥斯文齐姆、毛特豪捷，并指责我们除其他问题外，没有拿出足够的精力关注对右翼双箭分子^③、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分子的教育问题，没有充分鼓励他们同我们联合。卡罗伊^④下葬以后，我有机会读了不少关于光荣的“归顺”贵族的故事和小说，例如，关于一个地主的故事，说该地主从50年代起当挖土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分给了自己的挖土同事们，他们真的爱上他了。我差点受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田园诗的影响。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出现在1956年秋天之后——大概从那时起又过了5~6年，当时“阶级异己分子”和富农已露出凶牙。我不引用苏联的例子，尽管列宁和斯大林所举的例子也不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我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为例子，在这些国家里，据我所

① 海牙什·伊万(1890~1950)，极端右翼沙文主义政治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陷落后白色恐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② 奥尔戈万和希欧福克是1919年白色恐怖时期以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积极分子而出名的地方。

③ 双箭党分子，即1937年成立的“双箭党”成员，1944年10月该党在德军支持下在匈牙利建立了公开的法西斯专政。

④ 卡罗伊·米哈伊(1875~1955)，1918年11月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理，1919年1~3月任匈牙利总统。1919年7月至1945年5月侨居国外。同情工人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霍尔蒂政权的亲德政策。1947~1949年作为匈牙利公使出使巴黎。为抗议处死拉伊克辞去外交职务。

知，对资本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没有建立再教育制度和吸引他们的制度，而是遵循这样一种可靠的考虑：敌对分子看到公开反抗没前途，于是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甚至可谓高超的灵活性，以求适应形势。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人仍是敌人，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冥思苦想如何组织和夺回失去的政权和财产，他们将这种对劳动者不可磨灭的仇恨置入自己子孙的意识之中。列宁也研究过被打倒的敌人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写在自己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他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剥削者将以几十倍的疯狂企图恢复失去的东西。众所周知，我们已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列宁称富农是最野蛮的剥削者、吸血鬼、恶霸。这是列宁的话。关于这些分子“甘心情愿”为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一点，1960年可以在我们这里写，这只是因为批判我的文章包容了一切，这种包容是无止境的。

1950年2月10日，结束了中央领导全会，会上党制定的方针是完成五年计划任务。同时竭尽全力准备2月16日召开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党很重视为庆祝斯大林70诞辰而开展的这一运动。我认为这一运动很重要，所以请求斯大林派最好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学者前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同意了，苏联著名的冶金专家巴尔金院士前来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同时前来参加会议的还有苏联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贝科夫（快速加工金属能手）、帕宁（司机）、穆拉维约夫等人。在大会开幕前，他们参观了工厂，交换了经验。我接见了他们，要求他们对看到的東西发表意见，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以前我在莫斯科时访问过斯大林汽车厂，利哈乔夫厂长陪我参观了工厂并详细介绍了那里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了看看我国在怎样运用这些经验，同时也为了介绍我在苏联看到的東西，我参观了我国不少企业。在参观期间，我参加了璠

吉考尼饶市的石油工作者会议。会上，企业领导人骄傲地告诉我，他们超额完成了计划。但当我全面考察整个企业时，发现计划并没有超额完成。这个企业不久前还是美国人所有，领导它的是美国经理，大多数工程师基本上倾向西方。

我在来自全国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讲了这件事。我说，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通过劳动竞赛的决议之后，半年来我们不得不克服艰难险阻，因为定额员和其他人还坚持习惯的舒适的老标准，千方百计迫使工人们不接受新事物。我说，“半年之前，直截了当地讲，我们是借助于威胁和揭露了被粗暴歪曲的事实，才在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道缺口”。当我们最终达到实现“多劳多得”这一原则时，为在工厂里阐明这一问题还不得不做特别的奋斗。“我们常常说，社会主义和增加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但在劳动者意识到这一点和付诸实践之时，以前旧的东西将是危险的障碍和阻力，这不止一次地成为我们危险的敌人”。我认真地分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讲话。他们说，开始他们简直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一半人把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成绩看做是骗局。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贝科夫说到了匈牙利工人们怎样怀疑地对待他，他们甚至摸摸他手。他们的怀疑竟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在他给匈牙利工人们演示了自己的方法后，他们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内心的激动。我还谈了约瑟夫·费赫尔以及其他匈牙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发言，他们讲，如何恐吓他们，想让他们放弃类似的工作方法，说这种工作败坏了共产党员的名誉。我引用了旋工穆斯基的话，他认真地做了自我批评，公开承认，多年来他对其他人对自己的工作方法保密，生怕某位徒工超过他。

这就是对往事的回忆，即斯达汉诺夫运动道路上的障碍。我说，在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生产的完善意味着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重，例如贝多的方法。所以多数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新方法也被

拒绝了，因为通常它只能给资本家带来好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生产的利益才结合到一起。正如马克思主义把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同整个人类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一样，斯达汉诺夫运动体现了每个人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联系。我举的这些例子说明，工人还未意识到这一点，就开始了解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了。

我提醒人们注意，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目的是不是靠加大工人的体力负荷来达到，正如匈牙利一则旧谚语说的：“聪明胜过力气”。“今天我同几位妇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开玩笑说，劳动者更喜欢胖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不喜欢瘦的，因为胖的已用自己的体型表明，多干活靠的是聪明而不是力气。”我是对费伦茨·帕尼说这话的，她是当时最著名的纺纱女工。我之所以专门谈这些，是因为国外敌人提出了加重剥削工人的问题。带着这个目的，在鲁斯纳克^①教授领导下，我们对一系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查明，过度疲劳同提高工作速度毫无关系。当时我们公布了医生的这一结论。1956年之后，自然这时斯达汉诺夫运动已是众矢之的，为了反对这一运动，这时逐字逐句地重复着1956年之前资本家指责这一运动时所说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我在《妇女》杂志上看到了一条详细报道，说这位费伦茨·帕尼在1950年和其他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一起得到了科苏特奖^②，她喘着气，从一个车床走到另一个车床。看，这就是记者的个人崇拜，就是记者的报道品德。

在这次会议上，我详细地分析了苏联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巴尔金院士的发言。我预先同巴尔金谈过话，对他讲过匈牙利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巴尔金指出，苏联大学生的数量如何迅速增长，全

① 鲁斯纳克·伊斯特万（1889～1974），匈牙利内科学家，病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长（1949～1970），苏联科学院国外院士（1958）。

② 科苏特奖，1948年设立的匈牙利最高国家奖。

民的发展水平如何提高。他说，因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取消。“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共同劳动使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我指出了许多会议参加者在发言中所说的东西，即斯达汉诺夫生产的增长伴随着政治自我意识的提高。我还告诫说，要防止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完全看成是工人共产党员的运动。我提醒要注意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交流经验的重要性，我说，在会议上有的发言已指出敌人想破坏这一运动：在交流经验时拉灭电灯，停止传送带，在印刷工作中增加差错。

我也没有放过这一青年运动中开始表现出的错误。“已经说过，在民主制度取得成绩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盲目乐观情绪。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己的成绩，以此来夸口，而不是非常谦虚地说，这些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斯达汉诺夫运动”。我逐一系列了一些例子，说明我们的记录只相当于苏联生产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巴尔金在看了我们的企业后指出，我们炼钢车间的记录指标仅是苏联平均指标的一半。我感谢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请关注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同志们在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我是以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发言的：“我毫不夸大地说，我们所达到的一切，这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相比，还只是蜗牛速度。社会主义国家是有无限潜力的国家。当去年秋天我们决定根本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在冬天继续搞建设的时候，守旧的同志们不安地问：好是好，但建设的界限在哪里呢？对此我回答说：最高界限——天边！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没有资本主义那些界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这里。我号召匈牙利全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创新者、发明家勇敢地创造，不要害怕新方法，新发现，因为站在你们后面的是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有丰富建设经验的伟大苏联”。

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个人崇拜”高潮时召开的（大家都说当时

我被成绩冲昏了头脑)，我想摘录我发言的以下部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应当特别注意，不要让荣誉冲昏头脑。党，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称赞你们，真正爱戴你们，所以一些人开始头脑发热，他们认为自己是主角。我们已听到这样一些抱怨，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前来交换经验时，开始以高傲的态度教育工人，这自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切佩尔冶金联合企业党委书记凯列同志是对的，他说，在这一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被成绩冲昏头脑，只能带来害处”。

为了鼓励斯达汉诺夫运动，特别优秀的工人被授予科苏特奖，而50~60人获得了最高政府奖。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传统：在颁奖时，领奖人中间一定有优秀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我们发现，这些奖励和奖金激励了工人，社会主义竞赛获得了新的动力。会议参加者回到自己的工作地点积极宣传本次大会的工作情况。在1950年的经济成绩取得过程中，毫无疑问，这次大会起了一定作用。

4月4日，解放五周年纪念日临近了。全体人民满怀激情准备迎接这一节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情绪都是高涨的。劳动战线捷报频传，到处都开始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农村展开了合作社运动。年轻的军队巩固成长，装备日益改善。为庆祝解放五周年，我们不仅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而且还邀请其他兄弟国家的代表团。苏联代表团由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苏斯洛夫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代表。4月3日在歌剧院大厦召开了隆重的大会，会上我简短地介绍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强调指出了苏联的援助在这期间所起的作用。我怀着热烈的感激之情提到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们的部队同苏联部队一起参加了解放我国的战斗。在致各兄弟党的谢辞中，我对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列士和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的热情祝愿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关于自己的国家，我讲了以下的话：

“匈牙利劳动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庆祝自己解放五年周年。它知道，自己所取得的一切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不少困难和忧虑。但它也知道，如果它不失去自信，不丧失警惕，继续做苏联及其领导的和平阵线的忠实朋友，它定能战胜这些困难”。

在讲话结束时，我说：“对于匈牙利劳动者来说，今天的节日是新的力量源泉。我们把今天作为国家最大的法定节日，以便以此加深对我们解放者——苏联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苏联人民可以坚信，他们优秀儿子们的热血在匈牙利土地上没有白流，许多苏联英雄为之捐躯的事业胜利了。随着我国人民觉悟的增长，我们对我们的解放者——苏联的感激和忠诚也将与日俱增。”

第二天，在斯大林纪念像前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游行。这一聚会游行是劳动者心情舒畅的表示。部队和技术装备的游行表明，经济增长在国防中得到了反映，建立起了虽说不大但是现代化的军队。

4月的一天，列济·拉斯洛（当时任工人运动研究所所长，和我一起塞格德市长期蹲过监狱）告诉我说，发现了一份文件，可能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工人运动研究所（现在的党史研究所）的任务之一是审阅和整理霍尔蒂政府所遗留下来的警察档案和外交档案。这些档案部分被毁，部分被运到西方，或在1944年进攻时^①被焚烧失散。解放之后，残存的这些档案在各地陆续找到，于是逐渐又收集了不少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了解解放前霍尔蒂分子的一些秘密的外交活动。公布和评述部分材料是有意义的。例如，发现了关于1925年我被捕这一事件的大使的报告和给他们的指示。如伦敦大使报告说，工党代表到过他那里，在此之前，工党党员公开抗议反对判处我死刑（这是该党正式公布的决定）。但是这些工

^① 此处系指1944年12月26日至1945年2月3日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对布达佩斯的强攻。

党的代表对大使说，希望匈牙利政府不要对他们的这一决定为难，因为这一决定仅是为国内形势所需，为了安慰自己的党员和欺骗匈牙利人。还发现了匈牙利驻柏林大使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报告，对于逮捕我这样一个危险的共产党人，他们向霍尔蒂的大使表示祝贺，但同时也要求不要判我死刑，因为这可能被德国的共产党员们所利用。我清楚地知道，有一部分文件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在匈牙利报刊上刊登过。从揭露社会民主党人的真实面目的观点看，这些材料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还发现了外交部长给匈牙利驻巴黎大使的公函，指使后者向赞成释放我的一名法国部长或法国政府解释：为什么最好处死我。（当时法国庇护小协约国，英国支持匈牙利，因此法国政府总是尽量阻碍霍尔蒂分子们）。一句话，由于工人运动研究所的努力，公布了不止一份这样的文件。

这次研究所给我送来一份没有签名的给内务部长的报告。报告上的日期是1936年，但没签名（政治警察局领导人黑捷尼^①没有签署自己的秘密报告，后来其他类似的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该报告最后一页，即空白的第4页上，有许多登记的号码和印章。报告是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多次详细查阅警察局档案后发现的。报告中说，罢工的建筑工人工会主席（即萨卡希奇·阿尔帕德^②）来到布达佩斯一个区的警察局（说出了该局名称），通报了罢工者的一些情况和打算游行示威一事。报告还包含这样一些细节，如警察局

① 黑捷尼·伊姆烈（1871～1946），1922～1938年任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1932～1938年期间领导警察局。

② 萨卡希奇·阿尔帕德（1888～1965），从1903年参加匈牙利工人运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监禁3年，从1928年起担任匈牙利建筑工人工会主席，1938～1942年和1945～1948年期间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书记，1934～1944年期间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刊物《人民之声报》总编。同该党右翼领导人不同，支持同共产党合作的路线，1944年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同匈牙利共产党签署了两党统一行动和彻底合并协议，在战后贯彻了这种精神的政策。

长认为，无论这次情报如何，工会主席都将为可能的后果负责。

我立即把报告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其中包括卡达尔·亚诺什，他当时是内务部长。我们大家都非常气愤。我们了解萨卡希奇的去，知道他在1945年以前20年的时间里伙同佩耶尔^①领导了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的斗争，对此我们装作不知道。但任命他当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不到两年，就发现了类似可耻的东西。警察局报告的文本没有引起我们怀疑。尽管如此，我们还认真地核对了印章和签字。查明，在文件上签字的警察局工作人员有几个还住在布达佩斯。这样，可以核对他们的签字。总之，核对的结果证实文件是真的。（当然，没有这些我们也相信，工人运动研究所不会造假文件，因为在那里工作的都是像列济·拉斯洛这样经过考验的同志。）政治局委员们形成了意见——免除萨卡希奇的职务并追究责任。

我们出现此事还是第一次。霍尔蒂分子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关于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充当间谍的文件很少落在我们手里。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斯大林。他也为有此种事情感到气愤，他说，必须再次认真地核对此报告，如果文件确实可靠，那必须免去萨卡希奇的职务并追究责任。他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考虑，即让警察局的情报员留任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团主席”（萨卡希奇这时正住院，我到医院看望了他，报上报道了此事）。他出院后，我邀请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并列坐在我对面桌旁的三个人是：卡达尔·亚诺什、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和格罗·埃诺。

我立即开门见山，点明话题。萨卡希奇非常震惊，矢口否认。

① 佩耶尔·卡罗伊（1881～1956），从1919年起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主席，该党右翼领袖之一，坚决反对同共产党合作。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在过渡的“工会政府”里断续担任过内务部长之职，帮助巩固霍尔蒂政权。1922～1944年和1945～1947年为议会代表。1947年8月被开除出党，不久移居国外。1949年2月缺席被匈牙利法庭判处8年监禁。

我对他说，他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想根据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他的工作，那两年前为什么还推荐他当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我给他念了警察局的报告。他立即低下了头，然后请求亲眼看一看报告。我把文件递给他，他认真地看完，看了印章和签字，然后思索了一会儿，承认文件符合事实。我说，他应写一个书面解释，其中指出他是警察局情报员。萨卡希奇要了纸，写了声明，这之后逮捕了他。^① 这件事报告了党的中央领导，并附上警察局的报告和萨卡希奇的声明。中央领导（或政治局，我记不清了）受理了此事。^②

在公众社会面前，萨卡希奇的离去解释为身体状况欠佳，因此未引起任何不良反应。中央领导建议罗奈伊·山多尔^③ 就任原萨卡希奇的职位，想以此强调，解除萨卡希奇的职务不是向原社会民主

① 据有关材料，会见的时间是1950年4月23日，地点在拉科西住所，参加者还有Г.彼得、И.雷瓦伊和M.法尔卡什。此外，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法尔卡什也参加和会见，拉科西给他的任务是对这次谈话进行秘密录音。尽管录音带和打印材料1956年之后全部销毁，但弗·法尔卡什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次会见的过程。据这个回忆，拉科西向萨卡希奇出示了警察局的文件后威胁说，萨卡希奇面临两种命运，或者像匈牙利前总统蒂尔迪一样被监禁在家里，或者像拉伊克一样被处死，这取决于他是否认罪。萨卡希奇表示承认，并按照拉科西的口授亲笔写了两份声明，一是确认警察局的文件是真实的，一是辞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此后拉科西即声明说，免去萨卡希奇在党内的所有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同时通知他，根据党的决定，萨卡希奇将同妻子一起在家监禁。

② 萨卡希奇于1950年4月24日被捕。根据格罗·埃诺后来的证词，拉科西早在一年前就策划逮捕萨卡希奇，以便在拉伊克案件中利用他。关于这件事，格罗在1949年7月去索非亚参加季米特洛夫的葬礼时向伏罗希洛夫通报过。但当时莫斯科不同意这一计划。根据俄国档案材料，1950年4月11日匈牙利国家安全局局长Г.彼得秘密地把准备逮捕萨卡希奇的消息通知苏联国家安全部驻匈牙利顾问，并表示拉科西不愿让莫斯科提前知道他对萨卡希奇的打算。在萨卡希奇被捕的第二天，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召开会议，拉科西通报了对萨卡希奇的“揭露”。

③ 罗奈伊·山多尔（1892～1965），社会民主党左翼活动家，接近共产党，1945～1948年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1948～1954年为匈牙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50年5月至1952年8月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1952～1963年任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

党分子进攻。任命罗奈伊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确实稳住了那些认为开始了旨在反对原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的人。但很快事情转向了这个方面。逮捕萨卡希奇的第二天早晨，我召见马罗山·捷尔吉^①，把警察局报告和萨卡希奇的亲笔声明递给了他。马罗山惊诧地看了文件。我告诉他，我们打算任命罗奈伊担任萨卡希奇的职务，以便让大家看到事情不是什么迫害社会民主党人。这使他放了心。但是，当逮捕萨卡希奇的传闻一传出去，针对原社会民主党领袖，首先是马罗山·捷尔吉的声明大量地涌现出来。我们约定，同其他所有需要慎重和不愉快的问题一样，我向他提出问题只是想查清事情。我接见了马罗山并告诉他，对他提出了同萨卡希奇一样的指控。为了阻止这些指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弄清问题，我请他公开讲明自己的过去。我紧接着又补充道，像他当年反对共产党，称他们为莫斯科的走卒这些细节，甚至可以不提，因为这属于当时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职能范围，我们不打算向他追究这个问题。

马罗山回答说，1939年9月初，世界大战爆发后头几天，他被叫到党的中央领导人那里，并被告知，因清洗党内犹太人^②，任命他担任高级职务（我记得他是党的书记之一）。他努力完成了任务，几个月后，他被警察局长绍姆勃尔-什维尼特采尔叫去。什维尼特采尔对他讲：“马罗山，您自己讲，您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您工作了几个月还没报告一名共产党，没交一张共产党传单。为什么当

① 马罗山·捷尔吉（1908~1992），从20年代起参加工会和社会民主运动，1943年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书记，该党左翼领袖之一。从1948年起为匈劳动党中央副书记，1949~1950年任轻工业部长。1950年7月被捕并被判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1956年恢复名誉。1957~1962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1962年因与卡达尔政治观点不合离开党的领导机关。

② 1939年在法西斯德国的压力下，匈牙利通过了所谓的犹太人第二法令，规定了“限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犹太人扩张”的措施（从国家部门，教育和文化领域、政治组织负责岗位上驱逐被该法宣布为犹太人的的人）。

时选您？”马罗山对我说，“我立刻就这个问题找到莫努什·伊列什^①”（莫努什当时是党的思想家，他和佩耶尔在社会民主党里有无限的权力）。莫努什·伊列什奇怪地望了我一眼，说：“什维尼特采尔完全对。你应明白，我们是整个国家机构（从头到尾，包括国家所有警察）的一部分。明白吗？你就这样行事。”我问马罗山，“那么，这之后您怎么做的？”马罗山回答说，“我就是那样做的”。^②

当时我建议他把这一切用笔写出来，但不是当着我的面，而是回到自己家里。社会民主党清洗犹太人的插入部分，可以省略，只用一页叙述自己同什维尼特采尔和莫努什的谈话，第二天把这个声明交上来。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失误，第二天他考虑好整个问题后交给我的不是一页纸而是一部中篇小说，把上述所说都隐藏在模糊不清的叙述之中，尽管这已经够了。在详细审查了他的过去之后查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出生，他的匈牙利国际还有问题，他随时可以被驱逐出国，这使警察局有可能把他掌握在手里。当审问他时，他招认，自己被招募了（准确地说，我们政治警察局找到了记录，其中载明，马罗山向警察局出卖了一名面包师，该面包师受审时被拷打致死）。根据这些材料，马罗山被逮捕并被判刑。^③

① 莫努什·伊列什（1888~1944），1927年成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后任总书记和党的思想家，《自由人民报》主编（1934~1939）和《社会主义杂志》主编（1934~1938年）。1944年10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1月被双箭党分子处死。

② 关系到这一对话的真实性，下述事实是令人怀疑的：逮捕马罗山之后，远不是立即就从他口中得到了关于他同霍尔蒂警察局合作的必要口供的，而只是在施加精神压力和体罚之后才得到。

③ 马罗山于1950年7月7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原社会民主党党员、匈牙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伊斯特万·里斯。后者于1950年9月15日在国家安全局监狱中被拷打致死。关于逮捕马罗山和里斯的计划，拉科西写信通知了斯大林，该信1950年6月20日由M. 法尔卡什送往莫斯科。档案中还保存着斯大林6月23日的复电：“您的信收到了。同意应该摆脱里斯和马罗山。公开审判不合适。最好秘密审讯”。

1956年萨卡希奇和马罗山被释放。^①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了卡达尔的一些议论。他笑着说，掀起了一股恢复名誉的热潮，就连萨卡希奇也要求给他恢复名誉。他真的被恢复了名誉。一天，我记不清了是在我退休之前还是之后，我就这个问题同比罗什·拉斯洛^②谈过话。我感兴趣的是恢复名誉是如何进行的（比罗什当时是内务部长）。比罗什讲，法院裁定，所提及的报告是工人运动研究所伪造的，警察局官员已收回自己对萨卡希奇的指控，而萨卡希奇关于自己亲笔写的声明也说，这是卡达尔、格罗和我逼迫他写的。法院接受了这一说法，甚至不想听听我们的意见。1956年11月4日之后，萨卡希奇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我还听说他被埋在匈牙利工人运动英雄和死难烈士公墓。^③我希望马罗山也在那里得到块地方。

逮捕两名社会民主党领袖之后，在各企业里引起了一系列声明，报告原右翼社会民主党党员在霍尔蒂时代是情报员。1948年在联合之后，我们没提出这个问题，但现在问题爆发了。根据这些声明实施了一系列逮捕，其中许多人被判刑。用今天的眼光看，我认为在这些声明中个人仇恨在起作用，在被判刑的人当中确有无辜者。^④在1956年恢复名誉过程中，以萨卡希奇那样的罪名被关押的人都得到了释放。1950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兴趣的是，党联

① 萨卡希奇、马罗山和其他许多原社会民主党党员1956年3月获释。同年夏天萨卡希奇和其他8名同案犯因无犯罪事实或证据不足被恢复名誉。当时鉴定人确定警察局报告是伪造的。

② 比罗什·拉斯洛（1917），匈牙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1953年起先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内务部长。1956年10月28日离开匈牙利，11月4日同苏联部队一起回到布达佩斯。

③ 从1958年起，A. 萨卡希奇任匈牙利记者协会主席，从1960年起为匈牙利和平理事会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1959~1965年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

④ 1956年7月，当确定拉科西辞职后，甄别委员会得以对1099个原社会民主党党员案件进行了甄别。

合时期被开除的原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干什么。原来，他们认为，在汤刚煮开的时候不要喝，要振作精神，伺机破坏劳动纪律，给企业情绪以不好的影响。在当时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而且逮捕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对其最亲密的那帮人的一种压力，尤其审判是关着门进行的。谁知道自己哪怕是有一点点罪恶——在霍尔蒂统治25年期间和解放后最初联合的几年里这种人很多——都感到自己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扼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开始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来布达佩斯参加解放五周年庆典的代表团都为这里的建设规模和取得的成就而震惊。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食品供应状况，毫无疑问，这里的食品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比奥地利和意大利还丰富。许多人问我们怎么能取得这么大成绩，而我们感到有些不安，因为这些成绩不是某项决定或某一措施的结果，而是整个政策带来的。现在这一政策被诬蔑为宗派和教条主义政策，但在当时，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比，毫无疑问，它是最灵活和目标明确的政策。例如，布达佩斯郊区保加利亚菜园主的问题。^① 这些菜园主是有钱的富农，雇有短工，每年把大笔钱寄回保加利亚老家。由于我们缺外汇，有人建议禁止允许保加利亚菜园主把部分收入寄回家。我们全面分析了这个问题。结果弄清：如果我们禁止他们把自己的部分收入寄回保加利亚，那他们就会回国，这在保加利亚会引起不良反应，同时我们首都的蔬菜和水果供应也受到影响。结果采取了折衷的决定：允许保加利亚菜园主每年向国内寄一回一定数额的外汇，同时他们可以继续在这里从事果树和蔬菜栽培。对于这个问题两国间甚至签了协定。我们对布达

^① 早在19世纪70年代，布达佩斯郊区就出现了保加利亚菜农侨民，从事蔬菜栽培，为布达佩斯市场供应蔬菜。

佩斯郊区蔬菜栽培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我们还采取了其他措施，结果首都的新鲜蔬菜供应没有恶化，据我观察，至少不比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差。

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统一青年组织——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我们成立组织晚了5年。拖延建立类似苏联共青团组织的本身表明，我们在思想领域存在严重的缺点。沙文主义、反苏主义和教会影响严重地表现在卡沙、科洛日瓦尔、巴奇卡州“合并时期”^①高喊“夺回一切”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和被“不可战胜”的德军的最初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那部分青年之中。解放之后，正是青年需要统一的民主组织，但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阻力最大。党，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不愿听到青年组织统一。工会和大学青年千方百计保护自身的独立的青年组织。这持续了五年，直到我们粉碎了这一反抗的时候——即社会主义在所有领域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候。在热火朝天的恢复年代，以及此后很长时间，一些青年团体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用于互相斗争，这导致了它们不能全身心地参与国家建设，而这一建设统一的健康的基础只能是真正的有组织的团结。这一状况造成的结果是：在经过长期谈判很晚才建立起劳动青年联盟之后，联合并没有成为新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源泉，而是给这一过程溶入了很多半封建主义、刻板的形式主义，这影响到了这一组织后来的工作。

党的领导人热烈祝贺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并做出决定，让

^① 霍尔蒂政权的政策以修订特里亚农和约（1920）的口号为基础，按照该和约，匈牙利只剩下原来领土的33%，原居民的42%。根据1921年的统计资料，匈牙利人在南斯拉夫境内有44.6万，在罗马尼亚境内有148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1930年数据）有70.8万。加入意、德同盟后，匈牙利由于第一次（1938）和第二次（1940）维也纳仲裁，以及由于1941年4月对南斯拉夫的进攻，收复了自己失去的部分领土，其中有卡沙（科希策——在斯洛伐克地区），科洛日瓦尔（克卢日——在罗马尼亚）和巴奇卡（属伏伊伏丁那）。

我到大会上讲话。讲话时一开始我就说，我们的劳动青年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不能发挥共青团所起的作用，但现在时候到了，可以无阻挡地前进了，可以超过“5~6年前基本上被沙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余毒所腐蚀的那些青年了”。我引用了列宁的话，他多次强调，旧社会在无产阶级胜利了之后还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工人。我说，我们这里现在所表现出的正是这样。我说，“这些事实不仅我们清楚，就连敌人也清楚，他们正在这方面反对我们。但如果我们号召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号召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号召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热爱劳动，那他们就会警惕落后分子、发牢骚者、自私自利者、糊涂人和游手好闲的人。我们支持和歌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敌人支持懒汉和破坏纪律的人，以此阻止我们奔向美好的未来。

反对这些分子的斗争不是轻松的，不会立即见效，因为支持把我们拉向后退的这一社会阶层的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传统、习惯、信念、偏见、自私自利，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能避免这些东西，敌人会千方百计支持和加强这些东西。所以改造老一代的问题需要很多时间，需要耐心和努力；所有可能的困难，伴随我们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些临时挫折都会在我们这代人的队伍中引起怀疑，在不坚定分子中引起动摇。与此相比，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显得容易些。青年一代身上较少有旧的传统和习惯……”1956年我们证实了我的这些论断不完全正确。我们继承下来的不良习惯过去和现在都在影响青年，伴随我们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挫折，对青年的影响比成年人还大。无论如何，我再次强调了这点：“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旧的资本主义世界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偏见。必须尽快地克服它们……”

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阻碍我们继续发展的遗产中，我提到了反动的教会。我引用了列宁的话：“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

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① 我讲了反动的教会当时是如何反对和平运动的。这些神甫，我说，他们曾有大片田产，甚至拥有银行，现在都被劳动人民剥夺了，他们是最后的公开的有组织的力量……现在，在可怕的流血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又重新使这些分子骑在匈牙利人民头上……所以他们反对民主、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巩固。他们正在进行争夺青年的特殊斗争，企图让他们反对劳动人民。我引证说，“匈牙利人优秀的儿子裴多菲、阿兰尼、奥第、阿提尼、尤若夫把反动教会看成是我国劳动人民解放的最大障碍之一”。

“必须谈谈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他们的罪恶人民民主政权还没有追究。看到这一点，现在当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挑拨者们加紧准备战争的时候，他们重新开始了行动。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我们解放前的 25 年内，是霍尔蒂及其反动派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他们曾有意地散布流言蜚语，给苏联脸上抹黑；他们在劳动人民中间、在工人组织中寻找共产党员，把他们出卖给血腥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阻止各种解放运动，关心匈牙利工厂全速为德国法西斯做工，不要罢工，少出废品……

这些先生们暂时平静了，但近些日子又抬起了头。当然，现在他们变换了策略。现在他们对纪律施加不好的影响，扩大废品的数量，支持和组织懒汉，散布反动谣言，企图破坏工人们健康情绪……青年中有一部分人已染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传播的病毒”。所以，劳动青年联盟可以作为一个统一战线反对他们，在同他们的斗争中帮助我们。

我谈了伴随我们成绩所出现的一些现象：盲目乐观，虚荣，自私，贪婪。我指出，在苏联 1928 年斯大林被迫反对那些伴随多年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03 页，人民出版社，1986 中文第 2 版。

和平建设所滋长的情绪，即当时某些人开始想一切均已理顺，可不必那么紧张地投入工作了。由于取得了成绩，我们这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在这些成绩的影响下，我们迅速地忘记了我们1945年春天起步时的混乱、废墟和战争创伤。我们夸大成绩，借此吹嘘，这自然促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些想法，似乎我们现在一切顺利，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的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再也没有失业的威胁，不必再为一块面包经常奔波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有保障了。很清楚，他们得到了给他们的机遇，想立即为自己以前所遭受的痛苦、所失去的东西得到补偿，在食品、衣服和以前不能得到的东西的保证方面表现出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密切注视着我们和窥察我们弱点的敌人，一经发现我们的错误便立即展开工作，在发现我们表现出上述情绪后，企图给我们这些情绪加温。现在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说今年我们的计划规定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8%不够，我们可以提高得更多。一句话，为什么“量体裁衣”。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吃掉我们的未来，尤其是我们青年的未来。我们如果在需求方面不保持合理的比例，那我们就会吃掉未来可给我们生金蛋的母鸡。大炸牛排就会炸掉三年计划规定建设的所有工厂、企业和文化之家。我引证说，斯大林早在20年前就不得不批评那些人，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看成是“全面幸福”、看成是某种田园诗即期待大家都可以尽情休息和享乐的时期。匈牙利共产党人，尤其是匈牙利青年，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情绪，因为我们的敌人千方百计支持这种情绪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对那些出于善良动机表现出不可忍耐、要求我们现在——1950年就实现“全面幸福”的人，要给他们指出我们五年计划要走的道路。应该给他们解释，从取消面包卡至今还不到一年，那些今天不吃猪油要吃黄油的人，两年前如果能吃到人造黄油就高

兴得不得了。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状况，社会主义计划建设需要劳动人民付出牺牲和遵守纪律。为建设我们的未来流的汗越多，付出的牺牲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多，这一未来就越巩固，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就越珍贵。

这些清醒的话不完全符合节日的气氛，但说实话，必须指出上述消极现象，尽管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讲话结束时，我对 10 万多青年工人给予了好评，他们为庆祝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主动承担了新的劳动义务。这一时期，根据中央领导 2 月 10 日的决定，改选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重新选出的党的基层领导机关，新人占 55.9%，主要是青年和妇女，他们都是在解放后政治工作或经济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同志。党的领导机关成员更换一半不是轻松的任务，在其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冲突、争论和辩论。当然，在这一触及 80 万党员大军的数百万非党群众关注的运动时期，也有错误和缺点，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运动达到了目的：从领导集体里清除了宗派分子和所有那些破坏党的民主、不能或不想彻底贯彻党的灵活政策的人。6 月底结束的改选对党组织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应该看到，在两年时间里，到 1950 年夏天，党是在其成员不断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活动的。1948 年夏天开始了远非轻松的工作，即准备联合。两党联合的结果是党员总数从 200 万缩减到 85 万。几乎一年禁止接纳新党员也促成了这一结果。到 1949 年 6 月禁令取消时，党组织简直处于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人的包围之中。为了防止党重新发展到不能容忍大的地步和防止不合格的人加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50 年第二季度，大布达佩斯党组织进行了改选。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是在 24 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的，此外在这一时期还要从事三年计划建设、五年计划准备工作、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和建设军队等问题，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

说，工作够多的了。可以理解，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因为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许多新任务，许多地方我们的干部没有足够的经验。事后不难批评这些错误和缺点，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所说的这段时期，就其意义和所做的工作方面，不亚于1945～1948年这段时期。

1950年6月底爆发了朝鲜战争。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把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军队赶入大海。战争开始前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在美国军队高级将领陪同下亲自视察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界处的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当查明南朝鲜政府的军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时，美帝国主义分子立即开始干预战争。从日本冲绳岛向南朝鲜派去了大批空军力量，为援助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向南朝鲜派去了一批又一批美国部队。美国通过它当时控制的联合国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进攻一方。美国动员了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于是很快在南朝鲜，除美国部队外，出现了英国、荷兰和土耳其的部队。在紧急调往朝鲜的美军师的援助下，于8月底制止住了在釜山合围南朝鲜军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的进攻，之后朝鲜前线才稳定下来。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它们一起的还有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开始援助朝鲜的同志们。在会见朝鲜驻布达佩斯大使时，我建议他根据匈牙利的情况拟定一个我们可以援助他们的物资名单。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北朝鲜的医疗状况，于是立即提议向北朝鲜派去一个匈牙利战地医院。就这个问题我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他赞成我们给朝鲜提供物质援助和往那里派野战医院的建议。斯大林请注意这种情况，即给朝鲜援助不能声张，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有理由认为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我们在向朝鲜派战地医院（带必要设备）时考虑到了这一告诫。为了医院工作，我们往朝鲜派去了医生。后来

得知，医院工作很有成效。医院不断扩大，我们不断给那里送去必要的设备。在战争过程中（1953年6月结束），我们的战地医院救护了几万名朝鲜伤病员。在北朝鲜，到处都知道这个医院，它很受尊重，被称颂为劳动者国际团结的真正体现。至今朝鲜还称赞这个医院的优秀工作。

为了援助朝鲜的同志们，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长期无息贷款，后来我们又补充通知他们，战争期间我们给他们的援助都是无偿的（我知道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完成了朝鲜同志们的所有请求：额外为他们制造了必要设备并立即运往朝鲜，我国接收的朝鲜儿童一次比一次多，总数达几千。我党经常关心朝鲜问题，关心我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1956年初金日成来布达佩斯时，他满怀感激之情称道我们给他们的援助，他说，除苏联和中国外，我们的援助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相比是最大的。他特别强调了匈牙利战地医院在朝鲜所做的大量工作。

众所周知，战争进程于1950年9月复杂起来，变得对我们不利了。美国人在日本组织了新的军队，9月中旬将其投到汉城地域朝鲜人民军的后方。（朝鲜人民军当时控制着96%的国土，在控制的面积上生活着97%的全国居民）。敌人是突然实施登陆和随之展开进攻的，经过两个星期的激烈战斗，美国人重新占领了汉城，然后又投入新的兵力，夺取了平壤，于10月底在许多地方前出到中国边界。鉴于这种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底^①开赴朝鲜并投入战斗，迅速扼止住了美国人的进攻，重新占领平壤，随后占领了汉城。中国志愿军的这次进攻对敌人来说是突然的。美国人仓惶而逃，他们后来想投入新的兵力阻止朝鲜军和中国志愿军进攻的企

① 第一批到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是在1950年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的，第一次战役于10月25日打响。

图都失败了。最后美国人被迫承认，在他们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未能打赢的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斗争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力量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处于殖民主义桎梏之下的人民的解放运动。

在美国人在仁川港登陆的那几天，我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很平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制定了必要的计划。我相信，美国人不会很快就知道中国志愿军部队要投入战斗，我想，他们对此的反应最低限度要轰炸中国领土。应该说，斯大林对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人不敢进攻中国。可能，在这方面，苏联空军出现在靠近朝鲜边界的中国领土上空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半官方消息）。美国人后来干涉越南事务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没有从朝鲜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相应的政治结论。

为给朝鲜人民军购置野战医院设备所需资金是在全国开展的援朝运动中募集的。当时全国还开展了另一项活动：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战士们寄慰问信。参加这一活动的有300多万人，这足以说明这一全民活动的规模。几乎每个家庭都参加了为朝鲜的募捐活动，以此表达对争取自由的朝鲜人民的支持。为支援朝鲜人民募捐是我国人民政治情绪高涨的标志。其他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开展了到8月20日——新宪法一周年之际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运动。这一想法我们基本上实现了。

计划的运动结束之后，开始了新一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登记加入生产合作社的超过了4万户，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为此，必须在1200个农村进行土地划界，这自然涉及到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利益。

1956年之后，土地划界也成了批判的目标，当然没有考虑到，我们是被迫着手这项对未入社的农民来说显得是异常麻烦的工作

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批评者的出发点是，似乎我们当时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把全村至少是某一部分农民都吸引到合作社来，但由于我们是“守旧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所以终于选择了土地划界。遗憾的是，事情远非这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我们仅仅是在此之前两年里才提出的。对此大部分农民还持怀疑态度。大部分农民都想加入合作社的那种村庄还不多，即使有这样的村，那里也得进行土地划界，因为在合作社的土地里常夹有1~3霍尔特单干农民的土地，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农业机械。当时邻近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处于这种阶段，也没有找到其他出路。我们一开始也想组织这种能把全村所有农民联合在一起的合作社。但当时条件不成熟，甚至使用武力我们也建不起这种合作社。然而，登记入社是自愿的，自然我们不能采用强制手段。^① 这样，我们除了土地划界没有其他办法。又过了10~12年，当邻国甚至中国所有农民都联合成合作社的时候，我们才有数百个工作得很好的合作社（其成绩部分应归功于当时土地划界），这时我们的农民才明白，除了合作社，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② 只有这时才能提出和实现全村合作化的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党和政府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曾有多大担心，因为领导同农民没有充分的接触；当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又有多大惊喜。

① 实际上在匈牙利农村实行合作化时期是采取了强制手段的。除了施加思想压力外，还把不同意入社者列入“富农名册”，这不仅给单干农民带来了严重后果——夺走农具，加重税收，而且给他们的子女也带来了不幸——不接收他们入高等学校，如果已是大学生则被学校开除。匈牙利农民不顾强有力的合作化宣传和经济压力（1949~1953年个体农民交公粮的数额增加了两倍），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到1952年初，入社农民的比重只占农村自立人口的15.2%，到1953年中期也只达到19.1%。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农村生产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应达到80%。

② 此处指匈牙利农村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6年几乎所有集体农庄垮台之后，卡达尔政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进行了一次农业合作社重建。

有人对我们讲，这种土地重新划界在其土地被分的农民看来是一种“压迫”，因为他们留在了合作社之外；这种划界对单干农民来说常常是不公正的。的确是这样。但能有什么办法重新划分这成千上百的份地，而使剩下的农民都满意呢？毫无疑问，入社农民关心的是自己的前途，而留在合作社之外的农民在交换土地时努力得到最好的，但由于不能把这两种矛盾的愿望统一起来，自然就有了多起想象中的或现实中的不公正现象。只能如此而已。在我年轻的时候，农民对筑路土地被占的事实还记忆犹新。尽管这种占地所涉及的农民非常有限，持续时间有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且支付相应的补偿，但是有不少时候它伴随着农民同筑路者或宪兵们的流血冲突。自然，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因土地划界所造成的屈辱要在人们记忆中保存很长时间，在文学和电影中都有所反映。类似屈辱是任何进步都不可避免的。执行机关越优秀越有经验，这种屈辱就越少，但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考虑到第一次发行国债的成绩，我们根据苏联的榜样，决定年年发行公债。认购公债同争取和平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获得了和平公债的称呼。公债数额确定为7.5亿福林，这是上年认购的数额。由于健康的政治情绪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这一数额在36小时里便认购一空，在数额超过10亿福林时，认购才停止。在宣传发行公债的成绩时，我们强调指出，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绩是因为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得到改善，他们政治成熟和愿为公共事业做贡献。资本主义国家也注意到了我们发行和平债券的成绩，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多种多样，但都带有肯定的性质。我想指出，在我们展开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没有利用内债的经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走一条陌生的道路。

1949年秋，我们主要为地方苏维埃选举做准备，蓬勃开展保卫和平运动和准备召开匈牙利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地方苏维埃

选举赶在整个行政机构改造之前进行。这次改造有两个目的：改造行政机关，保障劳动者经常参与国家管理；另一个目的是使行政机关的工作贴近劳动群众，以便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律原则。刚一准备上述措施，我们便发现我们所面临的工作是何等的困难和复杂。在霍尔蒂统治时期，在旧的行政管理体制里，只有 1106 个村没有独立的地方机关，其余村庄（占村庄总数的一半以上）直接隶属于县管理局，这些村庄无权解决任何问题，事无巨细，都得找县文书解决。我们决定把带有地方自治权的村庄扩大到 2805 个。无需解释，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这件工作完成后，97% 的村庄就可在本村解决同行政管理有关的一切问题了。

以上所说只是我们面临任务的一部分。规定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之后，各部将把部分权力下放州苏维埃，州苏维埃将把部分权力下放区苏维埃，而区苏维埃诸多职能的执行将交给村苏维埃。顺便指出，这意味着 40% 以上的各种州级行政机关将转属地方苏维埃。上述状况将保障很大一部问题在地方、直接在农村、在地方苏维埃这样的地方国家管理机关里解决。在准备和实施选举工作中，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达几十万人。代表候选人近 22 万，在各种选举工作委员会里工作的近 7 万人。总的来说，选举是在独立阵线领导下进行的，但关键工作是由我党完成的。我们必须关注选入地方苏维埃的成员必须是村里认为最适于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人。必须规定，地方机关里应有妇女、青年和非党人士的代表。选举前一周，我在《自由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我在文章里写道：尽管新的地方苏维埃法律规定要杜绝旧制度的行政拖拉，但它们还是不能保障同这一法律有关的一切良好措施的贯彻执行。“在解放前，农村里有地方自治机关，但很少帮助农民，因为反人民的行政管理机关不遗余力地毒化劳动者的生活。所以农民接到到村管理机关去的通知手就发抖，所以他们到那里去就害怕，所以他们老老实实地听村文书

威胁他们。由于多数事情不能在村里直接解决，向当局的申诉要经过许多周折才能到达区中央：从本丢到彼拉多^①，要在敌视劳动人民的行政官僚的迷宫里转来转去。

那时城市苏维埃的状况也不好，在各种委员会里，决定权属于富人、商人、旧制度的各种仆从。普通农民到那里的路是堵死的”。

我分析了1945年之后这些机关形势转好的变化，指出，只有成千上万优秀的劳动人民的代表按照宪法原则进入管理机关，只有那时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文章指出了地方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成分。候选人中三分之一是党的成员，其余的是无党人士。候选人中有5.5万产业工人，1302万农民，10000知识分子代表，5000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其余是职员和其他职业的人。80%的农民代表是个体农民。

我指出，在产业工人中，提出的代表候选人是先进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即在工作、认购公债、到农村宣传中走在前面，一句话，以自己的榜样带领其他人前进的先进分子。农民中提出的候选人是优秀的经营者，即在农业生产中达到高指标和勇于向国家多交征购的人。在几千名代表候选人中有来自知识界的代表：科苏特奖获得者、文化界代表、我们优秀的工程师、医生、农艺师，以及那些以其信念和真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当然，代表候选人中也有不少支持人民民主的优秀的小商人、手工业者的代表。

在代表候选人中，近30%是妇女，约有60000人。这一数字表明，我们认真地对待了妇女平等的问题。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打算给地方管理机关注入新鲜的力量。在代表候选人中有50000人

^① 本丢·彼拉多，公元26~36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在任期间判处了耶稣的死刑。此处泛指残忍的官僚。

年龄在 25 岁以下。我们想以此给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同时又了解国家管理科学的青年提供机会。在代表候选人中还提出了几百名军人：普通士兵、军官和将军。地方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都是优秀的劳动人民代表，这些人的提名，反映了我党很好的工作和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后来的年月里，在“个人迷信”时代，他们在新的行政管理机关里担任了各种职务，通过他们，人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地方苏维埃选举的兴趣非常大。原因之一是，选民本人认识大多数代表候选人。到处的人们都以很大的兴趣对待地方苏维埃的工作。许多地方在推选候选人的同时都拟定出了选民期待新苏维埃所做事物的清单，或苏维埃新成员在工作中要克服的缺点。这一兴趣的加强，是因为根据地方苏维埃法，地方苏维埃代表必须汇报自己的工作，如果选民对其工作不满意，那他们可以召回自己选出的代表。敌人也开始利用这一规定，他们煽动这种情绪：即提出的要求超出了可能的范围。我写道，“他们制造这种印象，似乎新苏维埃的活动就像魔术师的魔杖一样，能一下子解除我们所有的不幸；似乎苏维埃是一种神药，能一下子去掉几十年来所积累的错误和困难。问题的这种提法是虚伪的。新苏维埃的选举立即改善了村、区、州行政机关的工作，但是根本的转折还要过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新地方苏维埃代表应介入情况，学会迅速解决问题，不要繁琐，不要官僚主义拖拉，廉洁奉公，根据选民的批评和自己的经验揭露所犯的错误并及时纠正它们。这样，社会管理事业就将得到改善和发展，直至量的变化引起质的飞跃，而我们的劳动人民就会满意地指出，苏维埃的工作是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所不能比拟的”。

在地方苏维埃选举前，推出近 30000 工人和农民到国家机关担任各种职务。（一天，我在切佩尔曼弗雷德·韦伊斯工厂讲，每年要

派 960 名工人去从事各种经济或国家工作。) 这次涉及的是派 20 万工人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工作。正如马克思说的, 量变将导致质变。所以说几十万人参加管理是一个新因素。“通过苏维埃将把国家旧的‘臣民’变成能参与人民民主事务管理的有觉悟的公民”, 我这样写道。

在选举前夕, 我们在全中国修订了生产定额。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现有的定额早已陈旧过时, 我们面临着居民购买力增长——非生产增长的结果——从而使我们的经济走上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首先是党——因为工会没能力从事这一工作——不得不完成这一困难的、难以收到成效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动了几十年的工会, 不能充分迅速地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活动, 当工会拖拉解决这样一些重要任务, 如加强劳动纪律、消除减轻定额的现象时, 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干预。由于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及工人中政治情绪健康, 定额修订进行得比较顺利。劳动群众明白, 我们进一步发展和顺利地五年计划的必要条件是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快清楚了, 定额修订导致了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可以指望 1950 年工业生产同上一相比增长 30%。建筑业就业人数一年增长了一倍, 最主要的是建筑工程开始了机械化过程。关于这方面我写道: “说实在的, 使用机械我们仅仅是从去年才开始的。1948 年地面建筑中机械功率仅有 325 马力。今年 1 月, 我们拥有的机械总功率达到 12700 马力。而到 8 月初这一数字达到 25000 马力。我们的建筑工人在这几个月开始掌握了苏联的建筑技术设备”。劳动青年联盟积极地加入了多瑙新城斯大林冶金联合企业建设的收尾工作, 多瑙氧化铝厂——中欧最大的氧化铝企业——也接近尾声。伊诺塔和马特劳电站的建设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诸如在地方苏维埃选举时成千上万工厂的工人提高了生产任务, 农村决定在 10 月 22 日前结束秋播等事实, 表明了当时健康的情绪。

在这种全面高涨和鼓舞人心的形势下，我认为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我们食品供应方面出现的困难。我写道，“在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就和成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说供应方面出现的一定缺点和困难。这些困难不仅同今年的旱灾、同隐藏在我们之间的敌人的活动、同我们自身没有经验和迟钝有关，它们同时也是健康发展的产物。这是增长中的困难，如同以前给未成年人买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一样。我们供应中的困难不是因为今年歉收。恰恰相反，今年食品生产增加了，但是对食品的需求量也在迅速增长”。

鉴于地方苏维埃选举，我写了下面的话：“敌人非常注意我们，在紧张地盯着我们，他们根据劳动人民在人民阵线候选人投票时是否一致和心情如何来评判我们。我们应该使敌人明白，站在我们共产党人队伍后面的是全体劳动人民……让地方苏维埃选举成为我国劳动人民解放后走过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在地方苏维埃选举准备活动中，我们动员了 30 万宣传员，其中 10 万是无党派人士。同志们一开始决定不吸收这么多无党派人士参加这项工作。我坚持这种观点：应尽量吸收无党派人士或其他党的成员^① 参加这项工作，以便提高对选举的兴趣。这样，地方苏维埃选举是在顺利的形势下进行的，它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十分清楚，我党取得了新的胜利。

9 月份我在斯大林那里，话题涉及到 3 月前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听到“苏维埃”这个俄文词，斯大林立刻集中了注意力，他习惯地眨了几下眼睛，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们现在实行苏维埃制度？”他问。我向他解释，在霍尔蒂时期，我们那里已有城

^① 到 1950 年，除匈牙利劳动党以外，在匈牙利其他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一些党被法律禁止，或宣布自行解散，另一些党，如小农党，虽在法律上未被禁止，但没进行政治活动，在地方上也没有党的组织。

市和农村苏维埃，它类似沙皇时期的城市杜马，谁也没有把目前选举同苏维埃制度或照搬它联系起来。这次谈话是在朝鲜战争最危机的时刻进行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一种特殊扩散共产主义影响的战争。关注整个事态进程的斯大林因此也注视着我们的地方苏维埃选举，正如后来得知的，他对我们的选举结果很满意。

我们把地方苏维埃选举同当时开展的争取和平运动联系在一起。当时在朝鲜事件影响下，争取和平的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朝鲜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分子训练和装备的南朝鲜军队被北朝鲜武装力量击败。南朝鲜居民到处欢迎北朝鲜军队，把它看成自己的解放者，因为他们憎恨美国人建立的血腥的李承晚政权。人民称李承晚是“刽子手”。现在前出到中国边界的美军把以前的失败仇恨都转移到了和平居民的身上。世界人民在五年前看到了德国纳粹的残忍性，现在他们看到，美帝国主义一点儿也不比法西斯好。殖民地人民更是义愤填膺，他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殖民主义企图又有了市场。他们以游行示威支持和平，抗议美帝国主义。这一民主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包括西欧各国。同保卫和平运动有关的数字今天显得是不可思议的。在斯德哥尔摩保卫和平大会呼吁书上签字的有5亿人，其中有1600万意大利人，1500万法国人，即这些国家一半的成年人。这一强大的运动不能不影响到帝国主义分子。

在匈牙利，我们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我们有750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呼吁书上签字。全国有27000个保卫和平委员会进行活动，其中妇女表现得最积极。投身和平斗争的工人们承担了新的劳动义务。成千上万的农民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他们说，这不仅帮助了国家，而且巩固了和平事业。在保卫和平运动中，我们努力吸引教会参加。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职较低的天主教神甫身上，

因为主教表示远离和平运动。我们在天主教神甫中组织了保卫和平委员会，自然是背着主教。许多拥护和平的神甫被我们推选为地方苏维埃候选人。选举运动中最普及的口号是“保卫和平！投人民阵线的票！”许多地方，在礼拜之后，教徒在神甫带领下去参加选举。11月中旬在英国设菲尔德市召开了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我们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全体人民参加的保卫和平运动，其影响是教会领导人所不能抗拒的。对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有几百名教职较低的神甫参加了保卫和平运动。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在这一时期同天主教会达成了协议。为搞垮保卫和平运动，美帝国主义分子动员了联合国组织。当时他们毫无阻碍地控制着这个组织，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决议，其中说，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破坏民主自由；决议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搜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美国想以此冒充世界自由的保护者。我们当然没有沉默，对美国授意的联合国决议给予了应有的回答。

这几个月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开始显露出来；他们意在西德建立一支由希特勒将军们领导的部队，用作驻欧美军的辅助力量。这一计划在德国遇到了民主力量，特别是青年的大力反抗。内务部长古斯塔夫·海涅曼^① 辞职以示抗议重新武装西德一事便是证明。为表达对这一计划的抗议，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布拉格举行了会议。会议决议指出苏联及其盟友密切注视着战争贩子们的破坏工作，苏联及其盟友决心阻止战争贩子们的侵略企图。大会提出了行动计划，规定德国要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和保

^① 古斯塔夫·海涅曼（1899～1976），1952年之前为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1949～1950年为阿登纳政府成员。后因不同意政府的方针而退休。1957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66～1969年任联邦德国司法部长，1969～1974年当选联邦德国总统。

障世界和平。大会给了德国民主和统一的支持者们以有力支持，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那个时期我经常考虑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被逮捕的萨卡希奇、马罗山，还有一些较小的政治活动家，都先后交待了自己的活动和他们所收到的外国、首先是英国工党领导人的建议和指示。现在，过了好多年之后也难定，这些口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但在当时，这些供词显得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党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口供采取行动的。尽管对逮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① 审理是保密的，我们从上述情况出发，决定把他们的部分供词在近期召开的党的中央领导全会上公布。

中央领导全会于10月27日开幕。我作了报告。在报告的一开头我就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形势紧张，争取和平的运动进一步展开。那些日子美国在朝鲜扩大了进攻。美国部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为当时中国的志愿军还没有入朝，看来美军就要占领整个朝鲜了。

当时美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很有信心，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目的。在报告中我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想把‘冷战’变成‘热战’。所以它们不仅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而且越来越对自己的盟友和马歇尔化国家^② 施压，以图使它们加强自己的军事准备”。我引用了英国报纸《新政治家》上的话：“为了达到统

^① 萨卡希奇、马罗山和其他7名原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审判是于1950年11月4日秘密进行的。萨卡希奇被判终生监禁，马罗山被判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

^② 此处指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马歇尔计划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制定和提出的恢复和发展二战后欧洲的计划。计划于1948年4月生效，欧洲17个国家参加实施之，其中包括西德。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人民民主国家，迫于苏联的压力拒绝参加该计划。

治世界的目的，美国给自己提出了任务：在德国武装那些挑起了最近一次世界大战的集团，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彻底放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手脚。同时美国还想改组联合国，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美国的政策和拒绝苏联的政策”。

我补充说：“这种企图统治全球的政策，其表现之一便是朝鲜事件。美国精心策划了这场侵略并相信李承晚能顺利地占领北朝鲜。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粉碎了美国的南朝鲜仆从军之后，惊慌失措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首先指责自己的国防部长，说他没有充分武装李承晚分子。国防部长为了辩解公布了他给朝鲜运去的军事物资清单。他还通报说，李承晚获得了5亿美元的援助”。

当我在作报告的时候，美国人在朝鲜正全速向中国边界推进。陶醉于捷报之中的西方电台和报刊天天公布胜利的消息，其影响我们都感到了。所以我强调了对美国人惨无人道的行动的反应，引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不顾美国的战绩所说的冷静之词。

我说：“美帝国主义分子现在正在为他们开始时的失败进行报复，双手沾满了朝鲜爱国者的鲜血。亚洲人民，甚至整个进步世界愤怒地看到，新殖民主义者更加残忍，其罪行是迄今为止血腥的殖民主义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朝鲜人民反对侵略的英勇斗争和他们所遭遇的惊人灾难对亚洲产生着特别深刻的影响。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记者亚历山大·韦尔布于9月初写道：朝鲜迅速变成了整个亚洲的象征。亚洲战争的结局或是美国人被赶进大海，或是朝鲜人民的痛苦唤起整个亚洲反对美国”。

对于美国人所谓他们只想“阻止共产主义扩散”，英国报纸《新政治家》在8月份一期上声明说：“扼制亚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归结为美国人支持剥削、贪污和反动派，以此赶走希望独立和社会变动的觉醒的爱国力量……我们可以从亚洲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些教

训是，这一政策支持像保大^①、蒋介石和李承晚这样的盟友，促使共产主义者作为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斗士行动”。文章结束时写道：“剥削只是把问题推到共产主义成为惟一出路的时候”。最后，我引用了美国反动杂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上的一篇文章，该杂志被迫承认，在共产党人领导独立斗争的国家，美国则对抗人民的要求。

由于美国为了替自己发动朝鲜战争辩解而动员联合国，我必须涉及这个问题，况且匈牙利政府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坚决反对联合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向朝鲜派出联合国军队。我解释了这样的决议是如何做出的。“建立联合国是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苦的人类的最大希望。人类期望联合国坚决抛弃所有复活被粉碎的法西斯的图谋，坚决支持民主和进步事业。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称霸野心赋予联合国的行动以完全另一种方向”。我提到，由于马歇尔^②计划的援助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措施，许多国家落入了依附美国的境地。“许多这些国家——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离开美元的帮助便不能长期掌握政权。这些政府顺从地执行了美国的任何指示。这些国家为数不少，它们机械地按照美国的要求投票。类似政府越不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越遭到本国人民憎恨，它就越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忠实执行美国的指示。正因如此，美国才抓住蒋介石不放，而阻止接收众多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联合国。美国不需要同人民的代表结盟，需要的是它的仆从”。我还指出，当印度向联合

① 保大（1913～1997），1926～1945年安南皇帝，1945年退位。1949～1955年充当越南法军占领区的傀儡元首。

②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1939～1945年任美军参谋长，1947～1949年任美国国务卿，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

国提出朝鲜问题调停方案^①——这一方案根本不能说是过激方案——的时候，这一提案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居民人数。但美国借助自己小仆从国的支持达到了否定这一提案的目的。我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联合国的类似立场对立场不坚定者产生着影响。说到这里，我谈谈南斯拉夫，对于资本主义报刊来说，在这危机的几个月它是一个适宜的题目。资本主义报刊威胁地报道，说铁托的军队强大得很，超过邻近和平国家部队的总和，而其结论则相反，说人民民主国家想进攻南斯拉夫。我还指出，旱灾造成了我国欠产，在南斯拉夫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困难，而美国报刊要求给铁托紧急援助，后来果真给了。

我详细指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的影响下，重新出现了戈林^②的口号：“少一些黄油，多一些大炮”。由于群众反对加重资本主义剥削，对此不仅对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开始了全面进攻，而且对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开始了进攻。……美国西海岸海员工会领导人加里·布里奇斯的话道出了美国现今形势的特点。朝鲜侵略战争爆发之后，加里·布里奇斯被非法投入监狱。在海员的压力下他获得了释放，这时记者问他在自由条件下感觉如何。布里奇斯回答说：“我没有自由，整个国家都是监狱”。

关于1950年生产增长，我说：“我们公布了国民经济计划前三个季度的完成情况。工业生产超额完成了任务，第三季度达到106.9%。劳动生产率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6.1%……我们发展的

① 此处指印度1950年7月13日提出的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方案，其主张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参加谈判（同时吸收南北朝鲜的代表参加），通过安理会调解朝鲜问题。

② 赫尔曼·戈林（1893~1946），希特勒的战友之一，帝国航空部长，国家迅速军国主义化的支持者

第二个标志是，前三个季度国民经济投资同去年同时期相比增长了108.5%。”一次我还讲过，在那几年，我们的统计局不够严肃，今天在有了多年经验之后我可以想象，它们为建设高潮所感染，很可能它们的统计数据有的地方不太准。不过毫无疑问，它们正确地反映了发展的速度和倾向。对这些指标产生了严重影响的是定额的修订，它部分地消除了制约社会工作规模的不道德和无纪律现象。我补充说，这些任务是不轻松的，它要求大多数工人付出重大的牺牲、努力和加强纪律性……不仅工人阶级的觉悟和自信心提高了，而且工业战线工人和职员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了。工业中就职人数一年增加了9万人，在建筑行业，现在就职人数比去年此时增加9.7万人。这一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临时困难。我列举了这些困难：有高级技能的工人数量增长缓慢，开始感到这样的工人数量不足，尤其是制造工具的工人。工程技术干部数量相对减少了。工业用煤大大增加了，以致煤矿不能充分满足供应。此外我们还犯有错误：我们完全习惯于说矿工是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柱，但关心他们不够。矿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国家总的发展，在政治方面也没有给予他们充分注意。需要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已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在改善矿工的物质待遇方面。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增加矿工数量。我们首先面向斯大林城冶金联合企业建设时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的青年。当出现征兆，煤成了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的时候，我心中十分懊悔。斯大林根据苏联的经验详细地对我讲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矿工应有最好的物质保障。他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矿工劳动是地道的奴隶性的：只有饥饿才会迫使人们下井干活，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贫困消失了，如果我们想不仅不让矿工们离去，去找轻松的工作，而且有新人前来矿井干活，那就必须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为他们建造良好的能留住他们的住宅，上班时保证饮食，延长假期，并给予到疗养院休养

的机会，以及提供提前退体的可能。说到这里斯大林还讲，在他们那里，类似情况在其他行业也有。例如伐木就属于繁重的劳动：在冬季进行。这种艰苦的十分危险的体力劳动是在森林中进行的，远离文化中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假如不给他们特别优厚的物质待遇，工人们不会去干这种工作。同这不完全一样但很类似的是建筑工人的状况（当时建筑工作机械化刚刚开始）。石匠在露天里从事繁重的经常是危险的体力劳动。我们能够留住他们干这种工作，除非给他们最高的工资和其他优惠。斯大林说，您大概会感到吃惊，农业劳动也属于这种工作，几乎所有农活都在露天，烈日底下进行，在农村，那里没有相应的文化机关。如果我们不关心让农业劳动者比工厂、车间里工作的人们得到的更多和生活得更好，那他们就会从农村迁走。当时我很好地领会了这一思想，可随着时间流逝给忘记了，只是到了1950年秋，当煤炭感到紧张时才迫使我想起了此事。

随着工业和建筑业劳动人数增长而出现的新形势，自然给我提出了以前未遇到的新问题。例如，所谓有“两个家”的工人——即家里有地的工人的问题。大部分新工人都来自农村，迅速使他们适应工业生产的节奏和劳动纪律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家里拥有土地的工人近20万人。这些工人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常常离开工厂，因此给生产带来损失。同时由于在工厂做工，他们也没有充分精力种田，自然也影响增产。这些正如我们所说的‘两个家’的工人们既给工业又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工人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多人近来建议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国家。现在我们正研究办法，想给工人们提供以合适的价格把土地卖给国家的机会”。

我指出，我们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降低成本、节约材料方面刚刚开了一个好头。同废品、过量仓库积压和其他形式的浪费现象作斗

争也刚刚开始。我说，现在，当工业生产水平比1938年提高了一倍的时候，在生产和计划领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任务，它们是与以前遇到的问题根本不同的。我们不得不同其进行斗争的困难中，我提起了这件事：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阻止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我说，“美帝国主义分子，经常提起铁幕。但他们美国人企图在一切领域给我们设置铁幕。不过我们发展的数字表明，尽管他们在某些地方给我们制造了或多或少的困难，但总的来说，他们不能阻挡我们发展”。我虽不能公开说我们可以打破美国的禁运和禁止出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西方伙伴出于自身的利益是支持我们的。自然，在战略材料，特别是在有色金属和橡胶方面，我们有时感到尖锐不足。洞察一切的斯大林一次问我：“你们生产镍？”我说不生产。“那你们有很多镍？”——斯大林接着又问，我又做了否定的回答。“那这怎么解释，你们有镍搞这个？”他从兜儿里掏出了一个“加乌”厂生产的明亮的镀镍打火机。我茫然若失，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回到匈牙利我搞清了这件事。“权威人士”辩解说，不过是数量不大的一点金属，但是在那几个月，我们不得不通过走私途径从西方往匈牙利进口一点镍，几次才20~30公斤，把它用在打火机上实在是太浪费了。

关于农村工作的开展，我举了以下例子：劳动农民决定在10月22日苏维埃选举日这天完成秋播。的确，到这天，19个州中17个州实现了承诺，没过几天，剩下的两个州也完成过冬作物的播种，到处都热情高涨地着手秋耕。同时我还讲了农民保守所带来的危害。1950年由于夏季干旱炎热，谷物提前成熟。政府多次呼吁农民不要拖延收割，而应提前进行。许多人不听，结果谷物过熟。农民也不想栽种他们陌生的作物。当时，1950年，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旱灾，玉米收获不大。同时与去年相比，生猪增加100万头，牛马增加20万头。生产合作社成员数目在秋季入社之后增

加了一倍，即增长了9万户。当时全国有360个机械拖拉机站，其中有6000台拖拉机。从苏联访问归来的农民代表团（200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合作社的拥护者和共同经营的宣传员，这种情况也促进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这时从外喀尔巴阡来了50名匈牙利族集体农庄庄员。这些集体农庄庄员，每到一处，立即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一开始，农民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待他们，用各种办法考验他们“是不是真的”。“苏联—匈牙利”庄员们戴着许多勋章，他们以某种“高傲”的态度对待当地农民，在他们眼里，当地农民很落后，没有看到合作社的好处。我也同这个代表团谈了话，我可肯定，虽然他们的集体农庄存在才只有4年，但它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和观点：他们明显地与匈牙利农民不同。当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① 向我夸奖匈牙利族外喀尔巴阡集体农庄庄员，说他们同乌克兰人一样，迅速走上了集体农庄道路时，我有点半信半疑。我甚至想，他们大概受到了比乌克兰人更大的压力。但现在，在同代表团谈话时，我可肯定，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外喀尔巴阡匈牙利人在过去10年时间里经过了4种政治制度，准确说是4种国家制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如同1940年独立的斯洛伐克一样，是一个自治的，甚至几乎是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国家，直到霍尔蒂分子经希特勒允许未占领它以前^②。4年之后，苏联解放了他们，从这时起他们成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自然，这些变化迫使他

① 尼·谢·赫鲁晓夫——1938~1947年3月和1947年12月~1949年期间任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1944~1947年）；从1949年起任党中央书记，1949~1953年同时兼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② 按照同希特勒达成的阴谋，1939年3月15~17日，匈牙利占领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参加了1938年10月法西斯德国发动的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行动。

们考虑政治，审视一切。这表现在他们迅速接受了集体经营农业的优势。

旱灾的影响只有在收获之后我们才能估计出来；由于旱灾，在粮食供应方面开始出现了某些短缺，商业出现了波动。小麦和燕麦产量超过了上年。但土豆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朝鲜战争影响，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出现了波动，而且波及匈牙利。我在总结报告中说：“敌人有意识地想破坏粮食供应系统，想尽量套购日用品。例如在杰尔，在富农伊什特万·萨拉伊家找到了大批肥皂，50公斤糖，1200米布和75双新皮鞋。为教育杰尔地区的群众，所有这些东西都展览在了橱窗里。另一个富农亚诺什·巴基在蒂萨南有60霍尔特土地，在他家找到了90套新西服。在布达佩斯，在瓦茨大街47号楼地下室找到45袋面粉，5袋糖。面粉已生虫子。富农经常大批购买白面包喂牲口。例如，欧罗什哈佐一个富农名叫尚多尔·宾克，因把1500公斤面包喂了牲口而被追究责任”。我只举了几个滥用粮食的例子。当时由于我们采取了措施，类似现象减少了。我之所以详细摘引我总结报告中关于奸商—富农的论述，是因为从1956年之后直到今天在散布一种说法，似乎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出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见。在匈牙利，富农是最有文化的一部分农民，他们比贫农了解形势。他们知道俄国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下场。因此富农在我们这里非常谨慎，不像在苏联那样疯狂反对新制度。所以我们对待富农没有采取像苏联那样的政策。谁怀疑这一点，我就劝他读一读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看一看那里是如何消灭富农的。有时我们也采取行动，防止我们采取的反对富农的措施触及中农。为了帮助农村和地区里没有经验的工作干部，我们把富农列出名单，凭着名单要求他们比贫下中农或中农多交税，这是正确的必要的阶级政策，是列宁农民政策在匈牙利的运用。从主要方面看，这一政策达到了目的。1956年当反革命

被粉碎和反动派明白他们的天下已一去不复返的时候，这个富农名单不重要了。但以前它是正确的，必要的，有益的，它促使了富农未经苏联那样的流血斗争而彻底顺从了，我希望它能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不止一次同斯大林谈过富农问题。斯大林说，他们不是到处都迫使富农迁居，把他们赶往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从经济观点看这样做不利，因为整个村或大多数都是富农。在这些地方成立了监督队，富农在自己村里，在军事纪律的条件下，在监督队里劳动，他们明白，这要比强迫迁居好得多，于是他们老实认命了，直到集体农庄的风浪未触及他们之前。

我密切注视着我国富农的动静。我发现他们善于适应形势。一次在科姆洛，我要求会见几个著名的矿工，此外还给我介绍了一名健壮的 40 岁的矿工和他的女儿——未满 20 岁且很有力气的姑娘，她工作得也很出色。交谈几句之后我才明白，他在海奥什有 20 霍尔特土地，此外他还有马和牛，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富裕的中农。我到过海奥什，那是一个富裕的村庄，不少斯洛伐克出生的人迁居那里。这个村庄我是在坐监狱的时候知道的，因为瓦茨监狱就与这个村挨着。我知道，那里的土地很肥沃，并且在我检查迁移者状况的时候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一句话，从海奥什来的这个矿工是个富农。他说，他和他女儿能挣 3000 多福林。如果好好工作，一年他们就能得到房子。如能把妻子接来，他将非常满意，她现在同 10 岁的儿子留在海奥什。她也能去工作。妻子乐意把土地、房子和马交给生产合作社，但那里正同劳力不足作斗争，不接受没有劳力的土地。无论怎样，这位富农说，这一定要解决。我问他留恋不留恋自己的农民生活。他说，在家里和妻子从早忙到晚，要经常想着牲畜，关心天气，惦记交公粮、交税、算账等等。他说，“而在这里干完活再没别的事了。如果我好好计算一下，工资收入将比农村高，尤其是妻子能来这里”。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富裕的中

农”在佩奇煤田表现还不错。

1949年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会期间，我多次同米哈伊洛夫^①举行过会谈，他当时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与苏联青年代表团一起来到布达佩斯。我问他共青团的一些情况。他顺便说，他们那里存在一个富农子女问题：有一些人反对接收富农子女入团。米哈伊洛夫本人主张接收他们加入共青团，他问我，我们这里这个问题怎么样。我说，接收青年加入青年组织我们不看父母阶级出身。这同人民民主制度的特殊条件有关，在这里，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前，没有发生过苏联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

富农的投机在我们1950年秋季所遇到的粮食困难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困难的客观原因是，劳动群众的购买力急剧增长。在一年时间里就业人数增加了25万人，工资额也提高了。此外，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在农村对动物必须接种疫苗。结果家畜家禽不生病和闹鼠疫了。同时这也意味着农村的购买力提高了几百万福林。农村和城市购买力的提高同时还反映在人们很好的饮食和衣着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我的总结报告中举了以下例子：“不久前我同生产合作社的农民进行了座谈，他们告诉我，与个体农民相比，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我问迈泽图尔‘红星’合作社一名妇女结算后她首先买了什么。‘买了11双鞋’——她脱口而出，眼都没眨一下。看到我有点儿惊讶，她补充说：‘我们家7口人，每人买了两双新皮鞋’。我想给她解释，尽管人民民主制度现在把鞋的生产翻了一番，但毕竟每个人一年不能买一双新皮鞋。不过我没扫她的兴。”

^① H. A. 米哈伊洛夫 (1906~1982)，1938~1952年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驻波兰大使，1955~1960年任苏联文化部长，1960~1965年任苏驻印尼大使，1965~197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报刊委员会主席。

我们发现了反动派使自己的口号和宣传迅速适应新形势的例子。在出现临时困难之前，他们就说粮食短缺。当采取一系列措施，形势正常和买粮排队现象消失之后，这时我们又听到这样的声音：这只是为了在苏维埃选举前提高人们的情绪，等选举过后又会重新出现什么也买不到的现象。^①这种事情在去年，在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会开幕前夕出现了白面包时又重演了一遍，当时他们说，等联欢会过后白面包又会消失。

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苏维埃候选人中有许多非党人士，这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关于这件事我说：“非党群众，特别是农村的人们，通过这一事实会明白，我们不想把他们排除在国家管理之外。相反，我们想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吸引他们参加国家管理。如果我们继续贯彻这一政策，不允许地方机关把这些非党群众排挤在外，那我党的群众基础就会更牢固……苏维埃选举刚过24小时，我们就开始收到报告：在农村，人们，首先是被我们推选为苏维埃候选人的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入党。这对那些不乐意而只是按照党的指示才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同志们是一个教训，因为他们观点不对头，认为现在我们巩固了，不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

根据被捕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供认，我详细讲述了英国工党是如何干涉匈牙利内政的。不久前英国工党反对联合。但到1948年初，当有几万名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转入共产党时，英国工党的这一指示又变了。现在，当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转入共产党从而他们成了光杆司令之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收到了这样的建议：不能等待，应自己提出联合的问题，从党内开除名声不

^① 1951年2月国内肥皂和油脂实行了凭卡购买，4月肉和面包也实行凭卡供应制。

好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他们想以此保持自己对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们的影响。此外，他们还必须骗取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应试图尽量多地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拉入党内，并保障尽量多地让他们占据重要岗位，保护他们并在党内建立第五纵队，以便在关键时刻重新转入行动。关于从党内开除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收到的指示是，把名声非常坏的像谢利格^①和班^②这样的人派往国外，其余的留在国内，待安定下来之后再开始颠覆活动。这里我补充一点，类似现象不是个别的。在其他国家，首先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颠覆工人运动很有经验，工党不少领导人，如希利，菲利浦·摩根是工人运动中英国秘密部门的代表。（雷瓦伊·尤若夫插话：“正是！”）我说，“的确，正是这样。英国秘密部门精心准备和策划了他们的升迁沉浮。在英国为此制定有方案。叛徒们常常是以‘左’的面目开始，以求更好地伪装自己和取得更大的影响。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作为‘左’派被开除出工党，在选举中他们因‘过激’而忍受失败。在这之后，他们取得了信任，可以更好地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对于我来说，这种把戏并不陌生，甚至很熟。1919年秋，在匈牙利公社陷落之后，在卡尔施泰因拘留营里，E. 瓦尔加（他对在维也纳随便批评和诬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民委员们经常发起攻击）给我讲了鲜为人知的匈牙利公社的前奏曲。当3月中旬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考虑它的大部分群众转向匈牙利共产主

① 谢利格·伊姆雷（1903~1968），1945年当选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1945~1947年当选匈牙利国民议会代表，1948年作为同匈共产党合并的反对者被开除出党，先后侨居瑞典和英国，曾任国外匈社会民主党书记。

② 班恩·安托尔（1903~1951），1945~1948年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1947年以前为社会民主党副秘书长，1945~1948年为议会代表和工业部长。1948年因反对同匈共产党合并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侨居国外。

义者一边的时候，而这在当时意味着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贡菲·日格蒙德^① 求教奥托·鲍威尔^②，问该怎么办。奥托·鲍威尔当时是奥地利外交部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公认的权威。鲍威尔建议贡菲同意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手里应该尽量多地掌握阵地。当形势变得危机之时，社会民主党必须立即结束苏维埃共和国而建立民主。众所周知，这一计划实际实现了：在3月21日成立的政府里，除库恩·贝拉之外，共产党人只占有副人民委员岗位。这种形势只是在10天之后才得到改变：在共产党群众不满的压力下，才把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副职改为正职，不过同时在政府苏维埃^③ 里保留了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2:1的比例。

众所周知，贡菲·日格蒙德在3月21日的会议上，建议两党不要合并而成立联盟。这也是根据奥托·鲍威尔的计划提出的。但库恩·贝拉产生了怀疑，他坚持必须合并。当5月1日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开始危机之时，贡菲坚持建立工会政府，同时还说，他已同奥托·鲍威尔商量过此事，后者不仅答应为共产党人提供避难权，而且为他们准备好了专列。但是，当按照共产党人的要求不是辞职而是通过了动员布达佩斯无产阶级决议的时候，贡菲坚决要求到工厂去的人民委员不要发表煽动性言论，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样的言论影响下，工人们将去前线，到那里还会逃跑。这一

① 贡菲·日格蒙德（1879～1929），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中派领导人之一，理论家，政论家，马克思著作翻译家。1918年11月在M.卡罗伊政府中任劳动和人民福利部部长。1919年3月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6月退出政府苏维埃。1919年8月侨居奥地利，自杀身亡。

② 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首领和理论家之一。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

③ 革命政府苏维埃——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党之后于1919年3月21日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要求是如此的坚决，以致库恩·贝拉抑制住自己报告的声调，它使我们吃惊地感到，这决不是煽动性的，我们感到他是非常“客观”的。众所周知，奥托·鲍威尔的这一计划于8月1日实现了。^①的确，瓦尔加说，发生了奥托·鲍威尔所谋划的东西。只是没有策划白色恐怖。在卡尔施泰因期间，瓦尔加心情非常沉重，甚至他都找到奥地利（实质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请求允许他带着家室去阿根廷（当时许多匈牙利侨民住在阿根廷）。我问他到那里干什么，他解释说，波兰育种家达姆钦斯基得出结论，如果小麦像稻子那样插秧，把根栽下10厘米，那么这样的小麦就能结出10~15个穗，一霍尔特小麦就能打70~80公担。瓦尔加个子不高，窄臂膀，近视眼，不像农民。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然后查明，达姆钦斯基的方法还未在农业中采取。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瓦尔加，这动摇了他的计划。这时从魏霍芬拘留营来了库恩的追随者，出现了新的事情，于是瓦尔加抛弃了自己的小麦计划和去阿根廷的打算。我没有忘记奥托·鲍威尔的计划，如果我没记错，当马罗山·捷尔吉承认英国人曾给他提出过“扎根”计划的时候，我立即想起了它。

我在总结报告中说，“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我们还应该注意，使几万原正直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和职员党员能够同我们一起肩并肩平稳地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从合并时起便可发现，我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工作的。同共产党员一样，原社会民主党天才的党员被我们勇敢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① 1919年8月1日，当罗马尼亚的军队迫近布达佩斯的时候，政府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政府辞职和建立以A.佩德尔为领导的“工会政府”的决议。几乎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按照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达成的协议于当天乘专列去了奥地利。

我还谈到了同天主教会签订的协议^①，我们把它视之为匈牙利民主制度正确的忍让政策的业绩。我谈到民主天主教群众的影响将帮助我们。梵蒂冈反动派公开表示对这一协议不满，而美帝国主义报刊直接说是投降。我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天主教会的领导人毫无例外现在都全身心地拥护人民民主制度。在执行协议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某些人多半把协定看成是暂时休战，可以给他们‘度过困难时刻’的机会。我们应认识到这一点而不能打盹儿”。

关于党的地方机关选举，我讲道：这些选举的目的是“完全达到党的民主，从领导班子里消除那些官僚主义、独断专行、歪曲民主精神、妨碍我党发展、破坏党的普及和脱离劳动群众的人。我们想通过这些选举优化我党领导成分，避免已给我们带来危害的经常的人事变动，这些频繁的人事变动严重地阻碍着我们干部的成长。

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克服所有这些缺点，……但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一切都已做得很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官僚主义还有不少抱怨。为了表明在这方面可能出什么事，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就在10月中旬，原松博特海伊市党的书记的抽屉里还放着106个党证和预备党员证，其中大部分已放了一年没办手续了。还能碰到不少独断专行的人，我党必须反对这些人。尽管存在这些缺点，毫无疑问，二月决议大大巩固了我们的党”。

我说，在我们巩固了州党委之后，现在轮到区党委了。“扩大区苏维埃的职能同时也要求真正加强区委。我们从人员数量上加强了区委，我们关心区委书记能否真正成为区的领导。州委书记由于

^① 经过长时间谈判，匈牙利政府和天主教主教团于1950年8月30日签订了协议。按照协议，天主教会失去了大多数教会学校，除4个僧团外，大部分僧团被取消了。签订协议之后，匈牙利关闭了600多处天主教僧院。

自己的出色工作被公认为州的领导人。现在我们需要区委书记也做到这一点。需要关心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威信。我们希望，将来的党的区委能保证使党的政策迅速传到最偏僻的农村组织”。

为了加强区党委，我们通过了决定，按照这一决定，每一个区可领到一部小汽车。书记们高兴地接受这一决定，因为至今他们的一个工作障碍就是交通工具落后。由于设置司机职位会重新增大机关编制，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亲自开小汽车，看来他们有些顾虑。在这方面，尤其是一开始，党的总务处很担心，因为各区在学开车，事故增多了。出现了不少抱怨，发生了滥用汽车的现象，但这和通常一样，事情逐步走上正轨并最终达到了目的——促进了区委工作的改进。

由于我们发现了基层党组织拖延给符合转正条件的预备党员转正，所以在讲话中我指出了我们在组织发展中的错误。“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毫无疑问，基本原因是我们自命不凡和过于自信。许多同志认为，现在我们已很强大了，用不着进一步努力加强我们的党了”。

我指出，由于农民迁移，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部分农村党组织涣散无力。例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绍莫吉州，钻进我们队伍的敌人开除了几千名农民党员，其用心是削弱我们在农村的影响。“但危害最大的是，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党组织甚至区和州委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社会主义成分上，集中到生产合作社、机械拖拉机站、国营农场上，因此很少关注个体农民……而中农现在占劳动农民的绝大多数。如果忽视这么多的群众，那我党的影响定会缩小。在秋天扩大合作社时期特别注意到我党队伍中中农很少。还证明了一点，凡有中农党员拥护合作社的地方，那里就取得了成绩。凡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或农村书记员党员宣传赞成合作社

的地方就没有成绩……我们首先应该在农村改变工作方法，在那里……接收党员的方针应该是最够格的中农。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有几万这样的中农通过自己的表现已证明，他们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忠实助手。应把这样的中农作为吸收入党的对象，并尽快地接收他们入党，因为他们自己已积极要求入党”。

此外，我还要求接收在生产中表现突出的人入党，其中包括技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我指出，在生产中，在认购公债中，在收割和苏维埃选举中，许多人工作突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保持已达到的水平和找到加入党的队伍的途径，那我们党的发展就会有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我们党的另一个错误在于，我们的鼓动工作减弱了。在政权问题没有解决和我们还没有坐稳以前，除宣传工作外，我们还必须不断地进行鼓动工作。我们能够使劳动群众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一鼓动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我们从掌握了政权之时起，就碰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看不到普遍地通俗地向群众解释每日出现的一个个新问题和结合当地条件向群众全面阐明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开始出现这样一类党的工作者，他们越来越企图通过组织途径解决一切，他们对鼓动宣传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之所以对鼓动宣传认识不足，是由于他们认为说服群众的工作不重要，从而也认为同劳动者保持密切联系没有必要。很清楚，需要最好的鼓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鼓动宣传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组织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能代替鼓动宣传。既使我们站稳了脚跟，这也丝毫没有降低鼓动宣传的意义”。

在谈到工会时，我强调指出，工会还有不少社会民主主义的余毒，这些余毒是从工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及其主要物质基地之时起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的影响表现在企业里的工会有时认为自己是和党组织平起平坐的，有时甚至认为比党组织还重要。但是在其

他地方，基层工会工作人员，尤其是工厂书记，远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赋予他们的任务，所以这些地方的党组织还不得不完成工会的任务。有不少这种情况，工会工作人员回避完成诸如加强劳动纪律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或不受欢迎的工作，有时甚至迁就落后工人。

这次中央领导全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匈牙利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它的主题是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同骄傲自满作斗争，加强党的民主。全会是在“个人迷信”高潮时期召开的，那些受1956年之后这样一些流行看法——即认为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尤其是我，脱离群众，开始被成绩冲昏头脑——影响的人，当把这些认识同事实对照时，无不感到局促不安。

冬季的到来和煤炭不足迫使党狠抓采矿业和矿工的问题。为此我们决定在11月底召开全国矿工代表会议。我们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通过了详细的政府决定，克服了暴露出的缺点。此外，还提高了矿工工资和退休费，为矿工住宅建设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一连几星期我亲自到各矿区走了走；同许多人——从普通矿工到矿长——谈了话。想根据这些直接观察在会议上支持党和政府的联合决议。早在1919年我就到过绍尔戈陶尔扬，从大学时代我就知道我国古老而荒废的布伦贝格矿井。事隔50年之后，我心里还有那种令人惊愕的印象：矿业公司搭建的所谓“侨民区”——低矮工棚，里面住满了人，像鸽子窝似的，门前垃圾成山，没有路和人行道。50年之后的今天，心情自然好了些，但解放刚4~5年，自然不能完全消除几十年的经济后果。尽管如此，矿工们的心情很好，这不仅是由于不久前公布了决定，而主要的的是由于这些工人通过各种渠道感觉到党和政府关心他们，一些缺点逐日减少。在绍尔戈陶尔扬矿区，在小泰莱克，卡兰恰伊尔，在米热尔夫和其他地方，我不止一次会见1919年的老战士，其中在小泰

莱克还会见了多蒙科什这样的同志，多蒙科什在卫国战争时期是游击队员，曾带40公斤重的发报机深入德军后方，我侄女埃瓦就随其工作。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不只是涉及矿井和矿工的事，还谈到所有日常生活问题，如难于给姑娘置买嫁妆等事。邀请接连不断。

在矿工代表会议上若菲涅茨^①同志作了报告。然后发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和工程师。同采矿业和矿工地位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提了出来。在辩论会上我发了言。我说，还在1919年，矿工就是共产党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霍尔蒂时期也是这样，而在1945年，矿工们不只是以采煤帮助国家恢复，在残酷的政治争夺时期绝大多数矿工都站到了我党一边。我指出，发言者都同意党和政府为帮助矿工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所要采取的措施。我谈到我们现在为什么对矿工提出新的要求。“由于矿工们的出色工作煤产量迅速增加了。今年矿工们比去年给国家多生产13%的煤。这是一个高指标，如果我们的煤产量每年以这么大的幅度上升，那么再过6年，我国煤产量就会翻番。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发展无论多快，煤产量每年递增13%无论显得多么强大，而总的工业发展毕竟是以近两倍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速度迫使我们号召我们的矿工进一步发展煤炭生产。我们相信，我国矿工将响应这一号召，就像响应其他符合人民利益的号召一样”。

我讲述了交通、社会供应、住宅建设领域出现的问题，我还谈到，我们已干了些什么和准备干些什么。我说，劳力不足和矿工流动太大。我指出需要加强劳动纪律。我还建议应允许矿工经过批准

^① 若菲涅茨·米哈伊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冶金和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1953～1954年为匈牙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休部分年假，可以几天不上班。我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工人提前两天告诉矿上他准备不出勤，那要好得多。那样领导人可及时调班，以免像现在这样，采煤工或他的助手上班后突然发现运煤工不在，或是出现相反的情形”。

我谈到了不仅是工人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对矿井机械化的谨慎态度。在同我单独谈话时，矿工们真诚地讲他们不喜欢新机器，甚至所有机械，因为机器的使用意味着他们几乎要重新学习新职业，或正如一个矿工讲的，需要从采煤转到安装机械和操纵机械。在谈话中，许多矿工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至今憎恨采矿工程师，解放前这些工程师不仅干工程技术工作，而且还拼命反对工人，保卫“煤炭大王”的利益。我在发言中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鉴于社会供应问题，我号召矿工们忍耐，我解释说，阶级斗争在这一领域正在进行：敌人有时冲向砂糖，有时冲向其他商品，目的是造成供应中断。我说，矿工们应面向社会主义。

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榜样，也派妇女去矿井工作。矿工们接收她们持谨慎态度（“最好去伙房烧饭”），最后表明他们是对的。矿上多数工作不适合妇女。矿工们对采煤工培训学校也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没上过任何学校也成了采煤工”，他们说。我不得不给他们解释这个问题。

会议期间，劳动捷报频频传来。由于这次会议全国实行特殊的工作日，可以感到所有矿工都加入了运动。我称这次会议是矿工议会。毫无疑问，会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采煤量开始上升。同时这也是党和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证明。只需补充一点：会议是在“个人迷信”高潮时期召开的，按照1956年以后散布的观点，当时党和群众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1951年夏天我在索契休假。在那段时期，我们政治局委员每年的休假为一个月，这与紧张的工作相比显然是不够的。（后

来，我打听到苏联政治局委员的休假时间为每年2个月)。我想见斯大林。我给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打了电话，请他打听一下，斯大林什么时候可以接见我。两天以后斯大林接见了。在用专线电话交谈时我就考虑我在莫斯科应该说什么。在一阵小小的慌乱之后，我弄清了斯大林在波尔若米。我先坐火车，后来继续乘汽车赶路。我们路过了仓促修建起来的飞机场，因为机场没有跑道，所以飞机都停在割过庄稼的地里，一个陪同我们的同志说，这些飞机是政治局委员们乘坐的飞机。汽车到了波尔若米，停在院墙的木门旁，门是一个老年妇女打开的。在这片相当开阔的地方，有一个类似城堡的建筑物，在它前面耸立着一块带有青铜色鹰徽的方尖碑。汽车停在入口处，不知是谁轻轻的用手把车门打开了。斯大林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于是我很快就见到了政治局的各位委员，他们当中有马林科夫、米高扬、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他们都是斯大林邀请到自己身边来的。我在路上走了一整夜，所以人们建议我在午饭前散一会儿步。我和马林科夫与米高扬在山岩之间散了一会儿步。米高扬对我们说，大约30年以前他就来到过这个位于水流湍急的库拉河边、属于不知是哪一个大公爵的老城堡。我注意到这里没有警卫，可是在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或在美丽如画的里察湖别墅，我在那些地方同斯大林会见时都有加强的警卫，特别是在傍晚。有一次我在同警卫队长弗拉西克中将谈论这个问题时，他提到，里察湖别墅在警卫方面安排得不是很好，因为从距离最近的山上可以十分清楚地观察到别墅的情况。

在散步的时候，马林科夫好像是顺便地问了一句，法尔卡什出了什么事。我因为夜间乘车感到有点累，加之天气特别炎热，所以我也就没有注意他提的问题，说了一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午饭是在城堡的院子里一张树荫遮盖下的桌子上进行的。斯大林让我注意一件事，尽管库拉河离得比较近，库拉河在距离城堡不足

100米的地方流过，但波尔若米山区的空气干燥，其湿度如此之小，以致即使天气非常炎热，谁也不会出汗。在外面吃饭习惯于简单，因为没有任何服务，大家都是想要什么东西，就往自己的盘子里添什么东西，谈话是无拘无束的，有时还来点俏皮的笑话。午饭后斯大林去休息，其余的人也走开了，我却在准备将要在城堡阴凉的地方举行的谈话。斯大林散了一会儿步，抽了几口烟，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话，有时候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问我，说实话，山多尔·焦尔德到底出了什么事，当我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时，他便对其余的人看了一眼说：我们这里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在按原定计划结束谈话以后，斯大林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您为什么打算枪决法尔卡什·米哈伊。这个问题，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完全是突然的，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之前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彼得·加博尔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所说的枪决一事是没有的，不过在他们的工作中有错误，我立刻开始把这些错误讲述出来。斯大林听了一小会儿，然后气忿地说：我看您是不够器重像法尔卡什和彼得这样优秀的工作人员。您应该为具有这样优秀的人才而高兴，不要去打搅他们。我被惊呆了，未及讨论这个问题，谈话就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了。

当时斯大林已经71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思维十分清晰。好几次我对此都深信不疑。城堡建筑附近降落了一架直升飞机。取下邮件的飞行员拉着两根T字形的白色带子着落了。斯大林和飞行员交谈起来，并且都用一些技术性词语问飞行员，直升飞机在空中摇晃是否减少了，直升飞机飞行员座位震动是否改善了等等。飞行员用专业词语回答问题，就好像在同空军的航空工程师谈话似的，他没有像我那样对斯大林的专业知识感到惊奇。在库拉河边散步的时候，斯大林突然问我，我能不能游过河去？我看了一下水流湍急的河水便回答说，我不能。斯大林想了一小会儿，看了我一眼

就开始谈论别的问题了。

这次会见之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斯大林身边的人对年事已高的斯大林的影响比早先更大。斯大林本人并不认识法尔卡什，只是在1948年2月为欢迎签署友好条约的匈牙利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过彼得·加博尔（并且，大约是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匆忙地和他交谈了几句）。关于他们俩人的工作和个人情况只有布尔加宁和贝利亚能够向斯大林通报。既然布尔加宁把法尔卡什，贝利亚把彼得都当成是自己的学生和被保护者，那么对法尔卡什和彼得的怀疑也就会涉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才提前为斯大林准备好了与我谈话的基调。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不愉快的，因为这种情况我早就觉察到了。我也明白了关于游过库拉河的问题。我在这次拜访索契的前几天曾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的老熟人和老布尔什维克什基里亚托夫家做客。共进午餐的还有波斯佩洛夫，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他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什基里亚托夫的别墅面对着海岸，离海滨浴场不远。在交谈时，什基里亚托夫提到，像他多次看见的那样，我能游到海中很远的地方，他还说这不太安全。现在，在库拉河岸边我一下子明白了，什基里亚托夫的评语和斯大林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我还明白了，斯大林也不认为这种游泳方式是正确的。斯大林也清楚，我会从他投给我的眼神中明白他的思想。应该补充说一句，起初我没有打算向斯大林提出无论是法尔卡什的问题，还是彼得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斯大林不喜欢向他提出可以由党来解决的个别人的问题。

有一次在谈话时，我向斯大林提出了关于我想看一看格鲁吉亚的愿望。那时按每千名居民来计算，格鲁吉亚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数量在苏联占第一位，我还听说，格鲁吉亚人已经达到最高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对他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表示出好奇心。斯大林立即

同意了我的打算，但他又补充说，如果我想看到真正有趣的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应该看一看巴库，以及丛林般井架区的石油开采。巴库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好的旅行路线，但我去了格鲁吉亚。

那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恰尔克维阿尼，他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向我推荐了很好的陪同，我与这些陪同一起在几天的时间里走遍了格鲁吉亚各地。当时在格鲁吉亚除了开采锰矿的恰图拉矿井外，没有重工业，恰尔克维阿尼告诉我，他们那时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刚刚开始建立格鲁吉亚的炼钢工业基础。当我在集体农庄来回穿梭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格鲁吉亚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在同样的土地上，同样地劳动着，格鲁吉亚集体农庄生产葡萄、茶叶、水果，当时在1000~1500公里以北的地方，俄罗斯集体农庄庄员却正在生产黑麦和土豆。比较多的日照，比较多的降水，总之一句话，良好的气候条件，并且在温暖的海滨有休养所，以及小小的格鲁吉亚民族善于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所有这一切都是较高生活水平的组成部分。

我是通过我在被俘期间读的前俄罗斯总理维特伯爵所写的回忆录才了解了第比利斯这座城市的，维特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就读于第比利斯并用格鲁吉亚语写了毕业论文。根据维持的说法，当时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乃是真正的巴比伦：城市居民几乎能用几种语言交谈。50年代初，城市到处都在进行蓬勃的建设：所建的博物馆和一些大厦，都可以和莫斯科相媲美。例如，以列宁名字命名的第比利斯学院一点也不比莫斯科大学逊色。人们自豪地向我展示格鲁吉亚1500年前的手稿，以及格鲁吉亚的历史建筑古迹。让我参观了斯大林创办的地下印刷厂。从矿井的一侧挖出一条通道直达地下印刷厂。但还是让沙皇警察给发现了：警察在搜查时向矿井深处扔下去一些点燃的报纸，并发觉在矿井的一个地方有一股气流将点燃的纸吹向了一边。于是他们走了下去并找到了印刷厂的人

口处。我到了斯大林的出生地哥里村。他们让我参观了那间斯大林小时候住过的房间，这间房间当时既是住房又是厨房和皮靴作坊。我仔细地参观了房间里磨损了的家具、小小的煤油灯及所有陈设，它们胜过任何语言地展示了造就了斯大林的极度贫困。当给我送来参观者留言簿时，我只写了两个词：“深受感动”。

有一次我们在恰尔克维阿尼那里吃午饭，当时还有其他客人应邀参加了这次午宴，恰尔克维阿尼给我们讲述了格鲁吉亚人民的历史。他认为，加盟俄罗斯拯救了格鲁吉亚人民，使格鲁吉亚人民免遭几乎完全被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消灭的厄运。他说，格鲁吉亚曾经一度拥有多么辽阔的领土。我一边听着介绍，一边头脑中浮现出裴多菲^①的一行字：“在匈牙利海的水中可以沉没北方的、东方的和南方的流星”。我对恰尔克维阿尼说，我们匈牙利人同样也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我们非常理解格鲁吉亚的历史。当恰尔克维阿尼说到，从前索契城是属于格鲁吉亚的，但后来在确定共和国边界时，加里宁^②提出理由说，格鲁吉亚境内有足够多的疗养区，而俄罗斯联邦也应有一些这样的疗养区，就把索契划归了俄罗斯联邦，这时我感觉到了一些遗憾。在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和喝了美味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后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格鲁吉亚要求归还索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将支持这一要求”。霎时出现了一片寂静，当我看了一眼共进午餐的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安东诺夫大将那惊奇的脸色时，我明白了，我触及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我的妻子出来圆场，她说道：“我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对此提出抗议！”“那

① 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诗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战斗中牺牲。

② 米·伊·加里宁（1875～1946），自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自1922年起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6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么好吧，”我笑着说，“如果我的妻子抗议，那么我就放弃支持”。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们又转到别的话题。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吃过像这些天吃的烤羊肉串。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我们品尝羊肉。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可到了第三和第四处地方我们就开始说，今天已经吃了几次啦。“那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烤羊肉！而我们这里的烤羊肉，在全格鲁吉亚都找不到！”这样一来还是没法拒绝：只好吃。不用说，不仅得吃，而且还得喝。每个村子都为自己采自己酿的葡萄酒而自豪，一般认为大多数酒只能在产酒的村子里喝，因为在运输过程中酒会失去自己原有的香味。格鲁吉亚出售的葡萄酒，多以产酒的村子命名，最终斯大林干预了这件事，才使得从那时起的格鲁吉亚葡萄酒有了统一的牌号。当时各集体农庄，对待这些措施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但这并不影响我处处都在用那磨得非常光亮的、镀了银的角形杯喝酒，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如果稍有不慎，那酒就会流到衣领里去。告别的场面就好像是一场徒手格斗，我在这场格斗中谢绝了很多人的礼品。几乎有一半多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都想给我送纪念品，并事先警告说，如果我不收礼品的话，那么将会使他们感到十分委屈。我参观了几个园艺农庄，毫无疑问，这些农庄要比我们类似的农庄更加现代化。除此以外，我还参观了一些根据规划需要采用更加现代化工具耕耘的、暂时还没有结出果实的果园。当然啦，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大量的和细致的工作。后来当我听说格鲁吉亚人是依靠贩卖南方水果富裕起来的时候，我平心静气地回答说，辛勤劳动是他们致富的根源。……

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除了我以外，政治局还派了科瓦奇·伊斯特万和萨拉伊·贝洛。这次代表大会当之无愧是“历史性的”，因为是在持续了30年的斯大林时代之后举行的。代表大会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发展中，还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的历史上都揭开了新的一页。出席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人和外国共产党的代表都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而后来就听到了赫鲁晓夫同志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这个报告我听起来很困难，因为赫鲁晓夫同志念得很快，此外，耳机经常使他的声音有些失真。加之我又不习惯听如此长的俄语报告。因此，到第二天清早，我就开始看《真理报》并一下子读完了登在该报上的总结报告（我的视觉记忆很强，我记忆阅读的文件要比记忆听到文件快）。说实话，虽然被称为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开始形成，并已经部分地成为其他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报告除了意识形态部分以外没有什么新东西。意识形态部分谈的是关于防止新的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可能性，一句话，即关于与产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关的形势，关于和平共处，无疑是意识形态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和创造性的运用。总结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软弱无力使我感到吃惊。报告谈到了恢复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加强党的民主，改变国家机关权力过分集中，加强对工业和农业的管理的措施，以及纠正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总之一句话，没有任何争论。这些讲话，特别是米高扬在自己的发言中非常尖锐地谈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受害者和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之后，引起了其他同志的注意。

其余人的大会发言，在实质上与总结报告的方针没有分歧，最多也不过是很小的细微差别。我对莫洛托夫的发言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在整个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是在关于同南斯拉夫人恢复党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他持有与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不同的意见。但是，莫洛托夫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出特别的观点，于是我认为在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在代表大会会间休息时，我经常同那些我早在共产国际工作时认识的同志们交谈。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多列士、陶里亚蒂、萨波托茨基、乌布利希、波利特、季姆-巴克、柯都维亚^①和其他老近卫军队员，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我认识了许多年轻的同志，他们当中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基地，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他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我的一本叫做《人民民主之路》的小册子，从中受益匪浅。我和贝鲁特^②同志交谈特别多，他被什么事揪着心，后来才弄清楚，他的担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担心是一致的。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右派方面的巨大压力（那几个月间，“修正主义者”一词还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词）。右派力量竭力恶化波苏关系，并出于这个目的而过分称赞“斯大林时期”在苏联被枪毙的波兰共产党员侨民问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已给他们平反）。贝鲁特和其他波兰领导人，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形势，竟撤销了共产国际于1937年通过的关于解散当时的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借口是波兰共产党内部混进了奸细和间谍。）他们好不容易成功了，所以现在出席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波兰党的领导人把很大的希望与取消共产国际的决定联系在一起。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希望是否能实现。我真担心，恐怕不会实现。因此（甚至也许与此无关）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该报的第一面几乎整版都刊登了在苏联获得平反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我不知道，这张报纸是如何出版的，是根据

① 安托宁·萨波托茨基（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尔特·乌布利希（1893～1973），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哈里·波利特（1890～1960），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季姆-巴克（1891～1973），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维克托里奥·柯都维亚（1894～1970），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

② 波列斯拉夫·贝鲁特（1892～1956），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党的领导人的决定，还是没有告诉他们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出版的，但是我相信，它的出现不仅对我，而且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员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认为，对于正在进行研究的问题采用这种强烈的加压的方法，是不会获得成功，并认为它们带来的危害比益处多。

同时，我利用为波兰党恢复名誉的机会，得到了与1936年解散匈牙利的共产党（确切些说，应该是匈牙利共产党）相关的文件。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同当时我曾经与之交谈过的并且当时参加讨论关于匈牙利共产党问题的库西宁^①同志告诉我说，匈牙利共产党根本就没有被解散。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十分意外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一直确信党被解散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当我本人还在坐牢时就听说关于1936年党被解散的消息，而到了1954年，我在存放在人事部的一份卡罗伊·基什的自述材料中见到了关于当时他被授权撤销布达佩斯党组织的情况。我得到并一口气读完了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或由执行委员会本身）提出的这个决定。该决定根本就没有提到解散党的问题，所谈的只是撤销党的老领导人的领导职务，第一个名字就是库恩·贝拉。依照这个决定，他被解除了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工作，内梅什^②同志和其他同志受到了党的各种处分。我非常痛心地看着这些记录材料，其中包括库恩·贝拉为自己辩护的声明。我立即明白了，如果我在匈牙利提起关于1936年共产党没有被解散的问题，并且共产国际的文件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布于众，那么党从这里什么好处也得不到，而且相反，这只会是火上浇油，对于本来就不能认为是健康的社会情

① 奥·维·库西宁（1881~1964），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书记，1940~1956年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② 内梅什·德热（1908~1985），1934~1936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

绪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匈牙利代表团正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意外地了解到，《真理报》将打算连续刊登大块文章以庆祝库恩·贝拉70岁生日。还在1955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已正式地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库恩·贝拉案件”的问题。年底，我接到从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打来的电话通知说，库恩·贝拉已被平反。我对此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在进行大会发言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乌布利希快速地写着什么，我在思考着，我们可用什么方式把代表大会的材料运用于自己的祖国。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内容（而根据赫鲁晓夫所作的总结报告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除了已经说过的，代表大会不会再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与我们在1953年6月以后所做的事情有着非常好的内在联系^①。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结报告只字不提当时苏联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那些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在纠正和消除斯大林生前所犯错误的过程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暗示和借口这些错误是制度错误的潜流得到了传播。也许，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过于敏感，这是因为在我国这种倾向比在苏联表现得更加尖锐，而且由于受整个形势的影响，这种倾向在我国比在苏联显得更危险和更公开。当我开始仔细研究代表大会的材料，特别是赫鲁晓夫所作的总结报告的时候，从党内外的右派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武器这个视角出发，我越来越清楚了，代表大会没有考虑到必然存在的来自右派的危险，首先是没有考虑到后来得到了修正主义的称谓。在正确的和从根本上消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

^① 1953年6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建议，拉科西被免除了政府首脑的职务，但是，保留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伊·纳吉被任命为总理，并提出了新的经济纲领。在匈牙利的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了政治解冻的最初迹象。

与之相联的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忘记了同右派的斗争。没有片言只语说明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性，因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企图利用我们改正错误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说明必须及时准备粉碎他们的这类企图……

必须考虑到来自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攻击，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打算从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中作出结论或者不准备在本国贯彻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应该预料到，修正主义者企图利用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论点作为为自己的观点和向共产主义运动展开广泛进攻进行辩解的理由。假如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了这样的危险性，那么就可以对不良过程产生一定的抵制作用。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于是修正主义者认为似乎代表大会“证实了他们的正确”，他们得到了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利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大会的总结不放，开始成为代表大会的“代言人”，“解释人”，成为“支持代表大会决议”的人。当然，所说的这一切，在代表大会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很难发觉的。当时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全神贯注于大会活动。在那段时间，由于缺乏相应的情报，很难透彻地分析国际上对代表大会的反应，其中包括我们的敌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然而，当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传达到社会各界时，这方面的情况立即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清楚和更加明确。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其中包括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只是在稍晚一些时候才知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于星期六闭幕。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宴会，欢迎各国代表团；举杯致词，接着就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照相。在拖得很长的照相时间里，我站在贝鲁特旁边，并且我们两人都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贝鲁特解释说，这是代表大会所引起的疲劳现象。他自己也感到很疲倦，他还抱怨说他自己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他打算在家里治疗。（这是我与贝鲁特的最后一次谈话。几天以后，我

已回到匈牙利，极其悲痛地得知，这位颇给人好感的、坚毅的和天才的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出乎我们大家意料地突然逝世了。)晚上在大剧院上演了一些什么文艺节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场是苏联国家最优秀的文艺团体举办的音乐会)。我们知道，新的中央委员会班子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还知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保留了斯大林近卫军的代表，其中包括莫洛托夫，虽然在此以前有传闻说，他不会入选主席团。选举福尔采娃^①同志为主席团成员对我们来说是新消息，我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同她见面时才得知这个情况的。我立即向她——第一位当选如此高级职务的女性表示祝贺。

第二天早晨，我好不容易才等到给我送来《真理报》，以便阅读关于代表大会闭幕的公报和关于领导机构组成的消息。我要赶快做完这件事，是因为我们计划好，匈牙利代表团将于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之后的第二天返回祖国。当人们给我打电话告别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当神秘地向我询问连我也不太明白的事情，问我是否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到中午我才打听到，昨天代表大会举行了秘密会议，讨论斯大林问题。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我以为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1955年12月20日，斯大林诞辰前一天，苏联大使馆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们别忘了以适当的方式在报纸上纪念斯大林诞辰。我将这个请求转达给《人民自由报》，这样第二天该报就登载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和纪念斯大林诞辰的文章。这件事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我记得，那段时间在国外

^① 叶·阿·福尔采娃(1910~1974)，苏共莫斯科市党委会第一书记，在党中央二月全会(1956年)上被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一年后她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的格罗同志，回国几天之后便来向我打听有关这篇文章的事情，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告诉他，文章是依照苏联同志的请求发表的。我现在才了解到，秘密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问题，当然，我想知道的是都说了些什么。我对苏联同志的对整个问题采取保密措施的神秘性感到不可理解，特别是我了解到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还有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总人数约 1600 人。

但在午饭以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列萨科夫和巴依科夫两位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列萨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工作并负责匈牙利事务，巴依科夫会讲匈牙利语，也在国际部工作。他们转交给我们两份赫鲁晓夫同志在前一天晚上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我们立即开始阅读报告。这份报告大致 60 页，当然是用俄文写的，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或用油印机复印多份而成。刚开始读报告，我便立即明白了，文件所说的内容是极其重大的事情。读完报告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这个报告带回匈牙利？”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能否把这个材料用于自己的祖国？”回答还是否定的，因为规定，报告中所讲的一切不得泄漏到代表大会会议厅以外。“至少，我们能否从报告中为自己做点摘录？”我们把没有肯定的回答当作同意的表示，我们立即开始了摘录工作。我开始用匈牙利文译给贝洛·萨拉伊同志，他快速地记下我说的话。我们大约花了 2~3 小时翻译和作笔记之后交还了报告的原文。我们很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于晚上回国了。

在火车上我们有时间仔细思考代表大会的意义。关于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的报告一直困扰着我们。尽管规定严格供内部使用，显然，报告的内容迟早都会在公开报刊上传出来，我们大家十分担心

此事^①。报告几乎一句也没有提到关于斯大林积极方面的事。在报告中，斯大林是一个血腥的暴君，他屠杀了最优秀的苏联共产党员，在军事方面和其他问题上犯下了骇人听闻的错误，给苏联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导致前所未闻的牺牲等等。就是这个作为共产主义一代人榜样的，在列宁逝世后成长起来的斯大林，竟一下子成了一个威望丧失殆尽，30年权利顶峰的尊严和荣誉被一扫而光的人。在这一份巨大错误和罪行的清单上几乎没有一句话提到关于他工作的积极方面，关于实际的功绩方面。立即就产生了许多疑问：所做的这一切是否正确？是否能更好地按照事情的实际情况用百分比来说明肯定的和否定的方面，说明成绩与缺点呢？关于产生这种非常现象的原因的解释是否能令人信服？是否会让敌人找到借口认定类似的现象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质本身有联系？为什么不能及时阻止这种现象？为什么斯大林的战友们能够容忍这种现象？他们为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以及他们又怎样解释自己在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助长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呢？

我想起了1953年6月，贝利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指责我的时候说，我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就是斯大林在苏联做过的事情。我很清楚，这种指责将会重新出现，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匈牙利学生”。纳吉·伊姆雷及其追随者现在又在依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影响，提出他们早在

① 1956年3月，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苏共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将带有“不予发表”字样的报告分送给各州委、各边区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以便使“全体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报告还在党、团会议上被宣读。还将报告分送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久以后报告就成为西方新闻工具财富。苏联第一次公布这个报告是在1989年。

1954年就打算提出的关于破坏法制的问题。当然，他们决不会半途而废，而是要采取进攻行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民主，反对苏联。既然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与我们大致相似，那么，在那些国家也将出现这些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做才能使党和国家避免严重的动荡？我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因库恩·贝拉生日而发表的那篇文章，以及甚至给波兰共产党恢复名誉，都是用来证明斯大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何等损失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在报告中一字不提与此相关的事，但是凡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会立即发现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

【专题说明】

陶里亚蒂与共产党情报局

(1951年1月)

与共产国际不同，至少在表面上，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不是一个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为有合法约束力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按照规定，其职能主要是在各党之间交流情况和经验，协商各自的政策和行动。自成立以来，情报局总共召开过三次大会。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的会议算是成立大会，1948年6月在罗马尼亚的会议和1949年11月在匈牙利的会议，都是组织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以协调欧洲各国党行动方针。情报局没有常设机构，平时的活动只是编辑和出版半月刊（后改为周刊）的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秘书处隔几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也是研究编辑方针和出版事宜。尽管苏联党有意通过情报局这种组织来控制 and 指挥各国共产党，但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不仅使得各国党对此颇有戒心和反感，也迫使斯大林满足于情报局当时的协商和交流的职能。

到1950年下半年，国际局势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骤然严重起来。冷战的新形势把两个阵营的冲突和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也对情报局提出了新的要求。1950年10月26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格里戈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意图提交了一份报

告，建议召开情报局秘书处会议，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的问题，并筹划在年底召开情报局大会，审议情报局组织巩固和机构加强的问题，设立情报局书记处并选举总书记。报告的核心问题在于强调，各国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行动要拿到情报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并接受情报局会议的建议和帮助，在紧急的情况下，有关党必须接受情报局的决定和指示。根据苏联党的计划，11月22~24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情报局秘书处会议。在会议上，法共代表按照约定作了关于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报告。报告要求改建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常设国际行动机构——情报局书记处。随后发言的保加利亚和苏联代表则进一步提出应设立总书记的职务。根据苏斯洛夫的意见，会议决议指出了情报局改变其职能的关键环节——必须执行情报局的决定和指示，同时情报局“重视”和“帮助”的范围也超出了欧洲，而扩大到亚洲和美洲的一系列国家。

情报局第四次大会原定于12月23日召开，但12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通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因健康原因无法如期赴会，建议会议推迟一个月召开。1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会议推迟到1951年1月25日召开，并提出让陶里亚蒂到苏联接受治疗。联共（布）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斯大林已经选定陶里亚蒂为未来情报局的总书记。12月20日陶里亚蒂抵达莫斯科，并住进了中央委员会疗养院。圣诞节前，斯大林给陶里亚蒂打了一个电话，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建议，请陶里亚蒂担任情报局总书记。然而，陶里亚蒂当时对此未置可否。在随后给意共领导人的信中，陶里亚蒂转述了斯大林的建议，并表示拒绝出任总书记之职。1月4日，陶里亚蒂以私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下面刊出的这封信，详细说明了他拒绝斯大林建议的理由。1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以联共（布）和意共中央的名义通电各党，因总书记人选未定，情报局大会继续推迟。为了讨论这一问题，1月19日和20日，陶里亚蒂分别与苏联领导人和来到莫斯科的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2月1日，意共领导人又举行了小型会议。2月12日，意共领

领导人联名向联共（布）递交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陶里亚蒂不能担任情报局总书记的职务。

陶里亚蒂在信中所述，既有他本人无法担任情报局总书记的具体原因，也有他对改变情报局职能不合时宜的总体看法，而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大多数欧洲共产党领导人的心里话。对于已经年迈体衰的斯大林，这不啻为一次沉重打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设立情报局书记处的事情，而直到1956年情报局本身解散时，拟议中的情报局第四次大会始终没有召开过。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高增训翻译）

No 04425

陶里亚蒂关于拒绝担任情报局总书记 致斯大林的信

(1951年1月4日)

绝密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已认真考虑了关于由我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提议。要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困难的，但我还是认为，现在意大利共产党是不能同意这个建议的。^①

现将我的意见简述如下：

1. 党的领导人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的总书记问题，主要已不是一个像地下斗争年代那样的简单的党内性质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对广大各阶层居民负有重要责任的问题。今天，未必能向意大利社会舆论解释清楚陶里亚蒂为什么要放弃对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党开展的所有重大运动和党的伟大创举乃至党的大部分威望，不仅在工人中，而且在中间阶层的居民中，都与陶里亚蒂同志的活动及其个人紧密相联。

在议会活动中，正像在整个政治生活中那样，这种情况表明，人们都把陶里亚蒂同志视为整个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在意大利，如果今后没有陶里亚蒂同志，那么共产党未必会保持住这一阵地。

^① 在档案原件上，斯大林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2. 我们的敌人在最富挑唆性的运动过程中公开谈论陶里亚蒂同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他们散布谣言，说陶里亚蒂同志要离开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岗位。最近一次这样做时值陶里亚蒂同志生病期间，运动声势浩大并得到政府本身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报纸也公开宣称，如果陶里亚蒂不再领导意大利共产党，那么解散共产党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3. 最近以来，我们党面对已经加强了的反动势力，基本上保持住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阵地。当政府仍旧更坚决地实行针对我们的迫害方针时，党将面临一个困难时期。但是我认为，已经成熟的党的领导一定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坚持党的合法存在地位，并且也能够扩大党的影响。

正是在这种时候，绝不能使党和工人阶级没有陶里亚蒂同志及其活动，否则，就意味着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阵线。大部分社会舆论，部分工人阶级以及我党的部分党员在谈到陶里亚蒂同志去国外任职时，都认为这样一来党就不可能再保持和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了。因此，党和工会的工作可能要遭到严重的损失。

4. 今年3月将举行地方政府选举运动（选举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灵、热那亚、威尼斯、波伦亚等）和意大利中部大部分的城市（佛罗伦萨、利伏诺等）都控制在我们手中的话，那么选举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政府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我们从这些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中赶出去。为了这一目的，政府通过了新的反民主的选举法。新的选举制度也已建立，这样一来，如果我党不想完全被从市政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的话，这一选举制度就迫使我们党与其他政党（不仅仅是与社会党人）缔结临时选举同盟。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策略问题。在地方党组织中，

将会出现不论是何人或在何处都与之缔结选举同盟的倾向，党的领导任务将会很难完成。

不言而喻，一般性的政治纲领（和平，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劳动计划”，保卫民主权利等）将是共产党的选举宣传的中心。使人担心的是，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在选举前到国外任职并居住外国，那么我们的敌人将围绕这一事实，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挑衅性的攻击。而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在反驳敌人攻击时将处于被动、困难的境地。陶里亚蒂本人的缺席将大大削弱我们的竞选宣传。

5. 任命陶里亚蒂同志去国外工作可能会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和普通党员中引起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开始，代表大会定于1月21日召开，后来又延期到2月底至3月初召开，其目的正是为了让陶里亚蒂同志能够出席并主持这次代表大会。我以为，按照代表大会议程，第一项（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为和平和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由党的其他领导人作为报告人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其他同志担任总书记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但是依我看来，这将会给本次代表大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不排除很快在党内可能出现非常紧张的局面。类似的情况过去曾发生过，那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被选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之后，便被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由此逐渐被削弱，以至到了1940年，我们党不得不解散中央委员会，并委托另外少数领导人恢复党的工作。

现在的形势绝对不同于当年的情况，但是更换党的领导人尚无准备，这样会使党措手不及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6. 至于情报局及其秘书处的组成问题，在我尚不了解那里工作的组织情况时，我不能发表明确的意见。那些目前还在布加勒斯特作为情报局秘书处成员的意大利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工作成效甚少。另一方面，我发现，最近（6~8个月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开展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有力的帮助，他们得到了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帮助，比从情报局得到的帮助要大得多。确切地说，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情报局制定政治总路线，而世界保卫和平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则善于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开展给予具体的和行动方向的指示。例如，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正出现重大的转变。基于这一经验，我们的印象是在当前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和发展世界保卫和平这样的运动^①，比通过像情报局这样的半合法组织（对于我们一些党来说情报局就是这样的组织）的活动，更容易达到改善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工作的目的。

7. 个人方面的理由当然是次要的原因，但我还是恳请注意我的处境。我在远离自己国家的国外曾侨居达18年（1926~1944年）之久。这是非常艰辛的。回到意大利后，我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我要在国内显示自己是一个“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家，并以此促进党的新的快速发展，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当还存在极大的可能性以进行合法的群众性工作的情况下，再次离开祖国，我觉得这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未必能在这方面如此有效地再次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建议，在情报局会议召开前夕，邀请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处的一位成员来莫斯科，以便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并由他来简述我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① 在档案原件上，斯大林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从我个人的考虑，我想建议邀请彼特罗·谢嘉同志，他是负责组织工作的，并且他手上的工作已安排妥当，这可使他能作短期出国。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1951年1月4日于莫斯科

No04426

格里戈良关于陶里亚蒂等待
答复给斯大林的信

(1951年1月12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陶里亚蒂同志的秘书路易吉·阿马德西于1月12日通知我，他受陶里亚蒂同志的委托约见我。我当天便会见了阿马德西同志。

阿马德西同志在谈话中提到，陶里亚蒂同志委托他了解，对于陶里亚蒂在给斯大林信中所陈述的问题，是否有了答复，因为这些问题解决关系到陶里亚蒂本人今后活动的安排，其中关系到他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做总结报告的准备，以及关系到对在罗马的同志今后工作的指导等问题。

阿马德西同志强调指出，据他观察，陶里亚蒂同志有些焦急，期望对他的信做出答复。

根据阿马德西同志的意见，陶里亚蒂同志打算1月底返回意大利。

对阿马德西同志的答复是：他通报的情况将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1951年1月12日

【专题说明】

爱伦堡拒绝在 犹太人集体信件上签名

(1953年2月)

在50年代初苏联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苏联的一批犹太族社会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学者和将军，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联名信，阐述他们对当时国际上轰动一时的犹太复国问题的看法。“巩固各民族和平”国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伊·格·爱伦堡（1891～1967）也在被邀请的签名者之列。爱伦堡认为这样一种做法不够理智，因此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下面这封信征求意见。在档案中没有发现斯大林对此信做出怎样反应的文件。也许是因为考虑了爱伦堡的意见，但更可能是斯大林的健康情况使他没有来得及做他想做的事情，总之，这封信从来没有见诸报端。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吴玉英、高增训翻译）

№06959

爱伦堡关于犹太人集体信件 给斯大林的信

(1953年2月3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决定打搅您，只是因为一个我本人无力解决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明茨^①和马里宁^②同志让我看了一封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的草稿，并建议我在信上签名。我认为我有责任提出我的疑问并请求得到您的建议。

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惟一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完全的同化，是犹太族人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民族的融合。这对于反对美国的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种宣传的企图是将犹太出身的人孤立起来。我担心，仅以出身联合起来的众多苏联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家的集体公开表态，可能会助长立场不稳的和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们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信件”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犹太人民”的定义，这一定义可能会鼓舞民族主义者和煽动那些还没有意识到不存在犹太民族的人们。

我特别担心的是，这封致“编辑部的信”对于扩大和巩固世界

① И.И. 明茨 (1896~1991)，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46年)，斯大林奖金 (1943年、1946年) 和列宁奖金 (1974) 获得者，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76)。

② 马里宁是 Я.С. 哈温松的笔名 (1901~1989)，1939~1943年为塔斯社负责人，后来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主编。

和平运动有影响。在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当遇到诸如为什么苏联不再开设犹太人学校和为什么不出版希伯来语报纸等问题时，我总是这样回答：战后已不存在以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家园，所以新一代犹太族苏联公民不希望从他们生活其中的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由犹太族的学者、作家、作曲家等人署名信的公布，可能会激化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崩得^①分子和我国的其他敌人正在进行的极其恶劣的反苏宣传。

在进步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看来，“犹太人”并不能作为某个民族的代表，“犹太人”一词在他们那里表示一种宗教属性，而挑拨者将会利用“致编辑部的信”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

我深信，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复活和推行犹太民族主义的企图，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它必然会导致背叛祖国，我觉得为此似乎应该刊登一篇或多篇由出身犹太人的人署名的文章，解释巴勒斯坦、美国资产阶级犹太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认为，《真理报》编辑部的说明，应重申广大犹太人劳动者对苏维埃祖国和俄罗斯文化的忠诚，这将有助于消除部分犹太人的孤立和根除反犹太主义的残余。我还觉得，这种举动能够有力地打乱国外挑拨者，并给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提供有力的论据。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要知道，我本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我才鼓足勇气给您写信。我谈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所以我下了决心请求您委托一名领导同志通知我：公布这样的文件是否适当以及我在该文件上签名是否适当。当然，如果这件事有利于保卫我们的祖国并有利于推动和平运动，那么我将立即在“致编辑部的信”上签名。

^① 1897年建于维尔诺的“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

致深深的敬意

伊·爱伦堡

1953年2月3日

附 件

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在这封信中，我们认为有责任表达我们的情感和对业已形成的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们希望号召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劳动者同我们一起认真思考涉及犹太人切身利益的某些问题。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冒充是全体犹太人民的“朋友”，甚至是全体犹太人民的代表，他们声称好像所有犹太人都有一致的和共同的利益，好像所有犹太人彼此之间都由一个共同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就是充当犹太富人帮凶和犹太劳动者最凶恶敌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每个劳动者都懂得，犹太人与犹太人各不相同，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挣得面包的人同金融巨头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由此可见，在犹太人中间存在着两大阵营——劳动者阵营和压迫劳动者的剥削者阵营。

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彼此分开。犹太劳动者非常希望能与全体劳动人民，同全球进步力量一起巩固和平的事业，自由和民主的事业。我们知道，在反对战争挑衅者战士的阵营中，犹太劳动者的代表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至于犹太人工业大资本家和银行寡头，那么他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国际冒险行为和挑唆行为的道路，间谍活动和破坏。

行动的道路，是一条策动新的世界战争的道路。犹太人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们同其他民族的富翁一样需要战争，因为战争是他们获得巨大财富的源泉。犹太富翁们推行的政策是与犹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相敌对的政策。这种政策将会给犹太劳动者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

犹太人的假“朋友”——犹太复国主义者喋喋不休地重复：全体犹太人的共同道路在哪里？全体犹太人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又在哪里？

以色列国家头目在关于犹太人“共同道路”、“共同利益”假仁假义的语言掩盖下，自以为可以证明，好像他们代表着全体犹太人的利益。但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以色列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代表谁，是为谁服务的吧。在以色列仅仅是一小撮富人享受着全部的财富，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犹太和阿拉伯居民却忍受着巨大的贫穷和困苦，过着半乞丐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以色列的统治者强迫以色列劳动人民接受犹太的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由此可见，以色列国家，如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一样，是一个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帝国，是一个为一小撮富人搜刮横财的帝国。由此可见，以色列统治集团代表的不是大多数劳动者组成的以色列人民，而是与美国垄断资本家紧密相联的以色列百万富翁。

这也就确定了当今以色列头目的所有政策。他们把以色列国家变成了策动新的战争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战争贩子的阵营的前哨。以色列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侵略势力反对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民族的前哨基地。

就在前不久，世界上所有诚实的人们都为特拉维夫的苏联使馆区炸弹爆炸的消息感到震惊。这次爆炸的实际组织者和鼓动者是当今以色列的执政者。他们在玩火的同时，加剧了美、英战争贩子制

造的紧张局势。

下面再谈谈成为美国情报机关分支机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联合会”代表哪些犹太人的利益？众所周知，苏联前不久揭露出了医生—杀人犯的间谍集团。大多数罪犯是受雇于“联合会”的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如 M. 沃夫西，M. 科甘，B. 科甘，A. 费尔德曼，Я. 埃廷格尔，A. 格林施泰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用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的生命，使苏联军队的领导干部失去工作能力，从而破坏国防。只有那些向帝国主义者出卖灵魂和肉体，丧失天良的人才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以色列国家的头目，“联合会”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头目，禀承冒险的犹太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真正的主子的意志，这是完全清楚的。这些主子就是为了新的利润而榨取各民族血汗的美国和英国的亿万富翁及百万富翁，这对任何人都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们这些本文的署名者，拒绝本·古里安^①、夏里特分子和其他战争贩子企图代表犹太人民利益的滑稽可笑的覬覦。我们深信，即使到目前为止仍然相信虚假的全体犹太人共同性的那些犹太劳动者，在认真思考之后，一定会同意我们关于犹太富人及其帮凶的政策的评价。

犹太复国主义头目在把以色列国家变成美国的世袭领地之后，把帝国主义的美国说成是犹太人的“朋友”，而对各民族的和平与平等的捍卫者——苏联进行诬蔑和仇视活动。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谁不知道，实际上，对于那些受到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器压榨的犹太劳动者来说，美国就是苦役折磨。谁不知道，正是在这个国家盛行最猖獗的反动种族主义，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此外，

^① 本·古里安（1886～1973），1948～1953年和1955～1963年（1961年除外），任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

还有谁不知道，反犹太主义也是那些受到美帝国主义普遍支持的法西斯集团的特征。

与此同时，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各民族，首先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用自己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拯救了人类免遭法西斯主义的桎梏，而使犹太人免遭完全倾覆和消灭殆尽的厄运。在我们的时代，苏联人民为了坚决捍卫有利于全人类的和平事业，前进在为和平而奋斗的战士队伍的最前列。

苏联已经实现了大小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兄弟般团结。犹太人劳动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同全体苏联劳动者一起享有自由的、欢乐的生活。

关于帝国主义的美国是犹太人的“朋友”的传说，是蓄意伪造的事实，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明显的诽谤者能够否认苏联各民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和坚不可摧，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苏联已确立的民族自由和各民族友谊面前，敌人正在竭力消除犹太人所具有的苏联公民崇高意识，妄图把俄罗斯的犹太人变成俄罗斯人民的间谍和敌人，同时还为反犹太主义这种可怕的过去的余孽的复活培育土壤。但是，俄罗斯人民懂得，苏联的最广大犹太居民是俄罗斯人民的朋友。无论敌人用任何诡计，都破坏不了犹太人民对俄罗斯人民的信任，都离间不了我们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关系。

全世界犹太人劳动者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以色列反动头目充当其走狗，有形形色色沃夫西、科甘、费尔德曼式的间谍和破坏者为其效力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全世界犹太人劳动者有一个共同的任務——即同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一起，捍卫和巩固各民族的和平与自由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不进行反对犹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及其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斗争，就不能捍卫犹太劳动者的生存权利，就不能成为为各民族的和平与自由事业而奋斗的真正战士。

犹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巩固同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友谊。各民族劳动者联盟越是牢固，和平和民主事业就越坚实。

让所有珍视和平和民主事业的犹太劳动者，联合自己的力量，结成广泛的联合阵线，反对犹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冒险主义政策，反对以色列头目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

因为注意到犹太人民所有进步力量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为了解关于不同国家犹太劳动者的真实状况和关于各民族为巩固和平而斗争的真实消息，我们认为在苏联出版一份专供苏联境内和国外的广大犹太居民阶层阅读的报纸应该是适当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首创精神将会得到苏联和全世界所有犹太劳动者的热烈支持。

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谢·伊·沃尔夫科维奇；

苏联坦克兵上将、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达·阿·德拉贡斯基；

“巩固各民族和平”国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伊·格·爱伦堡；

上将、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亚·格·克赖泽尔；

“镰刀与锤子”厂炼钢工人 П. П. 哈里顿斯基；

苏共中央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

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奥·赖津；

苏共中央委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鲍·利·万尼科夫；

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列·达·朗道；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萨·雅·马尔夏克；

苏联电影导演、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米·伊·罗姆；

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伊·伊·明茨；

爱伦堡拒绝在犹太人集体信件上签名

- 苏联重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 Д.Я. 赖泽尔；
苏联飞机设计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谢·阿·拉沃奇金；
苏联工程兵上将阿·达·齐尔林；
医生 О.А. 丘尔利翁斯卡娅；
苏联作曲家、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伊·奥·杜那也夫斯基；
莫斯科州孔策沃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 М.Н. 布里斯克曼；
莫斯科市第 19 中学教师 Д.Я. 赖欣；
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格·萨·兰茨贝格；
苏联指挥家、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尤·费·费尔；
苏联作家瓦·谢·格罗斯曼；
苏联飞机设计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米·约·古列维奇；
苏联坦克兵少将、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 С.Д. 克雷默；
苏联女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约·阿利格尔；
苏联科学院院士约·阿·特拉赫滕贝格；
科洛缅斯克重型机床制造厂厂长 Н.Э. 诺索夫斯基；
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达·费·奥伊斯特拉赫；
缝纫和针织工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卡冈诺维奇·玛丽娅；
俄罗斯联邦功勋医生 М.Я. 利普希茨；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边·莫·武尔；
“红色无产阶级”工厂车间主任、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С.В. 利夫希茨；
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伊·普鲁德金；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玛·纳·斯米特－法尔克涅尔；
“机器制造者”工厂车间主任、工程师 H.M. 兰茨曼；
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埃·格·吉列利
斯；

苏联教授、哲学博士马·莫·罗森塔尔；

苏联作曲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伊·布兰特；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达·利·塔尔穆德；

苏联沃伊托维奇车辆修理厂工人阿·伊·扬波利斯基；

苏联经济学博士 M.И. 鲁宾施泰因；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西·扎·罗金斯基；

苏联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列·阿·卡西尔；

新闻工作者 Я.С. 哈温松；

苏联第一国家轴承厂机械设计局局长、工程师 A.Г. 莱杰尔；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达·米·奇日科夫；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韦·伊·魏茨；

全苏和国际音乐家演唱者比赛获奖者 M.И. 菲赫滕戈尔茨；

苏联第一国家轴承厂车间副主任、工程师 И.Б. 科尔图诺夫；

苏联历史学博士、教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阿·萨·耶路撒冷斯基；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奥·格尔丰德；

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С.М. 梅谢列尔；

苏联第二钟表厂调整工 Б.С. 沙皮洛；

莫斯科市基洛夫区人民教育部副部长 К.И. 佐洛塔里；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谢·伊·布鲁克；

苏联历史学博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莫·缅·斯米林；

苏联经济学副博士 З.Ю. 洛克申；

莫斯科州列宁区农业局总畜牧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A.M.
沙弗兰。

【专题说明】

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关于 人事问题的决议

(1953年3月)

本专题只有一个文件，即1953年3月5日，在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根据官方的报道，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而这次会议是在当日20时40分结束的。这就是说，这位领袖终于在逝世之前实现了他从2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提出的从党和政府最高职位上“退休”的“愿望”，尽管可以断定，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在确定他绝无可能再醒过来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决定的。文件还显示，对于做出这样的决定起到积极作用的主要人物是当时最接近斯大林的三个“近卫军”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而对于各种机构的改组和任命表明，他们之间很快就将爆发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翻译)

№06238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记录

(1953年3月5日)

会议于20点开始，于20点40分结束

出席会议的有^①：

苏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安德里阿诺夫、阿里斯托夫、阿鲁季诺夫、巴巴耶夫、巴吉罗夫、巴伊巴科夫、别利亚耶夫、别内迪克托夫、贝利亚、别谢夫、鲍伊佐夫、博尔科夫、瓦加波夫、万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沃尔科夫、沃罗诺夫、伏罗希罗夫、加富罗夫、B. 格里申、И. 格里申、古谢夫、杰尼索夫、叶果罗夫、叶菲莫夫、叶弗列莫夫、日丹诺夫、热加林、朱可夫、扎夏德科、兹韦列夫、齐米亚宁、伊格纳托夫、伊格纳季耶夫、卡巴诺夫、卡冈诺维奇、卡伦别尔津、卡皮托诺夫、克茨霍韦利、基金、基里琴科、B. 基谢廖夫、H. 基谢廖夫、科夫里金娜、科兹洛夫、科涅夫、考涅楚克、科罗琴科、科尔恰金、柯西金、克鲁格洛夫、B. 库兹涅佐夫、H. 库兹涅佐夫、库利耶夫、库特列夫、库西宁、凯

①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1952年10月），选举出125名中央委员和111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中央委员Л.З. 梅利斯于1953年2月去世。除布尔加宁守候在斯大林病榻前外，还有有4名中央委员（安·亚·维辛斯基、Ф.С. 戈里亚切夫、М.Б. 米京、З.И. 穆拉托夫），10名中央候补委员（Г.В. 阿列克先科、С.З. 鲍里索夫、安·安·葛罗米柯、Г.Н. 扎鲁宾、Б.З. 科布洛夫、А.С. 潘友新、А.Н. 索洛维约夫、С.К. 托卡、В.И. 崔可夫、С.М. 什捷缅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宾、拉里奥诺夫、拉图诺夫、列别杰夫、卢基扬诺夫、马林科夫、马雷舍夫、马尔芬、姆格拉泽、梅利尼克、梅利尼科夫、米高扬、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莫斯科温、毛希宁诺夫、涅多谢金、尼古拉耶夫、尼亚佐夫、奥尔加诺夫、潘克拉托娃、帕托利切夫、别哥夫、别尔乌辛、波诺马连科、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佩洛夫、普拉斯、普罗科菲耶夫、普罗宁、普扎诺夫、拉扎科夫、鲁缅采夫、萨布罗夫、肖明、斯米尔诺夫、斯涅奇库斯、索科洛夫斯基、苏斯洛夫、泰别科夫、捷沃相、П. 季托夫、Ф. 季托夫、乌斯季诺夫、法捷耶夫、赫沃斯图欣、赫鲁尼切夫、赫鲁晓夫、切普拉科夫、切尔内绍夫、切斯诺科夫、沙亚赫梅托夫、什维尔尼克、谢列平、谢皮洛夫、什基里亚托夫、尤金、尤苏波夫、雅可夫列夫、雅斯诺夫同志

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亚历山德罗夫、阿尔捷米耶夫、阿哈佐夫、巴格拉米扬、巴克拉泽、巴西斯特、波格丹诺夫、邦达连科、布琼尼、布图佐夫、韦尔希宁、格德维拉斯、戈沃罗夫、戈格利泽、戈尔巴托夫、戈尔舍宁、格列奇科、格里戈良、达尼亚洛夫、德温斯基、杰缅季耶夫、德盖伊、叶皮谢夫、叶夫列莫夫、扎沃龙科夫、日加列夫、日梅林、朱可夫、扎韦尼亚金、П. 扎哈罗夫、С. 扎哈罗夫、伊利乔夫、卡扎科夫、凯洛夫、卡利琴科、卡嫩尼科夫、科兹洛夫、科马罗夫、科尔尼耶茨、科斯托乌索夫、Ф. 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娃、库洛夫、库梅金、拉达诺夫、拉齐斯、洛马科、卢钦斯基、雷科娃、马克萨廖夫、马立克、马利宁、马利诺夫斯基、马莫诺夫、马斯连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梅列茨科夫、梅尔库洛夫、米里谢普、涅杰林、尼基金、诺先科、奥尔洛夫、奥斯特罗维佳诺夫、В. 巴甫洛夫、Д. 巴甫洛夫、帕列茨基斯、帕尔申、皮德狄琴科、波马兹涅夫、波诺马廖夫、波波夫、波斯托瓦洛夫、普切利亚科夫、赖泽尔、鲁缅采夫、里亚比科夫、里亚斯诺

伊、谢尔久克、谢罗夫、西蒙诺夫、斯库尔科夫、索科洛夫、斯捷潘诺夫、斯捷潘诺娃、斯托列托夫、季莫申科、季霍米罗夫、图马诺娃、费奥多罗夫、福尔采娃、哈哈洛夫、霍赫洛夫、茨霍夫列巴什维利、齐伦、丘马琴科、沙塔林、沙什科夫、什科利尼科夫、尤金、尤马舍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同志

苏联部长：博利沙科夫、沃罗诺夫、库兹米内赫、库尔舍夫、普苏尔采夫、斯克沃尔佐夫、特列季亚科夫、福明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列别杰夫、塔拉索夫、费奥多罗娃

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

赫鲁晓夫同志请苏联卫生部部长特列季亚科夫同志通报约·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状况。

听取了特列季亚科夫同志的通报。

赫鲁晓夫同志说，从斯大林同志最初患病开始，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①的委员们就轮流守候在他的病榻旁。现在值班的是布尔加宁同志，因此他不能出席会议。

请马林科夫同志讲话。

马林科夫同志说：

大家都明白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承担着领导国家的重大责任。

大家都清楚，国家一刻都不能没有领导人。

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召开我国最高机关——

^① 在1952年10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选举了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即原政治局），是历届政治局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9人组成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他们是斯大林、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此时已经被排除在斯大林最亲密的小圈子之外。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这次联席会议的原因。

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托我向诸位报告从组织上对党和国家领导所做的一系列安排，以便这些安排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共同决议而予以通过。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托我报告，我们做出这些组织安排，依据的是在这个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非常困难的时刻，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对国家的整体运营的不间断的和正确的领导，这就要求领导人保证最紧密的团结，不允许出现任何混乱和惊慌，以便无条件地保证我们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国内外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接着请贝利亚同志讲话。

贝利亚同志说，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仔细讨论了我国国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缺少斯大林同志所面临的情况。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认为现在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必要的。常务委员会建议任命格·马·马林科夫同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提名马林科夫同志为候选人。我们相信，诸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在我们党和国家经受困难的时刻，我们只有一名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候选人——这就是候选人马林科夫同志。（众人的呼声响起：“正确！通过！”）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请马林科夫同志讲话。

马林科夫同志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委托，提出如下建议：

1. 关于任命拉·帕·贝利亚、维·米·莫洛托夫、尼·亚·布尔加宁、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众人的呼声响起：“正确！通过。”）

马林科夫同志说，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常务委员会全体成

员一致提出的。

2. 苏联部长会议设立一个机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以取代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规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成员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组成，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

3. 推荐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的该项职务。

任命尼·米·别戈夫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任命现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亚·费·戈尔金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书记。

4. 把苏联国家全部与苏联内务部合并成一个部——苏联内务部。

任命拉·帕·贝利亚同志为苏联内务部部长。

5. 任命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为苏联外交部部长。

任命安·雅·维辛斯基和雅·亚·马立克同志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同志为外交部副部长。

任命安·雅·维辛斯基同志为苏联驻联合国常驻代表。

有必要派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同志作为苏联大使和苏共中央代表常驻中国。

6. 任命苏联元帅尼·亚·布尔加宁同志为苏联国防部部长，苏联元帅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同志为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7. 把苏联对外贸易部与苏联商业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对外和国内贸易部。

任命阿·伊·米高扬同志为苏联对外和国内贸易部部长，И.Г. 卡巴诺夫为第一副部长，П.Н. 库梅金同志和 В.Г. 扎沃龙科同志

为副部长。

8. 把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机械制造和仪表制造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和机床制造部合并为一个部——机械制造部。

任命马·扎·萨布罗夫同志为机械制造部部长，解除他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9. 把交通机械制造部、船舶工业部、重型机械制造部与建筑和筑路机械制造部合并为一个部——交通和重型机械制造部。

任命 B. A. 马雷舍夫同志为交通和重型机械制造部部长。

10. 把电站部、电力工业部与通讯设备工业部合并为一个部——电站和电力工业部。

任命米·格·别尔乌辛同志为电站和电力部部长。

11. 任命 Г. П. 科夏琴科同志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2. 推荐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解除 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的该项职务。

13.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像党章中所规定的那样，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里只设立一个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取代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为了保证领导具有高度的工作效能，确定主席团由 11 名委员和 4 名候选委员组成。

批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由下列人员组成：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约·维·斯大林、格·马·马林科夫、拉·帕·贝利亚、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尼·谢·赫鲁晓夫、尼·亚·布尔加宁、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米高扬、马·扎·萨布罗夫、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尼·米·什维尔尼克、潘·康·波诺马连科、列·格·梅利尼科夫、M. П. 巴吉罗夫同志。

14. 由于通过了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

决定，所以撤消苏共中央主席团下属的外事常设委员会和国防问题常设委员会。

15. 选举 С.Д. 伊格纳季耶夫、彼·尼·波斯佩洛夫、Н.Н. 沙塔林同志为苏共中央书记。

16. 认为有必要让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任命尼·亚·米哈伊洛夫同志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7. 由于潘·康·波诺马连科和尼·格·伊格纳季耶夫同志调到苏联部长会议担任领导工作，由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调到陆海军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所以解除他们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马林科夫同志通报说，他向本次会议报告的各项建议都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提出来的。

马林科夫同志说，为了审议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本次联席会议的决议，常务委员会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①

接着，马林科夫同志通报说，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同志采取措施，对斯大林同志的各种文件和手稿，无论是现在使用的，还是已经归档的，全部进行整理。

马林科夫同志最后表示相信，在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非常困难的时刻，党的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定能保证对国家的整体运营的不间断的和正确的领导。

赫鲁晓夫同志问同志们对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建议是否有问题和意见，是否有其他的或者补充建议？（在座的齐声高呼：“通过，批准常务委员会的建议。”）

^① 这里指的是1953年3月15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

斯大林弥留之际苏共中央关于人事问题的决议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对所提的各项建议进行表决。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一致批准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组织安排的建议（见附件^①）。

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联席会议闭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
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联席会议主席 尼·赫鲁晓夫

① 即指会议的决议。该决议发表在1953年3月7日的《真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没有指明会议召开的日期，其中做了一些省略、改动和修订。例如，在公布的文件中，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人数是10人，而不是11人，因为这之中没有包括斯大林。还省略了关于库兹涅佐夫出使中国和整理斯大林的文件和手稿等细节。

【专题说明】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 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1953年3~8月)

斯大林去世以后，贝利亚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内务部长（此时的内务部已将国家全部合并进来）。到1953年6月贝利亚被罢免，在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一向令人畏惧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此，以前人们一无所知。对于苏联新领导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时所提出的罪名——间谍和反党分子，人们固然有理由表示怀疑，但贝利亚给一般人留下的阴森恐怖的印象恐怕是根深蒂固的。本专题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贝利亚的工作之一是致力于对内务部的改革和以往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当然，这未必可以证明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前没有参与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处理——虽然那时他失去了内务部长的头衔，他积极主张这样做也很可能是另有企图——为自己独掌政权进行铺垫，但起码能够表明，即使在这位曾主宰亿万人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看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苏联的内务部系统也是必须进行改造的。

本专题共收入17份档案，主要是内务部的报告和决定，或贝利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亚代苏联部长会议起草的决议。此外，作为本专题的附录，还收入了1957年劳改营管理局的一份统计资料。通过对比苏联这几年劳改营人数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贝利亚改革措施的效果。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8553

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重新 审理一些特大案件的命令

(1953年3月13日)

机密

为了加快审理由苏联内务部各处、局办理的一些侦讯案件，成立由以下人员组成的各侦查小组：

1. 被捕的医生案：

К.А. 索科洛夫——特大案件侦查室副主任，
А.В. 列夫申——特大案件侦查室主任助理，
В.В. 伊万诺夫——第四局局长。

2. 被捕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

О.М. 格里巴诺夫——第一总局副局长，
П.В. 费奥多罗夫——特大案件侦查室副主任，
Е.А. 茨韦塔耶夫——特大案件侦查室主任助理。

3. 被捕的前苏联军事部炮兵总局工作人员案：

В.Т. 博哈诺夫——第三局八处副处长，
А.В. 普京采夫——特大案件侦查室主任助理。

4.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地方工作人员
中 被捕人员案：

Д.П. 塔拉索夫——第二总局副局长，
В.Г. 采普科夫——特大案件侦查室副主任，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H.M. 萨奇科夫——第三局八处副处长。

责成 C.H. 克鲁格洛夫^①、B.З. 科布洛夫^② 和 C.A. 戈格利泽^③ 三位同志领导各小组的工作和审查各案件的结论。规定两个星期后结束工作。

向我汇报侦讯案件的审理结果。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13日

① 克鲁格洛夫，时任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后接替贝利亚任部长。

② 科布洛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时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③ 戈格利泽，时任苏联内务部第三管理总局局长。

№08554

贝利亚关于成立苏联公民被强制迁出 格鲁吉亚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命令

(1953年3月13日)

机密

鉴于苏联内务部收到大量投诉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全部错误行动的信件，反映一些公民在1951年被非法强制迁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由以下人员组成的委员会：

A. C. 库兹涅佐夫——苏联内务部第一特别处处长，

Я. A. 普列特涅夫——苏联内务部下属特别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Ф. A. 谢尔巴克——苏联内务部第一管理总局处长。

责成委员会审查1951年被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的每个家庭的材料，并对他们被强制迁出是否正确做出自己的结论。

委托C. H. 克鲁格洛夫、B. 3. 科布洛夫和C. A. 戈格利泽三位同志领导委员会的工作，并根据委员会的结论向我提出相应的建议。

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1个月。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13日

№08555

贝利亚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 给马林科夫的报告

(1953年3月17日)

机密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决定，考虑到苏联内务部被移交单位和有关部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现将有关把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其他各部系统的建议呈上。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规定，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其他部管理。

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附后。^①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17日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8556文件。

№08556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 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

(1953年3月18日)

机密

第832-370CC号

关于内务部移交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的决议草案

鉴于苏联内务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将苏联内务部的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分别移交给以下各部管理。

冶金工业部：

1. 北部边远地区建设总局（远北建设总局），
2. 黄金白金工业总局（“黄金总局”），
3.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矿区勘探开采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企业建设总局（“叶尼塞地区建设总局”），
4. 诺里尔斯克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联合工厂，
5. 第169 贵重金属精炼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第170 贵重金属精炼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第171 贵重金属精炼

厂（在新西伯利亚市），

6. 维亚尔特西尔斯克冶金厂。

苏联电站和电力工业部：

1. 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古比雪夫水电建设局），

2. 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建设局（斯大林格勒水电建设局），

3. 水利工程设计勘测研究局（水利工程设计局）。

石油工业部：

1. 石油和加工厂以及人造液体燃料企业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

2. 乌赫塔石油开采加工联合工厂。

交通部：

1. 公路管理总局（公路总局），

2. 铁路建设总局。

苏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

1. 土库曼大水渠建设局（中亚水利建设局），

2. 顿河下游灌溉和水利工程建设局。

苏联建设材料工业部：

1. 石棉工业总局（石棉总局），

2. 云母工业总局（云母总局）。

煤炭工业部：

伯朝拉煤田工业公司：

1. “沃尔库塔煤矿”联合企业，

2. “因塔煤矿”联合企业。

化学工业部：

1. 磷灰石和霞石精矿开采工业公司（“磷灰石”公司），

2. 基洛夫市化工厂建设局（基洛夫市建设局）。

苏联林业和造纸工业部：

林业总局。

海运和河运部：

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建设总局（伏尔加—波罗的海水利工程建设总局）。

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部：

加里宁格勒州琥珀开采和加工工业公司（第9联合工厂）。

二、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移交，冶金工业部（捷沃相^①同志）、电站和电力工业部（别尔乌辛^②同志）、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夫^③同志）、交通部（贝舍夫^④同志）、苏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科兹洛夫^⑤同志）、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尤金^⑥同志）、煤炭工业部（扎夏德科^⑦同志）、化学工业部（季霍米罗夫^⑧同志）、苏联林业和造纸工业部（奥尔洛夫^⑨同志）、海运和河运部（沙什科夫^⑩同志）、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部（波波维奇^⑪同志）：

1. 在10天期限内按至1953年1月1日的平衡表接收本决议第一项所列的企业、组织及其全部工作人员，在劳改营关押的犯人、劳改营机关工作人员和军事化的警卫人员除外，他们应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① И.Ф. 捷沃相，苏共中央委员，时任苏联冶金工业部长。

② М.Г. 别尔乌辛，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时任1953年苏联电力工业部部长。

③ Н.К. 巴伊巴科夫，苏共中央委员，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④ Б.П. 贝舍夫，苏共中央委员，时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⑤ А.И. 科兹洛夫，时任苏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部长。

⑥ П.А. 尤金，时任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⑦ А.Ф. 扎夏德科，时任苏联煤炭工业部部长。

⑧ С.М. 季霍米罗夫，时任苏联化学工业部部长。

⑨ Г.М. 奥尔洛夫，时任苏联林业和造纸工业部部长。

⑩ З.А. 沙什科夫，时任苏联海运和河运部部长。

⑪ 波波维奇，时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部部长。

2.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依照本决议从内务部接收的工厂和建筑单位不中断工作，即完成 1953 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和基建任务。

三、兹规定，苏联司法部通过与有关部签订的合同，保证内务部移交建筑单位和工厂的犯人劳动力。

№08557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理控告苏联空军和 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件的命令

(1953年3月18日)

机密

经检查证实，苏联武装力量部原反间总局即“锄奸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工作人员案件的侦查不客观，不深入，因该侦讯案件的材料对国家有重要意义，我命令：

1. 苏联内务部特大案件侦查室主任弗洛济米尔斯基中将对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工作人员的案件组织认真的检查，如有必要，吸收高水平的专家参加检查。

2. 第三局局长戈格利泽同志和第五局局长戈尔林斯基同志对检查侦查材料给予特大案件侦查室以必要的协助，必要时派有关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侦查。

3. 弗洛济米尔斯基同志在两周期限内结束工作，并将自己的结论呈报给我。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18日

№08558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议 1953 年一些基建项目 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

(1953 年 3 月 21 日)

机密

由内务部各单位施工的基建项目的预算额约为 1050 亿卢布，其中已经批准的 1953 年的基建工程计划为 133.4 亿卢布。

兹建议重新审议苏联部长会议以前通过的关于建设一些项目的决议，这些项目的建设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刻不容缓。

另外，由于一些建设项目需要消耗相当大量的金属、建筑材料和其他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劳力，停建或者取消这些建设项目是适宜的。

我认为必须停建或者完全取消以下所列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的总预算额为 492 亿卢布，它们 1953 年的基建工程计划为 34.6 亿卢布。

项目名称	预算额 (百万卢布)	至 1953 年 1 月 1 日已 完成(百万卢布)	1953 年计划 (百万卢布)
土库曼大水渠	17000	328.9	200
伏尔加河 - 乌拉尔自水渠	3745	13.0	4
伏尔加河 - 波罗的海运河	2825	618.0	700
顿河下游水利枢纽	1296	1.8	40
乌斯季顿涅茨基港	189	3.4	4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6卷

丘姆-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 铁路,伊加尔卡地区的船舶修 理厂、港口和村镇	7200	3724.0	240
共青城-波别季诺铁路	2288	595.7	699
鞑靼海峡海底隧道	3380	443.0	600
阿帕季特-凯维-波诺伊河铁 路	1220	109.5	120
瓦尔福洛梅耶夫卡-丘加耶夫 卡-奥尔加湾铁路	1230	—	50
丘古耶夫卡-谢尔盖耶夫卡铁 路	650	—	50
阿尔汉格尔斯克-鲁奇-梅津 铁路	1000	77.7	100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 克铁路	680	—	40
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铁路	620	—	70
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奥泽尔 诺夫斯基渔业联合企业公路	120	—	30
科拉半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摩尔曼斯克州和波罗的海沿岸 的公路	610	54.4	167
基洛夫市化工厂	4350	82.0	99
切尔诺戈尔斯克人造液体燃料 工厂	411	158.0	120
阿拉利切夫斯克人造液体燃料 工厂	350	81.0	80
奥谢特罗沃金属船舶制造厂	141	2.8	10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有关部应当就停建或取消上述建设项目，就合理利用未竣工的设施和物质技术资源，即保证未竣工设施的完好无损，制订出措施并呈报苏联部长会议。

现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①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21日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No08559文件。

№0855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 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

(1953年3月25日)

机密

第895-383CC号

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

考虑到以前通过的政府决议所规定的有些水利技术设施、铁路、公路和企业的建设对国民经济并非刻不容缓，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停建以下项目

1. 水利技术设施

土库曼大水渠，
伏尔加河-乌拉尔自流水渠，
伏尔加河-波罗的海运河，
顿河下游水利枢纽，
乌斯季顿涅茨基港，

2. 铁路和公路

丘姆-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伊加尔卡地区的船舶修理厂、港口和村镇，

共青城－波别季诺铁路，
鞑靼海峡海底隧道，
阿帕季特－凯维－波诺伊河铁路，
瓦尔福洛梅耶夫卡－丘古耶夫卡－奥尔加湾铁路，
丘古耶夫卡－谢尔盖耶夫卡铁路，
阿尔汉格尔斯克－鲁奇－梅津铁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铁路，
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铁路，
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奥泽尔诺夫斯基渔业联合企业公路，
科拉半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摩尔曼斯克州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公路，

3. 工 厂

基洛夫市化工厂，
切尔诺戈尔斯克人造液体燃料厂，
阿拉利切夫斯克人造液体燃料厂，
奥谢特罗沃金属船舶制造厂。

二、责成交通部（贝舍夫同志）、电站和电力工业部（别尔乌辛同志）、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科兹洛夫同志）、海运和河运部（沙什科夫同志）、冶金工业部（捷沃相同志）、石油工业部（巴伊巴科夫同志）、化学工业部（季霍米罗夫同志）

1. 在两周期限内制订出停建或取消第一项所述建设项目的措施及其开支预算，并上报苏联部长会议；

2. 采取一切措施使未竣工项目完好无损，使这些项目达到可以停建的状态，保证停建项目现有的辅助企业、设备和材料用于其他经济目的。

三、责成苏联国家计委

1. 根据本决议对有关部 1953 年的计划作必要修改；

2. 取消 1953 年为停建项目所拨的金属、燃料、建筑材料和设备的基金及其基金。

四、责成苏联国防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①）

1.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1 月 30 日第 273 - 126 - C 号决议，对承担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 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铁路和乌斯季博利舍列茨克 - 奥泽尔诺夫斯基渔业联合企业公路施工的 2 个筑路师，停止补充兵员。

2. 解散根据部长会议 1951 年 10 月 8 日第 3865 - 1767CC 号决议组建，并承担科拉半岛公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公路和波罗的海沿岸公路建设施工的筑路部队。

五、责成苏联财政部根据本决议修改 1953 年各部的收支平衡表。

^①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08560

贝利亚关于实行大赦 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3月26日)

机密

目前在劳动改造营、监狱和劳改队有 2526402 名被关押人员，其中被判处刑期 5 年以下者 590000 人，5 年以上 10 年以下者 1216000 人，10 年以上 20 年以下者 573000 人，20 年以上者 188000 人。^① 在全部被关押的人员中，对国家特别危险并关押在苏联内务部专门劳改营的罪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民族主义分子等等）共计 221435 人。

国家没有必要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大量的犯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妇女、少年、老人和病人。

被关押人员总数最近几年之所以增加，首先是因为 1947 年通过的关于加重侵吞国家和公共财产以及偷盗公民个人财物的刑事责任的法令，规定了非常长的关押期限。截止至 1953 年 1 月 1 日，在所有被关押的人员中，因上述罪行被关押者达 1241919 人。

根据 1939 年 6 月 15 日的命令，停止在此之前曾经实行的对劳动态度好的被关押人员进行工作日登记并予以提前释放的做法，这

^① 原文如此。这里被判刑人数总计为 2567000 人。

一情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被关押5年以下的人员中，有大量多半因初犯而且没有带来严重后果的罪行（擅自离职、渎职罪和经济罪、小偷小摸、耍流氓、小额投机倒把，等等）被判刑的人。

劳改营中有30000名因渎职罪、经济罪和军人犯罪行为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的犯人，其中有集体农庄的主席和生产队长、工程师、企业领导人，等等。

被关押的人员中，服刑的妇女有438788人，其中孕妇6286人，孩子不满2岁的妇女35505人。许多妇女有不满10岁的孩子，孩子寄养在亲戚家或儿童院。

关押地还关押着238000名老人——5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还有31181名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小偷小摸和耍流氓而服刑的。

约198000名在劳改营关押的人员患有严重的难治之症，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众所周知，在劳改营关押，长期脱离家庭，脱离习惯的生活条件和工作，使犯人和他们的家属及亲人处境非常困难，常常造成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整个生活。

这些被关押的人员大多数在劳改营中表现良好，劳动态度认真，可以回到诚实的劳动生活中去。

鉴于以上所述，建议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

命令草案规定，从关押地释放约100万名被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人，因渎职罪、经济罪、某些军人犯罪行为被判处不等刑期的人，孩子不满10岁的妇女，孕妇，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老年男人和妇女，患有严重难治之症的病人。

还建议对被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上的人员减少一半刑期。

命令草案还规定，撤消所有过去被判刑并且因本大赦法令被释

放的公民的前科，恢复他们的选举权。

建议大赦不适用于因反革命罪行、抢劫、大量侵吞社会主义财产和故意杀人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和被追究责任的人员。

在提出该命令草案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重新审议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还应减轻个别罪行的刑事责任。应责成苏联司法部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制订并提交必要的建议。

重新审议刑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每年有150多万人被判刑，其中近65万人被判以不同期限的剥夺自由，他们大多数是因为对国家无特别危害的罪行被判刑。如果不重新审议刑法，一两年之后，被关押人员的总数又会达到250万~300万。

命令草案是苏联内务部会同苏联司法部和苏联总检察长起草的。

拉·贝利亚

1953年3月26日

№08561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

(1953年3月27日)

批准苏联内务部贝利亚同志提交的在苏联司法部和苏联总检察长参与下制订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命令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3年3月27日

№08562

**苏联内务部长、苏联司法部长和
苏联总检察长关于实行大赦的命令**

(1953年3月28日)

秘密

第 08 / 012 / 85C 号

**关于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53年3月27日大赦令办法的命令**

为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53 年 3 月 27 日的大赦令，我们命令：

一、责成以下首长实施大赦令。

1. 对关押在劳动改造营中的犯人，由劳改营主任和劳改营检察长实施；

2. 对关押在监狱和看守所的犯人，以及被判处立即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员，分别由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内务部长、边疆区或州的内务局局长和相应的检察长实施；

3. 对关押在劳动改造队、羁押解送监狱和未成年人劳教队的犯人，分别由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局长或劳改队管理处处长、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处长和相应的检察长实施；

4. 对正在由内务部和检察院侦查的被侦查人员，由这些机关

的首长和相应的检察长实施，对正在由检察院机关侦查的被侦查人员，由相应的检察长实施；

5. 对现归法院机关管理的已被判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由相应的法官实施；

6. 对被判处劳役的人员，由劳役检查机关的首长实施。

二、解除惩治或对惩治期限减半，根据对每个应赦免人员所作的并经本命令第一条所述主管人员批准的专门决议实施，对现归法院机关管理的人员，根据相应法官的决定实施。

决议和决定应加盖刻有国徽的印章证明无误。

三、若犯人由法院裁定的刑期因大赦令第四条减半，减刑后剩余的刑期至大赦令颁布之日已经完全服完，则解除对该犯人的惩治，并撤消前科。

四、所有被判处劳役的人员，由劳役检查机关首长下达指示立即免于继续服刑，并将这一指示书面通知免于继续服刑的人员。

五、对大赦令第五条所列的侦讯案件和法院尚未审理的案件停止诉讼，内务部和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由这些机关的首长和相应的检察长做出决定停止诉讼，检察院机关办理的案件由相应的检察长做出决定停止诉讼。应将停止诉讼的决定通知被告人。

六、对应予大赦的犯人，如果对他们的判决已经有法律效力但尚未执行，由做出判决的法庭裁决，免于惩治或者减少他们的刑期。

七、对大赦令第一条所述的犯人，不论什么机关根据刑法第几条确定的惩治，一律予以大赦。

八、对大赦令第二、第三条所述人员，除因大赦令第七条所列罪行被判罪或追究责任的人员外，不论其刑期长短和根据刑法第几条被判罪或追究责任，一律免于惩治。

九、对外籍犯人，根据与苏联公民相同的原则实行大赦。

十、根据大赦令第七条，对因反革命罪行、大量侵吞社会主义财产（金额在 50000 卢布以上）、抢劫、故意杀人被判处 5 年以上徒刑者，以及因这类罪行被追究责任者，不实行大赦。

十一、对根据大赦令第一、二条应予大赦的犯人以及正在被侦讯和审判者，内务部和警察机构应停止侦查。

十二、对大赦令颁布之前所发生的行为的各种法院罚款和行政罚款，一律停止征收。

十三、首先从关押地释放未成年人、孕妇和有年幼子女的妇女，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和居住在当地的人。释放孕妇和患有残疾者，根据由非军职医生组成的医务小组出具的证明文件实施。

十四、对所有的劳改营、劳改队和监狱外有孩子应从关押地释放的妇女，须通过内务部机关出具正式证明，确认女犯人有不满 10 岁即 1943 年 3 月 27 日以后出生的子女。内务部机关应立即将上述证明发出。

十五、劳改营主任、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局长、劳改队管理处处长和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处长必须：

1. 若大赦释放的病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无亲属，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将他们安置在残疾人养老院和医疗机构内；

2. 将从关押地释放但无父母的未成年人送往孤儿院、技工学校 and 工厂培训学校，或者安排他们在工业、建筑业和农业中就业。

十六、向每个从关押地释放的犯人本人发放规定格式的因大赦解除惩治的证书。

十七、由警察机关根据关押地发的释放证书，向从关押地释放的人员发放释放地的身份证或者被释人员所选择的居住地的身份证。

十八、由警察机关给根据大赦令第六条撤消前科的所有公民更换身份证（有条件）。

十九、特别移民中在劳改营服刑的犯人若根据大赦令释放，从关押地释放后应押送至迁移地与家庭团聚。

二十、所有从关押地释放的人员，发给相当于在路途期间标准伙食费的路费、服装和鞋子（若被释放的犯人没有自己的服装和鞋子）以及至所选居住地的车船票。

二十一、内务部和警察机构在人员多的发运地、铁路枢纽站和江河码头会同劳改营、劳改营管理局或劳改队管理处组织接待点，帮助从关押地释放的人员搭乘火车或轮船，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

二十二、1953年6月1日前完成执行本命令的工作。

命令自电报发出之时生效。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苏联司法部长 K. 戈尔舍宁

苏联总检察长 Г. 萨福诺夫

1953年3月28日

№08563

贝利亚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 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3月28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3 月 18 日的决议规定，将劳改营、劳改队及其机构和军事化的警卫队移交苏联司法部。

有鉴于此，现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和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及其下属的全部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和地方机构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呈上。

决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劳改队及其工厂和建筑单位连同生产计划、建筑计划、全部物资和技术设备以及 1953 年的拨款一并移交。

苏联内务部编制内只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的特别集中营和关押原战俘中被判刑的战犯的集中营。

我们和司法部一起起草并得到戈尔舍宁同志赞同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附后。

拉·贝利亚

附 件

第 934 - 400CC 号

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 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

为了贯彻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3 月 18 日第 832 - 370CC 号《关于苏联内务部移交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责成苏联司法部对被剥夺自由的犯人（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除外）进行管理、看守和人员登记，以及对少年教养队和少年收容遣送站的被教养人员进行管理。

二、将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劳改队管理处、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一并移交的还有：

1. 物资、财物、楼房、设施、供应的营具——按截止至 1953 年 1 月 1 日的平衡表移交。

2. 储备的材料、设备、食品、被服及劳改营的其他财产。

3. 工业建设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农业计划（其中包括杜布拉夫内特别劳改营和奥焦尔内特别劳改营的建设计划）、财政计划、贷款计划和 1953 年的拨款。

4. 为移交单位和部门规定的编制和实有人数。

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司法部（戈尔舍宁同志）在 10 日期限内交接完毕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和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及其分支机构和地方机构。

三、责成苏联内务部向苏联司法部移交。

1. 135 名在苏联内务部中央机关负责劳改营和劳改队问题的人员及其编制；

2. 350 名在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内务部或内务局做劳改营和劳改队在押犯人登记工作的人员及其编制。

四、为保证劳改营和劳改队的食品、被服、其他食品以及材料和技术设备，责成苏联司法部在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内组建劳改营劳改队供应局和在各地的地区供应处。

供应局和地区供应处由苏联内务部腾出的军需供应人员及其编制进行补充：中央机构的编制为 154 人，地区机构的编制为 930 人。

苏联内务部在上述地点向苏联司法部移交必要面积的仓库和办公用房。

五、为了改善对劳改营和劳改队的领导，责成苏联司法部（戈尔舍宁同志）在 1 个月期限内将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的机构设置和编制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议，应注意进一步大精简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的中央机关及其地区分支机构。

六、兹规定：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3 月 18 日第 832 - 370CC 号决议由苏联内务部移交其他部管理的工厂和建筑工程的供应部门，向为这些工厂和建筑工程派出劳力的劳改营供应食品和被服。

七、转业到苏联司法部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及其下属部门和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保留原有的衔级、职务工资、个人工资、优待和原有的食品、被服、医疗、卫生、疗养

服务保障制度，以及现有的住房。

八、兹规定，被判处剥夺自由的特别危险的国事犯：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成员、无政府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白俄分子、其他反苏组织和团体的成员、有敌意活动的其他危险分子以及原战俘中的战犯，在苏联内务部的特别集中营和监狱中关押。

责成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局领导内务部关押原战俘中被判刑战犯的特别集中营和集中营，并负责其警卫工作，同时规定在监狱管理局内组建特别处。

由贝利亚同志重新审查并批准苏联内务部特别集中营的机构设置、编制和地址。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格·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秘书长 M. 波马兹涅夫

1953年3月28日

№08565

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 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

(1953年4月4日)

机密

第 0068 号

苏联内务部查明，国家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以下情况：粗暴地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刑讯手段——毒打被捕者，将双手铐在背后一昼夜，个别情况竟长达数月，长时间地不准睡觉，将被捕者剥光衣服关在冰冷的单人囚室内，等等。

根据苏联原国家全部领导人的指示，拷问被捕者在列福尔托沃区监狱和一些内部监狱专门修建的刑讯室内进行，委托由专门挑选出的监狱工作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拷问，并且使用各种各样的刑具。

这种残暴的“审讯方法”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无辜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作伪的侦查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把事先炮制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

这种恶劣的侦查方法把办案人员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国家安全机构也转移了与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作斗争的注意力。

我命令：

1. 严禁在内务部机构中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在侦查中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准则。

2. 取消苏联原国家安全部领导人在列福尔托沃区监狱和一些内部监狱中设立的对被捕人员进行体罚的刑讯室，刑讯用的所有刑具一律销毁。

3. 将本命令传达给内务部机构的全体侦查人员，并且警告：今后若违反苏联法律将最严厉地追究责任，直至不仅将直接责任人而且将其领导者送交法庭。

苏联内务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4月4日

№08566

贝利亚关于重新审理公民 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

(1953年4月14日)

机密

第 00112 号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3 年 4 月 11 日第 1007 - 430CC 号决议，
我命令：

一、由苏联内务部第一总局局长费多托夫同志（召集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科奇拉瓦什维利同志、苏联内务部“II”处处长阿利金同志、苏联内务部第一特别处处长库兹涅佐夫同志、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伊万诺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 1 个月期限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1 年 11 月 29 日第 4893 - 2113CC 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案件。

二、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全部特别委员会决议，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遣送回原籍。委员会所作的并经苏联内务部副部长批准的案件复审结论，应作为取消苏联国家全部特别委员会决议的依据。

三、从特别移民地释放虽然苏联国家全部特别委员会未作决议但是被非法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制迁出的全部人员，并遣送回原籍。委员会所作的并经苏联内务部副部长批准的案

件复审决议，应作为释放他们的依据。须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的案件，由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审议。

四、向注册的每个从特别移民地释放的人员发放规定格式的特别移民地释放证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决议或苏联内务部决议，应作为发放证明的依据。

五、责成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局长斯达汉诺夫同志保证不加以限制地向所有从特别移民地释放的人员发放身份证。

六、内务部和警察机构停止侦查根据本命令应从特别移民地释放的人员。

七、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将做出决议释放他们。

八、责成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古宾同志。

1. 于今年5月5日前，向苏联内务部“II”处提出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向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遣送特别移民地被释放公民及其财物所需车皮数量的申请。

2. 有组织地分批将特别移民地的全部被释人员遣送回原籍；为每批人员派遣护送队，以便在途中安排饮食和医疗服务。

3. 对从特别移民地获释并表示愿意自费自己返回原籍的人员，给予协助。帮助愿意留在原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九、苏联内务部“II”处处长阿利金同志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派遣一批负责人员，协助执行本命令。

十、责成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杰卡诺佐夫同志保证：

1. 通过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有关机构接收从特别移民地返乡的公民，将他们从火车站接回并安置在原居住地；

2. 对从特别移民地返乡的公民进行登记。

十一、苏联内务部军需供应局局长戈尔诺斯塔耶夫同志按哈萨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的申领单拨出食品，保证特别移民地的获释人员在集结地和返回原籍途中的饮食。同时拨出保证运输的燃料。

十二、苏联内务部铁路和水路运输处处长伊什科夫同志按苏联内务部“II”处的申请，保证向始发站拨出车皮。运输按军人类别实施。

十三、苏联内务部财务处处长兹韦列夫同志拨出与运送特别移民地获释人员回原籍有关的开支费。

十四、特别移民地获释人员和撤消注册人员的登记卷宗，交苏联内务部第一特别处保管。

于1953年6月10日前向苏联内务部报告执行本命令的情况。

苏联内务部部长 拉·贝利亚

1953年4月14日

№08567

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送
反映德意志族人状况的匿名信的附信

(1953年5月27日)

机密

第60/6号

现将一封反映德意志人（苏联公民）状况的匿名信寄给你们，信是卫国战争期间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库班河地区、乌克兰、罗斯托夫州和图拉州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人写的。

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拉·贝利亚

1953年5月27日

附 件

匿名信：……“看吧，嫉妒我是苏联公民吧！”

（马雅可夫斯基赞颂苏联护照的诗句）

尊敬的贝利亚同志！

根据最近的一次登记，1941年至1945年战争前在苏联生活着

约 200 万德意志人。

您是否清楚地知道，由于苏联政府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人的命运成了什么样？

请不要将信一丢了之，因为这不是什么敌人给您写的信，不是敌人！我当年是苏维埃制度的热情捍卫者；就是现在，尽管受了种种委曲，我还是对解决生活在苏联的德意志人的问题寄予希望。

我们苏联德意志人从自己早就住惯了地方——从我们祖先大约 200 年前就居住的乌克兰、高加索、克里木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被驱赶出来。

我们不是作为战胜者来到俄罗斯的。在苏维埃政权创建的年代，我们的父辈也曾帮助驱逐万恶的地主和资本家。

在合作化年代，德意志人中有过和其他苏联农民中一样残酷的贫农和富农之间的斗争，在这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性斗争中，难道德意志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他们的俄罗斯族同志的帮助下作为很少吗？

希特勒强盗进攻时，我们被遣送到苏联的边远地区，变成了特别流放者，被驱赶到矿山、森林以及铁路和公路建设工地，等等。

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面包和伙食的供应标准几乎和监狱一样。

我们，在苏联的德意志人，未经法庭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受惩治。但是我们当时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人员对我们说，这是临时措施，迫于战争的残酷要求采取的临时措施。

大多数人相信了这番话。

苏联人民遭受了希特勒暴徒带来的无数令人恐怖的苦难，希特勒暴徒和我们一样说德语，而且让所有德意志人感到羞耻的是，他们也说自己是德意志人。

但是我们，苏联的德意志人，是在苏联出生的，在苏联受的教

育！战争以苏联政权的胜利而告终。

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生活在苏联的德意志人，以他们在矿山、伐木场、集体农庄的田野及其他地方的辛勤劳动，也为赢得这场胜利出了大力。

不错，也有这样的德意志人：他们投靠了敌人，帮助了敌人，不想干活，搞反苏宣传。

但是，和忠诚正直的大多数相比，这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撮。

难道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中就没有叛徒？究竟为什么苏联政府因为个别叛徒的罪恶就惩罚所有生活在苏联的德意志人！战争8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状况却很少变化。

这不是无稽之谈。

我给您列举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和其他苏联公民相比处于受侮辱和无权利的地位。

1. 苏联宪法第118条：苏联公民有劳动权。是的，德意志人有在森林、矿井、矿场和集体农庄——在所有需要重体力的工地上劳动的权利。

德意志人是热爱劳动的人民。您检查一下德意志人和其他苏联公民的劳动生产率，德意志人在哪里都不落后。

为什么苏联政府至今不给过去被动员去矿井、伐木场等地的所有农艺师、教师、医生等从事专业的权利和条件。

您给国家安全部特派监管部门要这些资料，那里一清二楚。

2. 苏联宪法第119条：苏联公民有休息的权利。是的，德意志人和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每年都有假期。但是，德意志人作为交给不受监督、权力无限的特派监管人员看管的特别移民，无权到离他们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因此，“广泛的疗养院和休养所”等等，对德意志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我再重复一遍，德意志人干的是最艰苦的工作，当然也需要休养和治疗。

3. 苏联宪法第 121 条：苏联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是的。德意志人的孩子可以读到 4 至 7 年级，但不是上母语学校，而是上俄语学校。

在苏联的德意志少年满 16 岁时，作为特别移民的子女要领取注有“特别移民”的身份证（世代相传！您为什么欺负孩子？战争爆发时他们不过一两岁）。这些少年“罪犯”已经无法考虑上学的事了，因为中等和高等学院远离德意志族特别移民的住地，在 10~15 公里以外……

您查一查，一共有多少德意志人在正式的中学和高等学府上学。

4. 苏联宪法第 123 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是不可违反的法律。这一条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因为我们头上有国家全部来的特派监管上帝和沙皇，我们必须每月向他报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者让我们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个土皇上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退给这位专制独裁者，他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惩罚。

您不相信？

您可以作一次公正的调查。

5. 苏联宪法第 126 条：保障苏联公民有结社的权利。

德意志人有权加入工会组织，但是却没有当选任何职位的权利！

另外，您查一查，自 1941 年起有没有接纳哪怕一个德意志人为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这究竟是谁的指示？

要知道，即使在德国也有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

6. 苏联宪法第 127 条：保障苏联公民人身……不受侵犯。

特派监管机关对在苏联的德意志人布下了严密的密探和告密网。每 15~20 个人指派 1 名密探，他们也是德意志人，他们必须报告自己同事的一言一行。密探是通过讹诈和恫吓招募的。根据这

些密探大都为不实之词的报告，残酷无情地审判和流放德意志人。您查一查特派监管机关的档案和特别移民的个人卷宗。

7. 苏联宪法第132条：普遍兵役制是法律。

近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在苏联军队中服役。

您对这一情况很清楚。

您让德意志人成为平等的公民，他们会像祖国忠诚的儿女一样，高兴地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可是现在苏联的德意志人是偏心后娘的孩子。

8. 苏联宪法第135条：苏联公民有参加选举的权利……每一个苏联公民都可以当选……

德意志人也有选举权。但是，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名德意志人当选为代表，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名德意志人参加某个选举委员会。

这一情况也不难核查。

在苏联，在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德意志人的权利就是这样的！

贝利亚同志！

我们等了好久！这种有损尊严的状况难道没有终点？

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嘱，为了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希望有公正！

贝利亚同志！

我不能写明确切地址，我已经不止一次因为这种天真而吃苦头。

不止我等待回答向您提出的问题，生活在苏联的所有德意志人都在等待回答。

1953年5月8日

№08568

贝利亚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 民族构成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53年6月8日)

机密

第98/6号

苏联内务部在检查中查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机构及其下属的州、区机构中，白俄罗斯族业务工作人员的配备令人不满意。

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的中央机构中，22名处长中只有7名白俄罗斯人；内务部各州内务局的143名领导业务干部中只有37名白俄罗斯人；1921名业务工作人员中只有661名白俄罗斯人；125名侦查工作人员中只有33名白俄罗斯人。

如果再看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各区和州的机构，那里使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更糟糕。例如，内务部各区内务处的173名处长中，只有33名是白俄罗斯人。

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警察机构中也存在。例如，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警察局的局长和3名副局长都是俄罗斯人；州警察局的115名处长只有36名白俄罗斯人。

在白俄罗斯西部的布列斯特、格罗德诺、巴拉诺维奇、莫洛杰奇诺、平斯克和波洛茨克各州，选拔民族干部的工作非常不得力。

例如，上述各州内务局的101名领导干部中，属于这些州的本地人只有2名；内务机构的840名业务工作人员中，西部各州出生的人只有17名。

白俄罗斯西部的市、区两级内务机构中，使用西部各州当地白俄罗斯人的情况更糟糕。西部各州市、区内务处的82名处长中，竟没有一人是这些州的当地人。

警察机构在使用白俄罗斯干部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西部各州警察机构的150名领导干部中，只有1人是当地人；市、区警察处的92名处长中只有5名是西部各州的当地人。

苏联内务部已经采取了措施：免去М.И. 巴斯卡科夫同志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的职务，任命白俄罗斯人М.Ф. 杰奇科同志担任该职；任命白俄罗斯人В.Т. 波利季科同志、С.И. 霍列沃同志、И.М. 斯捷利马霍同志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并任命白俄罗斯人И.Г. 沃罗诺维奇（共和国警察局局长）为主管警察事务的副部长。另外正采取措施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机构配备经过考查的当地干部。

但是，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求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常研究为内务部机构配备白俄罗斯族工作人员的问题。

应当指出，在共和国、州、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在使用白俄罗斯族干部方面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在工作中使用当地的白俄罗斯人即在这些州出生的人不得力。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西部各州党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在西部各州生活的白俄罗斯人。例如巴拉诺维奇州委机关的63人中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即本地出生的党的工作者）很有代表性。波洛茨克州党委机关中也存在这种状况。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市党委的 152 名工作人员中，白俄罗斯人只有 57 名，其中当地人 56 名；西部各州区党委的 1235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102 人是这些州的当地人。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的苏维埃组织中，使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并非好一些。例如，各州执委会的 1408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114 人是白俄罗斯人，即在当地出生的人，而各市执委会的 231 名工作人员中，总共有 25 人是当地的白俄罗斯人；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是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

知识分子中的状况也是这样的。

明斯克市高等学校、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和各科研所的 1576 名教授和教师中，白俄罗斯人仅 738 名，而且只有 40 人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出生的人。戈尔基农学院的 164 名教授和教师中只有 48 名白俄罗斯人，而且在该学院的教授和教师中，没有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内出生或生活过的人。戈尔基农学院的全部课程都是用俄语讲授，而在 1935~1936 年以前，该学院是用白俄罗斯语讲课的。

应当指出，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是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除使用白俄罗斯干部的状况令人不满意的，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也有严重的缺点。

由于缺乏应有的从组织和经营上巩固集体农庄的工作，庄员收益不多的集体农庄数量相当多。

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促进农民对集体农庄工作的关心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1952 年在东部各州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平均分配：

货币 37 戈比，粮食 1 公斤，土豆 1.4 公斤，而在西部各州的集体农庄，分配货币 27 戈比，粮食 1.3 公斤^①，土豆 0.5 公斤。

1952 年全年 1 个庄员的平均工作量为 1 个工作日^②，而在西部各州的集体农庄为 154 个工作日。

当然，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白俄罗斯形成的局势。依我的意见，应当解除尼·谢·帕托利切夫同志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工作，提拔米·瓦·齐米亚宁同志担任该职务，齐米亚宁同志系白俄罗斯人，原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前不久调苏联外交部工作，任司长。

拉·贝利亚

1953 年 6 月 8 日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疑有印刷错误。

№08570

**贝利亚关于限制苏联
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
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3年6月15日)

机密

第 109 / 6 号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4 年 11 月 5 日决议，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下设立了特别委员会，授权它对认定为社会危险分子的人员采取以下惩治措施：

流放和驱逐 5 年以下，
在劳改营关押 5 年以下，
将外国籍人员驱逐出苏联。

在以后的数年中，特别委员会的权力通过上级机构的一系列决定相当广泛地扩大了。

根据联共（布）中央决议，自 1937 年起，特别委员会开始审理案件，对指控为托洛茨基右派组织、特务破坏组织和恐怖组织的成员，以及这些组织的参加者和被判死刑的叛国者的家庭成员，做出在劳改营关押 8 年以下的判决。

国防委员会 1941 年 11 月 17 日的决议授权特别委员会，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提出的反革命罪行案和反对苏联管理制度的特别危险罪行案，在苏联检察长的参与下对被告人裁定直至枪决的惩治

措施。

直至最近一个时期，苏联原国家安全部仍以这一决议为指南。

除上级机构的上述决定外，在以后的数年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又颁布了一系列命令和决议，授权特别委员会：

将以前因被判从事特务、破坏和恐怖活动罪和参加托洛茨基右派组织及其他反苏组织罪被逮捕但已服完刑期的人员，从关押地无限期地流放；

将从长期流放地逃跑的人员关押在特别集中营服20年苦役；

因逃避农业劳动被强制迁往特别移民地以及被强制迁往特别移民地永久居住的人员，若在特别移民地逃避社会公益劳动，将其送劳改营关押8年；

将乞丐和流浪人员送特别移民地居住5年；

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乌克兰西部各州参加民族主义地下活动人员的家属流放到苏联的边远地区。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

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者流放的惩治措施。

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

能。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草案和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附后。

拉·贝利亚

附 件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 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 通过拉·帕·贝利亚同志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批准特别委员会审理出于办案或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 10 年的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

2. 批准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该问题的命令草案，即两个附件。

3. 重新审议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

该项工作委托给由苏联司法部长 К. П. 戈尔舍宁同志（主席）、苏联总检察长 Г. Н. 萨福诺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С. Н. 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最高法院院长 А. А. 沃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须在两周期限内结束工作并向苏共中央主席提出委员会的建议。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3 年 6 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 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命令草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

批准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即附件。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1953年6月于莫斯科

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

1. 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有权审理苏联内务部机构提出的反革命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罪案件以及根据专门颁布的法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的案件。

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

2. 苏联内务部长为特别委员会主席。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和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局长为特别委员会成员。

苏联内务部长或者由他委托第一副部长主持特别委员会的会议。

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抗诉之前暂停执行。

3. 责成特别委员会秘书处准备提交特别委员会审理的案件，特别委员会秘书处遵循由苏联内务部长批准的条例工作。

4. 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有权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做出以下裁决：

- (1) 从常住地驱逐 5 年以下并由内务部机构监视，
- (2) 流放苏联边远地区 10 年以下并由内务部机构监视，
- (3) 在监狱或劳改营关押 10 年以下，
- (4) 将外国公民驱逐出苏联，
- (5) 将认定为神经不正常的人员送去强制治疗。

5. 特别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如果判决被告所依据的俄罗斯联邦刑法条款载有没收财产的附加惩处，在裁定有关惩治措施的同时，可以全部或部分没收被判刑人员的财产。

6. 特别委员会在审理根据苏联政府的专门决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的案件时，根据这些决定确定惩治措施和刑期。

7. 根据内务部机构和总检察长的申请，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有权：

(1) 改变或撤消原国家政治保卫机构的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局的三人小组以及原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内务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已往所作的决定；

(2) 撤消被国家政治保卫机构的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局的三人小组和特别委员会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39 年 4 月 5 日命令规定的程序判罪人员的前科。

№03638

沃尔库塔市“列奇诺伊”
劳改营委员会关于犯人抗拒事件
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摘录）

（1953年8月18日）

苏联内务部长

谢·尼·克鲁格洛夫上将

1953年7月25日，“列奇诺伊”劳改营有17个劳改队的囚犯拒不上工，有6个劳改队的15604名犯人集体拒不服从劳改营管理。

这并非突发事件……早在今年6月就有犯人集体不出工和抵制管理的事件发生。

今年6月30日晚在“卡比塔利”矿场发现有号召犯人“不产煤”、“给犯人以自由”的传单。

……今年7月19日第二劳改队350名犯人罢工……囚犯们对来到现场的劳改营领导和检察长宣称：他们不打算说出自己的要求，因为现场反正没有人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谁也不相信。因此犯人要求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沃尔库塔来。

今年7月21日在第一和第二劳改队所在地发现有要求大赦的传单，署名为“行动委员会”。（传单内容如下：囚犯和苦役犯们！苏联政府宣布拉夫连季·贝利亚为人民的敌人。必须要求重新审理你们的案件，并获得彻底的自由。要求：1. 取消内务部下属的特别劳改营；2. 取消苦役；3. 尽量缩短“命令”第58款规定的惩罚

期限。——“行动委员会”)

今年7月22日第二劳改队在第一班和第二班交接换班时1500名囚犯拒绝去7号矿场上工，并声称：“只要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不来沃尔库塔，我们就不上工”。次日该劳改队拒绝不上工人数增至3000人。

今年7月24日，依照苏联内务部发来的指示，对“列奇诺伊”劳改营所有劳改队的囚犯实行优待措施，包括实行9小时工作制；取消服装上的编号；允许会见亲属；允许与亲属通信；允许将工资寄给家人；将分户账上的月工资增加至300卢布。

第二、第三和第六劳改队犯人对苏联内务部关于实行优待措施的决议持敌对态度，他们在今年7月25日有8700人拒不出工，致使第7、第12、第14和第16矿场及二号热电站工地全部工作中断。

今年7月26日第三劳改队犯人袭击禁闭室，放出了因教唆罢工而被关禁闭的77名犯人。在犯人袭击禁闭室的过程中警卫队使用了武器，造成2名犯人死亡，2名犯人受伤。

今年7月28日，在第30矿场工作的第13劳改队犯人得知邻矿不工作后也拒绝上工。

集体怠工的主使者开始在犯人中进行宣传说：“已同意对我们让步，既然我们能争取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要上优待指示的当，不要为任何挑拨所屈服。我们要意志坚定，要让苏共中央的人告诉我们还要关多久。”

……多数劳改营分布在矿工居住区附近和沃尔库塔市市区，因此市民们也知道了有关犯人集体闹事、怠工的情况。

关于市民对“列奇诺伊”劳改营囚犯怠工的态度，有情报显示：沃尔库塔市大部分居民对犯人的行径表示愤怒，并对劳改营行政管理部门未能对怠工者采取果断措施表示不满。

雇来的工人中有一种议论：“目前在矿上干活很难。松松垮垮，胡搅蛮缠。谁只要一说话，就说你是‘贝利亚分子’。劳改营领导人也放任自流，和犯人们玩闹，犯人们正好利用了这一弱点。”

……施托贝利市市民说：“即使对犯人们的裁决不公正，闹罢工也绝不是苏联公民干的事。真该把罢工指使者绞死。”煤炭销售部会计萨普科说：“只要罢工者越界，我们将视之为敌人，和他们战斗。”

今年7月29日和30日，苏联内务部专门委员会与发生抗令现象的六个劳改队的犯人们进行了座谈，听取了他们的申诉、要求和声明，并就委员会权限以内的所有问题给予相应答复和解释……在委员会面前，总工组织者们把那些深怀敌意的犯人们推到前台，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以最后通牒式的语气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讲词，代表全体囚犯要求委员会重新审理他们的案件，释放劳改营所有囚犯，或者缩减全体囚犯的刑期。

在第二劳改队的座谈会即将结束时，犯人头目列万多无理声称：犯人们不相信莫斯科来的委员会，不想再和委员会的人谈，他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到劳改营来……第十劳改队总工组织者表现得更加蛮横无理，更具挑衅性。其主要要求归结为一点，就是立即重新审理案件和释放全部囚犯。

对于依照苏联内务部决议而实施的一系列优待措施的解释性说明遭到犯人们的讥笑……

各劳改队的刑侦机构和行政管理部門面临的任務是：立即揭露、查清所有总工组织者、煽动者和积极参与者，然后将其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

每个劳改队都制订了消灭总工、清除总工组织者的方案，并准备了用以关押被清除出来的犯人的补充地。

今年7月31日上午10时委员会开始在第二劳改队采取行动。

开始时，劳改营的广播警告所有囚犯停止怠工，通过中间通道走出居住地。同时警告：囚犯若袭击押送队，劳改营将动用武器。

起初有些混乱。当未携带武器的监管人员进入居住地时，犯人们发现自己被加强警备队士兵所包围。犯人们开始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通过大门走进指定地区，在这里每百人一组，由押送队押往冻土带接受仔细审查。

待怠工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被查清后，其余的囚犯重新回到居住地。此后，劳改营恢复正常秩序，中班时犯人们就开始出工了。

第三、第四和第十三劳改队的犯人在座谈会后停止了怠工，开始出工，并开始执行劳改营管理部门的指令……第十六劳改队的犯人自发地将怠工组织者和领导者捆往劳改营管理部门，并声明：他们并不想参与怠工，请求将这些怠工者从他们那里带走……

第十劳改队怠工组织者不但不停止怠工，反而在劳改队管委会成员帮助反对怠工的犯人走出居住地时进行反抗……有 50 名监管人员未携带武器进入居住地去帮助那些愿意走出居住地的犯人们。

匪徒们看到监管人员进入居住地后，开始折毁栅栏，用尖木棍和木板袭击监管人员，把他们赶出居住地。

怠工组织者在大门旁组织人墙，排成几排，前面约有 350～400 人，他们手持刀子向大门猛攻，在距门 15～20 米处被挡住。

当人墙发现个别犯人试图冲出居住地、摆脱他们的控制时，又再次发起猛攻，企图攻击守卫在大门处的军官、委员会成员和持枪士兵。

为防止犯人冲入大门开阔地区和瓦解怠工组织者的人墙，决定动用事先准备好的消防车上的水枪。这时人墙中的犯人开始袭击消防员，抢夺和割裂水带，并企图抢夺斧子以冲出大门到劳改营的外围地带。

进击的犯人逼近距大门五米处，他们显然是要逃离劳改营，并

攻击武装警卫队，劳改营在鸣枪警告后动用了武力。结果，袭击的主谋和闹事的积极参与者都被驱散，全部犯人顺利地赶出居住地，每百人一组在押送队看管下被分别疏散到冻土带各地。

对所有被带离生活区的犯人都进行了仔细审查，以查清所有怠工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

由于动用了武力，45名犯人死亡，135名受伤，其中轻伤83人。

伤亡者多为怠工和骚乱的组织者与积极参与者。

就地组建的有苏联检察院代表和劳改营检察官参加的委员会的结论认为，对犯人动用武力是正确的。

自从弹压了第十劳改队犯人的反抗后，“列奇诺伊”劳改营再也没有发生任何犯人怠工或抵制管理的过火行为。

复工的犯人开始超额完成煤炭开采定额……

……导致“列奇诺伊”劳改营犯人集体怠工、集体抗命的主要原因是：劳改营刑侦部门工作极端薄弱和人力不足……

正是由于刑侦部门的姑息，对苏维埃政权深怀敌意的犯人才敢为所欲为地组织怠工而不受惩罚，才敢于以富有煽动性和挑衅性的号召拉拢了大批犯人，妄图在这次怠工中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代表所有犯人要求释放劳改营全部在押犯。

……委员会提出下述建议：

1. 考虑到劳改营关押犯人需要有警戒性限额，我们认为应该将现有劳改营缩小，每个劳改点不超过1500人。

2. 从根本上改造劳改营犯人中的刑侦工作，进一步加强警卫、保密制度、隔离囚犯和维护秩序等工作，将劳改营刑侦工作人员划归劳改队首长直接领导。

3. 为配套“列奇诺伊”劳改营的干部人员，因此建议苏联内务部干部管理局尽快向“列奇诺伊”劳改营派遣以下人员：劳改营

刑侦部门领导副职 5 人，劳改队刑侦组织领导 6 人，主任刑侦特派员 10 人，刑侦特派员 10 人，侦察员 5 人，保密员 7 人。

附 录

苏联内务部劳改营管理局 《关于 1953~1955 年间苏联内务部所属劳改营及 劳改教养所中犯人数变化及构成》的资料

绝密，极其重要

1953~1955 年关押在劳改营和教养所的犯人数明显减少。截止到 1953 年 1 月 1 日劳改营、所中的犯人共 2472247 人。1954 年 1 月 1 日 1325003 人，是 1953 年同期犯人人数的 53.6%；1955 年 1 月 1 日 1075280 人，是 1953 年同期犯人人数的 43.5%；1956 年 1 月 1 日 781630 人，是 1953 年同期犯人人数的 31.6%；1957 年 1 月 1 日 807977 人，是 1953 年同期犯人人数的 32.7%。

……1953 年劳改营、所犯人减少了 1610616 人，其中根据 1953 年 3 月 2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释放了 1201738 人。同一年内监狱转到劳改营的犯人为 463372 人。此时劳改营、所的在押人数减少了 1147244 人，即减少了 46.4%。

……1954~1955 年犯人数减少的原因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和提前释放令、假释令而释放了一些囚犯；原判反革命罪重审后改判刑事案件的；在所有劳改营、所实行工作日考查制度；释放了一些患有严重不可治愈疾病的犯人，以及 1955 年

1月10日颁发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少量偷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命令。

内务部所属劳改营和教养所在押犯人的构成情况：（按占犯人总数的百分比）

	1953.1.1	1954.1.1	1955.1.1	1956.1.1	1956.4.1
1)反革命罪犯	21.9%	34.8%	28.7%	14.6%	11.3%
2)盗匪及持械抢劫罪犯	7.7%	11%	11%	13.1%	13.1%
3)蓄意谋杀犯	1.7%	3.1%	3.5%	4.2%	4%
4)流氓罪犯	5.6%	4.5%	10.1%	14.6%	15.9%
5)根据1947年6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关于盗窃国家及社会资财罪犯的刑事责任》判刑的罪犯(第1.3.5款)	11.3%	6.7%	5.8%	5.4%	5.3%
6)根据本命令第2.4款判刑的罪犯(二次、团伙及大金额犯罪)	18%	21.8%	18.2%	16.3%	16.2%
7)根据1947年6月4日《关于加强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命令而判刑的罪犯(第1.3款)	13%	8.9%	10.6%	14.9%	16%
8)根据1949年1月4日《关于强奸罪的刑事责任》命令被判刑的罪犯	0.5%	1%	1.5%	2.2%	2.2%
9)其他罪犯	20.3%	8.2%	10.6%	14.7%	16%

……1953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在押罪犯比例由21.9%增加到34.8%。这是由于根据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赦令只赦免了很小一部分反革命罪犯（五年徒刑以内的），而根据此命令总计获得特赦的犯人人数为1201738。

1954至1955年之间反革命罪犯的比例几乎降低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这是由于一方面部分反革命罪犯服刑期满而被释放，另外有

贝利亚对内务部的改革与重大案件的重新审理

32798 人因重审而改判为刑事罪犯，以及根据 1955 年 9 月 1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赦免 1941 年到 1945 年卫国战争期间协助侵略者的苏联公民》命令而释放的 55480 人。

1956 年 1 月 1 日在劳改队和劳改分队中关押的反革命罪犯 113735 人，与其相比较，1955 年 1 月 1 日共计 309088 人，1954 年 1 月 1 日共计 460557 人。

在劳改队和教养院关押的罪犯所判刑期为：（按占犯人总数的百分比计）

截止到	1953.1.1	1954.1.1	1955.1.1	1956.1.1	1956.4.1
1 年内	1.3	0.9	0.8	1.4	1.5
1~2 年	7.9	5.8	10.4	13.3	14.9
3~5 年	10.7	16.1	15.9	17.4	17.4
5~10 年	49.3	42.1	35.2	35.0	35.6
10~15 年	16.9	14.8	15.6	14.2	13.7
15~20 年	6.3	7.2	7.9	9.3	8.7
20 年以上	7.6	13.1	14.	9.4	8.2

在押人员在年龄组成上的变化情况如下：（按占名单总数的百分比）

截止到	1953.1.1	1954.1.1	1955.1.1	1956.1.1	1956.4.1
未满 18 岁	0.4	0.3	0.4	—	0.5
18~25 岁	29.9	27.5	29.0	25.2*	23.3*
25~35 岁	33.1	33.9	35.6	46.8*	49.6*
35~45 岁	19.2	20.5	19.4	16.8	16.2
45~50 岁	7.8	8.5	7.6	6.1	5.6
50~60 岁	7.1	6.8	6.1	4.1	4.0
60 岁以上	2.5	2.5	1.9	1.0	0.8

* 表示从 1956 年 1 月 1 日起分为：18~23 岁，23~25 岁。

……在苏改队和教养院中关押男女犯人的比例：（按占犯人总数的百分比计）

	男 犯	女 犯
1953.1.1	82.2	17.8
1954.1.1	87.7	12.3
1955.1.1	87.5	12.5
1956.1.1	90.0	10.0

1953~1955年间犯人在各种行业进行劳动的情况：（按占犯人总数的百分比计）

截止到	1953.1.1	1954.1.1	1955.1.1	1956.1.1
煤炭工业	7.1	11.0	9.5	7.8
石油工业	8.2	5.5	3.9	3.0
有色冶金	12.8	15.3	11.5	7.8
化学工业	0.5	0.1	0.4	0.3
水利工程设施建设	7.4	4.3	3.8	4.4
铁路建设	8.4	5.3	4.4	3.2
公路建设	1.1	0.2	—	—
建材工业	0.7	0.4	0.3	0.2
专门建设(苏联内 务部专门建设部)	9.0	5.8	12.3	11.8
托拉斯集团、建筑 局(冶金和化学工业 企业的建设部、建筑部)	3.9	4.0	3.2	3.4
苏联内务部总局 (工农业、基本建设)	24.2	28.9	24.3	25.2
其他部门的各种工作	3.4	2.5	2.3	2.1

【专题说明】

苏联对日内瓦会议 第一阶段成果的评估

(1954年6月)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并没有随着战场硝烟的驱散而立即得到缓和。在朝鲜半岛，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高级政治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迟迟没有召开。同时，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积极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千方百计破坏越南人民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甚至考虑像朝鲜战争那样直接出兵参战。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中断将近8年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取得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成果：决定同年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尽管美国极力反对中国参加会议，但又不得不承认，离开中国，这两个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大会最终决定，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这次国际会议期间，中苏双方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和破坏，会议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6月15日，也就是讨论

朝鲜问题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临时提出一个只有两句话的决议草案：一是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二是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这个带有最基本的协商和解精神的建议，得到几乎所有与会代表，包括敌对方面代表的赞同，却遭到美国代表的拒绝。尽管朝鲜半岛从此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局面，但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显然正是美国。在会议第二阶段解决印度支那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帮助下，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四方奔走，与有关各方反复协商，终于促成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解决，为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争取和平的事业做出了贡献。当时，一些比较弱小的周边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恐惧和疑虑的心理。为消除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促进双方关系的和平发展，1954年6月25~29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这次访问期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被写进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声明还郑重提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

本专题选编的两个文件所涉及的问题是莫洛托夫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成果的评估。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杨世昭、安新奎、沈友泰）

№0362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 6 号会议记录（摘录）

（1954 年 6 月 24 日）

1954 年 6 月 24 日会议

由赫鲁晓夫同志担任会议主席。继续进行全会的工作。由莫洛托夫同志做报告。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结束之后：

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中央主席团就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暂时没有拟定任何决议，因为日内瓦会议还没有结束。

建议通过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

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被通过。

中央书记

№02797

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1954年6月24日)

打印 26 份

对于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是依据柏林会议的决定召开的。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日内瓦会议于4月26日开幕。6月19日之前可认为是会议的第一阶段。

目前，日内瓦会议正在就印度支那问题继续开会。因有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暂时离会，由本国责任代表暂时代理他们。预计，会议的这个阶段将持续大约3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然后，在外交部长们返回时再继续开会。

如果说柏林会议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欧洲问题，即德国问题和与奥地利缔约问题，那么日内瓦会议主要就是讨论亚洲问题。很明显，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都被列为亚洲最迫切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当然，它参加讨论亚洲的迫切问题，不但完全合情合理，而且很有必要。这一

点甚至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它对人民民主的中国持敌对政策。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作为五大国之一取得了自己的合法席位。这从只有五个大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两个议题的讨论，而所有其他国家当时只参加其中一个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这次，中国以一贯坚持的民主立场和前所未有的威望在国际舞台上发表意见，对此我们感到特别满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伟大朋友和同盟者。我们认为，这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民主阵营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胜利。

我们认为，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它向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迈出了一步。苏联政府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日内瓦会议像柏林会议一样，其意义将取决于会议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而且我们认为，这样来调解有争议的国际问题，是解决国际局势紧张状态缓和问题的办法，一种既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又有利于巩固全世界和平的办法。

众所周知，美国统治集团奉行一种“实力”外交政策，他们对日内瓦会议以及柏林会议是另外一种评价。他们对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以利于巩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实现他们的侵略。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时柏林是如何讨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的。

杜勒斯最初在柏林外长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参加讨论印度支那问题限制在于一些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上。杜勒斯在2月8日的提案中是这样说的：“只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于朝鲜和东南亚的政治会议上以行动证明它确实有和平的愿望时，四强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代表才会通过共同协

商，确定召开了一次旨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会议的条件”。

这样，在杜勒斯的提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参加外长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就取决于两个条件，即在朝鲜问题上和在东南亚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都必须事先“证明”自己有和平愿望才行，这项提案是美国政府推行“实力政策”的一个表现。杜勒斯的这项提案当然遭到了出席柏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否决。结果，经过多次讨论后，于2月19日发表了柏林公报，公报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未提任何先决条件。不但如此，柏林公报实际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摆在了日内瓦……^①

美国政府被迫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还因为它不能不考虑当时渴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社会民主各界的强烈情绪，美国的这一立场又恰恰与它希望对朗埃尔-皮杜尔^②的政府给予支持这一意图相符合，因为该政府正在无条件地推行一种旨在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政策。

但是，美国政府一方面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步骤对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各国施加压力，首先是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压力。

大约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一个月，由于东南亚局势——那里殖民主义国家的事态明显地恶化了——美国政府开始了一场专门针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诽谤运动。这又是一个利用各种威胁手段恐吓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投降的企图。

3月29日，杜勒斯以解释美国政策为名，发表了题为“远东问题”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了印度支那重要的战略意义

^① 此处原档案复印件缺行。

^② 乔治·皮杜尔（1899～1983），法国政治活动家，人民共和党创始人之一。1944～1954年间数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和部长职务。

和经济意义，并且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莫斯科”和“北京”想借助胡志明之手强占印度支那。于是，策动了一场持续几个星期的、愈演愈烈的反苏反华运动。

……^① 条件下以任何手段把共产主义俄国及其中国共产主义盟友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会对整个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认为，绝不能与这种可能性相妥协。必须以“联合行动”予以回击。

从这时起。美国政府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企图实施东南亚殖民地各国的“联合行动”计划。

为此，4月初杜勒斯前往伦敦和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加紧组建东南亚侵略性国家的军事联盟。他声称，他这次去伦敦和巴黎，负有“基于实力的和平使命”。从美国政府的这一些举动中不能不看到，它是企图使日内瓦会议接受既成事实，接受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各国的联合阵线，从而干扰印度支那问题在印度支那人民可接受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美国政府企图以所谓的东南亚“联合行动”为借口，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或在会议进行中，就建立起有法国和英国参加的所谓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些企图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不赞成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果尚未明朗之前就对这个问题做出决策。这个计划的实施引起……^②

由于未得到英国和法国方面的支持，于是，美方的这一举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成为一种孤立的行动。

日内瓦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开幕的。

① 此处原档案复印件缺行。

② 此处原档案复印件缺行。

现在回到朝鲜问题上来。日内瓦会议由讨论该问题入手。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在该协定签订三个月内应召开政治会议，以通过谈判解决属于和平解决整个朝鲜问题的那些问题，其中包括北南朝鲜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朝鲜国的问题。但是，由于美国代表坚持在板门店预备谈判时所持的立场，其中包括：他们坚持让苏联以一个参战国的身份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完全不顾这一立场多么荒谬绝伦，致使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未能举行。

在柏林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与日内瓦会议研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然而，事实表明，这并不表示美国及其随从国方面有调解朝鲜问题的意向。

还在柏林，在单独会谈时，杜勒斯就明确表示过，他看不出目前有调解朝鲜问题的可能性。他直言不讳地声称，他明白苏联和中国的立场，认为苏联和中国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容许在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接着他又声称，而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可能容许在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从杜勒斯这些声明中不难看出，他根本不关心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问题。对他来说，在朝鲜，保障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其他利益的问题才是第一位的。

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机会说明朝鲜国家统一的具体计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朝鲜国家统一纲领大致如下：

第一，它要求在全朝鲜居民意志自由表达的条件下进行全朝鲜选举。同时规定，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北南朝鲜协商由朝鲜人自己解决。为此，应该成立相应由朝鲜北南两部分代表组成的全朝鲜选举

委员会。此外，考虑到朝鲜三年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朝鲜两部分之间关系紧张的事实，必须承认，全朝鲜的选举应该在以中立国组成的相应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监督下进行，是适宜的。

第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载有一切外国军队在一定期限内撤出朝鲜的规定，而且这次撤出外国军队应该在全朝鲜选举之前进行，因为这是保证这次选举真正自由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还规定，凡是特别关注确保远东和平的国家，都负有保证朝鲜今后和平发展的义务。国家间的这种协议应该警告一切破坏和平和发动新的朝鲜战争的企图。这时，我们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声明，苏联准备与其他国家一道参加履行这项任务，并承担相应义务以确保朝鲜和平发展。

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都坚持的朝鲜国家重新统一纲领的基本条款。毋庸置疑，这个纲领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巩固远东和平的需要。

这些建议没有得到打着联合国旗号参加侵朝战争的那些国家的赞同。这种情况是在美方的公然压力下造成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提议，即成立全朝鲜委员会，以筹备并进行全朝鲜选举产生朝鲜国民议会，并且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使北南朝鲜在经济文化上互相接近，引起了极多的反对意见。同时，对全朝鲜委员会要以协调双方意见的方式解决其受理问题的建议也有争议。然而，否认这种协调的必要性，就意味着否认北南朝鲜在民主原则下实现统一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走上一条毫无希望的、企图把一方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道路。

与这项重新统一朝鲜的民主纲领相对立的是在联合国庇护下进行全朝鲜选举的提案，这个提案甚至没有考虑到所进行的三年反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是打着联合国旗号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绝对不可能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机构的角色。把南朝鲜李承晚政体强加给北朝鲜的企图，也在这个提案中表露尽致，这里也是用联合国旗号作掩饰的。然而，在朝鲜问题上联合国已完全依附于美国统治集团。

杜勒斯在4月28日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用不着发明什么统一朝鲜的具体纲领，这样的纲领已经有了，它就写在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在这个声明中，杜勒斯援引了联合国大会的那个非法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武装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高潮时期通过的，它是以北朝鲜推行南朝鲜李承晚政体为宗旨的。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桌上又做了一次把南朝鲜半法西斯式政体强加于北朝鲜的尝试，也就是试图在现在的和平条件下去实现用三年朝鲜战争未能实现的事情。当然，这些企图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坚决批驳。

根据我党中央主席团的指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详细说明朝鲜国家统一纲领，而且要促使朝鲜发展的和平条件更加牢靠坚实。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研究制订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保证朝鲜和平条件的议案。该议案于6月15日提交日内瓦会议审议。当天，苏联代表团也向日内瓦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简短声明。鉴于这两个建议都没有得到其他16个代表团的支持，根据我们党中央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日内瓦会议各参加国做出声明，准备继续努力以期达成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这项提议在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进行了讨论。为了通过这项议案，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致使对方代表团队伍发生了某些动摇。不

论是比利时代表斯巴克，还是此刻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代表艾登，都表示准备接受这项提案。艾登甚至提议，确认“这项提案反映了我们这次会议的工作精神”。但是，这里也遭到了美方代表史密斯的反对。他在会议最后一分钟宣布，他不能接受上述建议。这样，美国代表团的直接干涉妨碍了会议就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通过一项共同声明。

关于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结果能说些什么呢？

这次讨论表明，带头停止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并拒绝通过任何一项协议的责任，完全落在美英集团国家的一边。在国际社会舆论面前，我们应该强调，在日内瓦会议上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这些国家，而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

同时应该承认，在日内瓦会议上研究朝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将各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解决朝鲜问题上来。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民主阵营各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纲领尽可能地深入到朝鲜人民中去，并取得其他各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

争取朝鲜问题民主解决的斗争不能松懈。朝鲜问题有待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得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民主阵营其他各国的全力支持。

二

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正是现在这个讨论才进入了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所以，目前只能作关于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第一阶段的总结。

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为了消灭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政府方面已经组织了不止一个战役。

从去年起，便竭力推行一项所谓的纳瓦尔计划，规定加强法国远征军的军事行动并建立庞大的傀儡军。纳瓦尔将军的这项计划不仅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赞同，而且得到了近几年才开始紧锣密鼓地插手印度支那军事活动的美国政府的赞同。

但是，印度支那事变的进程越来越清楚地说明，军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企图是多么没有希望。恰好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夕，奠边府陷落了。民主越南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奠边府已达数月之久，而不论是法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认为，法军保卫奠边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能忽视，像越南北方奠边府陷落这样的事情已经掀起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据某些新闻机构声称，在现在的局势下，这样的事实对广大越南人民群众具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因为它同时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此外，殖民主义政策在越南遭受的失败，同时也在法国的其他殖民地，譬如在北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日内瓦，人们告诉我们，譬如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居民的各界人士都把奠边府陷落这一天看做是自己的节日，在街头巷尾不相识的人们互道问候，互相祝贺。

最近几年，越南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运动规模很大。现在，越南领土的大部分已经不在保大政府的官方政权控制之下。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在土地交给农民和降低土地租金方面的民主改革，使这个政府在越南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以致当前连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在越南进行自由选举，大多数选票会投给胡志明的拥护者。

在另一个印度支那国家——老挝，局势也证明民族解放运动相当高涨。这里差不多一半的国土实际上已经不在官方政权的控制之下。

民族解放运动在柬埔寨也越来越扩大，这里同样有解放区，并且在全国各地都进行着游击斗争。

日内瓦会议正是在美国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把赌注下在美国直接军事干预印度支那战争上的时候召开的。苏联代表团面临的任务是揭穿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侵略行径。这在当前条件下尤为必要。因为来自美方的这种干预正在导致东南亚战争规模的扩大，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危及和平事业的危险后果。

不能不重视由于美国对印度支那各国实行的政策所造成的目前这样一种特殊局面。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绝不愿意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民族运动，也不愿意尊重从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中间推举出的民族运动机构。另一方面，大家知道，美国官方代表一再声称，还按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三国与法国达成的协议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是不够的。这种论点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美国统治集团会力求给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政权的官方机构搞到尽可能多的行动自由。这表明美国统治集团渴望得到机会把这些国家置于直接依附美国的政策和利益的地位。

这就是有关印度支那各国现在的军事政治局势的一些实际情况。

直到不久前，法国政府还不肯承认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个事实。但是，法国政府在柏林会议上提出倡议，表示建议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这证明，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印度支那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日内瓦会议应该研究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

只有民主越南的代表团代表民族解放斗争力量参加了本次日内瓦会议。大多数与会者都不承认也有必要同时与寮国和高棉抗战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甚至企图把老挝和柬埔寨的局势描绘成似乎这里

并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在这些国家里只有越南武装力量在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并由此得出结论，似乎这里的任务就是让越南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上撤回去。好像到那时候在这些国家里继续战争的问题就会消失。然而，这些论断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此，这里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方面曾在日内瓦会议上承认过，过去在老挝和柬埔寨领土上确曾有过一定数量的越南志愿军，他们参加了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这些志愿军已经适时地撤回了。同时还承认：如果发现现在还有什么越南志愿军在这些国家里，那么这些残留的志愿军也必将撤回。这里不能不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竭尽全力促进恢复全印度支那和平的诚意。

众所周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也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建议。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为调解印度支那问题提供了依据，并且能够保证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其中最主要的建议有：

1. 法国应该保证承认越南以及柬埔寨和老挝的主权和独立；同时，一切外国军队应该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撤出去。

2. 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应该进行全国人民的自由选举，选举结果应该是在各自的国家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

3.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寮国和高棉抗战政府应该表明，准备讨论根据自愿的原则将这些国家纳入法兰西联盟的问题。应该承认，法国在这些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文化利益，但这些利益的实现必须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

4. 实现上述政治措施之前，应在全印度支那停止军事行动，并签署相应协议，这些协议的效力应该是，保证完全停止从境外向印度支那调运新的军队以及各种武器、弹药等等。

此外，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承认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以

督促各方履行停战协议条件是适宜的。

这样，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就为与法国达成协议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使得双方有可能在体面的条件下达成协议。依据这些建议，就能够在印度支那和法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新型的、真正友好的关系。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现在进展如何？

首先应该指出，讨论政治问题的谈判实际上还没开始。为此，苏联代表团总在强调研究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就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基本政治问题达成相应协议，就不可能保证建立稳固持久的和平。

在此之前，一切都集中围绕着停战问题。当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各方谁也不否认这类谈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根据我党中央主席团的指示，苏联代表团认为，力求在日内瓦，以及在当地，在印度支那立即开始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直接谈判，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相关的谈判对于老挝和柬埔寨也很必要。

法国方面没有立即承认在日内瓦进行这些直接谈判的必要性，法国军事代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之间的直接谈判，直到6月2日才开始。直到6月19日才承认，对于老挝和柬埔寨，也有必要开始这种国家之间的相应的直接谈判。

现在谈论这些谈判的前景还为时尚早。但是，从6月初已经开始的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来看，有可能对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达成而且势必要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军事意义的协议。同时，这种讨论不仅为达成军事协议，而且为达成政治协议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协议必将促进在印度支那建立永久的和平。

关于越南局势问题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在整个印度支那的

2900万人中，越南就占了2300万人。

最近，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很多文章说，越南应该分割为两个地区，而且民主越南的武装力量应该留在北部，保大政府的武装力量在南部。这样划分越南领土，基本上符合双方承认的界定双方军队驻地的原则。而且如果他们驻扎在许多重新划定界线的地区，就会排除诸多相互冲突的借口。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样调解越南局势的要求是：调解时，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现在就该通过一项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属于这类政治问题的，首先是必须通过这样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应当保证在全越南尽快进行自由选举，并成立统一的、在全体越南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的越南民主政府。如果拖延实现这个要求，那就不能不考虑这样把越南分割为北南两个地区的消极后果。

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那么6月19日内瓦会议关于双方就涉及这两个国家的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决议，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为此必须使有关双方，无论事关老挝还是柬埔寨，都要表现出有达成协议的良好愿望。

根据6月19日通过的日内瓦会议决议，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和外国军事人员，都必须从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上撤出去。这个要求应该认为是，既针对法国武装力量，也针对驻在这些国家领土上的外国志愿军的。

此外，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关于监督履行停战协议的国际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问题。这个问题也应该在最近交给各方审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支持下，苏联代表团就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提出了一项建议，该建议考虑到对方先前表示过的愿望，提出，我们同意这个委员会或者由五国组成，即印度（主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或者由三国组成，即印度（主席）、波兰和印度尼西亚（或其

他某个亚洲国家)。这样，国际监督委员会将基本由亚洲国家组成。应该说，这是为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至于该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职能，看来，这里不应当允许与会各国之间还存在着严重分歧。无论如何，苏联代表团过去和现在都是从这样一个在其看来没有争议的论点出发，即不应该把执行停战协议的各方联合委员会的作用估计得过低。因为履行这项协议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各方是否真的准备认真负责地恪守这项协议。

大家知道，在日内瓦会议过程中，法国政府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法国政府改组，会不会对日内瓦会议的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做出任何结论都会是危险的。不过，众所周知，新的法国政府把加快解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作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正是现在，美国侵略集团公开对法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们做出一点点有助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举动。

这就是现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

* * *

从以上我所说的一切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1. 首先必须指出，日内瓦会议以及今年年初举行的柏林外长会议表明，在和平解决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这一事务中，有关国家之间的直接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在朝鲜问题上事情还没有走到达成协议这一步，而只局限于弄清各方的立场；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在日内瓦会议的进程中就已经看出来，有可能在双方都体面的条件下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得益于两件事：一是建立了参战国之间的直接接触；一是开始就同时在全印度支那停止军事行动问题的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讨论。

即使依据这个初步总结也可以判断，我们党和政府在缓和国际关系紧张状态和巩固和平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具有多么积极的意义。

2. 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再一次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在继续推行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这是当前条件下对和平解决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主要障碍。

但是，日内瓦会议具有不同于柏林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尤其是与英国和法国，在立场上的分歧公开暴露出来了。这是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增加的明显标志。这使得美国有时处于一种与其他大多数与会国对立的地位。

3.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特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与其他大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在平等的原则下参加了这样广泛的国际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研究这两个问题——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因为民主的新中国登上了国际舞台，并且在大国之中取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还因为日内瓦会议明显地证明了这样一种状况：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许多国际问题，尤其是事关亚洲局势的问题，根本无法审理。

日内瓦会议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仍然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自己的合法席位这一立场是多么荒谬。会议证明了这种状态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当美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同坐在日内瓦会议桌上谈判的时候，它的捣乱政策却造成了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讨论有关问题。毋庸置疑，日内瓦会议彻底揭露了美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政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4. 毫无疑问，日内瓦会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的最主要积极成果是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这就为研究其他已经成熟的国际问题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日内瓦会议的这一阶段上就已经显现出，有可能在考虑到双方利益的情况下，恢复印度支那

的和平。其影响已波及到某些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社会各界。他们对欧洲，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成立的各种侵略性军事集团表示担心，这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很容易理解：既然有可能就亚洲问题达成协议，而且不是靠建立各国军事集团，而是通过有关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调解这些问题；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利害相关的各国都抱有真诚愿望的情况下，不能在解决业已成熟的欧洲问题方面也达成这样的协议。

总之，虽然日内瓦会议还没结束，但是会议的第一阶段已经表明，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

苏联代表团遵照党和政府的指示，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力求使会议结果符合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的需要，符合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宗旨。

【专题说明】

贝利亚家属的遭遇

(1954年1月和1958年10月)

1953年6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以反党反国家罪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23日未经审判而被处决。与以往发生类似的重大政治案件后的处理方法不同，苏联新领导人没有因此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但是，贝利亚的家属却未能逃脱受到政治牵连的厄运。还是在对贝利亚进行调查期间，他的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和儿子谢尔盖·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被逮捕。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他们又被关押了一年半时间，此后，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命令被流放到乌拉尔，没有向他们出示任何具体的指控。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是贝利亚的亲属。在获释前夕，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贝利亚的儿子被剥夺了物理数学副博士和博士的学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以及上校工程师军衔。同样是在审判贝利亚之前，1953年秋天，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将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境内”的决议，大约有20名贝利亚的亲属被送往西伯利亚，理由是“他们进行了不坚定的用心险恶的谈话”。被流放的人员中还包括贝利亚的姐姐安娜——一名聋哑人，以及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贝利亚的姐夫安塔泽，甚至连贝利亚年过80的老岳母也没有逃过此厄

运。

本专题收入的两件档案——贝利亚遗孀的申诉信和苏共中央监察部门对贝利亚儿子申诉的处理意见，当然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政治性文献。不过，研究这些文件，对于了解50年代苏联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还是有帮助的。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才能见到肉和一杯牛奶，而我生平第一次尝一下糖的滋味是在 11 岁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根本谈不到雇工。甚至我母亲与第一个丈夫生的孩子——本来能成为农活的帮手——在家里都没有活儿可干，也没有什么可以谋生。他们被迫给别人当雇工，因为他们当时羞于干这个，所以离开我们村庄到别处去了（姐姐克谢尼亚去波季给一个商人当保姆，哥哥尼古拉·沙夫季亚在库塔伊西给一个神甫家当雇工）。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在老迈之年，还赤足露体地整天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挥汗劳作。1917 年他被一个沙皇小警官射伤，过了半年就死了。我的贵族出身就是这样。

如果有这个必要，上述这一切都可以在当地，在格鲁吉亚（格格奇科里区，格格奇科里村，从前叫马尔特维利村）——我 1905 年出生在那里——准确地查明。

在侦查过程中，我被指控与好像是我的亲戚，现移民在巴黎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格格奇科里通信。我不认识他，从未见过面，他不是我的亲戚，我跟他没有通过任何信，也不可能通信。

在孟什维克当政时期，我从 11~16 岁在极端贫困（像大多数居民一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格鲁吉亚，没有父亲，母亲有病。为了吃上一点玉米粥和上学，我在库塔伊西市给拉日坚、洪达泽家当了两年雇工，由于从事我的年龄所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了。我的那个在海关当记账员或会计的同母异父哥哥尼古拉·沙夫季亚把我带到第比利斯市他那里。我给他干活并学习。我们住在纳哈洛夫卡（现在的列宁区）干线大街 19 号乌托绍夫家，那里住着一些铁路员工。为了能坐电车到学校，我给全院的人洗衣服，但因为不是总能挣到这个钱，我只好每天光着脚走完 15 公里多的路程，到了学校大门才穿上便鞋。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不认识这个“亲戚”，没有去找过他，也没有与他建立任何关系，况且他也未必知道在什么地方有我这么一个人。究竟有什么能使我同他在苏维埃政权下建立任

何有损于苏维埃国家的关系，何况这个政权还把我从极端愚昧和贫困中解救出来？任何人也不能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利用，因为我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党员我在政治上的修养足以使我认清孟什维克和其他移民可能成为并且现在就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间谍。我的罪过只是我姓格格奇科里（未嫁前的姓），如果这一点可以使我受指控的话。然而这个姓氏中也有人成了始终不渝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他们是我真正的亲戚，并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为我创造了正常的生活条件，现在我出生的村子和西格鲁吉亚的一个大区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作为真正可怕的指控落在我身上的，是我做了30年（从1922年起）贝利亚的妻子并且姓他的姓。同时，在他被捕以前，我忠于他，怀着极大的尊敬对待他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并盲目地相信，他是忠诚的、有经验的和苏维埃国家需要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使我有根据和理由从反面去想）。我没有看出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一情况是侦查过程中向我宣布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欺骗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全体苏联人民，人民从他的社会地位和担任的职务来看，也对他给予了信任。

考虑到他所从事的有益活动，我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去照顾他的健康（他年轻时患肺病，后来又得了肾病）。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全部时间里，我在家里只能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见到他。从1942年我从他那里得知他在夫妻关系上不忠实以后，我就不愿再做他的妻子了。从1943年起我先是一个人住在城外，后来则与我儿子家在一起生活。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向他提出，为他创造正常的条件，同我离婚，以便他娶一个可能爱上他并同意做他妻子的女人。他拒绝这样做，理由是没有我，他可能在某个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越出生活的常轨。我相信了人的习性，留在了家里，为的是不毁掉他这个家，并使他有可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在这个家里休息。我

安于自己在这个家里所处的可耻的地位，为的是不对他的工作精力产生消极影响，我原以为他的工作精力是用在需要的和有益的活动上，而不是用在敌对活动上。

关于他对家庭的不道德行为，在侦查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之前我一无所知。他对作为妻子的我不忠实，被我看作偶然的并部分地归罪于自己，因为我常常离家去看在另一个城市生活和学习的儿子。

我认为自己在苏联社会舆论面前，在党面前是绝对无罪的，因此我斗胆请求您，请求党让我向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提出申请，不要让我得不着自己儿子及其孩子安慰就孤独地死在牢房或某个流放地。我已是个衰老和病得很重的女人，顶多还能活两三年，还得是在比较正常的条件下。让他们把我送回我儿子家，在那里我的三个年幼的孙子、孙女需要奶奶照料。

如果我同别人的来往由于自己是个蒙受耻辱和现在人人蔑视的人而不适宜，我保证在家里也遵守现在对我所执行的那种监狱制度。如果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将一如既往，百分之百认真负责地完成交给我的工作。

对待拉·帕·贝利亚，我今后将遵守苏联人民及其培养出来的司法机关做出的决定。

如果检察长仍然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有关系，那我只好请求他一件事：尽快做出我应得的判决并加以执行。我再也没有力量承受我现在所受到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由于我的病）的痛苦了。

只有快点死去才能使我摆脱这些痛苦，这样做才是对我高度人道和仁慈的表现。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贝利亚

1954年1月7日

№04513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贝利亚之子申诉的处理决定
(1958年10月30日)

绝密

(第1340号记录第5c点)

谢·拉·贝利亚的申诉(自1944年起为苏共党员,党证编号:7102161)。

(古利亚耶夫斯卡娅同志,博伊佐夫同志)

批准中型机械制造部政治管理局党委1954年4月16日的决议。决议决定,鉴于谢·拉·贝利亚为了贪婪的目的,滥用职权,在担任K6-1型塔式起重机主任设计师职务期间,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取了物理学数学科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上校军衔,将其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调查报告

贝利亚,谢尔盖·拉夫连季耶维奇,1924年生人,自1944年起为苏共党员,党证编号:7102161,格鲁吉亚人,职员,高等学历。在追究其对党的责任期间被监禁。

1954年2月19日,作为人民敌人的儿子,116政治处党的委员会决定将其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1954年4月16日，中型机械制造部政治管理局党的委员会批准，作为人民敌人的儿子以及在工作中执行反党的路线，将其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案件的实质：谢·拉·贝利亚在被开除党籍时，被指控犯有如下罪行：利用自己父亲贝利亚的职位，在担任K6-1型塔式起重机主任设计师职务期间，为吹捧自己，把K6-1型塔式起重机设计组全体科学工作人员集体的成绩归功于自己；吹捧外国专家虚假的权威，并贬低苏联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在进行K6-1型塔式起重机设计工作过程中，缺乏交换意见，通常，在解决主要技术问题时，总是以外国专家的意见为基础。不参加党务会议，不过党组织生活。任何一个试图批评谢·贝利亚的工作以及忠诚他的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提出批评的人被开除出企业。

1953年7月谢·贝利亚被逮捕，指控其犯有以下罪行：参加阴谋反苏的叛徒集团，该集团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消灭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在侦查过程中，以上这些指控没有成立，但却查明：谢·贝利亚利用其父的职位，通过欺骗手段，即利用别人完成的答辩论文，获取了物理学数学科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

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3管理总局设计局主任设计师期间——该局当时隶属拉·贝利亚管辖，谢·贝利亚于1953年2月非法获得了斯大林一等奖金的荣誉称号，并得到现金50万卢布，其中的10万卢布给了其父拉·贝利亚。

苏联检察院认为，谢·拉·贝利亚的这些犯罪行为应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3年3月23日颁发的“大赦”命令处理，以此为基础，停止对谢·拉·贝利亚刑事案件的起诉。同时向有关机构提出，取消谢·贝利亚非法获取的物理学数学科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取消非法得到的斯大林奖的荣誉称号和上校军衔。

苏联部长会议 1958 年 2 月 6 日决议决定，取消谢·贝利亚所获得的学位、斯大林奖金的荣誉称号和上校军衔。

被释放后，谢·贝利亚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格格奇科里，父称改为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申请书中，贝利亚请求查明对他提出追究的党务案件并归还其党证。

目前，谢·贝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担任一家邮政信箱为 320 号的企业实验室主任。

1956 年 7 月，谢·贝利亚到过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M.H. 朱拉巴耶夫同志处。

由于谢·贝利亚在 1954 年监禁期间，已被开除了党籍，1958 年 5 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阿尔费罗夫同志在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出差期间，通知谢·贝利亚，根据中型机械制造部政治管理局党的委员会 1954 年 4 月的决定，由于为了自己的贪婪目的而滥用职权，他已被开除出党，取消其获得的学位、斯大林奖的荣誉称号以及上校军衔。

我们认为，目前接受审理其案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建议：

重新批准中型机械制造部政治管理局党的委员会 1954 年 4 月 16 日的决议，即鉴于谢·拉·贝利亚脱离党的组织，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而滥用职权：在担任 K6-1 型塔式起重机主任设计师职务时，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取了物理学数学科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上校军衔，将其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 古利亚耶夫斯卡娅

【专题说明】

苏联的核政策及科学家 对核武器的看法

(1955年1月)

实际上，本专题收入的档案并不能全面反映苏联的核政策，也不能完全代表苏联科学家对核武器的看法，因为这里选编的档案只是苏联的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彼·列·卡皮察所写的一篇关于原子能的科普文章，以及苏联官方对这篇文章的处理意见。不过，通过这些材料，的确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对核武器的政策，以及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看法。

早在战前，卡皮察就已经在苏联科学界享有盛名。1945年8月20日，苏联建立了一个领导“利用铀内原子能”的专门委员会，卡皮察即成为其领导成员。1941年10月12日，卡皮察在莫斯科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指出利用原子能制造原子弹的现实性，而有关在英国进行的铀的工程的第一个间谍情报只是十几天以前才到莫斯科，因此很难说他的演说是受到这次核情报的启发。卡皮察是最早被贝利亚看中并吸收参加核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尽管他不是专门从事核研究的，但也参与了苏联原子弹之父伊·瓦·库尔恰托夫1943年春天开始启动的原子能工程。

由于同贝利亚的分歧，卡皮察在不久后直接向斯大林请求退出核研究，并得到批准。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因美国率先试验成功原子弹而迁怒于卡皮察。无论如何，从1946年8月起开始了对他的隔离，甚至可以说是流放——让他住在莫斯科郊外尼古拉山的别墅里。一直到1955年1月28日，即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倒台后，卡皮察才重新回到他在科学圣堂的位置。在尼古拉山上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卡皮察依然顽强地从事科学研究，并在他的家庭实验室里创造了他自己的学派，在一定意义上预见到激光和激光武器的“大功率的电子学”由此诞生。正是在他个人顽强的努力下，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以后，卡皮察就直接与赫鲁晓夫发生了接触。1954年12月15日赫鲁晓夫接见了这位退隐山林的科学家。此后一个月，卡皮察便把下面刊印的信和文章寄给了赫鲁晓夫。当然，科学家的良好愿望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政治环境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卡皮察这篇科普文章的命运。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这些档案时咨询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并在注释中做了一些技术性说明。此外，作为附录，这里收入了贝利亚之子的回忆片段，权当是了解苏联核武器研制历史的补充材料。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谢一冈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赵迎菊、安新奎、沈友泰)

No03960

卡皮察关于发表原子能文章 致赫鲁晓夫的信

(1955年1月16日)

最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最近我国一些杂志数次请我写一篇有关原子能的文章。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请求，因为我无法读到外国的政论作品。当我请求把外国一些社会政治杂志拿给我时，通常总是说不需要，因为他们可以准确告诉我应当写些什么，也就是希望按已知的方法去行动：“我们的思想——您的签名”。最后，不久前《新时代》杂志寄来一些我需要的外文杂志，我才有了写文章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自己对于在和平和军事方面利用原子能的现状的看法。文章中所写的许多问题都是跟您谈话时的题目，因此我想您也许有兴趣翻一番它。但我担心我的许多意见会被杂志的编辑删减。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几个有经验的同志建议我在寄给杂志社以前，问问您对发表这篇文章合适与否有何意见。

自从您对我说我在工作中可以期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我友好的态度^①，已经过了一个月。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改变。科学院很久以前向中央提出把研究所还给我的请求仍然杳无信息。^②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痛心，主要因为这表明对我提出的

① 彼·列·卡皮察与尼·谢·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54年12月15日，在此以前这位科学家还写过几封信。

② 关于1954年初试图让卡皮察回到他所创办的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的建议，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研究过，但由于原子科学方面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此后，苏联科学院院士伊·马·哈拉特尼科夫和列·达·朗

“大功率的电子学”^①问题缺乏真正严肃的态度。也许我对您说的“应当赶紧解决提出的任务”这句话理解不正确，当时您认为我的5年期限太长，而现在一切都在发展，这个期限就显得更长了。

尊敬您的 彼·列·卡皮察

附言：例如，现在我需要立式铣床，我现在转而研究较短波长的的工作，这要求提高生产仪器的精密度，我们的机床制造厂还不能制造我需要的精密度的机床，比如像瑞士基尔公司新生产的。从国外得到这种机床在我国得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快得到它。我能不能指望，如果我去找机床进口单位，他们是否能摆脱通常的因循守旧，很快弄到车床。

附 件

卡皮察院士的文章《论核能》

1791年伽伐尼^②发现了电流，他观察到在电流的影响下青蛙腿部的肌肉可以收缩。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150多年。在这段时间

(接第465页注释^②) 道起草了一封很有说服力的信，说明应当把卡皮察的研究所还给他本人，有12个著名物理学家签了名。这份集体呼吁书对于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改变对卡皮察的态度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1955年1月28日任命卡皮察为苏联科学院谢·伊·瓦维洛夫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长的决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① 这里是指卡皮察有突出贡献的大功率微波发生器或研究热核反应需用的电流达到兆安培的电子学。其代表作是他的学术专著《大功率电子学》。

② 路意吉·伽伐尼(1737~1798)，意大利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电学创始人之一。1791年他发表了“肌肉收缩时的电力”的论文，总结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

里，可以用电流形式传送的功率在不断增长。在上世纪电流基本上用来传递通讯信号，到本世纪人们可将大河和瀑布的水能用电能的形式传到几百公里以外。

当居里夫妇^① 半世纪前首次分离出一小粒镭时，这一小粒镭所提供的原子能并不大于伽伐尼的实验中使青蛙腿跳动的电流。而今天一颗氢弹爆炸释放出的核能可以毁掉一座大城市和它周围半径几十公里内的一切。这一步不小于从伽伐尼的实验到伏尔加河大坝上的水电站，这种巨大的差别是引人注目的。没有电我们无法文明地生活，我们试设想一下，如果用魔杖使导线中的电流停止，那么任何一个大城市的生活就会停顿，但是今天人类认识了原子能和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不仅无助于人类的生活，而且预示着他们的灭亡。

难道人类历史上新的自然力的首次发现都会给他们带来损害？

应当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妨碍原子能走上为人类和平、文明生活服务的道路？自然，首先应当由科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怎样，是科学家把这个野兽释放出来的，这些科学家也应当驯服它和迫使它造福于人类。

不难看出灾难的根源何在。一方面，利用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进行破坏，在战争技术中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和平利用原子能，例如原子能发电，目前它还不能与普通热电站竞争。但是否永远是这样呢？我认为大多数像我这样的科学家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毫无疑问应当发生根本的变化。为了使变化进行得快一些，必须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明白现在形成的不正常情况的真正实质。这有助于使核能的利用走上正确的道路。

^① 皮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物理学家，放射性学说的创始人之一。皮·居里与夫人斯克罗多夫斯卡-居里（1867～1934）于1898年共同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1903年与亚·贝克勒耳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奖）。1911年居里夫人由于得到金属状态的镭而获诺贝尔化学奖。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叙述发现和认识核能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文明生活，并回答核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像现在的电影一样与人类的生活不可分离的问题。

* * *

我先来叙述破坏力很大的核能的特点，然后再分析它的和平利用问题。

从上世纪末科学家就懂得了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但对于把能量和质量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定量关系，直到50年前，才由爱因斯坦用简明的公式作了确切的表述，这就是他创立的“相对论”^①；如果物质转化为能量得以大规模地实现，这种转化就会给人类提供极大功率的动力源。这一事实在当时使所有的人感到吃惊。

科学能够在实践中把物质转化为能，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道路。在不同国家所做出的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之后，在实践中用建立链式核反应产生巨大的原子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是很清楚的。首先指出这一现实可能性的是我们苏联的科学家尼·尼·谢苗诺夫院士^②。而最先公布的数据方面的计算是由他的同事亚·鲍·泽利多维奇和尤·鲍·哈里顿^③完成的。要完成链式核反应应当走的道路，

① 1905年阿·爱因斯坦在《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论文中研究了特殊相对论的基础。就在这一年，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发现了质量和能量的相互联系。爱因斯坦的关系式是计算核反应动力学平衡的基础，也是核物理的基础。

② 尼·尼·谢苗诺夫（1896～1986），苏联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科学院士。1926～1932年谢苗诺夫发现了多分支链式化学反应，以后几年里又建立了多分支以及退化的多分支和非多分支链式反应的一般理论。195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③ 亚·鲍·泽利多维奇（1914～1978），苏联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尤·鲍·哈里顿（生于1904年），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都是苏联“原子弹之父”伊·瓦·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同事，并在解决利用核能问题，制造苏联的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中起了领导作用。

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已经明确。但碰巧这一时刻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期间，只有美国有发展这一工程必要的物质条件，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国的领土没有战火蔓延，它的大学和科研的正常生活方式没有遭到破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许多国家主要科学家参与下，美国便开始了实现链式核反应工程。主要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学家恩瑞科·费米的工程^①，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铀反应堆并于1942年末起动。这一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成果为完成爆炸的链式反应开辟了道路。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第一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②。这个试验的结果表明，由这一现象的理论所预言的核爆炸的巨大威力。的确，这次爆炸的原子弹超过普通最大的炸弹爆炸力的1000倍。由于原子弹特殊的军事意义，美国所有与原子弹有关的工程都处于极大的通常只在国防技术方面才实行的保密状态下。从一开始，对于这种科学成果进行保密就遭到了科学家的批评。它只能阻碍世界科学的发展，而实质上也是不现实的，这令人想起了波利希内尔的秘密^③。

科学必然沿着同一条道路向前发展，各国科学家，即使他们的工作相互之间完全保密，他们也必然走上同一条道路。区别可能仅仅在于曲折的探索和速度的快慢，这些基本上取决于参与的科学家

① 恩·费米（1901~1954），意大利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和中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苏联科学院外国院士。1934年发现中子引起的人工放射性（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38年侨居美国，1939年通过实验证明实现铀分裂的链式核反应的可能性。建立了第一个核反应堆并于1942年12月3日首次完成了它的启动，并获得自持链式反应。1944~1945年领导了美国能源部科学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一个部门，在这里进行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②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性爆炸是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尔多沙漠（新墨西哥州）进行。

③ 16世纪末始见于法国民间戏剧中的人物。所谓波利希内尔的秘密即指尽人皆知的秘密。

的才能，他们工作的精神条件和他们拥有的物质条件。情况正是这样出现了。战争刚一结束，欧洲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起初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独立地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

如果核物理的发展道路和规律对于科学家是非常清楚的，那么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家和外交家至今对此还不明白。所谓“原子外交”出现的原因只能用这一点来解释。众所周知，这种外交手腕的依据是，美国用这种保密的方法就能保持其在掌握核武器方面最初的战略优势，并利用人们对原子弹破坏力的恐惧心理，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调整国际政治。生活很快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很遗憾，这个误区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彻底根除。

不久前英国杂志《新的国务活动家和国家》发表了马·斯·布拉凯特^①教授一系列关于核能在军事上应用的很有趣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好地说明了美国的原子优势如何在逐渐消失，布拉凯特认为，这个优势现在已经没有了。布拉凯特公正地指出，尽管全世界对原子弹的科学研究正在进行严格的保密，但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即使根据报刊上透露的很少的科研情报，大体上重复核技术和核物理发现中的基本阶段和基本成就也不会有特别的困难。作为没有参与核工程的科学家，我同布拉凯特一样，可以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广泛发表的资料的基础上。我基本上同意布拉凯特对现代核物理取得的成就的描述，但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略有不同。

* * *

自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在发展原子能工程方面的基本

^① 马·斯·布拉凯特（1897～1974），英国物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成员和会长，苏联科学院外国院士；从事原子物理和核物理、宇宙射线物理方面的研究，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1948年）。

努力，就转入增大它的爆炸力。大概可以认为，在新墨西哥州的第一次爆炸之后，通过对受激链式反应方法技术上的完善，成功地把原子弹的爆炸力又增加了 10~20 倍。但最独到的和最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进行。

与自然界存在的放射性物质一样^①，原子弹是靠把重原子核分裂成较轻的原子核而得到自己的能。但早已知道了另一种获得能的途径：靠用较轻核合成重核。核的这种合成过程^②被认为是在一些恒星和太阳的内部进行的。这正是维持星球高温的能量来源。不难看出，类似的过程（如果能够用人工方法进行的话）可以导致突然释放大量的能，亦即爆炸。如果像铀一类最重的元素裂变释放能最有效，那么，用轻核进行合成时就应当用像氢那样最轻的元素释放能最有效。因此就自然提出了关于实现具有合成过程的炸弹问题，并把它叫做氢弹。为了引发用氢核合成的过程，需要高温，目前大概只有用核爆炸的方法才能实现，虽然不排除以后可以采用快速累积引爆的方法，实现高温的可能。在最初的方案中，氢弹的结构就是将普通的原子弹四周用装满氢的包壳包围。引发的原子弹所形成的高温达几千万度，此后就发生了氢核合成为氦核的过程。这时爆炸所得到的能决定于可以转变为氦的氢^③的数量。简单的计算表明，在这种核反应下，得到超过最初的原子弹爆炸 1000 倍的爆炸强度，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似乎一切都很简单，但从数量上来研究这些过程时，就产生了实际的困难，它使人开始怀疑制造氢弹的现实可能性，甚至第一个原子弹的研制者奥本海默教授也是如此。^④

问题在于氢核处于三种状态。最常见的是原子量为 1 的氢核，

① 指一般放射性衰变与核裂变所得到的能都表现为其产物所携带的总动能。

② 即聚变核反应。

③ 这里即指两个氢的同位素氘聚变成氦的反应。

④ 罗·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

然后是原子量为2的所谓的氘；它在自然界是很少的，最后就是原子量为3的氚核。氚核有放射性，它的衰变寿命大约是12年。自然界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①，只能人工合成，例如可在核反应堆中产生。对聚变核反应比较详细的研究表明，氢弹只有在具有足够数量的氘的情况下才可制成。由于氘的制造费用昂贵和工艺复杂，根据许多科学家的看法，氢弹的造价特别高。布拉凯特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美国一些科学家估计，1公斤氘的造价为10亿美元，虽然他本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

在制造氢弹时也还有其他一些技术困难，例如必须使用液体氘和液态氚。所有这一切导致氢弹的重量达几十吨。众所周知，在评价制造这种昂贵的和实际上不能移动的氢弹的合理性时，美国科学家意见分歧。然而，美国政府仍然决定无论如何要制造它，这仅仅是为了在1949年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后重新取得显然已经失去的“核霸主”地位。

在花费数十亿美元在萨凡纳里韦尔建立了第一个生产氘的工厂后，美国人终于在1952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所得到的爆炸力明显大于普通原子弹。^②此种昂贵而又笨重的氢弹在军事上没有重要意义，但在科学上的意义却是很大的，因为实验已经证明，聚变核反应是可行的。一年以后的1953年8月，苏联也爆炸了一颗氢弹。

从以后的叙述将看出，从这时起开始了在军事上应用核弹历史的新阶段。

* * *

美国人毫不隐讳，他们经常对苏联周围大气层的成分进行观

① 约为氢的万分之一。

② 1952年11月1日美国爆炸了一颗代号叫“马依克”的氢弹，其重量为50吨，爆炸力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大800倍。

察。大家知道，原子弹爆炸后，大气层中留下来的放射性物质会被气流带到很远的地方。这使美国人通过分析苏联国境以外的空气，不仅可以确认在我们国家发生的核爆炸，而且可以评定出它的力量和性质。布拉凯特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我国热核弹爆炸以后，1953年8月美国人用这种方法发现了空气中锂的轻同位素。这个事实对于物理学家了解氢弹的情况是足够了。而问题正在于此。

苏联一些科学家首先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思想：由锂生成氘的过程不是像美国人做的那样，事先在反应堆中产生，而是在爆炸时依靠引发核爆炸过程中形成的中子。这样一来，大量极端贵重的氘已无必要。此外，由于生成了氢与锂的化合物（氢化锂^①），这样，就没有必要使用制造起来很杂的液态氢了。^② 通过实验实现了这一卓越的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氢弹，或者是这种炸弹比较正确的名称——热核弹，实际上只是稍贵一点，并不比普通原子弹重，而它的爆炸力却能超过原子弹爆炸力的数千倍。

在得到足以揭示苏联热核弹实质的空气分析资料以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7个月成功地复制了它。人所共知，这种热核弹在美国是1954年3月爆炸的。我认为，为了重现核武器竞赛的客观历史，需要对当时形成的情况作较详细的研究。

在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热核爆炸以后，我们储备的每个原子弹都变成了热核弹。这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因为对此只需要足够数量的锂的轻同位素。大家知道，对现代技术来说，分离出一般的锂的轻同位素没有困难。这样一来，苏联储存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实际上一下子增加了1000倍，而美国这种爆炸力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

① 这里似应为氘化锂。

② 实际上应是氢的同位素氘。全部过程应是：中子与锂作用，生成氘和氦，所生成的氘进一步与氘作用生成氦和中子。在这两个聚变反应过程中，都释放出大量的能。氘在这个循环中没有消耗，相当于催化剂。消耗的核燃料是氘。

即使容许美国的原子弹核燃料储量比苏联多几倍，那么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力为美国 1000 倍的情况下，苏联的“核实力”超过美国“核实力”的几百倍也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信心十足地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就其规模而言，有如此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当然不包括殖民地战争）。

这种情况持续了 7 个月。苏联政府无疑对此一清二楚。因此很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国外那些用苏联企图侵略来吓唬本国人民的人怎么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利用 7 个月的显然压倒的“核”优势去达到臭名远扬的侵略目的？要知道，按照一些美国技术专家的看法，苏联的几十个热核弹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足以把任何一个国家从地球上抹掉，这样看来，这 7 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外交界在具有充分“核优势”的这 7 个月里，没有以“实力政策”去行事？而这是战后英、美外交家为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世界而竭力采用的政策。

这里可能只有一个清楚而又简单的答案：侵略和强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政策，而苏联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国家。甚至当这种国家明显拥有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时，它仍然不会这样做，同样，一个正直的人决不会去偷，即使明明知道不会受到惩罚。

使我十分惊奇的是，为什么即使是英、美最进步的报刊，对这一切也只字不提？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核爆炸问题科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我要详细研究人们还很少意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只有科学家了解，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

为了想象热核弹的破坏力，应当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整个德国所造成的破坏。大家知道，那时向德国总共投了大约 300 万吨炸弹。现在一颗热核弹的破坏力比上次战争向德国所投的炸弹

的总和还要大几倍。

热核弹主要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那难以想像的破坏力，而在于它对空气的放射性污染。任何一种原子弹爆炸之后，在空气中都会留下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它不断产生贯穿辐射^①，即使剂量不大，也会给活的机体带来危害，而且还会带来死亡的危险。这种对大气的放射性污染不是可以躲避的短期现象，它可以持续几年。粗略的计算表明，如果把从铀反应堆中得到的活性产物^②变成热核弹并进行爆炸，那么这种物质现存的数量可以完全污染地球的大气层。

从这种情势的现实性出发，可以构思出我们称做“x”和“y”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它们每一方都有极限数量的热核炸弹，也就是足以污染全球大气层的数量。比方说，x国乘其不备或者利用在炸弹技术方面的优势向y国进攻，并可以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从地球上抹掉。当然这时x国在注视着，希望这次战役所用的炸弹的数量小于极限数量，也就是可以污染全球大气层的数量。甚至即使x国这种战役进展“顺利”，但在y国仍然活下来一小撮人，这些人已经一贫如洗，哪怕是从复仇的感情出发，仍然可以把自己储存的放射性物质的残余拿去爆炸。他们用这些东西去污染大气层，并用这种方法去消灭x国的全体人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不仅是y国剩下的那一小撮人，而且是全世界各国没有参与冲突的人民。

还在10年以前，这种构思可以作为儒勒·凡尔纳或者威尔士的科幻小说的基础。但今天这种构思已不是文学幻想的基础，而是真正的现实，遗憾的是，目前只有一些科学家才意识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在国外的报刊上现在还能读到一些很长而又费解的论断，即美国在核燃料储备的数量方面仍保持着自己在世界上的优势。这些

① 指穿透能力很大的射线，如伽玛射线等。

② 即核燃料。

论断说明，他们对现实状况根本不了解。

如果在极限数量（假如我们设定为1000枚热核弹）爆炸以后，地球上的生命就将不复存在，那么，超过这个数字所剩余的炸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点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已经不存在被毁灭的一方和进攻的一方了，也就不可能再把热核弹用于军事的目的了。爆炸1000个还是5000个炸弹已经没有区别，这无异于一个人在1000米深的水中还是在5000米深的水中淹死。

当然很难相信人类会进行这样一场使“地球自杀”的战争。可以正确地把自杀行为说成是心理不正常的行为，也可以说近于神经错乱。难道说人类中在政治、宗教和其他世界观方面经常存在分歧就应该导致在目前使用热核弹，并为证明自己的正确，而造成共同的毁灭吗？

显然，现在有一个摆脱目前状态的出路，这就是绝对禁止任何类型的核武器，并对这一禁令的执行情况进行最为严格的国际监督。

我完全同意我的同行，德·弗·斯科别利岑^①院士不久前写给《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表示的意见。除全面禁止核武器外，没有一条摆脱现状的简单而又实际的其他出路。科学家都清楚这一点，他们的责任是让自己国家的全体公民都了解这一现状，以便使最顽固的政治家也能明白，从“实力政策”出发建立各国之间关系和在军事冲突中可以使用核武器是很荒唐的。

国外有许多科学家发表演说时都指出，任何一次核爆炸以后不可避免会对空气产生放射性污染，并最终对地球上所有的人产生后果极为严重的影响。在远离美国热核弹爆炸地点的日本渔民的死亡就可以做出公正的结论，这种通过空气的放射性污染的例证是如此

^① 德·弗·斯科别利岑（1892~1990），苏联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科学院院士。1954年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致编辑部的信”，信中对裁减和禁止核武器问题进行了分析。

地令人痛苦，而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对这种演说表示欢迎，就像对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艾德里安^①教授1954年9月1日在牛津发表的权威演说一样。在大英科学学会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学会主席的艾德里安在他那一定程度上是专门谈科学和原子战争问题的开幕词中说，由于放射性污染，“大规模的原子战争对全世界将是灾难性的”说法是可信的。

* * *

为了全面研究分析军事利用原子能问题，还应当涉及对核袭击的防御问题。

对这些问题国外刊物上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但由于通常只限于讨论现有的和已知的防卫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使用无线电操纵的、配备雷达技术的导弹和飞机，所以这里军事技术顾问的意见比科学家的意见更具权威性。各种地位不同的技术顾问一致肯定说，在现代无线电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条件下，虽然有很大困难，但仍然可以保护90%的人不受空袭的侵害。这就是说1000个炸弹中只有100个可以命中目标。例如，对美国本土组织此种防御的费用约需拨款2000亿~3000亿美元，亦即比生产原子弹的一切花费还高许多倍。毫无疑问，组织这种防御主要是作为遏止发动核战争的一个因素，对于所有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们假定的1000枚炸弹的数量是可能完全污染空气的炸弹的极限数量，那么在组织防御时，其中只有100枚炸弹具有破坏性作用，而这个数量对于“从地球上抹掉”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够的。显而易见，即使这种不完备的防御系统，对侵略者来说，也可以使核战争变得黯然失色。

^① 艾·道·艾德里安(1889~1977)，英国生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和主席(1950~1955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

显然，一个国家完备的防卫，将使核战争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我们应当赞成用各种手段详细研究比较有效的防御方法。应当给科学家提出寻觅全新的、比较有效和比较经济的防御方法。

科学史一贯教导我们，任何毒药都有其解毒剂。很难想像在无穷无尽、五光十色的自然现象中，不存在一种制造出合乎要求的解毒剂的新方法，以使人类免除核灾难。

* * *

但不管热核弹多么充满威胁，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已形成的状况明显地把原子战争的辩护士引进了死胡同，这一点不仅所有的人很快就会看到，而且毫无疑问，各国的进步人士很快就会明白，脱离这个死胡同的惟一出路就是寻找一种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可靠方法。此外，现存状况的积极方面还在于，对提高核反应的爆炸力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逐渐变得没有意义。显然，当 x 和 y 两国已经积累了超过世界污染标准那样多的放射性物质，继续积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已经没有必要。这样一来，今后首先应当缩减，然后完全停止对原子弹的研究。既然双方在这一方面都拥有数量大约相等的知识，自然就有可能把这些知识公开并把它作为全世界科学家的财产。只要翻阅一下科学书籍，就不难发现，目前对核物理羞羞答答的公开已经开始，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再过几年就会完全公开——这个期限就看有关的国家机构负责保密的领导人理解并充分认清现有状况需要多长时间。

对公开核物理的秘密应当表示欢迎，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科学研究的进步。广大的科学家将会立即被吸引到这个工作中来，在不同知识领域里的科学家将开始合作，而这一点目前还很不够。

科学史坚定不移地表明，通过科研工作中不同流派的互相交融

的途径，就会有最先进和最卓越的发明。因此，不同专业的科学家的自由合作一定会发现在科学中和生活中利用核作用的全新的可能性，虽然对这种可能性还不能预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核作用利用的可能性将变得极为重要。

暂且不提这些尚未确定的可能性，我只描述一下目前和平利用核作用的最有成效的发展方向。

* * *

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目前有两个主要发展方向已很明确。第一个发展方向基于人工放射性原子利用的可能性。这些原子的化学性质与碳、磷等最常见元素的原子完全相同。大家知道，这一点正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和化学中。在应用所谓的“示踪原子”时，用全新的方法成功地弄清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生物和化学作用机制的实质。尽管这项工作目前只限于纯粹的科学成果，但它的意义在实践中却是很大的。对现存作用作较深地了解总会发现使它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记住，生物作用是在我们文明生活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农业、畜牧业、医学的基础。

但我将不对这些核作用科学的应用方向作详细的研究。无论是科学著作，还是普及著作都应当对它们予以足够的注意。

我想主要讨论一下第二个发展方向——利用核作用以增加人类所拥有的动力资源。第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如下：在核反应堆中对地壳中能够找到的全部预测数量的铀进行加工后，可以得到多少能？

科学文献指出，如果把所谓“增殖者”反应堆中所能得到的铀全部使用于核反应，那么可以计算出，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到的新能量比燃烧所有可以开采的煤矿所得到的能量至少还多9倍。因此，如果同意像广为流传的地质学家预测的那样，即地壳中煤的储量只够人类使用2000年，则铀的原子能的储量够人类用的时间远远超

过2000年。当然，这个计算都是推测的，但它仍然毫无疑问地说明利用核能为人类服务可能达到的巨大潜力。并且应当指出，这些计算根据的只是把利用已了解和研究得很充分的铀核裂变作为前提。毫无疑问，以后会发现其他规模更大的核反应。如果认为，人类还能成功地利用轻核聚变产生的能，则可以大胆地认为，核反应的动力永远不会受“可燃”原料不足的限制。

如果确乎如此，那么如今妨碍广泛和平利用核能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目前煤炭、石油、水力的储藏尚未用尽，只有当核能的获得和利用比通过燃烧煤、石油等方式获得能更加有利时，核能才会顺利地利用。我尽量粗线条地来描绘一下核动力的现状。

如上所述，当进行核反应时，就释放出很大的能量。这个能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裂变后产生极高速运动的电子、中子和原子的核碎片的动能。如果把这些微粒的动能与其在相应的热运动状态条件下进行比较，则相当于加热至数百万度。可以用各种方法把快速运动的粒子的动能转化成有用的能。我指出其中三个基本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依据是，在裂变过程中形成的大多数快速运动的粒子都带电荷。通过制动这些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可以把它们的能直接转化为电能。这是最直接和最有效地利用核能的方法，但也是最难以实现的方法。当这种过程实现的时候，同时会产生一种放射性铯的元素，只是数量很少。而要想大量得到这种能量则是很困难的，况且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还远远没有弄清楚。在回旋加速器或直线加速器这样一些已经掌握的装置中，电能可以逆向地转化为加速粒子的动能。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即怎样把动能转化为电能？原则上这两种过程都是可能的，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应当做大量发明工作和克服许多技术性困难。我在参考文献中尚未发现这种逆向加速器的尝试。

第二种方法很容易实行，它就是让核反应时所得到的快速粒子

进行化学反应，把用这种方式积累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这就是这种过程的极其简单的轮廓。比方说，在核作用时所得到的快速粒子的影响下，水分解为氢和氧；然后在气体状态下它们重新化合时可以得到电流。用这种化学过程回收核能比第一个方法容易得多。这时显然有希望得到不错的效果，预期设备将简单而又便宜。但目前直接把核能转化为化学能，化学能转化为大量电能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些过程在实践中应用之前，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和技术工作。虽然在参考文献中没有指出对这种过程正在进行研究，但已有许多研究放射性辐射对化学变化影响的论文。

最后是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最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将核裂变产物及粒子的能量转换为热，可以用来发动普通的热动力装置。例如蒸气涡轮机或煤气涡轮机，这样就得到一种热动力装置，其燃烧室中使用的是核能。这种方式的优越性就是其中所有的基本单元都是现代科技已经掌握的，只是需要将这些基本单元适应于在核反应堆中产生热的特殊条件，并正确地把它们互相组合起来。现在一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走的的就是这条路。从国外浩瀚的科学著作中可以看到，已经取得了给人以希望的结果。但是应该指出，此种利用核能的方法的通常是有限的。因为现代蒸汽动力设备的效率不超过 30~35%，那么显然，类似的核设备也不会有更高的效率系数。与热动力设备比较，由于需要防止放射性辐射和利用遥控，核设备就比较复杂。不过，所有这些在实践中的不足都可以得到弥补，因为不必把煤、石油和其他燃料运到动力设备的所在地。不难看出，这些优点在许多特殊情况下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如在北极或其他难以到达地区，在轮船上，在飞机和洲际导弹上，也就是在所有普通燃料难以运输的地方。至于说到在国民经济动力部门和平使用核能，现在一些科学文献中对开发各种类型的热动力核发电站的技术经济条件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和分析。这里，问题还

不是很清楚的。比如，计算表明，核动力设备投资比一般设备要稍多一些，但这毕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有可能使这种核电站靠近消费者，从而节约昂贵的供电网。

在利用本身的造价问题上，可以预见到两个基本困难：其中第一个困难——必须定期从反应堆中清理掉放射性“核废料”。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铀进行代价很高的化学加工。有些作者担心，这些开支可能会超过铀作为燃料与煤炭相比所节约的成本。在使用热动力核电站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放射性“核废料”的命运。如果像现在这样简单地把它倾入大海或者随便倒在外边，简单的计算表明，对水和空气的放射性污染很快就会达到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的程度。为了摆脱这种情况，现在有人提出把“核废料”封存在密闭的水泥板中深埋地下或海底。这当然也使利用热动力核电站变得复杂化和更为昂贵。

在运行时，电站构件的可靠性将起很大的作用，对这种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每次对核反应堆和与其有关的仪器设备进行维修时因存在放射性而非常麻烦。这里的严重的困难在于，在蒸气动力反应堆中的高温条件下，在放射性作用中产生的快速粒子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这些反应会使所用的材料，即使最耐久的材料也遭到锈蚀。从现有资料大概可以得出结论，已知材料中最稳定的材料，如不锈钢，也经受不了反应堆长时期的运转。但实验证明，镀一层锆可以解决这个困难。但是研究这些问题要花一定的时间，因为目前工厂尚未掌握锆的冶炼技术。问题还由于锆中往往含有铪的杂质而复杂化，而核反应堆中铪的存在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仔细地用化学方法清除锆中的铪，这样就使锆的冶炼复杂化了。

还应当指出，对浓缩铀型反应堆强运行^①条件下有必要采取

^① 即指高功率运行。

安全措施。以免反应堆中所发生的链式反应转变为类似原子弹的爆炸。在一些著作中，指出了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由于上述困难不是原则性的困难，所以可以相信，所有这些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克服。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自己的演说中指出，再过 10～15 年热动力核电站就其技术经济指标而言，可以赶上普通以煤为燃料的发电站，并且开始取代它们。

至于说到热动力核电站工作的实验资料，目前还很少。美国可能至少有 4 个热动力设备的反应堆。这些反应堆都不大，按不同的方式工作，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系列实验数据。据报道，“增殖者”反应堆已工作了两年，并很详细地公布了在橡树岭用浓缩铀运行的实验性反应堆的结构。借助这个反应堆使效率为 14% 的 140 千瓦涡轮发电机开动起来。这个实验性设备工作了两年，其专门的目的在于研究潜艇动力的成套设备。因此，在文献中引用的虽然是非常详细的技术和经济数据，但其意义却很有限。

苏联去年建成了第一个 5000 千瓦热动力核电站的大型设备，它超过美国建成的同类电站的 35 倍。这个设备以一般的和平供电为目的，因此它的技术经济指标在研究和利用核能的方法时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期望，经过不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将能获得这些数据，从而可以进行研究。当然，苏联这一设备和未来的设备相比功率还不大，因此很难期望在它运行时达到最高的技术经济指标。但是毫无疑问，它作为研究较大的热—核动力成套设备的基本指标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

根据所引用的资料，我认为，即使按照原来使用的方法，核动力也是具有远大前景的。所谓按照原来使用的方法也就是把已用过的方法和已了解得很充分的热动力转换方法，正如煤、石油等普通燃料的燃烧转变成动力的方法运用到核动力方面。但正像我一开始

就已经说过的，遥远未来的能量利用方式应该是以更充分地获得核能为其特征。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开辟了极其巨大、极其有趣和大有希望的创造性科研工作的远大前景。这项工作只有全世界各国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友好参与下才能顺利和迅速地完成，比方说在物理学、电子学、冶金学、化学、电化学、热力技术等领域。

目前妨碍这一联合工作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与核反应的科研工作有关的保密问题。这不仅妨碍了国际范围内的科学家的合作，而且正如国外报刊上所看到的，也妨碍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科学家在这项工作中的合作。

我已经指出，现在当核武器竞赛已走入死胡同时，有一切理由预言，最近几年内在核物理领域中的保密应当终止，这样就会立即促进科学的繁荣。但不应当忘记，在科学家国际交往的路上，仍然会有另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冷战及其根源，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阶级偏见。任何一个进步的、有思想的人在这个偏见中当然不能不感觉到中世纪与科学中的新思想斗争的方法的复活，就像当年所组织的反对哥白尼、伽里略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人们早就应当明白，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能用警察的措施驳倒先进的世界观和阻碍它的发展。我愿意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情况不能长时间的持续下去，科学家友好的国际合作终将恢复，这会立即把和平利用核能推向前进。

我相信，伟大的发现——核能不会遭到人类诅咒的时代已经不远了。它定能像今天的电一样成为我们的文明和福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彼·列·卡皮察（签名）

1955年1月11日于尼古拉山

No 03962

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关于卡皮察 《论核能》一文处理办法的报告

(1955年1月27日)

科学院院士彼·列·卡皮察请求审查他为《新时代》杂志所写的文章《论核能》。

在本篇文章中通俗地叙述了和平和军事利用核能这个问题的现状。文章的作者证明美国政府的“原子外交”是站不住脚的，并宣布他与德·弗·斯科别利岑院士的意见一致，后者写给《国际生活》杂志的信中表示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卡皮察院士引用了一些外国科学家反对准备原子战争的有趣资料，特别是著名英国物理学家布拉凯特的一些文章，均证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以往的优势现在已荡然无存。

在详细陈述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前景以后，卡皮察院士表示相信核能不遭人诅咒，并将成为我们文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代已经不远了。作者强调说，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可以更快地取得成果，但却受到核物理研究中的保密和建立在对共产主义世界观阶级偏见基础上的冷战政策的干扰。

然而，卡皮察院士的文章在阐述某些政治上重要问题时有客观主义的缺点，文章中还有一些在苏联至今没有公布的资料，因而引起一系列不同的意见。

在对核武器竞赛进行合理的批评时，卡皮察院士并没有强调是苏联政府首先提出禁止核武器的主张的，并一贯努力争取达成这样

的协定。卡皮察院士并没有提到我国研究原子弹以及氢弹，是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一种必要的反应，他力图“重现”一种核武器竞赛的客观画面。卡皮察院士的文章给人一种苏联在积极参加核武器竞赛的印象，而在1953年8月至1954年3月，苏联甚至成了这一竞赛的优胜者。

卡皮察院士的文章对核研究中的保密制度对科学进步的有害影响这一问题也作了客观主义的分析。文章没有提到，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些主要科学家在1939年通过了停止公布原子核物理的研究成果的决议。到现在为止，外国报刊上公布的只是核物理现象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揭示核工业奥秘的那一部分。卡皮察院士不去阐述核物理领域中研究工作保密性的真正历史，而指责所有政府似乎都同样地在妨碍科学家建立国际合作。

在苏联公开的报纸上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热核弹（氢弹）结构的详细资料，以及美国已经复制出苏联专家发明的这种核弹构造的资料。卡皮察院士没有指出情报的来源，只在文章的第9页上写道：“苏联一些科学家首先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思想：由锂生成氘的过程不是像美国人做的那样，事先在反应堆中进行，而是在爆炸时，依靠引发核爆炸过程中形成的中子。这样一来，大量极端贵重的氘已无必要。此外，由于生成了氢与锂的化合物（氢化锂），这样就没有必要使用制造起来很复杂的液态氢了”^①。在文章中首先公布这些重要资料是不适当的，作者还特别指出，他没有参加核工程。

卡皮察院士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包括了一系列今后发展核物理的设想。特别是他写道，通过制动在原子核分裂时形成的带电粒子的方法可以把核能直接转化为电能。文章的作者指出，他在文献资料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第474页注。

中还没有见到发明一种仪器来完成这个过程的尝试。由于卡皮察院士对这些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内容可能具有实践的意义，所以未必应当将这些内容发表出来。

在说明热核弹破坏力的特点时，卡皮察院士引用美国一些技术顾问令人怀疑的见解说，用几十颗这样的炸弹可以把任何一个国家从地球上抹掉。例如，卡皮察院士在文章中对原子战争恐怖的极其鲜明的描述，他是这样说的：“热核弹主要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那难以想像的破坏力，而在于它对空气的放射性污染。任何一种原子弹爆炸之后，在空气中都会留下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它不断产生贯穿辐射，即使剂量不大，也会给活的机体带来危害，而且还会带来死亡的危险”。（第36页）最后的论断总的来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应该是，剂量不大的放射性辐射不是致命的。

卡皮察院士断言，一颗热核弹的破坏力比二战期间投在德国本土上的300万吨普通炸弹还要大几倍。在没有搞清楚它们各自条件的特殊性时，就能引出这样的危害性论断吗？实际上，热核弹的效力要低于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该热核炸弹那么多的普通炸弹爆炸时的效力。是否应当在公开的报刊上把美国和苏联的“核能力”在数量上进行对比尚不清楚。

卡皮察院士在文章中提到，通过建立链式核反应的方法释放能量的可能性首先是尼·尼·谢苗诺夫院士提出的，并且最先公布这方面数据计算的是他的同事亚·鲍·泽利多维奇和尤·鲍·哈里顿。必须注意到，1944年美国的铀反应堆已经开始工作了，尼·尼·谢苗诺夫院士在《25年前的苏联化学》这本论文汇编中写道：“正如泽利多维奇和哈里顿的计算所表明的，完成雪崩似的链式反应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但目前还不能创造这些条件。利用链式反应中所含的核能的途径对于现代技术来说还是太复杂了”。

卡皮察院士文章的严重缺点也是断言可以把物质转化为能。文

章作者忽略了苏联一些核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对这种错误方法论表述的批评，以及忽略了他们在阐明质能关系方面的大量工作。

我们认为彼·列·卡皮察院士提供的文章《论核能》不宜发表。

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部长 阿·鲁缅采夫

1955年1月27日

附 录

谢尔戈·贝利亚有关 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回忆

美国在阿拉莫果尔多附近的沙漠里爆炸了第一个原子装置已不是秘密——斯大林在与杜鲁门会晤前就已知晓。我父亲曾亲自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通报了美国人获得的实验结果。这还是在波茨坦大国首脑开会期间，谈话时有谢罗夫大将在场。我是从他那儿了解的这些细节。……

侦察回来的人们掌握着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有关资料。他们报告给父亲，而父亲又马上通报给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很不满意。发怒的原因明摆着——美国人抢在了我们的前面。……很自然，他很不客气地询问，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父亲报告说，我们还需一两年的时间，我们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回应美国人的挑战。

应该说，他们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了。斯大林常常关心研究的进展情况。而这一次父亲通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他说，已经得到了钚，正在全力进行原子弹的设计和研制。不过，

父亲还是说，即使各方面条件都很顺利，再要早些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至少还得两年”。

谈话时库尔恰托夫其实并不在场，并非像现在有人写得那样。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斯大林当时所讲的那席话了。有人写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马上就责成库尔恰托夫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事实上据谢罗夫给我讲，斯大林认真听完了父亲的报告，只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他打算还要再谈这一问题，仅此而已。然而，正如大家所知，是与美国总统的会谈。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次会谈……

丘吉尔的吃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家现在都清楚斯大林与杜鲁门会谈前的那段历史。……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绝对平静地听取了美国总统的通报。与其说这是一次通报，还不如说这是一次试探，想试探斯大林的反应。

……开会回来后，斯大林没有斥责任何人，不像现在有的人述说的那样，他只是指示我父亲准备对加速这项工作提出建议。后来，正如大家所知的，成立了一个具有更广泛权力的特别委员会。国家的所有资源被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

下面摘自官方的文献资料：

“特别委员会是在1945年8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上成立的。它隶属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其成员有拉·帕·贝利亚（主席）、格·马·马林科夫、H. A. 沃兹涅先斯基、鲍·里·万尼科夫、A. П. 扎韦尼亚金、伊·瓦·库尔恰托夫、П. Л. 卡皮察、B. A. 马赫涅夫、米·格·别尔乌辛。并规定‘凡一切有关铀的原子内部能量的利用工作均属委员会管辖’。后来该委员会归属苏联部长会议领导。1953年3月具有国防意义的一些其他专门工作的领导权限也划归该委员会领导。1953年6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取消特别委员会，而其机构则被并入重新组建的苏联

中型机械工业部。”

斯大林还催促研制氢弹，对斯大林应给予应有的评价，没有他的介入什么事情都别想干成。这一点他的手段很多——从对设计的人们进行物质奖励到施加压力，但无疑他帮助过他们。我曾经对我现在的同事讲过，那时我的研究所里的计算机要比今天的还多。有11台，体积很大，是第一代的，但是有，而且是国产的。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哈伊尔·别尔乌辛，战后一些年代里曾任化工部部长，他在60年代末就写了一些回忆录，但是不久前才出版。他在回忆录中强调，“当我们失败时，我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当然，我们在恐惧中度日”——叶菲姆·斯拉夫斯基随声附和说，他在那些年代里曾出任原子能联合企业第一任厂长，后来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有的材料来源更直接说，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到试验场时带着的职员名单是两份——一份上的人员是获奖的，而另一份是如果失败了被捕用的。……竟有传言说，父亲好像在最后一刻也不相信原子弹会爆炸。

有关这一类的童话确实很多。有关这类名单的东西我读过，还有别的一些什么。……而事实却是这样的。1949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我自己就在现场，因此我知道的这一切并非是一道听途说。有人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什么父亲在原子弹爆炸后心情不好，因为他没能第一个向斯大林汇报试爆成功。

父亲的反应我记得非常清楚。情况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原子弹爆炸后，父亲和库尔恰托夫互相拥抱和亲吻。我记得父亲当时说：“谢天谢地，我们的一切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任何一群学者中都有对立面。这里也是如此。有人给斯大林写信打小报告，说爆炸的可能性很小，说什么美国人在取得某些成果前，作过多次的试验。

父亲与那些参加实施原子弹计划的学者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至于纯理论性的内容，我现在已不记得了，当时是提出了一个成功百分率——爆炸不一定能从首次试验中获得成功。现在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他们所有的人，可以理解，都如释重负。我看着父亲，心里明白，他同那些与他共事多年的人们为了取得这一成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人们现在写的是，“这是贝利亚的辉煌成就”……。但这是苏联、苏联科技的辉煌成就。没说的，完成的的确是一项顶天立地的任务。

……还是那个斯拉夫斯基的一些说法是可信的，例如，即使再过去了许多年，他还是承认，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时常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他对所有的组织领导工作游刃有余。在他的帮助下，许多不可缺少的决定得以付诸实施。诚然，“贝利亚没妨碍我们”一语使人们感到惊讶。

幸亏有人能这么说。当有人强迫库尔恰托夫指控父亲，并要求他写贝利亚千方百计阻挠制造第一颗苏联原子弹时，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他——贝利亚，就不会有原子弹。”

现在谈谈是谁向斯大林通报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通报的人正是我父亲本人。因此一切有关某个人抢在我父亲之前通报了此事，而父亲勃然大怒的谣传都是荒唐的。除了父亲，还能有谁会去通报呢？

报告是直接由核试验场送往莫斯科的，而随后不久斯大林让我父亲请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及其最亲近的助手，还有原子委员会的成员去会见他。当时谈话的细节自然是较为详尽的。

在那个年代里，这一邀请要比获得最高勋章更有意义得多。科学家对那次接见很满意。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奖励，奖了

小汽车，为他们盖了房子。一句话，原子弹工作者的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奖赏。您要注意到，这一切可都是在战后普遍困难的条件下做的。斯大林当时说，他真想也这样对待那些曾参与设计原子弹方案的所有的人们，他们也是受之无愧的，但遗憾的是，国家暂时还没有那种能力。

有许多科学家当时就受到很高的奖励。我父亲也获得了国家奖金。问题当然不在于奖励。完成了顶天立地的事业，他们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

成立了实施铀规划总局。而这之前已有某种机构。尽管当时是战争时期，没有资源，没有资金，但已经开始了。主持新局工作的是鲍利斯·里沃维奇·万尼科夫。他后来三次获得苏联劳动英雄称号，是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两次国家奖金获得者。在战争年代，万尼科夫将军是人民委员，主管武器弹药工作。而总局归我父亲领导。为什么归他领导呢？因为正是我父亲自1939年以来一直，也是惟一的一个坚持必须开展这项工作的人。

还考虑到，他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善于解决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问题。父亲所领导的国防和其他部门的工作都进展顺利。

以冶金工业为例。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规划要求所有工业部门都参加，需要一个行家，一个善于在战时条件下进行组织工作的人。我知道，正是这些条件确定了这一选择。此外，所有侦察情报继续通过他的机构，最后到达我父亲那里。

无疑，如此规模的规划也需要专门的知识。他不会推算这样或那样装置的数据。但是推算的结果、物理性质，父亲可以通过科学家们而得知。只要确定方向，提出问题，就足够了。

【专题说明】

赫鲁晓夫谈苏共二十大

(1956年7月)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由于其承认了苏联以往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且把矛头直指去世不久的苏联党和国家领袖斯大林，而在全世界引起了政治震动和社会震动。苏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固然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模式的盖子，从而使追寻社会主义目标的各个国家得以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从实际结果看，赫鲁晓夫的唐突行动，无疑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不仅给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生活造成波动和混乱，也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麻烦。那么，苏共中央当时为什么决定在全党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这一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的呢？本专题选刊的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长时间谈话，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 会谈记录

(1956年7月10日)

苏共中央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波斯别洛夫、波诺马廖夫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参加会谈的有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意共中央委员塞勒斯特·尼加维莱、意共中央候补委员贾科莫·贝勒格林尼。

会谈于10时30分开始，于17时结束。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意共代表团成员收到了南尼^①寄给苏斯洛夫^②同志的信，信中对《世界工人》杂志刊登《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一文作了解释并保证对苏共持友好态度和忠实于与意大利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政策（向代表团成员宣读这封信）。

巴叶塔同志：您的看法怎样？

赫鲁晓夫同志：信写的不错。我们决定以苏斯洛夫同志的名义正面答复他。但那篇文章不好。不过，考虑到意大利国内业已形成的条件，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在复信中我们将谈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起初我们认为，南尼打算把对斯大林个迷信的揭露作为疏远共产党人的借口，并认为在我们的报刊上对他的文章表态是适当

① 彼得罗·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战时曾任该党总书记，战后领导意大利社会党左翼。1946~1947年出任政府外交部长。曾获列宁国际奖（1951年）。

② 米·安·苏斯洛夫，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

的。然而在收到信后我们决定采取克制的态度。

巴叶塔同志：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南尼吗？

赫鲁晓夫同志：可以对他说，我们对南尼的信，对他努力保持与我们友好关系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就自己的行为与我们保持接触感到满意。

然后巴叶塔同志通报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意共的情况。共产党广泛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强调他们在意大利条件下的意义。它们在意大利舆论中得到了广泛响应并使共产党的敌人陷入混乱。代表大会有关在苏联加强民主的决议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决议与意共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是吻合的。共产党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过程中正在广泛利用二十大的材料。

个人迷信的问题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苏联对接受和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是有准备的，而在意大利则没有。共产党（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社会党）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因为斯大林的名字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意共中央认为，苏共进行揭露个人迷信的工作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做这件有益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应当看到苏共和意共所处条件的差别。苏联居民认识到，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例如，为被非法审判的人平反，取消对上班迟到和旷工的惩罚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意大利，人们不知道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缺点，因此对这些缺点的揭示最初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只是在人们对苏共采取的措施有了正确的理解后，才在意大利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意共领导人估计到，突然地揭露个人迷信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引起“休克”。何况，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动报刊在对苏联发表意见时，由于其国家与苏联有良好的外交关系而受到约束，但在意大利由于没有这个顾忌，反动报刊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选举运动更使这种攻击尖锐化。资产阶级报刊的

主要力量用于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分离。

南尼在这一时期显得张皇失措，发表了一些主张自治的声明，企图把反动宣传的主要压力转嫁到共产党身上，担心他的党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从局势和意大利社会党内形成的情绪来看，我们赞同苏共对它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共产党人完全赞同苏共的政策，因为它给所有的共产党带来了好处，促使它们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

意共领导人开始进行个人迷信问题的辩论时，力图使其超出本党的范围并以进攻的态度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这个辩论。在党内，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不是通过纪律措施进行的，而是通过说服的方式。意共领导人还本着这样一种出发点，即在这个问题上，灵活性不应当损害原则性。

因此，在反对作为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时，意共领导人使党避免了宗派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把辩论限制在党内。

在美国国会公布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我们对二十大决议的解释就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在这之前只公布了部分消息。陶里亚蒂曾认为报告将是保密的。从这点出发，我们采取了逐步地解释由于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而发生的变化的方针。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有中央书记处书记知道。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只通报了报告的政治方面的内容。意共中央懂得，主要任务是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不过应该向工人和劳动群众正确地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并回答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苏共中央也以自己的决议对此做出了回答。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应该表明，他们带有批判性地同意苏共中央所作的解释。否则共产党人将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你们赞成来自苏联的一切，现在，当事情反过来时，你们还是表示赞成一切？”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从正面对待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坚定分子，表示出一些不正确的和敌视苏共的看法。

赫鲁晓夫同志：可能你们现在将失去极少数人，然而以后你们将得到数十倍的人。

巴叶塔同志：没有任何人离开我们的队伍，我们相信我们党将赢得新的拥护者。

有关苏联法制遭到破坏的严峻后果的具体资料公布后引起了严重的混乱。无论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党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立场，而应当承认事实确实是严峻的，同时使人们坚信，一切都将纠正过来并且不再重犯。使党的中层干部相信这一点尤为重要。按照这个方针拟定了陶里亚蒂对《新议论》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和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

苏联同志对“蜕化”这个词赋予了我们从未理解过的绝对意义，而苏共中央决议中所说的对陶里亚蒂的第二个意见，没有反映出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这个意见反驳的不是陶里亚蒂所说的含意，而是你们对“蜕化”一词的理解。

意共领导人完全理解斯大林所负责任的程度，但同时也要避免“反向的迷信”，即把所有的缺点说成是一个人的错误，并更快地使共产党人乃至全体劳动者信服。苏共中央决议对此有很大帮助。

陶里亚蒂关于该决议的声明，其目的是表示意大利共产党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同时表明意共领导人（在次要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以此来打击那些叫嚷“赫鲁晓夫揪住了陶里亚蒂的耳朵”的资产阶级报刊。

作为一个有 200 万党员和 600 万张选票的大党，意大利共产党有能力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理解，拿这个党的威望冒险是不适宜的。

接着巴叶塔同志转向意共代表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他说，意

共领导人希望能预先通报苏共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意大利共产党的措施，并对苏共详细通报其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谈表示感谢，因为这对意大利共产党与南共联盟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有很大帮助。

赫鲁晓夫在告诫大家注意情报的特别机密性后向代表团通报了铁托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谈话。

巴叶塔同志：现在从美国方面传出一些谣言，说苏联政府打算承认朝鲜战争似乎由斯大林倡议发动的。如果这些谣言被证实，无论共产党，还是和平拥护者的运动都会受到打击。

赫鲁晓夫同志：这不是真情。我们随时准备声明，美国人在撒谎。

巴叶塔同志：你们非常坦率地宣布了许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这一切都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你们彻底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的决心，然而我们觉得，再公布一些这方面的事实好像是多余的。

赫鲁晓夫同志：请你们不要生气，因为我要说的事与你们无关。然而有趣的是，丘吉尔在我们访问英国期间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说：“应当给人民时间去领会你们公布的东西，否则这件事将向与你们对立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真诚的建议。丘吉尔这个老狐狸担心，如果因我们自己愚蠢的行动而被解除了对国家的领导权，那么即将执政的政府会恢复斯大林式的毫不妥协的方法。我对丘吉尔说：“我们将考虑这一点”。

巴叶塔同志说：苏共中央的决议深刻地分析了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并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现象不会重演。同时，他也关心苏共将来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协同一致地行动。他还通报说，意共代表团在《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和在苏联最高法院关于苏维埃国家民主性的交谈对代表团特别有益。他对苏联同志明智而真诚的答复表示感谢，并认为这些交谈是苏联与意大

利两国共产党关系改善的证明。巴叶塔同志说，甚至一些能够证明在苏联可以自由生活的“细小”证据，对于增强人们对苏联的好感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例如，资产阶级报刊公布的关于两个资本家乘自己的飞机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与铁托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消息，都抵得上共产党整整一年的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对印度的访问，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访苏邀请，对伊朗国王的邀请——都大大有助于共产党说服意大利人民相信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并粉碎敌人关于只有共产党人希望扩大与苏联的联系的谣言。甚至阿登纳^①来莫斯科也被我们用来广泛地宣传以改善意大利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在谈到苏共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时，巴叶塔同志表示希望在两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苏联的存在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不过没的必要恢复共产国际时期的纪律，这大概会成为两党之间的障碍。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即使在个别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出现重大的分裂，也无损于共产主义运动。苏共最近对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实行的政策看来能证明意共领导人的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即使不能建立起共产党的区域性联合体（法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在各共产党之间，首先是在他们与苏共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仍然是有益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联系不应带有“游览”性质，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之间坦率的创造性的谈话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巴叶塔同志请求通报苏共中央对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事态发展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报刊，如匈牙利和波兰报刊对他们的党和政

^①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德国政治家。战后出任科隆市市长，并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1949年出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连任四届。1955年9月阿登纳受邀访问苏联，讨论苏德关系问题。

府的各种措施常常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坚持并用浅显易懂的话阐述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方面，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缺点的原因而不是粉饰现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着，巴叶塔同志通报了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的成果。意共与南共联盟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不过南斯拉夫人很明显地醉心于领袖的地位，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也要先争论一番。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不过如果他们想抓住整个胳膊，这是办不到的。铁托十分欣赏对苏联的访问。尤其使他惊讶的是斯大林格勒的示威游行。他形成了一个印象，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是统一的和团结的，如果他们中间有意见分歧，也可以自由地表示意见。南斯拉夫人认为，无论与苏联领导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还是进一步改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都没有障碍。

铁托对法国共产党人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有所保留，在一次会见中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南斯拉夫人使用“同志”一词时有些犹豫，等等。总而言之，铁托表示打算改善与法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但不急于求成。

意共代表团成员们有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现有的关系对其他共产党可能是有益的。南斯拉夫人大概不想加入现有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不过他们不反对加入新的国际民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大体上相当于对南尼党的态度。

赫鲁晓夫同志回答了意共代表团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首先谈及他在苏共中央^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的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曾认为报告是不会发表的，否则我们对报告的写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这个问

^① 原文如此。

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做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做出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原计划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由波斯佩洛夫^①同志作为通报来作，不过这可能使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或者怀疑苏共领导人中间存在分歧。因此这个报告委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来作了。

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实。然而结果发现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而对你们是有害的。在苏联，斯大林就像是半个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大家知道，他死后情况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人们列队去圆柱大厅那几天，街上压死了许多人。甚至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劝说人民散开都没有人听——所有的人都想看看斯大林的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意志和在他的压力下所做的不体面的事情。到斯大林死的时候在监狱里关了大约 200 万人（赫鲁晓夫同志告诫大家对下面所谈事实要保密）。这个数字是战胜希特勒后增加的：所有我们过去的战俘以及一些少数民族都被驱逐了，所以现在的平反工作出现了很大困难。这些人获得了迁回的权利，想回归故里，而那里已经住上了别的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 10～15 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例如 1916 年入党的老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过去在莫斯科州委组织处工作，我个人认识她，马林科夫同志更了解她，这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把她抓起来流放了，我们当时认为她与敌人有联系。在贝利亚被揭发后我们把她释放

^① П.Н. 波斯佩洛夫 (1898～1979)，时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负责调查肃反扩大化问题。

了，恢复了党籍，现在她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显然，应当对这些人进行解释，使他们不要对党和对党的领导人怀有不健康的情绪。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了，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积极地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在二十大进行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过几次激烈的会议，主席团一些成员认为，不应当提出个人迷信问题，因为这会在国内和工人运动中造成困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死负有罪责。回避这个问题就表明，现在的苏共中央包庇负有罪责的人，同意他们的做法，不敢说出真相。可以逃避批评，并像斯大林在世时那样继续“拧紧螺丝”，采取严惩措施等，但这意味着对党的危害。

我们决定沿着民主化的路线，沿着加强与群众联系的路线前进。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该继续实行正确的政策，同时应该对党及其主宰——代表大会讲真话，我们公开地就我们所谴责的所有缺点讲了真话。

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可以从小事开始，把时间拖长并使批判的分量不要太重。但这可能给党带来危害，直至造成它的分裂，因为一部分共产党员承认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会仍旧支持我们；而另一部分不掌握足够的事实，会仍旧坚信斯大林的一贯正确。我们一下子说出了全部真相，虽使人们有些震惊，但我们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积极的纲领，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一个人，而且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完全支持。全党在中央周围团结起来，尽管有人表现出对斯大林的愤慨（要求把他从陵墓中迁出，摘掉他的肖像等），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在揭露个人迷信时我们曾以为，外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会像后来

出现的这样严重，因为报告不得在报刊上发表。我们曾打算逐渐地，随着党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工作的进展来报道报告中叙述的那些事实。然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贝鲁特的逝世和恢复波兰共产党的名誉正值二十大召开。^① 在波兰，当人们得知党恢复了名誉而它的领导人却被枪决^②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对此应当补充一点，在波兰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后，还是斯大林在世时就从我们的监狱里释放了许多波兰共产党员——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回波兰，这些人很不正常地领会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极其恶劣，并极力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过去贝鲁特同志以自己的权威制止了他们。他逝世后，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厚颜无耻，然而，对他们的抵制也加强了。

我出席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当时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我在会上坦率地说，在一个工农国家，大多数领导干部应从主体民族中提拔。在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问题时，一些人（少数人）曾认为推荐现任国家监察部长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适当的。其他多数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领导职务将任命犹太人担任。我个人认为尽管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不过从波兰民族利益出发，因为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的犹太人越多，反犹太主义情绪就会越严重。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苏联的犹太族公民中，也有人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忠诚。

在接着谈波兰问题时赫鲁晓夫同志讲，当候选人萨姆布罗夫斯

①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14~25日），苏、波、意、芬、保五党于2月19日发表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恢复波兰共产党的名誉。3月12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因病死于莫斯科。

② 在波兰的党内清洗中没有领导人被枪决，不知赫鲁晓夫这里所指何人。

基被请到全会上来时，他声明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但他的讲话像一个待嫁的姑娘，嘴上请求父亲不要把她嫁出去，内心却巴不得这样。最后不得不对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说，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干嘛还要当书记，这将加强反犹太主义。

我没有出席选举书记的中央全会，然而马上就有人开始暗示，似乎我持反犹太主义立场。不过我仍然认为，领导波兰的应该是波兰人。要知道在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件^①后到波兹南去的不是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他在那里大概会碰到困难，而西伦凯维兹^②同志去了以后，就找到了与波兰人的共同语言。

在你们意大利，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不会没有一批从苏联回去的心怀不满的人参与，尤其是在波兰，波兰社会党人、米科瓦伊奇克的追随者和天主教徒还很有势力。这些力量已经开始活动。领导者们惊慌失措了。报刊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材料。我们事先告诫过波兰领导人这些现象的危险性，而他们认为民主化过程正在进行。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波兰的法国朋友通报说，看到陪同他们的波兰同志口袋里有赫鲁晓夫的报告，而美国人声称，在波兰赫鲁晓夫的报告值230兹罗提（赫鲁晓夫风趣地说：我对奥哈布^③同志说，你们对我的报告作价太便宜了）。仅在克拉科夫省就发现我的报告少了17份。这一切都是波兰领导人处于某种

① 指1956年6月28日在波兰爆发的波兹南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4月17日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使波兰的党内矛盾公开化了。人们纷纷要求恢复在斯大林时期被罢免的哥穆尔卡的名誉和职务，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终于在6月28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览会在波兹南举行之际，爆发了工人示威游行和群众骚乱。波兰政府派出军队控制了局势。

②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1911~），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部长会议主席。

③ 爱德华·奥哈布（1906~），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麻木状态”的结果，他们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波兹南事件的益处在于，经过这些事件后波兰领导人看到了他们那里的敌人。

我们当然会懂得，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内容迟早会捅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但我们原以为这将逐渐地发生。在苏联，首先了解报告的是中央委员会，然后是苏共中的领导干部，再以后是全党同志。其内容也不得不向共青团介绍，因为在米高扬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在那些以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教育出来的青年中出现了混乱。为了不使工人和知识分子受到委屈，决定也向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在苏联，报告的内容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正确理解，这是事实。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为此从党内只开除了5~7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谈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迷信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它一直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享受着许多经济优惠，而这是由我国其他各州负担的。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得到了孟什维克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至于格鲁吉亚事件，是从一些无关重要的讲话开始的。在斯大林诞辰日，最初是一些孩子到他的纪念碑那里来来去去，接着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后来聚起数以千计的人群。发现了发表反对党和政府言论的演说者，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从莫斯科发出了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邮局、电报局的指示。警备司令得到命令让他在城里维持程序，并要求人群在指定的时刻前散开。然而在此之前人群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群人打算夺取武器，而另一群人向驻有部队的邮电总局大楼进发。人群冲进一层楼，在向士兵们开了几枪之后，开始冲向二楼。一个士兵擅自用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弹，人群才四散奔逃。剩下一些人在斯大林纪念碑

附近被装甲车包围，他们试图冲出去，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些人群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工人们不支持他们。例如，一群大学生到一个工厂进行宣传鼓动，被工人们赶出去了。

在格鲁吉亚还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因为如果说那里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有相当的觉悟，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尽管许多人也投票赞成党的政策，但对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理解。正是知识分子在人群中高喊：“格鲁吉亚孕育着新的斯大林！”，“我们将给你们一个斯大林！”等等。格鲁吉亚的情况正在复杂化，原因是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是俄罗斯人，而行政管理人员是格鲁吉亚人。在格鲁吉亚60%是格鲁吉亚人，40%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等，但在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然而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能说。

在格鲁吉亚过去实行的是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葡萄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集体化被搞成这样，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收入是宅旁园地得到的。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所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不过我们并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懂得，人们需要逐渐地习惯于新事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平衡价格差别不是靠降低价格，而是靠提高我国其他州的采购价格。

在本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实行监督，不让个别人或个别政府鼓励不同的共和国居民人均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一措施有很大意义。

赫鲁晓夫同志表示相信，意大利共产党将正确地理解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战胜在意大利产生的困难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一切缺点正在成为过去。

至于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么在资产阶级那里可以找到比个人迷

信的后果多得多的坏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说，如果知道资产阶级报刊什么时候发表他的报告，那么苏共中央《关于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克服个人迷信的决议》会通过得更早些。

在谈到陶里亚蒂同志对《新议论》杂志发表的谈话时，赫鲁晓夫同志说，总的来说我们对谈话的评价是很积极的，无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还是对苏联共产党人来说，都没有理由对来自对方的某些意见感到不满。当时不能回避“蜕化变质”一词，因为这已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应。为了预先向陶里亚蒂同志通报，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给他发出一封信并将决议的发表推迟了一天。我们非常满意的是，你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相信，对斯大林活动的批判和重新审查将改善我们的关系并给你们带来很大益处。我们认为，我们两党的关系不会因所发生的事件而蒙上阴影。我们理解你们的困难和做出有些紧张的反应的原因，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对陶里亚蒂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对苏共和苏联所说的话不能不做出回答。

意大利代表团提出我国的民主制，特别是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应提出若干个候选人的问题。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今后还是应当提出一个候选人，因为一个政党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严肃的，而其他政党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资产阶级选举法的全部意义在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党，因而也就有自己的代表。斗争就由此而来。然而要斗争就需要有对抗性矛盾，而我们这里没有。如果我们在实际处理这个问题时，开始提出几个候选人，例如由党、工会、苏维埃分别提出，那么我们这里倒不是在斗争，而是在游戏。而在苏联成立另一个对抗性的政党，在还不具备任何条件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没有任何意义。

巴叶塔同志：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合适的。但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难道不可以提出几个候选人吗？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提候选人时有过尖锐斗争的情况。有时，在筹备选举的大会上一个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落选了。有时，委托人会议改变了有关党组织预定的候选人的最初人选。不过我们把这看做是该党组织工作的缺点，它对人不了解，给地方苏维埃提出了没有威望的候选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当之无愧、很有名望的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极力诬蔑我们的选举制度，但是它办不到，因为选举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人有使候选人落选的可能，不过他们宁愿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良好愿望。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改变选举制度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寻求社会生活各环节进一步民主化及提高全体党员和劳动者主动精神的方法。例如，我们正打算改进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本次会议将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过去报告人总是极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讲到。布尔加宁同志将要就退休金法作的报告大体上与报刊上发表的内容相同，他将不对预先讨论该法过程中提出的建议表态。这件事将由代表们及代表立法建议委员会作副报告的人去做，后者将对讨论的结果做出评价并提出建议。把争议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是适宜的，这会使它的工作活跃起来。赫鲁晓夫风趣地说，让共和国的代表们互相揪一揪脑门上的那绺头发吧，不然这次会议确实就开得枯燥无味了。

现在的情况与斯大林在世时不同。过去总是这样：不用作报告，不用宣读五年计划草案，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一次会上只用10分钟就亲自把计划批准了。如果任何人反对这样的程序，斯大林就会认定他是反对派。现在我们用一切方法鼓励对主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斯大林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时，我们把我们的成就归功于苏维埃制度，也只能归功于它。当然，领导层出现过停滞不前，然而斯大林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世时思想工作也曾经

正常地开展过。在基层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斯大林死后领导得到改进，成绩比以前更大了。

今年我们在 3300 万公顷生荒地上播了种，期望得到好收成。然而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做。斯大林死前不久委托我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的决议草案，这就把我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根据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建议，对斯大林也许是不能接受的。我马上遭到了贝利亚的抵制，他声称赫鲁晓夫的工作与以前马林科夫所做的是矛盾的。不过我们还是拟定了有益的建议并将建议提交政治局。然而，斯大林既没看文件，又没看报纸，就问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在听了说明以后，他推翻了建议草案并提出要对它加以修改，他的根据是农民生活很好，只要卖掉一只老母鸡就能交上所有的税。他提出把对农民的税收增加 420 亿卢布，增加额相当于农业的全部收入。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增补到中央全会的农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中时，才弄清楚这些人完全不负责任，于是斯大林开始大叫：你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等等。

巴叶塔同志还对语言学著作是否是斯大林自己所写感兴趣。

赫鲁晓夫同志：看来是他自己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写的。应该指出，斯大林也有清醒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也创造出一些很像样的东西。例如，苏共党章的许多规定就是斯大林口述后记录下来的，你们自己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些多么好、多么清楚的表述。

巴叶塔同志：有意思的是，从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中我们就发现了一种对民主化的渴望。

赫鲁晓夫同志：这也是斯大林要求的。遗憾的是，他要求别人有民主作风和敢于批评，只不过不是对他自己。顺便说一下，斯大林在世时，州和共和国的全会开得比二十大决议规定的要多一些。这不完全合理，但却是民主的，并且证明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化的关心。

赫鲁晓夫对代表团说，斯大林以不能容忍的粗暴对待政治局委

员和整个政治局。他讲了一件事：当斯大林得知政治局关于乌克兰西部一些州土地分配标准的决议后，用不堪入耳的字眼大骂政治局，尽管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

尼加维莱同志：斯大林在与自己同事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粗暴吗？

赫鲁晓夫同志：是的，令人完全不能容忍，并且病态地多疑。

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准备随后就逮捕他们。斯大林死后才发现，以前被流放的莫洛托夫的妻子在莫斯科，看来是为了得到她指控莫洛托夫的供词。加里宁的妻子坐了15年牢。对伏罗希洛夫的窃听从1942年就开始了。不让他看秘密文件，也不请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原因是认为他是英国间谍。甚至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可笑的指控，说他是美国间谍，好像他在美国还有财产，有自己的火车车厢。

还可从斯大林与其最亲密的战友个人关系中举出许多说明他多疑和专制的事实，而多疑和专制导致他总是感到自己受到威胁。

巴叶塔同志：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可能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和暴君。

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同时他容不得竞争者存在。难怪有这么多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

罗马尼亚的情况，无论是党内还是经济方面都很好。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错。领导机构免去了契尔文科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他干了不少蠢事，但他是个诚实的好同志，应当支持他。在他们国内有少量失业者。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请求我们给了他们一些农业机械。然而遗憾的是，机械化会使失业者人数略有增加，因此需要新的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地

位是牢固的，但是国内生活水平很低。阿尔巴尼亚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但是从来不偿还。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潜力，而我们将在这方面具体地帮助他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很好，尽管有怠工的事，尤其是在运输业，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能处理好这些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不错，经济形势差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活水平低于西德。我们完全满足了民主德国同志的所有要求，这将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同西德进行斗争。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意有必要共同援助民主德国。赢得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现已展开的斗争，就意味着赢得争取整个德国的斗争。应当向德国工人和居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看得见的优越性，而这些根本的优越性就是脂油、肉、皮鞋。在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方面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份额。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6年内工资提高了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以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并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3辆坦克，还想枪杀一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匈牙利的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也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

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得到巨大发展，那里没有使人严重

关切的缺点。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形势严峻，生活水平低下，而领导人着手实行不切实际的方案，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对工业的投资搞的过大。我们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将以应有的方式纠正。

接着赫鲁晓同志谈到国际形势问题。他说，苏共领导人对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以及在当前局势中美国人可能搞一些破坏行动的见解给予严重关切。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并不说明我们正在走向战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以下看法。法国没有想战争也没有准备好战争，它已陷入阿尔及利亚，看来要把它丢掉。它的经济已被破坏，国内有强大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而法国人民不想要战争。英国同样不向往战争也没有准备战争，担心轰炸，从与艾登及其他英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德国目前被解除武装，人民中间也没有好战情绪，反对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就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不能进行战争也不向往战争，国内没有一个侵略性政党。在美国有人想靠战争发财，但他们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不会同意在朝鲜停战了。在远东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就是说只能通过欧洲作战，但美国不想用自己的力量作战，而是想利用别人的力量。目前在欧洲还没有要向我们开战的国家。

这样一来，现在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形成一种印象，在美国人们谈论战争更多是出于恐惧。他们自己害怕，但极力吓唬别人。美国的复杂局势迫使一些反动集团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分歧进行投机，尽管他们仍旧挥舞着反共这个稻草人儿，但他们的行为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把杜勒斯的发言与他以前的发言相比，现在已不带有这样多的侵略性了；麦卡锡、诺兰及其他一些人全都下了台。

我们认为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错，只是应当保持警惕，聪明地实行政策，不削弱民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尤其要为这些组织创

造有利条件。应当更有民主作风并更积极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挪威、比利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非正式地）正在谋求与我们联系，这说明我们的威望受到高度评价。我们不打算默不作声地忍受法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友善的讲话，现在正准备一篇文章反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戈曼的讲话。不过我们将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辩论。

梵蒂冈也试图通过意大利总统格隆基的私人医生与我们联系。目前正在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重要的是，如果梵蒂冈试图与我们联系，这就是说它预感到了什么。战争前夕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巴叶塔同志：甚至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关系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赫鲁晓夫同志接着说，我们正在与南斯拉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铁托同志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耍一些手腕。他本人希望与我们建立良好关系，但某种力量，大概是卡德尔及其同伙妨碍他。例如，德洽同志通报说，对罗马尼亚方面提出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公报，铁托同志起初赞同，但在卡德尔和波波维奇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过此后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铁托同志向德洽同志说，他仍然赞同公报的内容并将按它的精神行动。

至于在列宁格勒对铁托同志的迎接和我们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他在这件事上有些过甚其词，因为苏联人的欢迎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苏联领导人而不完全是对铁托同志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发现了，并对我们说苏联领导人在人民中很受欢迎。

谈话到此结束。意共代表团团员们为这次坦率的、对意大利共产党非常有益的谈话向赫鲁晓夫同志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巴叶塔同志代表本党领导人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人除了与苏联并肩前进，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苏共看做是自己经验丰富的兄长和领导者。

赫鲁晓夫同志亲切地拥抱了意共代表团团员们。

【专题说明】

赫鲁晓夫谈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1956年8月)

本专题所选档案“赫鲁晓夫与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主要反映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犹太人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在本世纪30~50年代，犹太人问题始终是一个世界性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在整个欧洲发动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浪潮，实际上是为建立德国法西斯对欧洲乃至全球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战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又被卷入了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漩涡。正是由于这一背景，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是复杂的和矛盾的。一方面，对于广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应该给予公平的、合理的对待，对于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悲惨遭遇应该给予同情和帮助；一方面，又不能使英、美支持和主张的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危害到苏联本身的安全和稳定——苏联境内也生活着大批犹太人，而这些人往往生活在社会的上层，其影响力不容忽视。斯大林时代苏联发生的战时犹太人委员会案件和犹太医生案件，就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心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虽然从建立法制的角度为一些犹太人案

件进行了平反，但并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处境。于是，面对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的质疑，赫鲁晓夫只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解释。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180

赫鲁晓夫与加拿大劳工进步 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1956年8月29日)

参加谈话的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成员：劳工进步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蒂姆·布克同志、全国委员会委员莱·摩里斯同志、Д. 索尔兹伯格同志、У. 卡尔达什同志，С. 莱耶尔逊同志和威·卡什坦同志。

谈话开始时赫鲁晓夫同志问加拿大的同志们是否喜欢莫斯科的气候。

布克同志说：我们认为莫斯科的气候是好的，特别是政治气候。

赫鲁晓夫同志风趣地说，每个人对气候都各有所好。例如政治家对政治气候感兴趣，外交家对外交气候感兴趣，商人对商业气候感兴趣。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问，加拿大的同志在莫斯科进行了那些座谈后，是否产生了更多不明白的问题。

布克同志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代表加拿大劳工进步党，考虑到美国共产党目前的状况，也代表美国共产党，感谢苏共中央，感谢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内容丰富的谈话，由于这些谈话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许多问题。现在，也许除了一个问题以外，我们可以就所有问题对加拿大人做出详尽的解释。

现在我们想重点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想按照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实际情况来阐述这个问题。如果我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闭口不谈是不对的，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想强调指出，在加拿大的犹太居民中，对苏联的好感来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在苏联从各方面，包括犹太文化的发展方面，为犹太人提供了最广泛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之一是让诚实的犹太人明白，在苏联，犹太居民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一切权利。然而无论是美国的反动派，还是加拿大的反动派，现在都靠宣传犹太文化在苏联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由于这个原因，索尔兹伯格同志在我们加拿大他自己的选区遇到了严重的问题，犹太人在这个选区影响很大。

以颇有声望的阿布拉莫维奇为首的美国反动的犹太人组织更加积极地进行自己的反苏活动，尤其是在一个去苏联的反动犹太人团组回到美国时宣称犹太人在苏联并未享有与苏联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之后。由于这种宣传，我们在加拿大失去了犹太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损失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犹太居民。

布克同志接着说，劳工进步党面临的任务是对生活在加拿大及美国的诚实的犹太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资本主义国家，犹太人组织的反动领袖们为反对一体化进程而斗争。他们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这与犹太人的利益相矛盾。我们当然寻找了各种方法，试图做出适当的回答。我们一直坚持希望搞清楚这个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想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尽可能好地弄清楚这个问题，用事实武装起来，以便回击反动派。我们的愿望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包括生活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犹太人站到苏联一边。

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动分子千方百计把在苏联实行的消除个人迷

信有害后果的措施与犹太人问题，与苏联犹太人状况问题联系起来。

索尔兹伯格同志展示了阿布拉莫维奇的组织在加拿大和美国到处张贴的关于苏联犹太人状况的反苏宣传画。

赫鲁晓夫同志说：你们怎么连阿布拉莫维奇都对付不了？我们推翻了这里的沙皇，粉碎了武装干涉者，战胜了法西斯，而你还怕这个阿布拉莫维奇？

索尔兹伯格同志：我们不应为阿布拉莫维奇而受到指责，他是在革命期间从你们这里跑到美国去的。

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所说的苏联犹太人问题，是形形色色的阿布拉莫维奇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这根本不是问题，这是小事一桩，就像牛犄角上的一只苍蝇一样。

索尔兹伯格同志：然而遗憾的是，这只苍蝇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百般鼓励。

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想让美国国务院来帮你们吗？难道你们想与阿布拉莫维奇之流的组织建立这样的关系，让他们也来帮你们？

索尔兹伯格同志：我们既不怕阿布拉莫维奇，也不怕国务院，但是我们想武装起来向他们进攻，使他们不能夸大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来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我们想给他们以回击，同时对美国国务院极力利用犹太人问题来达到反苏目的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知道阿布拉莫维奇已经向杜勒斯提出请求——把苏联犹太人状况问题提交联合国。

赫鲁晓夫同志：这有什么？让他提好了。

索尔兹伯格同志：在实行歧视犹太人和黑人政策的同时，他们还想装出捍卫平等的样子。为了向他们进攻，我们需要帮助。

索尔兹伯格同志说，1948年，由于贝利亚冒险主义的卑鄙伎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及犹太文定期出版物在苏联被查封。我

们当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因为苏联方面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后来又出了“医生案件”，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反对我们的敌人的地位。对于“医生案件”我们说，卷入此案的俄罗斯人比犹太人更多。然而贝利亚却声称，被镇压的医生是与一个叫做“焦因特”^①的犹太组织有联系的犹太人。这伤害了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感情。

索尔兹贝格同志说，我认为，为那些希望恢复活跃的文化活动的犹太人提供恢复这些活动的条件，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去令人信服地回答在加拿大对我们提出的问题。

卡什坦同志：我们代表团并没有给自己提出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任务，这个问题代表团是清楚的。我们涉及这个问题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我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地确保把生活在加拿大的最重要的居民阶层包括犹太居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把反动派用来加强其反苏斗争的武器从他们手中夺下来。

制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单有杜勒斯分子，还有暂时受杜勒斯分子散布的谣言影响的非常重要的劳动者阶层。如果阿布拉莫维奇背后没有杜宾斯基、拉夫斯顿、米尼等人为他的活动提供资金并加以操纵，阿布拉莫维奇的传单就不会出现。我们想找到最有效的手段同企图利用犹太人问题的反动宣传作斗争。

赫鲁晓夫同志向代表团成员卡尔达什同志问道，代表团里的乌克兰人是怎么想的？杜勒斯在加拿大没有保护你们吗？

卡达尔什同志说，杜勒斯没有将加拿大乌克兰人置于保护之下。况且他们也不需要保护。卡尔达什同志说，我们不久以前很成

^① 英文 Joint 的音译，在美国俚语中指令人厌恶或名声不好的场所、集会地点住宅或大麻香烟、注射毒品的器具等。

功地举行了伊万·弗兰科^①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召集来参加纪念会的人比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多4倍。通过纪念伊万·弗兰科诞辰100周年，我们给了民族主义一个沉重的打击。

赫鲁晓夫同志说，不久前他到乌克兰去，在那里遇见了两个从乌拉圭回来的乌克兰人。他们现在粮食采购站工作，用非所学。曾经下过指示，要求按专长来使用他们。现在他们的情绪很好。但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乌克兰人中也有些人情绪不好。他们从那儿回来，带有一些久住的地方养成的习惯，其中有些人不满意。我们现在对许多这样的人到我们这里来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过得去。我们自己加把劲，就能干好自己的事。

回来的亚美尼亚人也有这种情况。这些人中有不劳而获分子，他们已经习惯于资产阶级的放荡生活，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环境。确实有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乌克兰人在这里有自己的家庭。这些人将得到了我们的帮助。

我国的生活在很多时候是被理想化的，然而我们这里还不是天堂。我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讲了不久前一个来留学的罗马尼亚姑娘发生的事。有一次她坐电车，钱包被人偷去了。她大吃一惊，回到学院后就开始骂所有的俄罗斯人和我们所有的制度。她没有料到一部分苏联人还完全没有摆脱旧社会残留的许多旧习，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我们这里劳动报酬是用卢布支付的。卢布的作用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大的。一些人努力通过劳动去挣尽可能多的卢布，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老想从别人的口袋里去偷卢布。如果我愿意就我们的缺点发表讲话，那我可以随便引用许多各种各样的事实，我会比任何阿布拉莫维奇讲的多。什么事都能

^①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弗兰科（1856～1916），乌克兰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够添油加醋，但是应该掌握分寸。克服有害的旧习和消除缺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刚才你们谈到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要用阶级观点去看。把这个犹太人问题塞给你们，为的是逼迫你们出来辩论，从而使你们掉入反动力量的圈套。这里根本不涉及民族问题，只不过是企图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引入与工人阶级事业敌对的歧途。我们曾经建起一个比罗比詹市^①。在这件事上投入了很多资金，糟糕的是犹太人在比罗比詹市只留下了一些犹太语的标记。如果正视这件事，那就不能不承认，犹太人不想到那里去。

索尔兹贝格同志：我 1939 年访问苏联期间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进行一次旨在保证犹太人去比罗比詹的运动？当时给了我两种回答：第一种回答——因为这是自愿的事；第二种回答——有些人不敢搞这样的运动，担心给他们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

赫鲁晓夫同志：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事。红军在反攻战役过程中解放了切尔诺维策市，这个城市当时非常破败和肮脏。当时提出一个任务——清除城市中的垃圾。需要说明的是，在占领期间德国人把这个城市交给了罗马尼亚人，因此犹太居民幸免于难。当我们做这件事时，该市的犹太居民向我们声明，红军来了以后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到乡下去了，因此现在城里没有人可做清扫的活了。请告诉我，依你们看一个乌克兰人听到这种话会怎么样？在这里，我讲的是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我根本不想说这是犹太人的民族特点，但是我们应正视这件事情。要知道类似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作用的，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住在切尔诺维策并持有罗马尼亚护照的公民可以按其意愿到罗

^① 苏联远东地区犹太自治州的中心城市。

马尼亚去，当时我们放走了许多人。在想要去罗马尼亚的人中有一个犹太人——一位牙科医生。这是个给人印象很好的人，我请别的同志去弄清楚他为什么想走。当问到他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喜欢苏维埃政权，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观点，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留在苏联，就得靠工资生活，如果他去罗马尼亚，那他就能从那里再往远走，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他可以私人行医和旅行。

你们看到了，这个人对于苏联不大有好感，大概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们当然看到，我们这里犹太人工作在各种各样的职位上，包括很高的职位。有的犹太人是中央委员、科学院院士、部长、副部长、部务委员会委员、著名军事家、教授等等。还需要什么呢？这里有什么反犹太主义，谁会遭到反犹太主义之害呢？那些似乎苏联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谣言，其目的是挑起反苏的狂热情绪，难道这一点还不清楚吗？犹太人在我们国家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

让我们把话说得坦率些。未必有人否认，在某些犹太人身上存在着一个弱点，即如果一个犹太人身居高位，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开始吸收其他犹太人，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自己人组成的圈子。现在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斯托利亚尔斯基教授在敖德萨组建了一所音乐学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很需要的学校，但是他组建的这所学校里既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一个乌克兰人。斯托利亚尔斯基完全不是反苏的人，当然他也不是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同志接着说：请你们到红场上的陵墓去看一看，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多少犹太人。认为在消灭了阶级的同时，这些阶级的残余，以及与我们敌对的意识形态的残余也被完全消灭了，认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了，是不正确的。

应当清醒地、正确地去看待事物，看待活生生的现实。例如，你们在乌克兰会找到这样的乌克兰人，这些人会说他们也不大满意，因为在基辅许多乌克兰人宁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罗斯学校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能禁止乌克兰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俄罗斯学校去。在基辅，俄罗斯剧院里坐满了人，而乌克兰剧院里有一半座位是空的。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提出在那里开设第二家乌克兰剧院，问他们为什么现有的剧院空着还要开第二家，他们说如果有了第二家，就会出现竞争，那时其中的某一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光顾了。

看一下地图你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苏联多么大！在学习俄语的人面前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在我们国家可以自由发展。这就是在摩尔达维亚人们尽量把孩子送到俄罗斯学校，人们都学习俄语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懂俄语的摩尔达维亚人有广阔的前途，而只懂摩尔达维亚语的摩尔达维亚人只能局限于摩尔达维亚境内。格鲁吉亚语也是这种情况。在格鲁吉亚现在知识分子过剩。那里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无事可做。通晓俄语就能在格鲁吉亚境外拥有广阔的前途。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我认为是进步的现象。我们实行的政策就形式而言是民族的，就内容而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我们这里占第一位的不是民族观点，而是阶级观点。若是共产党人都开始用拉比^①的语言说话那就不好了。这样的共产党人应当扪心自问，他们究竟是站在哪一方？难道他们不明白，关于苏联犹太人问题的叫嚣，目的就是企图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让我们更现实地来看这些事。比方说，如果我们召集的都是犹太人听众，听一个人用犹太语讲演，那么能听得懂的人远远不到一半。我们再谈一个有关建立犹太学校的问题。建什么样的学校呢，

① 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学制是四年、七年还是十年呢？如果建四年制学校，犹太人就会说，为什么欺负我们？如果建十年制学校，那应当是合理的，随之就应当建立用犹太语教学的高等院校和用犹太语教学的系了。假设一个犹太青年从用犹太语教学的学院毕业，下一步怎么办？他到哪儿去工作？你们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一个从用犹太语教学的医学系毕业的犹太人，他将给谁治病？

你们提出了犹太人报纸的问题，可是谁来读这些报纸呢？我们总不能为阿布拉莫维奇出这些报纸吧。如果你们对苏联犹太人说他们是被压迫民族，他们准会让你们见鬼去。比方说，你们试试去对万尼科夫同志说这话？他三次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受到了完全的信任。他会对你说，你们再不要冒险提这些反动分子所提的问题了。

当鞑靼人从克里木迁出来时，一些犹太人开始提出犹太人向那里迁移的思想，以便在克里木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这会是美国在我国南方的基地。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斯大林的意见。绝不能听命于杜勒斯分子的支配，他们不反对建立针对我们的基地。难道这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吗？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这些问题应当从阶级立场，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去看待，而不应当从民族主义立场去看待。请你们也从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不是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保守的立场去评价我们的民族政策和我们的活动。难道我们对犹太人的尊重不如对乌兹别克人或哈萨克人吗？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很落后，现在你们去看一看！乌兹别克人有了自己的科学院，他们全都有了文化，工农业蓬勃发展。让杜勒斯也去那里看一看。为什么对苏联犹太人不这样做？因为在苏联的组成中没有犹太人的国家，但这不妨碍他们占据国家职位，占据工业、军队

及经济和文化建设各方面的领导地位。我们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应该坦诚地、以同志的态度对你们说，我们正在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你们对杜勒斯怕得不得了。你们确有困难，许多犹太人不满意，甚至党的队伍里也有不满意的人。然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你们党的队伍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组织工作还很差。这说明你们成了阶级敌人对你们施加压力的俘虏。在这种压力下暴露出你们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妨碍你们对敌人进行相应的回击。应当加强党。应当对把党引向危险道路的企图给以坚决的回击。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坏了杜勒斯之流的大事。如果说从前他们叫嚷我们要战争，我们是侵略者等等，那么现在他们的所有这些王牌都被打掉了，除了掀起所谓犹太人问题的叫嚣外，他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剩下。

我们知道在美国犹太资产阶级非常强大。那里的人重视他们，艾森豪威尔也重视他们。但是我们根本不指望美国的犹太亿万富翁会支持我们，支持苏联。美国的亿万富翁让犹太人脱离苏联，想在劳动人民心目中败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名誉，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有人正在上这个钩呢。请注意，以色列国的建立使一部分犹太人头脑糊涂了。当然，每个人都有民族动机。那些想到他们终于将有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犹太人也有民族动机。然而请你们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许多犹太人巴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而这一点我们是理解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中间有坏人。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中间也有坏人。然而有些人却喜欢这样来考虑问题，似乎犹太人中间不可能有坏人。这是绝对错误的。在犹太人中间也有资本家，有进步事业和共产主义的死敌及其他各种坏蛋。我们将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索尔兹贝格同志：我们也在斗争。

赫鲁晓夫同志：但从整个情况看来，他们制服了你们。

索尔兹贝格同志：不，我们没有被制服，但我们遭受了失败。

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有必要仔细看一看，不要忘记，在给马备鞍子的时候，他们就塞进一块更软的毡鞍垫，为的是使马鞍子更适用，使它被认为是“自己的”，而实际上这个鞍子上坐的是敌人。你们看一看事实是怎样的，他们散布有关我们政策的谣言，而自己却不放保罗·罗伯逊^①到加拿大去，用私刑迫害黑人并认为这是合法的。

索尔兹贝格同志：烧死了罗森贝格一家人。

赫鲁晓夫同志：你们要知道，他们认为我们是民族压迫者。如果说我们压迫谁的话，那就是阶级敌人。这一点你们要搞清楚。

让我们人道地来看待这些事情。今年有12000多名旅游者从苏联出境。这12000人里有3个没有返回苏联。这3个人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个是设计师，另一个是工程师，第三个是马戏团工作人员。现在请你们认真想一想：别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没有一个留在境外，而这三个人却留下了。难道这不刺激苏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吗？是什么吸引他们到那里去？那里有谁需要他们？在那里他们只对反对苏联各族人民的反苏诽谤有用。这些叛徒很快就会满口谎言，编造各种各样的谣言来给我们抹黑。

你们应该考虑到，敌人发表了他们偷去的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打算向我们进攻。这当然在一些共产党内造成了某些困难，然而这个材料敌人也用不了多久了。再过两三个月，我们就开始收到红利^②了。这是我们党的影响更加强化的事实。这是非常健康的，

① 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黑人歌唱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获得国际和平奖和列宁国际奖。

② 原档案此处使用了 Дивиденты 一词，估计是 Дивиденды 一词的印刷错误。

有益的、十分必要的开端。

是我们自己坚决地揭发了过火行为，任何人也没有迫使我们关注这些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破坏民主的行为是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纠正的。目前在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知道个人迷信带来了什么恶果。人民齐心协力地欢迎在消除这个迷信有害后果方面实行的措施。这使局势走向健康化，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的经济现在增长得非常快。我们党的威信空前增长，我们打掉了我们的敌人在反苏运动中使用的王牌。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给犹太人问题“备鞍子”，企图败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名誉。这一点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尽管他们在你们党的队伍里引起了一些动摇。这个我们能挺住，能经受得住，你们在动摇一阵以后也能经受得住，变得更加坚强，把敌人的鞍子从自己身上扔掉。应当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即使我们把民族主义者争取的东西和盘献出，杜勒斯此后也不会停止反对我们的斗争。他会抓住别的什么东西不放。

布克同志：不仅杜勒斯不会老实，而且民族主义也仍然不满意。

赫鲁晓夫同志：应当好好想一想，你们是不是过多地站在了对阶级敌人进行防守的立场上？加强同这一切的斗争是不是更好？

布克同志：我们感谢您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我们非常想让我们代表团的成员索尔兹贝格同志现在就去进攻。

赫鲁晓夫同志：星期六在法国有人宣布，好像我死于一次车祸，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昨天我接见福尔和德让，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把我活着埋葬，那么我就把热猪油浇到你们的皮上。他们想让我死掉，但他们的这个愿望不单单是针对我的，而是反对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你们怕杜勒斯不支持你们。当他开始支持你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让你们到这里来了。如果

巴鲁克^①开始支持你们，那我们也将认为你们是另一些人。

好吧，同志们，该停止向你们进攻了。我之所以说这一切，是为了让你们对把党引入危险道路的企图进行更坚决的斗争，为巩固自己的党展开积极的斗争。

布克同志在向赫鲁晓夫同志表示感谢之后说：回到加拿大后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同赫鲁晓夫同志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乌克兰却什么也没有问他。因此，我们请您略微谈一下乌克兰。

赫鲁晓夫同志：我可以告诉你们，乌克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今年那里的小麦收成不怎么好。但乌克兰今年种了很多玉米和甜菜。玉米的收成很好。

乌克兰工业蓬勃发展。现在正采取措施增加煤的开采量，在利沃夫地区正在建设一个新煤矿区。那里将建成约50个矿井。这个州的劳动力很充足，这些劳动力将用在新建起来的煤矿区。这个州的居民不太喜欢到其他边疆区去，因此在那里建设新企业的前景会受到欢迎。

当我们的一個农业代表团去加拿大时，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冲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莫斯卡理^②压迫乌克兰人，但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对他们说：请看我们这些“被压迫者”。我们是作为整个苏联的代表来的，我们大多数人是乌克兰人。我们就是这样一些“被压迫者”。

现在乌克兰有4200万人。乌克兰拥有更快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一切必要条件。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空前牢固。在我们这里犹太人和俄罗斯人没发生过任何争斗。请转告加拿大的乌克兰

① 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美国财政家，总统顾问，曾任美国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二战后以提出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监督的巴鲁克计划而闻名。

② 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兰人，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摩里斯同志问，今年访问过苏联的加拿大社会党人给人什么印象？

赫鲁晓夫同志说，加拿大社会党人给人诚实正派的印象。同他们可以打交道并建立工作联系。这当然不是法国社会党人，尽管同他们也应建立联系。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加拿大社会党人有阶级嗅觉，对法国社会党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对那些人很难弄明白他们在为哪个阶级服务。但我们很快就会把法国社会党人“压住”，我们将通过提高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通过提高实际工资及增加奶和肉等东西的大量消费来压住他们。应当说现在一个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比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高，如果加上我们的劳动者在工资之外从国家得到的东西，那么同他们的争论就更有根据了。英国人也自吹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这种吹嘘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英国人与法国人一样，有亿万殖民地人民为他们干过活。而我们一切都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是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保证的。

最后赫鲁晓夫同志祝愿加拿大同志在工作中取得成绩，他表示相信加拿大劳工进步党能够克服困难并为巩固自己的队伍而加强斗争。

【专题说明】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1956年9~10月)

本专题收入了14件关于1956年9~10月苏日关系正常化莫斯科谈判的档案。

1951年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不同意吉田执政年代实行的过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首先提出与苏联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认为协调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将使日本得以实行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新领导人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趋向缓和的方针，这不仅表现在停止朝鲜战争，改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以及重新构架与西德的关系等问题上，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也是这个新方针的一部分。

于是，1955年6月苏日双方代表开始在伦敦进行首轮谈判。由于在领土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于1956年3月中断。同年7月底在莫斯科重开谈判，争论仍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代表团要求除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外，苏联还应将国后岛和择捉岛交还日本，并声明日本拒绝放弃对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的所有权。苏联代表团坚决拒绝领土条款的这一方案，并且声明，除了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外，苏联将不做任何领土让步。8月13日谈判再次中断。

本专题涉及的是第三轮谈判，即1956年9月苏日双方关于继续

谈判条件的磋商和 10 月莫斯科谈判的具体过程。经过反复交涉，这次谈判终于打破了僵局，双方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协议：在日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同意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交还日本，但实际交还这些岛屿要在缔结日苏和平条约之后。当然，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种种政治上的原因，苏日领土争端至今尚未解决。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张廷文、高增训翻译)

№06970

鸠山一郎关于日苏关系正常化 谈判的条件致布尔加宁的信

(1956年9月11日)

主席先生^①：

如您所知，为了建立日苏两国间稳固而友好的关系而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我的夙愿。

鉴于到目前为止举行的两国间的谈判进程^②，我荣幸地通知您，在有关领土问题的谈判今后将继续进行的条件下，如果苏联事先表示同意以下五点，日本准备参加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这五点是：

- (1) 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 (2) 互设大使级外交代表机构；
- (3) 尽快遣返留在苏联的日本公民回国；
- (4) 渔业协定生效^③；
- (5) 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关于上述五点，苏联驻东京渔业办事处主任齐赫文斯基在与农林相河野一郎和国务大臣高崎举行的几次非正式谈话发表的意见是，苏联政府同意上述几点。

如果我能够得到您的书面证实，齐赫文斯基在上述非正式谈话

① 即尼·亚·布尔加宁（1895～1975），1955～1958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② 关于1955～1956年日苏谈判的情况，参见本卷本专题№06974文件。

③ 1956年5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日渔业协定。

中所表达的意见表明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上述五点，那么我将不胜荣幸。在收到贵方的这一证实后，日本政府准备尽快恢复在莫斯科的谈判。借此我愿表达自己的愿望：使双方代表在伦敦和莫斯科已经达成协议的上述 5 点尽可能地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通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日本内阁首相 鸠山一郎^①

1956 年 9 月 11 日

^① 鸠山一郎（1883～1959），1945～1946 年担任自由民主党的主席，自 1954 年起为民主党首领，1954～1956 年担任日本首相。

№06971

苏联外交部关于答复日方条件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56年9月12日)

秘密

第1份

苏共中央：

日本内阁首相鸠山一郎已向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发函（函件后附^①），他在信中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尽快恢复苏日莫斯科会谈并请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同意根据以下5点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1. 终止战争状态；
2. 互设大使馆；
3. 尽快遣返滞留（在苏）的日本公民；
4. 使渔业协定生效；
5. 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鸠山一郎还表达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使上述五点得以通过，而上述五点已在伦敦和莫斯科的会谈中达成协议。

我们同意第1、2、3、5点，并已通过我驻东京的办事处通知日方。至于第4点，1956年5月14日的渔业协定规定，该协定将

^① 即本卷本专题№06970文件。

在签订和平条约和恢复外交关系的同时生效。

苏联外交部认为由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向鸠山一郎发一封回信是适宜的，回信应确认苏联政府准备在莫斯科根据上述五点恢复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

决定草案附后。^①

请审阅。

安·葛罗米柯^②

1956年9月12日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No06972文件。

② 安·安·葛罗米柯（1909～1989），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069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布尔加宁 给鸠山一郎复信的决议

(1956年9月13日)

第 II40 /X X X III 号

绝密

批准尼·亚·布尔加宁同志致日本内阁首相鸠山一郎的回信草案
(附后)。

中央书记

接第 40 号记录第 X X X III 点

秘密

日本内阁首相鸠山一郎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通知您，我已收到您于 1956 年 9 月 11 日发来的信件。您在信中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尽快恢复日苏莫斯科会谈并请求确认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苏联政府现确认，准备根据您在信中按照贵我两国预先共同讨论的以下条款而阐述的意见，并在目前尚未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在莫斯科恢复日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1. 宣布终止苏联和日本间的战争状态；
2. 恢复外交关系并互设大使馆；

3. 释放并遣返在苏联被判刑的所有日本公民；
4. 1956年5月14日签署的渔业协定生效；
5. 支持日本关于接纳它为联合国成员国的请求。

至于您对关于在伦敦和莫斯科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那几点愿望，那么我认为，双方是可以就其交换意见的。

首相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部长会议主席 尼古拉·布尔加宁
1956年9月13日于莫斯科

№06973

苏共中央主席团
关于苏日谈判代表团组成的决议
(1956年10月11日)

第 П46 / 21 号

绝密

关于同日本首相鸠山一郎率领的日本代表进行
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问题的决议

批准为同日本首相鸠山一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进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组成：尼·布尔加宁、尼·谢·赫鲁晓夫、阿·伊·米高扬^①、安·安·葛罗米柯、尼·特·费德林^②。

中央书记

1956年10月11日

① 阿·伊·米高扬 (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② 尼·特·费德林 (1912~)，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06974

**苏联外交部呈送布尔加宁的
关于苏日谈判的准备材料**

(1956年10月12日)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现呈送苏日谈判的以下材料：

1. 第一次会议的计划草案；
2.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的开幕词草稿；
3. 有关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资料；
4. 有关将（日本）战俘和公民从苏联遣送的资料。

安·葛罗米柯、尼·费德林

第 543/АГ 号

附 件

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计划（草案）

1. 苏联代表团团长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厅举行。
2. 双方代表团团长相互介绍自己代表团的成员。
3.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致开幕词（附后）。
4. 日本代表团团长、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言。

5. 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如下工作程序：

(1) 开会时间：11时至13时。必要时可经双方协商后改变这一程序。

(2) 经双方商定后举行代表团团长会晤。整个准备工作委托双方代表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去做。有关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将在会上商定。

(3) 确定俄语和日语为正式工作语言。

(4) 每次会议之后均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公告。

为了准备送新闻界的公告，双方代表团各指定一名代表。

苏联方面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Л.Ф. 伊利切夫负责新闻问题。

(5) 为了方便双方代表团团长的联系而指定相应的代表是适当的。

苏联方面指派H.Б. 阿德尔哈耶夫^①负责联系。

共同宣言的我方草案根据情况可交给鸠山一郎。

附注：10月10日交给日方的日本代表团在苏联逗留的计划。

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开幕词（草案）

复印件

秘密

首相先生，先生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对您，首相先生以及日本政府代表团光临我们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表示欢迎。首先我想指出，我们高度评价您，首

^① H.Б. 阿德尔哈耶夫，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顾问。

相先生为建立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做出的努力。

在日本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前，已在伦敦和莫斯科举行了有关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还有 1956 年 9 月我们双方交换了有关信件，其中商定开始在莫斯科举行正式谈判。

进行苏联和日本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是依据自己一贯的和平以及同所有国家进行事务合作的政策，根据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

苏联政府认为，建立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和睦邻关系不仅能消除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而且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开辟一条通往两国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的道路，将服务于巩固远东和平的事业。我们相信，随着正常关系的建立，我们两国将更广泛地进行并发展稳固的互利贸易、互派各种科技代表团，也能使文化交流走上正轨。为此已经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而且我们认为，这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日本都将是有利的。

苏联真诚地致力于同日本的和平并考虑到日本的愿望，在此之前的谈判中对日方作了让步，其中包括在领土问题上。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仍不准备签订和平条约并且建议我们在现在尚未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使苏日关系正常化，而且提出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使签订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的谈判继续进行。

我们同意了日方的这一愿望。

双方在关于签订和平条约的伦敦及莫斯科谈判过程中都相当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对这一条约的几乎所有条款完全达成一致。今年 9 月份我们彼此交换的信件说得也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满意地认为，我们之间已达成相互谅解，实际上业已形成建立苏联和日本之间和平与睦邻关系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更容易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课题，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会谈能胜利结束。

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资料）

复印件

秘密

一、伦敦谈判

在苏联和日本两国政府预先达成协议后，于1955年6月1日在伦敦开始进行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在6月7日的会议上，日本代表团转交给苏联代表团一份备忘录，以及日本外相重光葵^①5月26日的讲话全文、议员大桥武夫^②的质询及鸠山一郎首相对质询的回答。这些文件都强调指出，苏联遣返日本人以及满足日本的领土要求是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苏联代表团6月14日声明，谈判的目的是签订苏日和平条约和建立苏日间的外交关系，领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不是先解决，而只能是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至于遣返一事，在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是可以解决的。就在当天，已将和平条约的苏方草案转交给日本人。

在随后两个月里，日本方面回避讨论我方的条约草案，顽固地要将遣返日本战争罪犯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

日本方面只是在8月9日才对苏方条约的草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在8月16日才拿出自己的和平条约草案。基本分歧表现在领土问题和海峡问题上。对其他条款观点大体相同。

① 重光葵（1887～1957），1954～1956年在鸠山一郎内阁中担任副首相兼外相。

② 大桥武夫（1904～1981），自1949年起为日本议会下议院议员，1952年之前在吉田内阁中任不管部长，负责国防军事务。

由于双方在伦敦进行了谈判，结果就条约的序言和以下条款达成了协议：关于终止战争状态；关于承认联合国的准则；关于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关于苏联和日本放弃彼此的觊觎；关于渔业问题；关于对解释或实施条约方面产生的争端；关于战前的各种条约，以及就贸易和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条款原则上已达成协议。

我方的条约草案第2条（第2段）提出日本承担的义务是：不加入任何曾参加过对日战争的任何大国集团或军事联盟。

日本方面借口与美国的条约及单独和集体防卫的权利^①，请求取消这一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松本俊一^②声称，日本在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中，特别是在同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不是为了反对任何第三国。

为了不使谈判复杂化，苏联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并取消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领土问题。我方条约草案第5条指出：“日本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萨哈林岛南部及其附属的所有岛屿和千岛群岛^③的完全的主权，并且放弃对这些地区的一切权利、法律依据和要求。苏联和日本间的国境线如所附的地图所示，应从根室海峡、野付海峡和越前海峡的中线通过”。

① 指的是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即9月8日在旧金山大会上，48个国家与日本签署的单独的和平条约。同一天，还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该条约使美国有权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部署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基地。

② 松本俊一（1897~1987），日本外交官，自1955年起为日本议会下议院议员，在与苏联谈判期间，担任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

③ 萨哈林岛，中国的传统名称为“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岛，原属中国，18世纪后半叶俄日相继占领该岛北南各部。1875年俄日签订条约，俄以千岛群岛18岛交换日占南部萨哈林岛。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将南部割让于日本。

我国对领土问题的立场是以1945年2月11日克里米亚会议^①的决议、波茨坦公告^②和其他国际协议，其中包括旧金山对日和约为依据的。这一条的第“C”款第2条（领土）指出：“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萨哈林岛的一部分及该岛附属各岛屿的一切权力、法律依据和要求，而对上述地区的主权是日本按照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③的规定获取的”。

但是，日本方面违反所有这些国际协议，要求归还这些地区并建议将有关领土的条款作如下表述：

“1. 因战争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占领的日本领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日本恢复行使对这些领土的完全主权。

2. 现在仍驻在本条第1款所指的地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军队及国家职员应在尽可能最短的期限内，无论如何在本条约的生效之日后不晚于90天的期限内撤出。”

日本方面提出自己的领土要求的根据是1855年、1875年和1905年同沙皇俄国签订的条约^④以及似乎在俄国人来到这里之前

① 即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三大盟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之后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在战争结束后将萨哈林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

② 1945年6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以英国、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名义通过（此时苏联尚未对日宣战），公告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日本无条件地投降，并规定消灭日本政权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对日本领土进行临时占领，限制日本对一些岛屿的主权，惩罚战争贩子等等。

③ 1905年的朴茨茅斯和约结束了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其结果是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南萨哈林岛以及辽东半岛上旅顺、大连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让给了日本。

④ 1855年的俄日商贸和边界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俄国承认将由俄国人开发的千岛群岛的南部地区归日本，而萨哈林岛则处于“俄日两国之间尚未分开的地区”；根据1875年条约，俄国将千岛群岛转交给日本，而日本则放弃对萨哈林岛的领土要求。

日本人已经开发了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资料。

日本全权代表松本俊一在同马立克^① 交谈时表示了归还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的特别愿望。对此我方8月9日作了答复：关于这些岛屿的问题希望能同苏方的和平条约草案所指出的其他问题一起加以研究，而不是独立地去研究，如果就其他种种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这也会有利于就齿舞诸岛和色丹岛的问题交换意见。

8月30日日本方面对第5条提出一个新方案，其表述是：

“1. 从因战争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占领的日本领土中，

(1) 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完全恢复日本对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主权。

(2) 关于北纬50度以南的桦太岛（日本对南萨哈林岛的称谓）及其附属的各岛以及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将通过盟国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之间的谈判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加以解决”。

该条的第2款同第一方案一样，规定苏联的军队和国家职员撤出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诸岛。

日本人的这一提案同样遭到了拒绝。但是日本人仍在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

日本议会代表团在1955年9月21日同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领土问题。代表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请求“对关于齿舞群岛和色丹岛问题作有利于日本的顺利解决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暗示”。对代表团的要求我们作了正面答复，因此，1956年2月10日苏方将自己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的新方案转交给了日本人：

^① Я.А. 马立克（1906～1980），1942～1945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53～1960任苏联驻英国大使。

“1. 为了满足日本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家的利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小千岛群岛（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

本条所指出的各岛屿转交给日方的程序在本条约后附的记录中作了规定。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之间的国境线规定从库纳施尔（根室）海峡和伊兹缅（野付）海峡的中线通过。”

尽管苏联在领土问题上作了这种让步，但是日本方面却拒不接受这种提法，坚持除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外，还有择捉岛和国后岛都归还日本，在国际会议上一揽子解决其他岛屿的问题。因此，领土问题在伦敦会谈中未获得解决。

关于海峡问题。和平条约的苏方草案第7条写道：

“协议双方保证不采取可能阻碍在拉彼鲁兹海峡（宗谷海峡）、根室海峡、野付海峡和越前（科耶马伊）海峡上自由航行的措施。

同时日本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在桑加尔斯基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上自由航行的措施。

上述所有海峡将永远为各国贸易商船的航行开放。

2. 本条第1款所指出的海峡应只为邻近日本海的大国的军用船只航行开放。”

日本不同意我方的建议并坚持取消这一条款。之后他们才明白，如果他们接受我方对领土问题的建议，这一条款是可以取消的。

关于接纳日本进入联合国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分歧的实质在于日本坚持让苏联保证“无条件地”支持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组织。而这一条款的我方草案写道：“苏联支持日本关于接纳它加入联合国组织的呼吁”。

这样，在谈判中断前夕，即到1956年3月20日，只有领土问题和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海峡问题实际上并未谈妥。

1956年3月6日，松本俊一向马立克同志声明，就完成谈判

而言，日本的社会舆论尚未做好准备，对和平条约的签字显然尚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一声明为中断不定期谈判作了准备。

松本俊一在1956年3月20日的会议上声明：“由于谈判进入当前的阶段，我已接到本国政府指示，临时回东京向政府报告谈判的情况并接受对今后谈判的指示”。

二、苏日莫斯科谈判

1956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资源和解决在邻接苏联远东领海区域的公海上捕鱼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①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参加渔业谈判。此建议得到同意。

渔业和海上遇难人员救援问题的谈判于4月29日开始。在这些谈判过程中，日本方面再一次试探苏联重新考虑自己对领土问题的立场的可能性。尼·亚·布尔加宁同志于5月9日在同日方全权代表河野一郎谈话时声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伊什科夫^②同志和河野一郎之间的谈判于5月14日结束，签署了《渔业协定》和《救援海上遇难人员的合作协议》。当时曾规定，上述两个文件只有在和平条约生效或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之后才能生效。

双方曾达成协议：在最短的时间内，即不晚于1956年7月31日恢复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莫斯科谈判。7月18日，日本政府任命重光葵外相为日本代表团团长。7月21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政府：苏联外交部长德·特·谢皮洛夫^③同志已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团

①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资源和解决在邻接苏联远东领海区域的公海上捕鱼问题》的决议发表在1956年3月21日的《真理报》上。

② A. A. 伊什科夫（1905~?），1954~1979年任苏联渔业部部长。

③ 德·特·谢皮洛夫（1905~1995），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担任苏联外交部长。

团长。

苏日关系正常化莫斯科谈判是伦敦谈判的继续，因此，双方首先再次确认，在1955~1956年的伦敦谈判中已谈妥的和平条约草案的那些条款均已达成协议。在莫斯科谈判过程中双方代表团对有关贸易和渔业问题的条款最终也达成了协议，对讨论双方从未达成协议的主要问题——领土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莫斯科谈判中日本代表团仍然反对我方的领土条款方案，提出了一个新草案，其中规定除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外，还将国后岛、择捉岛交给日本，并根据旧金山和约第2条，放弃对千岛群岛的其他岛屿和南萨哈林的所有权及要求。这一草案也不含有关于使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的归属问题通过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盟国和日本之间进行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条款。这也是日本方面在伦敦谈判中所坚持的。

苏联代表团坚决拒绝领土条款的这一方案，并且声明，除了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外，苏联将不作任何领土让步。

此后，日本方面接着又起草了领土条款，以求在条款中写明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不包括转交国后岛和择捉岛），并指出日本拒绝放弃对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的所有权，这也是旧金山和约的规定。但是日本人在这时反对将国境线的通过位置的规定写入条款。

这一建议同样遭到拒绝。

谈判由于双方对领土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于8月13日中断。日本全权代表重光葵声明，他应回东京同本国政府商量。

与领土问题有关的关于船只通过日本海海峡的问题同领土问题一起悬而未决。

在莫斯科谈判过程中日本人像以前那样提出了释放和遣返在苏联被判刑的日本公民问题。他们被告知，这一问题随着苏日关系的

正常化而终将得到解决（有关在苏联的日本公民数字资料附后）。

1956年9月11日，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致函尼·亚·布尔加宁，建议在现在尚未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实现苏日关系正常化，同时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9月13日，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对鸠山一郎的来函做出肯定的答复。

由于即将进行谈判，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松本俊一已抵达莫斯科。

9月29日，应日本方面的请求，安·安·葛罗米柯同志和松本俊一互致信函，双方在信中表示同意在恢复外交关系之后，继续进行关于签订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的谈判。

为了进行这些谈判，日本政府派出了以首相鸠山一郎为首的日方代表团。鸠山一郎于今年10月12日抵达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M. 贾丕才

副 本

关于遣返日本战俘和平民

在1945年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士兵、军官和将军共59.4万人。

这其中在战区被直接释放的70880人；1946~1951年被遣返的510417人；

1950年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的961人。

1946~1950年遣返的平民507569人。

这样，遣返工作已经结束。留在苏联的只是那些因犯罪而正在服刑的人员。

1953年11月，苏联和日本红十字会代表达成协议：在被判刑人员服刑期满后将他们遣返回国。根据这一协议，1954年3月至1956年8月这类人员已有7批总人数为773人被遣送回国。

1956年10月仍留在苏联的共有1073人，

其中被判刑的战俘——859人，

被判刑的平民——214人。

刑满人员名单已于1953~1955年转交给日本方面。

除了被判刑人员外，居住在苏联的无国籍的日本族人——713人。

有关这类人员的数字没有通知日本人，因此这类人员的名单也未转交给日方。

战俘的总数与被遣返和在苏联刑满的人数之间的差额（约有一万多一点）主要是因为有的死去，有的失踪，对此，已于1953年11月向日本红十字会的代表作了声明，同样也向他们作过解释，要拿出这些人员的名单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被俘后，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就地很难做出应有的登记。

在1955年的伦敦会谈期间，日本方面转交了11177名投降的日本人名单，似乎这些人现仍在苏联并且尚未被遣返。

这批名单已转交给苏联内务部核查。

经局部核查现在已经查明：上述名单中的139人早就被遣送回日本，而且有文件，另外有895人先后死去。对其他一些人员的核查工作仍在继续。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M. 贾丕才

No06975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 关于苏日恢复正常关系的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6日)

进行谈话的时间为10月16日14时至15时45分。

河野一郎：日本国内的局势非常困难。我希望苏联驻东京代表齐赫文斯基能就这一问题很好地报告赫鲁晓夫先生。

一些党派对鸠山一郎首相和我们整个代表团到苏联来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鸠山一郎首相决心来莫斯科并将谈判进行到底。

对苏联政府在今年5月份进行渔业问题谈判时所表现的良好意愿，我应该表示感谢。但是我觉得苏联政府尚未完全想像到我们国内复杂的情况，并且也不了解日本各政党内部发生的各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

通过伊什科夫部长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捎来了鸠山一郎首相和河野一郎的信函^①，其中阐述了日本方面的某些请求。您是否知道这事？

赫鲁晓夫回答说，知道。

河野一郎：我昨天又一次会见了伊什科夫并详细地向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您是否得到这一消息？

赫鲁晓夫作了肯定的回答。

^① 所收集的档案里没有该信函。

河野一郎：如果需要我对以前所说的补充什么的话，那么我同意这么做。

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反对河野一郎的补充意见。

河野一郎：首相和我都认为，苏联和日本关系正常化应以鸠山一郎首相的信及布尔加宁的复信所阐述的五点为基础来实现。众所周知，在互致信函之后，我们的全权代表松本俊一被派到了莫斯科来，以便能更详细地阐述我们关于会谈安排的观点。我们认为会谈的结果应符合上述5点。但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首先是执政党内的尖锐冲突（指吉田集团）^① 使我们对莫斯科的立场变得更加困难，并且也干扰了对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日本方面认为需要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为了使关系正常化进行得顺利，没有阻碍，必须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归还日本。其他的一切事可以在以后解决。请原谅，我建议从五项条款中做一些退让，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迫使我这样做的。

赫鲁晓夫：我们两国间举行的谈判具有持久性。我们对双方已取得共识的问题和对日方不接受的问题都有充分的理解。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那就是，领土问题是阻碍关系正常化的主要的和唯一的问题。其他各种问题，好像都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并已获解决。

对领土问题，我们已注意到可能的难处，我们曾提出签订和平条约，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各种条件，包括领土问题都作了规定。为了对日本做出让步，苏联政府准备放弃对属于我国的齿舞群岛和

^① 吉田茂（1878~1967），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的日本首相。对鸠山一郎的平衡的对外政策持反对意见，鸠山一郎的对外政策不像吉田执政年代所实行的那么依赖美国的政策。鸠山一郎曾是与苏联谈判的倡议者，他认为协调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将使日本得以实行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关于这一点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冲突。

色丹岛行使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是，上述岛屿距北海道非常近，这一情况可能在将来成为我们两国间产生磨擦的导火线。同时，转交上述领土会有利于加强我们的友好关系。已将此情况授权通过在伦敦的松本俊一先生通知日本方面。后来日本方面声明，和平条约的这些条款日本不能接受，因为日本政府对各政党承担一定的义务，国内的政治局势对此有干扰。鉴于这一声明，苏联政府将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往后推迟，期待着在日本主张同苏联和平和友好的力量获胜的時刻的到来，到那时将可恢复签订条约的谈判。

我去年详细而清楚地向在莫斯科的日本议会代表团阐述了苏联政府的观点。接着，在重光葵先生来到莫斯科后在他同谢皮洛夫外长谈判时，我方再次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但是日本方面却不能签署和平条约，于是在今年9月份，根据日本首相的建议提出了完成谈判的方式的新问题。这就是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在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的信中所阐述的所谓的五点。苏联政府同意信函的基本原则，因此以鸠山一郎的五点作为出发点得到认可，这样就决定将不解决领土问题。所有这一切在布尔加宁同志的复信中都作了说明。

昨天交给日本代表团的文件是严格按照上述五点制定的。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结束谈判的新条件是日本不能接受的，当时河野一郎先生就声明，这些条件也将得不到日本社会舆论的支持。

河野一郎先生提出了转交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通过和平条约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然而要知道，日本方面却声称它不准备签订这个条约。没有一个能解决关系的基本条约又怎么能解决领土问题呢？

日本方面想不签订和平条约就获得齿舞诸岛和色丹岛，想在以后解决其他某种我们所不知的、其实也不存在的领土问题。苏联政

府想尽量快些同日本达成协议，所以它不会利用领土问题作交易。但是我要再次非常明确而又坚决地声明，除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之外，日本对领土问题的任何要求我们都将不会接受，无论什么样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我们都将拒绝讨论。

日本政府也应该理解苏联政府的处境。我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在领土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我们要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送给日本。但是如果我们再做更大的让步并将另一些法定属于我国的领土转交给日本，那么我国人民就会不理解我们了。我们不能也不会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可以按照和平条约转交给日本，但是随着上述岛屿的转交，整个领土问题应该认为是圆满地解决了。

我想，上述条件对日本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多少可以根据日本的报刊判断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都同意我们所提出的和平条约的条款，因为它能终止我们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使关系正常化，发展贸易，交流文化成就，同时也能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创造条件。这样解决问题有利于日本人民。因此我强调的是现在和将来的日本的利益。

如果日本现在不能去为关系正常化有所作为，那我们将感到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直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在日本成熟。

我们赞赏鸠山一郎首相在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事业中所作的努力。这一点我昨天说过，今天再重复一遍。尽管他年事已高且身体不适，但他并没止步不前，仍然来到莫斯科，以便使谈判有个结果。我们也很欣赏您，河野一郎先生所作的努力。您精力充沛地工作，以便实现苏联和日本间的关系正常化。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本将比苏联得到更多的好处。

也许，对日本方面来说，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写

上苏联同意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转交给日本。但是这将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在双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还要进行领土问题的谈判那种局面，因为转交齿舞诸岛和色丹岛是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否这样处理：我们向日本让出上述岛屿，并在文件中写上这一条。然而实际向日本转交上述领土应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应在美国把它占领的冲绳岛和其他历来就是日本的领土交给日本之后。苏联方面准备这样解决问题，以便能缓解日本代表团的处境。当然，日本方面也能够做出选择：要么同意只按五点的条件结束谈判，要么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条款补充到这五点中去。

河野一郎：请原谅，我们不厌其烦地向您提出各种请求。昨天交给我们的苏联代表团的草案和纪要我们已经研究过，我们认为这些文件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不包括领土问题。对这些文件我们也有一些补充请求。

1. 日本方面请求进行调查，以便能找到从苏联方面获得的名单中没有提及的那些失踪的日本公民。

2. 日本方面对苏联政府在接纳日本为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问题上的立场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我和重光葵一样不尚空谈，你们将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例会上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请求，因此对我来说有您们的保证就足够了。

赫鲁晓夫：对有关失踪的日本公民的问题，除了我以前所说的外，现在无可奉告。在我们这里，除了交给你们的名单中的那些人外，再没有别的日本人。但是，如果日本代表团认为，为了使代表团处境好些，对宣言的全文加以概括性的语句将是有益的，那么我们显然是不反对这样做的，尽管应该再次指出我们这里除了已经通知你们的那些人之外再无别的日本人。如果能找到这种人，那么我们会立即将其送回日本。

河野一郎：请求将这句话加进宣言。

赫鲁晓夫：关于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请求问题，一切都将取决于日本自己，确切地说，将取决于在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提出之前在多大程度上从法律上办妥关系正常化的文件。我们说的是大实话，您可以相信。

河野一郎：请允许就领土问题再说几点想法。我们想解决不涉及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领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牵涉到美国和其他盟国。日本准备在坚持自由立场的情况下解决领土问题。我们不能去签署和平条约，但是我们同意签署一些在内容上与该条约无任何区别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解决和平条约可以解决的几乎所有问题。

很遗憾，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所迫，关于领土问题我们不能接受苏联的立场。

我们恳请苏联政府尽快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归还给我们，不要将这与其他问题牵扯在一起。

至于说其他的领土的归属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很难就此说些什么。近期内这方面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苏联正占领着上述地区。你们建议要将转交齿舞诸岛和色丹岛的问题写入共同宣言，但实际归还它只能在美国将冲绳岛归还日本之后，这会使社会舆论和日本国民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苏联已经同意在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将这些领土交给日本，这是全体日本人都知道的事。

你们关于转交上述领土直接取决于美利坚合众国归还冲绳岛和其他领土的声明令我们非常失望。我们不想在上述日本领土之间划等号。我再次重述我们的请求，请苏联政府尽快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归还我们。

我们认为，关系正常化一定要在现在完成，因为鸠山一郎首相再也不会来莫斯科了。可见，如果我们错过当前这个有利时机，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将把解决我们关系的可能性错过许多年。

赫鲁晓夫：为了不使你们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我想再明确地说一下我能说的关于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的话。

如果马上签署和平条约，苏联政府就同意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转交工作将在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后进行。我不知道对转交工作会有什么技术难题。显然，在这些岛屿上有某些可能要运出或转交的财产，我只想指出，转交上述领土与条约的批准是相关的。如果和平条约得不到签署，而日本方面同意我们昨天交给它的那些文件，那么，问题显然只能按下列方式解决：

苏联政府同意转交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关于这一点可以写进有关的文件中并公开宣布。苏联政府从法律上放弃自己对上述岛屿的权力，但实际转交要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和将美国所控制的冲绳岛和其他领土归还日本之后进行。我们不想在这方面有不平等的状况。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控制着日本的领土并在那里建造反对我国的军事基地，但却要求我们把属于我们的领土交给日本呢？这不公正。对这种歧视态度，我们表示抗议。为了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想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将再也不做比日本方面已经了解的那些更大的让步。河野一郎先生，可以想想，也许我们还能够再次会晤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可以改善你们的处境，因为你们能够从两个决策中选择一个。

河野一郎：赫鲁晓夫先生是否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会在某个时候将冲绳岛归还日本呢？

赫鲁晓夫：对美国我很难说，但我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齿舞诸岛和色丹岛的解决方案将促进冲绳岛的解放事业。谁也不怀疑冲绳岛是日本的领土。在为此而履行了相应条款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我认为，美国尽早会将冲绳岛和其他领土归还给日本的。但是无法说是什么时候这么做。

河野一郎：如果美国从冲绳岛撤走的话，苏联政府是否同意将

国后岛和择捉岛归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我不知道日本人会如此顽固。你们总是一致行动。

河野一郎：当然，国后岛和择捉岛对日本来说并无重要的经济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在全国开展一场争取归还冲绳岛和其他领土的运动，把这个问题同归还国后岛和择捉岛联系起来，那么也许我们会成功，因为两个大国把本属于日本的领土同时归还日本的理由很有说服力。

赫鲁晓夫：国后岛和择捉岛在这里完全没有关系，它们的问题早已解决了。在经济上，这些领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它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损失，是预算的沉重负担。但是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威信考虑，以及事情的战略方面。

河野一郎：请您照顾我们的处境并考虑一下我今天提出的我方请求。

赫鲁晓夫：关于如何在文件中处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的问题，我们将同外交部商量一下。

河野一郎：如果您不反对，那么我想同您再会晤一次。

赫鲁晓夫：据我所知，预定于明天举行鸠山一郎和布尔加宁同志的会晤。

河野一郎：我想在这次会晤之前再同您会晤一次。请允许我于10时到您那儿。

赫鲁晓夫回答同意。

河野一郎：最后我想说一下，日本代表团的处境非常困难；它在没有得到东京赞同的情况下接受了所有解决方案，因为，如果我们请求他们同意，那么就一定遭到拒绝。要说服日本议会和社会舆论同意我们在莫斯科签署的那些文件，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需要苏联政府方面的支持。

No 06977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 关于苏日领土问题的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7日)

会谈于10时开始，10时50分结束。

河野一郎：我今天不想更多地辩论，只想说明与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奉行的路线有关的一些情况。

鸠山一郎和我们所在的自由民主党^①制定了与谈判有关的新方针。我愿意向您解释，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这一新方针。我们党内有这样的成员，他们强烈反对我们的莫斯科之行，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呆在莫斯科，那么，他们，即这部分成员所担心的协定就一定会签订。因此，党员中的某些派别在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制造了有系统的干扰和障碍。鸠山一郎和我们竭尽全力，以便党的大多数人和政府能够接受我们的路线并能委托我们去莫斯科。我们总算成功了，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上一次，当我在莫斯科进行渔业谈判时，我拜访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并同他们交谈了领土问题。布尔加宁先生当时向我声明以下内容：苏联政府将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关于这一点，在伦敦也不止一次说过，但是，归还上述领土——这是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可以采取的最大限度的举措。布尔加宁继续说：我知道，日本国民要求归还择捉岛和国后岛，但是，将上述领土归还日本是完全不

^① 日本的自由民主党成立于1955年11月15日，是自由党与民主党联合的结果。

可思议的和根本不可能的。现在是谈归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事宜，所以其他问题以后解决。现在，双方应就观点一致的那些问题达成协议。

布尔加宁先生的声明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我应当指出，自由民主党原先制定了苏联方面根本不能接受的苛刻谈判方针。因此才决定制定新的方针和确定新的态度，这个新方针是完全建立在布尔加宁先生上述声明基础上的，我已向党和政府报告了该声明的内容。他们告诉我，我和鸠山一郎同去莫斯科是为了按布尔加宁声明中所提出的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换句话说，就是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归还日本。

赫鲁晓夫：河野一郎先生解释的内容同布尔加宁同志谈话多少有点出入。苏联政府无论在伦敦通过马立克同志，还是在莫斯科的多次谈话中均不止一次地通知日本方面，我们同意在缔结和平条约和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的条件下交还日本国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但是发现，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对谈判问题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日本方面建议暂时不谈领土问题，而只限于消除战争状态和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在同意新方案的同时，我们认为，归还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只有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实施。

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的。

为了满足日本代表团的愿望，我在昨天提出了另一种对日本有益的新方案。于此，我想推心置腹地说，我们的方案可以被日本卓有成效地使用在宣传方面，因为苏联归还日本上述领土的义务可以成为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归还冲绳岛和其他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领土的最充分的理由。可以在联合宣言中写入关于在缔结和平条约和归还日本冲绳岛和其他在美国控制下的领土之后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这一条，此外，还可以用口头的，无文字记载的方式达成协议，即我们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归还上述领土，不受归还

冲绳岛和其他领土的制约。我们希望帮助日本解放冲绳岛和其他领土。我们解决领土问题的这一方案日本是完全能接受的。在这种场合下，日本可以举苏联作例子，并以此来动员国内外社会舆论支持冲绳岛的解放斗争。

河野一郎先生昨天问我，是否相信美国会将冲绳岛归还日本。当然，我是相信的。我明白，美国并不愿意归还这些领土，但历史常常会迫使人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日本人民为此坚持斗争的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交出属于日本的领土。我想，日本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将很快确信缔结和平条约的好处和必要性，到那时，也就是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我们将不受冲绳岛问题的制约，归还日本国齿舞诸岛和色丹岛。

河野一郎：我很明白你的意见，所以我提出了如下的关于领土问题的文本。（他递交该方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国家的利益，将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将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并在两国之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后，保证全面解决由于战争状态出现在两国之间的问题”。

关于上述岛屿的归还期限现在可以不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关于交还齿舞诸岛和色丹岛第一部分内容表达写得不妥当。在这里，全都以非常绝对的形式说明，如果在这样的提法之后，我们没有立即交还日本国上述领土的话，那么日本的舆论将认定，似乎是苏联政府拒绝履行自己的这一责任。我们希望两国关系的真正正常，我们也希望，社会舆论正确理解我们，因为苏联对于自己所承担的所有义务，总是诚心诚意地和认真地履行。我们从来都是履行自己诺言的。

河野一郎：如果这个草案不能接受，请提出你们的方案。

赫鲁晓夫：河野一郎先生应该明白，我们的提议给了日本国进行收回冲绳岛和其他领土斗争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权力。我知道，日本有亲美派，他们不满意我们的谈判，可以完全不理睬他们。主要问题在于，按照我们方案解决问题的结果，日本国将得到向美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您要估计到，没有斗争，你们就不能收回在美国人手中的你们的领土。

河野一郎：日本方面同意研究你们提出的任何方案，鸠山一郎和我决定同自己的政府协商就签署文件。

赫鲁晓夫：河野一郎先生，您要看到，我们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收回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领土开展斗争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我们已经决定交还你们的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因此我们失去了对这些岛屿的一切兴趣，所谈的仅仅是交还领土本身是否对日本有好处。在消除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之后，就不再存在任何像以前那样使我们疏远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将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本来，我们将签署和平条约并到那时交还你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当苏联向日本国交还这些岛屿时，你们就能利用这一时机收回在美国人控制下的自己的领土，因为到那时，苏联已经交还了对日本允诺的领土，而美国仍然像以前一样，坚持过去的立场。这样一来，以苏联作榜样，可以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本领土的态度。

河野一郎：请您审阅我们的方案，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请更正。我希望能就这个问题再同您会晤一次。因此我请您在修改我的方案之后，送给我一份并给我约定任何时间去拜访您。

赫鲁晓夫：我们将以信件方式给你们送去我们的意见，研究我们的意见时，您如果觉得需要，我随时恭候。

№06976

赫鲁晓夫关于解决苏日领土问题 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0月16日，我同日本国农林相河野一郎举行了会谈。整个会谈在讨论领土问题。现将会谈记录呈上。在会谈结束时，河野一郎请求再次会晤，今天，10月17日，举行了这一会晤。

在今天会谈时，河野一郎递交了他对领土问题的表达方式并请求我方向他们递交我们对领土问题的表达方式。

现呈上列入联合宣言的我方对于领土问题的表达方式的文本。

同时，我以口头方式向日本方面转达了未列入联合宣言的协议书文本草案。如果同志们同意该文本，那么可以将其转达河野一郎。他请求在他了解我们对领土问题的建议之后再次会见他。我同意了。

尼·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17日

附 件

列入联合宣言的文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同意在恢复苏联和日本两

国之间正常外交关系之后继续进行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和考虑到日本国的利益，同意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还日本国。但是，实际交还日本这些岛屿，要在苏日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之后，要在日本收回冲绳岛和在美国控制下的属于日本的其他岛屿之后。

以口头方式向日本方面转达的 未列入联合宣言的协议书文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在苏日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和不等到冲绳岛及其他在美国控制下的属于日本的岛屿获得解放，实际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还日本国。

河野一郎提出的方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国家的利益，将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将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并在两国之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后，保证全面解决由于战争状态出现在两国之间的问题。

No06978

布尔加宁、米高扬与鸠山一郎、河野一郎 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7日)

在互致问候之后，鸠山一郎发表了如下声明：从1951年9月我开始当政以来，不断为同苏联关系正常化而奔走。从那时起到现经过了将近5年。我在这方面的系统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日本的社会舆论坚信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

我很高兴，我现在在莫斯科并有可能亲自实现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理想。

我感到高兴的是，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我想向你们谈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领土问题。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谈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最近几天，河野一郎先生代替我多次会见赫鲁晓夫先生，在这些会见过程中仔细讨论了领土问题。我想请您，主席先生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从日本出发之前我们曾认为，实现关系正常化可以不受领土问题的制约。但在我们党内，以吉田茂为首的相当可观的派别强烈反对我们在谈判问题上的立场，由于这一情况，我们不得不到莫斯科重新提出交还齿舞群岛和色丹岛谈判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提出这个领土问题是违背我们意愿的。

2. 关于加入联合国问题。我不是纯粹地追求形式，换句话说，

我不尚空谈。我关心事情的实际方面，所以请求苏联政府，在我们关系正常化之后，在与接纳其他国家无关的情况下，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斗争。我相信，你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宽宏大量地对待日本，并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中一员的愿望。

3. 关于被扣押的人员问题。在你们提出的联合宣言中，释放扣押人员问题写了整整一段。赫鲁晓夫先生同意接受的一点是要继续在苏联境内查找，以便发现那些没有列入你们提供的名单中的日本人。因此我请求在联合宣言中写入下面这一点：“至于材料中没有提到的那些日本人，那么苏联应采取措施，以便弄清楚，在苏联境内到底有没有上述日本人。苏联应继续寻找上述人员。（没有依照日本文本翻译）。”

4. 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和一系列与国际问题相统一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联合宣言第9条中说出。众所周知，我们在谈判期间只讨论了那些与建立外交关系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我不否认，你们提出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认为，只有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后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才是适宜的。

5. 请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为大使馆馆址和使馆人员住处寻找合适地方给予协助。

布尔加宁：我打算详细回答您的问题。

首先我想声明，包括我的同事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内，我们这些政府领导同志们都高度评价您致力于消除两国间不正常的关系的努力。我们毫不懈怠地注意着自1951年以来您在这方面的活动。我们总是希望您成功，而现在，我们十分满意地同您会晤并开始谈判。我们希望，所有这些会晤都将意味着迄今为止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不正常关系的结束。今天早餐时，我已声明，我们的会晤是历史性的。我现在还想重申这一点并且认为，您

的莫斯科之行将载入日苏关系的史册。

我们同样高度评价河野一郎先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十分满意地指出，河野一郎相为我们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并以此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我说的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出于礼节。这是所有政府成员一致的真诚意见。

请允许我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领土问题。关于领土问题，已举行过多次会晤，会谈和会议。这些活动在伦敦和莫斯科都举行过。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是重光葵先生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重要问题。最后，昨天和今天还举行了赫鲁晓夫同志和河野一郎先生讨论领土问题的会晤。

我们已多次指出，在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可以交还日本国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众所周知，已通过我们驻伦敦大使马立克发表声明，我们已经准备移交，虽然，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在政府中解决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了极大决心和在我们的社会舆论面前承担了最严肃的责任。但是，我们坚持缔结和平条约和以此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非常遗憾，日本方面却声明，日本不能缔结和平条约。重光葵先生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同志详细地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此，重光葵先生的代表团不能取得成功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昨天和今天，赫鲁晓夫同志和鸠山一郎首相的代表河野一郎先生举行了会晤。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一个我们完完全全同意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同时也是整个政府的观点。摆在日本面前有很大选择。它可以遵循某些文件中规定的一系列章程。我说的是和平条约方案，政府首脑之间的书面互换信函，葛罗米柯同志和松本俊一先生之间的书面互换信函，最后还有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解决领土问题方案。

这样一来，我们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就得到了详细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也不会有任何其他让步。

河野一郎：我已经就领土问题同赫鲁晓夫先生进行了交谈，我还想同他会晤一次。我请您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对日本代表团的宽厚态度。

布尔加宁：苏联政府交给日本方面下列两个依据赫鲁晓夫同志与河野一郎先生谈判精神提出的文本供审查。第一个文本应写入联合宣中。

（布尔加宁同志的宣言包含有苏联签订和平条约和在归还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领土之后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内容的条款的草案。随后，布尔加宁同志宣读那份不列入联合宣言中的文本草案，该草案是双方关于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事实上交还日本国齿舞诸岛和色丹岛而不必等待美国归还属于日本的领土的口头协定。

鸠山一郎不止一次想弄清楚，这是否表明苏联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就交还齿舞诸岛和色丹岛，抑或是这种归还还要具有两个条件：

1) 缔结和平条约，2) 美国归还冲绳岛和其他在美国控制下的领土。

尼·亚·布尔加宁解释，在签订由我们向重光葵先生提出的和平条约的情况下，苏联同意将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交还日本国。）

鸠山一郎：在这个文件中提及美国会使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因此我们想回避这一问题。

米高扬：我们认为，布尔加宁同志宣读了我方方案，我们是以此来减轻日本为争取收回在美国控制下领土斗争的压力。

河野一郎：如果苏联归还我们国后岛和择捉岛的话，那么日本的任务就真的减轻了。

布尔加宁：关于这两个岛屿根本不能谈。

米高扬：关于这些岛屿我倒是有一句话，那就是它们纯粹是苏

联的领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容忍交出岛屿的想法。

布尔加宁：关于领土问题就谈到这里。我们的立场是最终的和不可动摇的。

布尔加宁：关于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在恢复正常关系和批准文件之后，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诺言——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要求。

鸠山一郎：谢谢。

布尔加宁：关于被扣押的人员问题。我们将采取措施交还扣押在苏联的全部人员，包括被判刑的战俘。我们也同意日本方面的补充要求，愿意采取措施寻找未列入名册的日本族人员。

下面，是谈关于我们联合宣言中的第9条，也就是关于在国际问题上以及在禁止原子弹和氢弹问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性。我们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日本代表团找到了共同点和共同意见。众所周知，苏联国会很快响应了日本国会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决定^①。我们认为，如果两国政府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承认这一点，那么这样的决定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日本方面认为不能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也不反对这一例外。

米高扬：我同意布尔加宁同志的看法，也不再坚持保留这一点，但我不明白日本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第一个国家。况且还可以说，那些原子弹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扔下来的，可见这一轰炸没有任何必要性。日本国民大声疾呼，要禁止使用原子弹。日本国会迎合人民意愿的同时，也提出了致世界各国国会呼吁书的著名决议，众所周知，我国

^① 1954年2月，日本议会的两院通过决议案，要求立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1956年7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苏联政府决定裁军并赞成单方面裁军问题通过了致各国议会的呼吁书。

国会很快响应了这一决议。日本代表团方面将用什么来解释对这一问题的否定态度？

河野一郎：日本代表团不反对这一条，并赋予它很大的意义。我们只是希望，正如首相所说的那样，是要在另外时间，也就是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布尔加宁：最后，是关于为大使馆提供馆址请求问题。苏联政府将为帮助在莫斯科寻找日本大使馆馆址和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这些地方工作创造良好、正常的工作条件尽自己的全力。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

河野一郎：我想，日本大使馆也用不着很大的场所。

布尔加宁：我认为，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也不用占很大的场所。

鸠山一郎：最后我想讲一点，如果我们由于关系正常化而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防止出现新的战争，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就在全人类面前完成了自己伟大而崇高的职责。

布尔加宁：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并认为苏联和日本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乃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巨大贡献，这不仅有益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

我想指出，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为各民族间的和平和友谊而斗争。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遵循的是伟大列宁关于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教导。

米高扬：我想，对于日本来说，在我们的谈判结束之后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其正常的关系是合适的。

谈话持续了1小时10分钟。

No 06979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 关于苏日领土问题的谈话记录

(1956年10月18日)

谈话于16时15分开始，16时55分结束

河野一郎：日本方面仔细研究了昨天晚上递交的关于领土问题的苏联方案。结果是，我们决定请从你们的方案中去掉关于美国归还日本冲绳岛的提法。如果苏联方面不反对，那么我们想在苏联方案基础上提出下列方案。

“日本国和苏联同意在建立日本国和苏联两国正常外交关系之后继续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家的利益，同意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但实际交还日本国这些岛屿在缔结日苏和平条约之后实施。”

赫鲁晓夫：苏联方面基本上同意所提出的方案。我们愿意接受日本的愿望，所以准备取消我们方案中关于交还日本冲绳岛和其他领土的那一部分。

我们也有一个纯粹是文字性的意见：我们请从日方方案的第一部分中去掉“包括领土问题”的用语，我们提出这条建议的原因是，如果保留上面这句话，那么就会以为是在日本和苏联之间，除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外，还存在着什么别的领土问题。这会造成对我们打算签署的文件的曲解和错误的理解。

河野一郎：非常遗憾，日本方面已将今天提交你们的方案通知

了东京并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因此任何以后的更改，当然都要经政府的批准。实际上这意味着，很明显，我们如果必须向东京请求，也就是明天不能在这些文件上签字。

赫鲁晓夫：我祝贺你们已经得到自己政府签署文件的批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去掉上述的说法。同时，正如你们了解的，所说的只是关于措词的修改，而该条文的内容没有变。

河野一郎：我完全同意您说的。苏方的修改不改变我们方案的内容，但该方案一经迅速协商，我们就得到东京明确的批准，在一切都商妥之后再修改，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赫鲁晓夫：我以为，您不用请示自己政府，因为大家都清楚，甚至你们的敌人也清楚，领土问题的条款对日本有益。请您想一想吧，河野一郎先生。我们删掉了自己方案中的最后一部分。这样来，我们向您做了很大的让步，而您却不同意这个纯粹是措词上的更准确的表达。

河野一郎：我非常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已经被日本政府规定的决议所制约，很难做出什么样的更改。

赫鲁晓夫：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请你们删除这几个单词，是为消除在今后由于解释本协定而出现的冲突。要知道，我们签署的文件不只管一年，也许，他们将在10年，或者也许100年内有效，自然，应当把文件起草得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允许有不正确的解释。您知道，到处都有吹毛求疵的人，他们竭力利用任何疏忽，甚至是措词上的疏忽，在我们的协定解释上制造冲突。让我们终止这个问题的继续讨论。您接受我们的提议，删除几个单词，我们就缔结协定，以此开创日苏关系的新时代。

河野一郎：非常遗憾，我应该再一次强调，作任何更改，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首相和东京已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不得不再次向东京请求，这样做只能拖延签署日期。

赫鲁晓夫：所说的只是措词上的更改。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迁就日本，而您却想让我接受我们认为不合适的条款。我劝您不要推诿，接受我们的更正，并同意签署文件。

河野一郎：我个人是同意的，请允许我向首相建议。如果首相认为是必须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就不得不向东京请示。

赫鲁晓夫：尽力做必须做的事情吧。但您应记住，我们将坚持删除“包括领土问题”的说法。

河野一郎：我还有一个请求。我接到东京来的书面命令，要求请您释放扣押在苏联的 100 名渔民。我以为，释放这些人员对签署关系正常化文件有重要意义。

赫鲁晓夫：我答应您的请求，我将在政府中支持您关于释放上述渔民的请求。除此以外，您还请我们苏联当局进行补充调查，弄清在苏联境内是否还有没有列入当时递交给苏联方面的名册中的日本族人。调查之后查明，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一小部分未列入上述名册的日本族人。如果上述人员愿意的话，我认为，可以将他们交还日本。

河野一郎：我非常感谢您在这个问题上的声明。受鸠山一郎先生委托，请允许我向您递交一封致布尔加宁先生的信。这封信是昨天在布尔加宁先生同鸠山一郎首相会谈基础上写成的。

№06980

赫鲁晓夫与河野一郎 关于苏日领土问题表述方法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18日)

1956年10月18日18时举行

河野一郎：在与鸠山一郎首相协商之后，我们决定接受赫鲁晓夫先生关于删除“包括领土问题”提法的建议。

赫鲁晓夫：很好。这就可以签署协议了。

河野一郎：我们很着急，想在10月20日签署。

赫鲁晓夫：签署可以定在10月20日，但最好在10月21日签署。事情是这样的，有部分政府官员要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①。当然，如果日本方面很急，那么可以在我们不在场时签署，但我们以为，在实现这一历史性行动的时候，最好能一起参加。

河野一郎：我们是很着急。政府坚持要首相尽快回日本。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与你们无关的特别情况。我指的是预订从斯德哥尔摩到东京的飞机。但是，我们不愿意为完成谈判作如此努力的赫鲁晓夫先生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签字。

赫鲁晓夫：我们政府全体在对于同日本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河野一郎：我想在与首相协商之后，再向您通告我们关于签署日期的最终提议。

^① 1956年10月19~20日，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对波兰进行了访问。

No06981

赫鲁晓夫关于苏日领土问题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0月18日，根据协议，我会见了河野一郎。他向我转交了日本方面关于领土问题的提法。同时，河野一郎还指出，这一提法的基础是我们10月17日递交给他们的领土条款文本。在日本的文件中，没有提到归还齿舞诸岛和色丹岛将在“……日本收回冲绳岛和在美国控制下的属于日本的其他岛屿”这一内容。

在了解日本的提法之后，我告诉河野一郎，该意见基本上能接受，但是，为了消除任何一种对该意见的不正确解释的借口，必须在文本的第一段中删除“……包括领土问题”的字样。

在谈话结束时，河野一郎声明，他本人同意这个更正，但应就这个问题与鸠山一郎协商之后再给最后的答复。

过了一个半小时，河野一郎又一次拜访了我并通知说，日本方面同意我们的更正。

在这种情况下，我送上关于领土问题的修正方案稿。我认为，关于领土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可以接受的。

尼·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18日

关于领土问题的文本

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在恢复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正常化外交关系后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家的利益，同意交还日本国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但是，实际交还日本这些岛屿要在缔结日本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和平条约之后。

№06982

布尔加宁关于苏日宣言草案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56年10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

现将1956年10月18日鸠山一郎给我的信和答复草案呈上。我以为答复草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给鸠山一郎回音。

尼·布尔加宁

1956年10月1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先生

主席先生阁下：

为表达对您的敬意，我荣幸地向您提出如下请求：

对于我们之间昨天的会谈，我的理解是我们的会谈具有下列内容，即：

1. 关于领土问题，我请您大力协助使特派代表河野一郎先生同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生之间的会谈得以顺利进行。您对此表示同意。

2. 关于接纳日本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我请求苏联方面协助，

以便在关于日苏两国间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宣言生效之后实现日本加入联合国，并表示相信，苏联支持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这一行动并不受第三国家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影响。对此，您明确表示，您愿意以全体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向我保证，在实现日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苏联将全面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3. 关于遣返现滞留在苏联境内日本人回国问题，您同意我的请求，继续寻找那些下落不明的日本人的下落。

4. 关于国际问题和原子能问题，您同意我的请求，在恢复日本国和苏联之间正常关系之后，将把这些问题作为讨论的对象，并将这些问题从确立两国间关系正常化的现在的联合宣言中取消。

5. 关于提供设立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建筑，提供大使馆人员住所和其他问题上，我请您协助，对此您表示同意。

如果我上述理解没有错误的话，是否能请您用书面方式证实这一点。

值此机会，主席先生，请您相信我对您的敬意。

日本首相 鸠山一郎

1956年10月18日

首相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拜读了您1956年10月18日的信件，信中您请我对今年10月17日我们会谈中您提到几个问题理解的正确性加以证实。

按照您信中提到的问题会谈有以下内容：

1. 领土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说的，苏联政府出自缔结和平条约以及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在提出缔结和平条

约之后交还日本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为此在我们社会舆论面前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提到，苏联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曾在过去的伦敦和莫斯科谈判过程中详细阐明过。

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河野一郎先生两次会谈中对领土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那么我声明，尼·谢·赫鲁晓夫论述的观点，我们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一观点是苏联政府的观点。关于河野一郎先生同尼·谢·赫鲁晓夫还将举行一次会晤，我持同意的态度。

接着我还对您说过，我们大家都在竭尽全力寻求该问题的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给日本提供了很大的选择余地，日本可以依照我在会谈中列举的相当多的文件中提出的一系列条款办事，我还说过，我们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让步。

2. 关于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声明，在恢复正常关系和批准文件之后，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诺言，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要求。

3. 关于遣返日本人回国问题。我声明，我们将采取措施，以便交还日本包括被判刑战俘在内的全部扣押在苏联的日本人。

我们也同意日本方面在联合宣言文本中关于希望采取措施寻找那些没有列入日本方面向我们递交名册中的日本族人员的补充意见。

4. 关于国际问题和原子能问题。我指出，依我们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代表团将寻找共同点和共同意见。我们认为，如果两国政府都承认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决定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好处。但是，既然你要求把这些问题从联合声明中取消，并把这些这些问题放在恢复苏联和日本国之间正常关系之后讨论，我们也同意你们的意见。

5. 关于为日本大使馆和使馆工作人员提供场地问题。我说过，苏联政府尽力做到帮助在莫斯科寻找大使馆和其工作人员的场所，

并为在使馆工作创造良好的正常条件。同时我也希望，这一切都建立在双方互惠的原则上。

值此机会，请首相先生您相信我对您的敬意。

莫斯科

1956年10月18日

№06983

葛罗米柯关于苏日联合宣言文本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0月19日)

第 590 / АГ 号

秘密

一份

苏共中央委员会：

现呈上苏联 - 日本国联合宣言文本和贸易问题协议文本，该文件已经我们和松本俊一协商。

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系按照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和河野一郎协商后的形式拟定的。

联合宣言和协议书将按此稿准备签字。^①

安·葛罗米柯

1956年10月19日

① 苏联和日本共同宣言以及两国关于发展贸易和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议定书是于1956年10月19日17点45分在克里姆林宫签署的，公布在1956年10月20日的《真理报》上。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 日本国的联合宣言

从1956年10月13日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代表团的谈判。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方面参加谈判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尼·特·费德林。

日本方面参加谈判的有：

首相鸠山一郎，
农林相河野一郎和
国会议员代表松本俊一。

在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状况下举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坦率的交换意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完全同意，两国间恢复外交关系将有助于发展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安全。

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代表团之间的这些谈判，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共识：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将从联合宣言生效之日起终止，两国之间恢复和平与友好关系。

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之间恢复外交和领事

关系。同时还注意到，两国立即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而关于在苏联和日本设立相应的领事馆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强调，他们在相互关系中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特别是该宪章阐述的原则第 2 条：

(1) 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公正；

(2) 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应放弃武力威胁或者诉诸武力，在任何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或者政治独立问题上，反对采用任何与联合国宪章宗旨不相符的其他方式。

苏联和日本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每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的单独的或集体自卫权利。

苏联和日本相互承诺，彼此均不以任何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直接或间接干涉对方内政。

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支持日本国关于接纳其加入联合国的请求。

5.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部被审判的日本公民从本联合宣言生效之日起将被释放并遣送回日本。

至于那些下落不明的日本人，苏联将依照日本的请求继续寻找他们的下落。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放弃一切对日本赔款的要求。

苏联和日本国相互放弃国家、团体和公民对另一个国家、团体和公民自 1945 年 8 月 9 日由于战争引起的所有赔款。

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国同意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就缔结条约和协议进行谈判，以便对贸易、商业航海方面的关系和其他商务方面的相互关系提供牢固和友好的基础。

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国于 1956 年 5 月 14 日签署的关于在太平洋西北部公海上的渔业协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与日本国关于救援海上失事人员的合作协议将与本联合宣言同时生效。

考虑到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在保护和合理利用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自然资源的兴趣，苏联和日本将本着合作的精神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渔业资源，以及调整和限制在公海上的捕捞。

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之后继续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日本国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家的利益，同意向日本归还齿舞诸岛和色丹岛，但是，实际归还这些岛屿是在缔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国的和平条约之后实施。

10. 本联合宣言有待批准。在批准证书的互换之日，本联合宣言即生效。批准证书的交换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在东京举行。

下列代表在本联合宣言上签字以资证明上述各节。

联合宣言一式两份，均用俄文和日文书写，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56年10月19日于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尼·布尔加宁，

德·谢皮洛夫。

日本国政府全权代表：

鸠山一郎，

河野一郎，

松本俊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日本国
关于发展贸易和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日本国政府根据 1956 年 10 月 19 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日本国联合宣言第 7 条的规定，对下列各点达成一致意见：

1. 在缔结本联合宣言第 7 条中所规定的条约和协议书之前，谈判的双方将开始进行各种努力发展两国间的贸易，谈判双方中的每一方将给另一谈判方提供以下待遇：

(1) 在关税、收费、海关手续和其他与谈判另一方商品进口和向谈判另一方出口商品有关规章的所有形式方面提供最惠国待遇；

(2) 向谈判另一方的船舶停港，进、出港和停泊，税收和收费，以及货物装卸，供给燃料，淡水和食品方面提供最惠国待遇。

2. 根据上述第 1 节规定，谈判各方采取禁止或限制的任何方式以便保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权利不受限制。

本协定书有待批准。本协议书自批准证书互换之日起生效。批准证书互换应尽快在东京举行。

下列代表在本协定书上签字以资证明上述各节。

协定书一式两份，均用俄文和日文书写，且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56 年 10 月 19 日于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尼·布尔加宁，

德·谢皮洛夫。

日本国政府全权代表：

鸠山一郎，

河野一郎，

松本俊一。

【专题说明】

苏联在 50 年代的裁军方案和行动

(1955 年 8 月至 1959 年 1 月)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转变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即以缓和政策替代对抗政策，试图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减少军费开支，以便集中力量加快国内经济建设的步伐，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55 年 7 月 18~23 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了欧洲安全和裁军问题。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6 日，苏、美、英、法外长继续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研究具体落实 7 月政府首脑会议所确定的内容。此后，苏联重新审议了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并延长了这些措施的实施期限，开始进行全面裁军。

这里刊出的是有关 50 年代后半期苏联党和政府所有关于裁减武装力量人员的决议和报告等 19 件档案。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苏联在这一时期执行缓和的对外政策及落实与西方达成的裁军协议方面是认真的，积极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协商会议规定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采取裁军行动的不仅是苏联本身，还有一系列东欧国家——除民主德国以外的所有华沙条约国。这或许可以说明，在苏

联与西方阵营的对立中德国问题的特殊地位。此外，文献所表明的苏联军方对大规模裁军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显然也是构成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树敌过多的因素之一。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刘明、白云翻译)

№093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裁军的决议

(1955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关于裁减苏联军队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军队兵员的决议

1. 通过国防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武装力量兵员的决议草案（附后^①）。

2. 通过国防部关于裁减各人民民主国家军队兵员以及延长其装备更新期限的建议。

批准所附致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书记的信。^②

中央书记

1955 年 8 月 12 日

① 即本卷本专题№09400 文件。

② 参见本专题以下各文件。

№09400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军的决议

(1955年8月12日)

第 1481 - 825cc 号

绝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裁减武装力量兵员的决议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如下：

1. 批准国防部关于至 1955 年 12 月 15 日将苏联武装力量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裁减 34 万人的建议，此外还规定，武装力量的义务缺额人员，包括现有的缺额人员在内，共计 30 万人。

被裁减的 34 万人以及因规定而义务缺额的现役军人转为预备役。

2. 关于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4 年 11 月 25 日第 2386 - 1140 和 2382 - 1136 号决议组建航空师一事，责成国防部在一个月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延长组建期限和组建数量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布尔加宁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A. 科罗博夫

1955 年 8 月 12 日

№09401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贝鲁特的信

(1955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
博列斯拉夫·贝鲁特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 36 万人裁减到 30 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 年 8 月 12 日

№09402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诺沃提尼的信

(1955年8月12日)

绝密

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
安托宁·诺沃提尼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22.9万人裁减到19.5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年8月12日

№09403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拉科西的信

(1955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拉科西·马加什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 14.5 万人裁减到 12.5 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 年 8 月 12 日

№09404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
致阿波斯托尔的信**

(1955年8月12日)

绝密

致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书记
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25万人裁减到21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年8月12日

№09405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日夫科夫的信

(1955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托多尔·日夫科夫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 14.7 万人裁减到 13 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 年 8 月 12 日

№09406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事宜致霍查的信

(1955年8月12日)

绝密

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恩维尔·霍查

鉴于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协商会议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减少武装部队的经费开支，我们认为，研究协商会议纪要规定的将和平时期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从4.1万人裁减到3.3万人的问题是适宜的。

有鉴于此，还望重新审议军队装备更新计划和国土备战计划，考虑延长这些措施的期限。

这些问题的细节可事先通过两国总参谋部系统协商。

请通告您对于该建议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5年8月12日

№09407

朱可夫关于裁减武装力量情况的备要报告

(1955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要报

1. 目前，武装力量的编制人数为 4815870 人，而在册的实有人数为 4637523 人，其中包括：军官 905093 人，工厂、维修部门、工程兵部队、验收机构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 370731 人。

缺额 178347 人。

武装力量各军兵种实际在册人数如下：

- 陆军：2321243 人；
- 海军：747452 人；
- 空军：732322 人；
- 国土防空军：498931 人；
- 空降兵部队：84201 人；
- 机场建设以及工程兵部队：253374 人。

国防部建议至 1955 年 12 月 15 日将武装力量编制和在册人数裁减 34 万人，其中包括从奥地利撤回的部队，此外还规定，裁减后武装力量的义务缺额人员，其中包括现有的缺额兵员，为 30 万人。

裁减的 34 万人以及因规定而义务缺额的现役军人都转入预备役。

武装力量各军兵种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拟分别裁减：

- 陆军：21 万人；
- 海军：3.3 万人；
- 空军：1.65 万人；
- 国土防空军：2.9 万人；
- 从奥地利撤回的部队：3.85 万人。

鉴于缩编部队和兵团，减少步兵连和炮兵连的员额，共裁减 34 万兵员，规定削减步兵连和炮兵连的政治副连长职位，按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做法，改为营设党务政治机构，这样可减少 1.3 万名军官。

国防部建议通过下列方式来裁减武装力量的人数：

——将配置在苏联境内的步兵师、机械化师和坦克师改为缩编师，缩减海军陆战队和海岸防御部队的员额。

——将 13 个军属炮兵旅改编为军属炮兵团；

——缩减突破炮兵师的员额；

——撤消现有的 17 个空军航空兵军指挥机关中的 11 个，撤消现有的 7 个国土防空军歼击航空兵军指挥机关中的 2 个。航空兵师由空军集团军直接领导；

——将 5 个探照灯师改组为 10 个独立探照灯团；

——将阿穆尔河区舰队改组为内河军事基地，将北太平洋区舰队改组为一级海军基地；

——裁减军需保障部队、后勤和工程兵部队及其机构、军事院校的人员，裁减某些职位；

2.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4 年 11 月 25 日第 2386 - 1140 和 2382 - 1136 号决议，国防部应在 1955 ~ 1957 年期间组建 39 个轰炸航空兵师，其中包括：

8 个战略航空兵师；

11 个远程航空兵师；

20 个前线航空兵师，并为前线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现两团编制的轰炸机师和水鱼雷师各增编 1 个轰炸机团，共 16 个轰炸机团。

根据政府的上述决议，国防部在 1955 年组建：1 个战略航空兵师，5 个远程航空兵师，2 个前线航空兵轰炸机师，并为前线航空兵现两团编制的轰炸机师增编 6 个轰炸机团。

国防部认为，在 1956 年仅组建一个战略航空兵师和一个航空兵团是适宜的。远程航空兵以及前线航空兵其他部队的组建工作推迟较长的时间进行。国防部提交的 1956 年度预算草案已考虑到上述设想。国防部关于延期组建上述航空兵部队的建议将另行提交。

格·朱可夫^①

1955 年 8 月 12 日

^① 朱可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09408

苏共中央主席团
关于国防部所提问题的决议
(1956年2月9日)

绝密

关于苏联国防部提出的问题

1. 赞成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关于继续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员额的建议^①，并责成苏联国防部详细制定实施所拟措施的期限。

关于报道继续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员额的时间问题另行研究。

2. 裁减现役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的工作于1956年8月1日前完成。

3. 关于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问题另行研究。

4. 责成米高扬同志和朱可夫同志研究关于军事部门贸易机构的问题。

5. 责成布尔加宁同志委员会研究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将军事部门撤消部队和施工队在建的工程项目，移交民政部门的问题，并将自己的建议上报苏共中央。

^① 参见本专题№09409文件。

6. 责成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研究关于“骑兵集团军”的经费总额问题，并将自己的建议上报苏共中央。

中央书记
1956 年 2 月 9 日

№09409

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 关于进一步裁军的建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2月9日)

绝密
要报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8月12日第4181-825号决议，国防部对武装力量的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进行了裁减，裁员总数为34万人，此外还规定，义务缺额人员，其中包括当时武装力量实有的缺额人员的178217人，为30万人。

此外，根据苏联与芬兰共和国1955年9月19日关于取消波卡拉-乌德苏联海军军事基地的协议，裁减武装力量员额16962人。

为了减少缺额员额，国防部又压缩了武装力量编制员额48417人。

目前，武装力量的人数，包括工程兵部队、维修以及辅助部队，共计：编制人数为4406216人，在册人数为4147496人。至1953年3月1日，编制人数为：5396038人。自1953年3月1日至1956年1月1日这段时间共裁员：编制人员989822人，其中军官和将军172238人，在册人员为1106216人，其中军官和将军119074人。

国防部认为，通过裁减战斗部队、管理机构、后勤和服务部队、机关、军事院校，通过用文职人员取代部队、机关、院校、仓

库以及维修机构中的现役军人，在 1956 年再裁减武装力量的编制人员 42 万人是可行的。

为实现这些目标，国防部建议

关于战斗部队和指挥机构

1. 撤消白海军区和塔夫利亚军区的指挥机构，成立 2 个军指挥机构领导这些军区现有的军队。

2. 撤消 10 个步兵指挥机构，2 个空降兵指挥机构，3 个航空兵军指挥机构，这些军的步兵师和航空兵师将直属集团军司令员或军区司令员领导，而空降兵师将归空降兵司令员直接领导。

3. 撤消布置在远东地区斯列坚斯克市、伊曼市和克拉斯基诺镇（滨海边区）的 3 个步兵师以及其他地区的 2 个空降兵师（1 个在远东地区，1 个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和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独立步兵团。

4. 撤消 23 个独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团，根据以前批准的组建措施计划，以其人员及重型坦克组建一个重型坦克师和补充两个现有的重型坦克师。

5. 撤消布置在堪察加的一个海军陆战旅。

6. 撤消国土防空军契卡洛夫斯克师指挥机构，以其为基础组建国土防空军古比雪夫军指挥机构辅助点。

7. 撤消在现代条件下无特别实战价值的掩护歼击和强击航空兵机场的独立高射炮兵营。

8. 将国土防空军 72 门火炮编成的高射炮兵团改组为 56 门火炮编成的团。在用导弹改装这些团时，人员必须达到所需数量。

9. 在 1956~1957 年期间，将海军的 200 艘作战舰艇和快艇转入储备舰船或封存。

10. 根据国防部于1955年12月31日提交给苏共中央并于今年的2月8日由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报告，将93艘超龄舰艇报废，将69艘超龄舰艇转入其他舰种。

11. 撤消国土防空军莫斯科军区的一个高射炮探照灯团。

12. 裁减国防部中央机关和军事验收部门的人员。

在拟定的关于苏军驻德军队集群的措施中，计划将4个步兵军指挥机构，2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营和1个机场技术保障连以及1个初级飞行学校撤回苏联境内并撤消。

为了避免削弱军队集群的炮兵，以撤消的4个军的军属炮兵部队和高炮部队为基础，组建2个集团军属加农炮师和1个集团军属高射炮师。

由此，我军驻德国部队的人员将减少7500人。

关于后勤保障部队

1. 撤消布置在苏联境内的航空技术师指挥机构，将机场维护部队移交航空兵兵团。

2. 解散国防部新建和改造现有通信电缆以及无线电通信线路的线路通信部队，其工作由苏联通讯部承担。

3. 将贸易机构、在国外为部队服务的机构（贸易分支机构、商品采购基地、军官商店、军官餐厅、团属小商店和小咖啡馆）从武装部队中分离出去，移交苏联贸易部，这些贸易机关的现役军人转入预备役，责成苏联贸易部用工人和职员替代他们。

4. 裁减物资押运部队的员额，军用物资的运输（火炮牵引车、拖拉机、汽车以及使用铅封棚车运输的军用技术装备），按国民经济物资通用运输原则运输。

5. 目前，打捞沉船以及水下技术工作在海上由海军抢险救护

部门负责，在江湖上由河运部水下技术和特种工程总管理局负责。

建议将打捞沉船以及水下技术工程由苏联海运部集中管理。海军只保留必要的抢险救护机构，以保证作战训练和抢救遇难舰只。

关于军事院校

根据裁减武装力量人员的计划，军事院校裁员 4 万人，同时：

——将 2 个军事学院，即军事运输学院和军事后勤供给学院合并为一个军事学院，下设军事通讯系、军事后勤系以及汽车运输系。由于裁减铁道兵部队以及取消了道路建筑军，撤消交通系和道路建筑系；

——撤消军事政法学院，在一所地方政法学院设置一个军事法律系；

——撤消莫斯科兽医学院的军事兽医系，责成农业部为武装力量培训必要数量的兽医；

——将国防部所属军事院校中的 15 所音乐学校作为少年宫移交所在的加盟共和国教育部，因为现在可以用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和在业余乐队学习的青年补充军乐队；

——鉴于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生活条件差，将 17 所苏沃洛夫军事学校改编为 10 所苏沃洛夫军官学校。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改编措施在两年内，即 1956 年和 1957 年完成。

关于工程兵部队

武装力量中从事建筑的军事工程兵部队共有现役军人 231015 人。

除此而外，武装力量编制外还有现役军人数量为 73095 人的军

事工程兵部队和应征军工总数为 218880 人的军事施工队。

国防部建议将现役军人数量为 105000 人的军事工程兵部队和应征军工数量为 115000 人的军事施工队留在武装力量内，从事气候条件特别艰苦的边远地区的机场建设和特殊工程。

撤消国防部其余的军事工程兵部队和军事施工队。

除上述措施之外，国防部认为，还可以通过用工人和职员取代部队和机关中现役军人的某些职务裁减武装力量员额，按工作性质来讲，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不需要进行军事训练，具体如下：

——在管理机构、各后勤部队、科研机构和军事院校中，初步计划取代 100000 人。

——完全用职工取代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以及通讯器材军工维修企业（工厂、基地和修理厂）中的现役军人（在国外的企业除外），约取代 10000 人。

扩大武装力量中的职工增加 110000 人及警卫人员增加 11000 人，以取代现役军人。

武装力量各军兵种分别裁减：

陆军——142911 人；

海军——52000 人；

空军——43296 人；

国土防空军——40117 人；

空降兵部队——7036 人；

中央直属部队和指挥机构——8591 人；

武装力量中的机场建设和工程兵部队——126049 人；

撤消编制外的工程兵部队，人数为 73095 人，撤消编制外军事施工队，人数 103880 人。

苏联国防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正在施工的工程有：

加里宁市第 513 号纺织联合企业、建材工业部的一个工厂、莫

斯科动力学院教学楼和住宅楼、通用机械制造部国家储备和动员储备火药及爆炸物储存基地、化学工业部液态氧仓库、航空工业部和民航管理总局的工厂、飞机跑道和机场、发电站、无线电广播站、食品工业企业以及其他许多工程项目。

鉴于将裁减工程兵部队，苏联国防部请求自 1956 年开始不再为其他部和主管部门进行建筑安装工程，将这些工程交相应的部和主管部门施工。

国防部不再为莫斯科市的建筑项目施工，按国防部的计划，自 1956 年开始，将莫斯科市以及城郊的全部工程项目移交莫斯科市住宅和民用建筑总局。

苏联部长会议 1955 年 8 月 12 日第 4181 - 825 号决议规定，武装力量缺额 30 万人。

鉴于作战部队中军士和士兵很少，这已经影响了它们的军事训练，国防部请求，裁减的 42 万人员中，实际上只退役 30 万人，其余 12 万人用于补充缺额，因此，规定缺额员额不是苏联部长会议 1955 年 8 月 12 日第 4181 - 825 号决议规定的 30 万人，而是 18 万人。

拟定的裁减武装力量人员的措施在以下期限内完成：

- 撤消和裁减部队和机关人员——1956 年 11 月 1 日前；
- 舰艇和快艇退役或封存——1956 ~ 1957 年期间；
- 裁减军事院校人员——1956 年 12 月 1 日前；
- 将贸易机构移交苏联贸易部，将音乐学校移交加盟共和国教育部——1956 年 10 月 1 日前；
- 以职工取代现役军人——1957 年 1 月 1 日前；
- 撤消和改组工程兵和机场建设部队及指挥机构分两期进行：25%——1956 年 11 月 15 日前，75%——1957 年 1 月 1 日前；
- 裁减军事施工队：35%——1956 年 12 月进行，余下的

65%——1957年5月1日前。

为了保障国防部的工程项目，必须责成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其计划中规定，根据国防部工程部门的撤消情况，向其派遣工人，可在居民之中有组织地挑选。

请审核并批准。

格·朱可夫

瓦·索科洛夫斯基^①

1956年2月9日

^① 索科洛夫斯基，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09410

苏共中央主席团
关于国防部所提问题的决议
(1956 年 3 月 17 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关于苏联国防部的问题

批准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苏联武装力量人员”的决议草案。

中央书记
1956 年 3 月 17 日

附 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
苏联武装力量人员的数量决议

1956 年 3 月 17 日第 362 - 233cc 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如下：

1. 批准苏联国防部关于在 1956 年对武装力量编制内现役军人

裁减 42 万人的建议。

2. 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5 年 8 月 12 日第 1481 - 825 号决议作部分变动，武装力量规定缺额员额由 30 万人改为 18 万人。

3. 批准苏联国防部：

将被裁减的人员之中的 12 万人补充武装力量现有的缺额，而余下的 30 万人转入预备役；

在武装力量内增加职工 11 万人，增加警卫人员 1.1 万人。

4. 通过苏联国防部的建议，将附件中所列音乐学校移交加盟共和国教育部，音乐学校享受少年宫待遇。

5. 由于海军抢险救护部门的员额裁减，自 1957 年 1 月 1 日起，苏联国防部不再承担其他各部和主管部门打捞沉船以及水下技术工程的工作。

责成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会同苏联海运部、河运部、渔业工业部、苏联国防部，研究以这些部以及民政部门的现有资金为基础建立从事打捞沉船以及水下技术工程工作的统一机构，并将建议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6. 规定对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8 月 15 日第 3102 号决议作部分改动：苏联国防部的物资，包括汽车拖拉机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自 1957 年 1 月 1 日起交铁路发运或转运时按国民经济物资运输，特别重要和危险的物资除外，其押运和保卫工作由苏联国防部自己承担。上述所指物资通过水路运输时也按同样的办法办理。

7. 因撤消军事政法学院，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会同苏联国防部研究并决定在一所地方政法学院设置一个军事法律系的问题。

8. 责成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州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采取措施，对根据本决议转业的军官以及超期服役的军人，按照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 1955 年 9 月 1 日第 1640 号决议所规定的办法，安置工作并保证其住房。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布尔加宁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A. 科罗博夫

№09412

科涅夫和热尔托夫关于军队 对裁军问题的态度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6月1日)

机密

苏共中央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声明得到了陆海军全体人员的正确理解。绝大多数士兵、水兵、军士和军官拥护关于裁减武装力量的措施，认为这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提高苏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道路上迈出的巨大一步。

但是，对政府的上述决定也有个别不正确的议论。有些军官对单方面裁减苏联武装力量是否妥当表示怀疑。

例如：苏军驻德军队集群的排长斯卡卡尔金上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政府关于裁军的决定是不是为时尚早？要知道，阿登纳正忙于组建自己的军队，美国人也没打算裁减自己的军队”。

远程航空兵第50军的丘哈切夫中校说：“如果我们能成功地维护住和平就好了，否则，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又得匆匆忙忙地培训干部”。

白俄罗斯军区的中尉技术员什托波尔科夫说：“我们可别像1941年那样过度裁减”。

还有一种不好的情绪，一部分年青军官开始感到在部队服役是一种苦恼，希望尽快转入预备役，这样在地方更容易安置工作。关

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军事院校的学员中议论很多。其中一些人后悔来军官学校学习。

一些年龄较大的军官有不安和失落情绪。一些人对地方当局在安置后备役军官工作和住房的工作表示不满。例如，在敖德萨州，去年转业的 329 名军官，至今还没有被安置工作，其中有 120 人无权领取退休金。

还出现了某些悲观情绪。例如，在明斯克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军官教导员赫梅列夫斯基少校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往脑门儿来一枪就算了”。

在列兵和军士中间出现了许多关于提前退役的议论，还有贪图安逸的情绪。在莫斯科军区近卫军机械化师兵营里，当看到刊有政府裁军声明的报纸时，整个分队都高喊“乌拉”。

政治机关已经加强了在军人中的解释工作，重点解释在裁减苏联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应当可靠地保卫我们人民的和平劳动，不要放松警惕性，要保持高度警惕性。全体指挥员和领导人要认真研究官兵的情绪，及时对他们做工作。

我们正在向即将服役期满的士兵和军士，以及将要转入预备役的年青军官认真讲解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5 月 18 日致全体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呼吁书。

伊·科涅夫^①

阿·热尔托夫^②

1956 年 6 月 1 日

① 伊·科涅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② 阿·热尔托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

№09415

马利诺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
关于继续裁减苏联武装力量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1月3日)

特别卷宗

绝密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7 年 12 月 6 日 (第 128 号会议记录) 的指示, 国防部研究了关于裁减武装力量的问题, 认为在 1958 年度通过裁减指挥机关、后勤服务部队和机构、军事院校以及作战部队, 裁减武装力量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 30 万人是可行的。

为此国防部建议:

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

从苏军驻德军队集群中将 41753 人调回苏联境内, 其中包括: 2 个摩托化步兵师, 1 个师改为 3000 人的缩编师, 撤消另外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以及集团军直属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

除此之外, 将苏驻德军队集群的 7 个高炮和炮兵师以及 2 个集团军属炮兵师改编为旅。

将南方军队集群中的第 38 集团军指挥机关及其警备和服务部队、2 个摩托化步兵师撤回苏联境内, 将这 2 个师改编为 3000 人

的缩编师，部署在喀尔巴阡军区。

实施以上措施后，我们驻德国部队的现役军人数量将裁减 41753 人。驻匈牙利部队的现役军人数量将裁减 17109 人。

1. 撤消：

——南乌拉尔军区指挥机关；

——远东军区什科托沃镇第 25 集团军指挥机关；

——1 个航空兵军指挥机关和列宁格勒海军区指挥机关，将其编队和部队划归舰队司令；

——8 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中：远东地区 5 个（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巴拉巴什村，苏城市，萨哈林，堪察加）以及外贝加尔的 3 个（达斡里亚车站，第 74 和 77 会让站）；

——2 个水鱼雷航空师指挥机关，1 个歼击航空师指挥机关，1 个军用运输航空师指挥机关和 2 个重型轰炸航空师指挥机关；

——3 个歼击航空师，4 个轰炸航空师，4 个歼击 - 轰炸航空师；2 个歼击 - 轰炸机航空团，30 个歼击机航空团，5 个轰炸机航空团，3 个重型轰炸机航空团和 1 个水鱼雷航空团，4 个侦察航空大队。上述航空师和航空团目前只装备了 40~50% 的飞机，最近几年也没有可能从工厂获得新飞机。

撤消国土防空军 5 个歼击航空师的指挥机构，因其编成内的团已经撤消，其作战技术装备已补充其他各师；

——2 个高炮师，3 个炮兵旅，2 个机炮团，2 个坦克教练团，1 个加农炮团和 1 个炮兵旅；

——1 个高射探照灯团，29 个掩护机场的高炮兵独立营，因其不能保证可靠地掩护机场；

——因扩大了其他高炮部队的编制，将每个高炮团由 6 个营扩编为 8~12 个营，撤消 7 个高炮师指挥机关，12 个高炮团指挥机关和 18 个高炮营指挥机关；

——2个防御地区（远东的波西耶特和苏城防御地区），设2个卫戍处保卫该地区永久性防御工事；

——26个装备落后的海岸炮兵营以及一些后勤部队、机关和服务机构。

2. 将2个山地步兵师改编为2个山地独立步兵团（红旗土耳其斯坦军区），1个机炮师（卡累利阿地峡）改编为1个独立机炮团。

3. 压缩军区指挥机关编制：4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榴弹炮加强旅以及其他的部队和机构，也要裁减国防部中央机关。

4. 1958年，43艘舰艇和26个海岸炮台退出海军战斗编成，列入储备或封存。

5. 陈旧的战舰、教练舰、辅助舰、船只和浮动工具，519艘报废，66艘改作其他用途。

军事院校

根据裁减武装力量的计划，军事院校裁员22000人，其中：

——撤消4所校舍和教学设备陈旧的军事学校（步兵的），1所高级海军航空工程学校，并压缩其他军事院校的规模；

——为了更好地选择苏沃洛夫和纳西莫夫军事学校的生源，保证有觉悟少年入学，改变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6年5月25日第720号决议规定的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西莫夫海军军事学校招收中学四年级毕业的少年的办法，规定：学校今后将以自愿考试的方式，招收苏联陆海军现役军人、军官、将军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子女，他们应当身体健康、能从事军事、七年制学校或中学七年级毕业、年满14岁的少年。录取后在苏沃洛夫军校培

训 3 年（八、九、十年级）。有鉴于此，解散 4 所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将 3 所苏沃洛夫军官学校改为军事学校（步兵的），以取代因校舍破旧解散的军事学校。武装力量保留 10 所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 1 所纳西莫夫海军军事学校，共计有学员 4950 名。

考虑到裁减目前在五、六和七年级学习的学生是不适宜的，因此，这些学校的裁减工作在三年内完成，这三年学校不再招收新生。

工程部队

将国防部建筑部队改编为军事施工队，裁减现役军人 18000 人。将改编部队的士兵转为应征军工，相应地扩大应征军工数量 18000 人。

由于实行上述措施，将有 40000 名军官转业。

有鉴于此，国防部认为，必须让一部分军官退伍，主要是已服完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并有权获得退休金的军官、病员以及没有受过相应军事和专业培训的军官。

鉴于应转业的军官数量很大，国防部认为必须：

——军官转业工作应逐步进行，至 1958 年年底结束，以利于为他们安置工作；

——责成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边疆区和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企业、机关和组织的领导，应在转入预备役军官到达居住地后的 1 个月内参照他们的专业和工作经历，为他们安排工作；

——责成各部和主管部门以及各企业和机关领导，给予转入预备役的军官以优先入学和参加有关专业培训班的权利。在学习期间，除有退役金的人员外，要给予转为预备役的军官发放补助金，

数额为他们受训后所任职务工资（月工资）的75%。

——责成各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优先保证转为预备役的军官的居住面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8月26日命令，为他们拨出建造私人住宅的土地，并按国家价格批给他们建筑材料。

所拟定的裁减武装力量的措施将在以下期限内完成：

——裁减武装力量的工作在1959年1月1日前结束；

——裁减军事院校的工作根据毕业时间完成；

——精简的军官的转业工作在1958年内逐步进行，而士兵和军士在1958年第1季度提前转入预备役。

请审议并批准。

罗·马利诺夫斯基^①

瓦·索科洛夫斯基

1958年1月3日

^① 罗·马利诺夫斯基，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09413

**苏共中央主席团
关于继续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员额的决议**

(1958 年 1 月 6 日)

绝密

1. 赞成苏联国防部提出的关于缩减苏联武装力量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 30 万人的建议。
2. 批准所附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苏联武装力量的决议草案，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其中的修改意见。
3. 批准塔斯社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稿。
4. 关于超龄军舰从海军退役的问题，苏联国防部应参照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书记

1958 年 1 月 6 日

№09414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武装力量的决议

(1958年1月6日)

绝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第133号会议记录的第1条

关于裁减武装力量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 批准国防部关于1958年度裁减苏联武装力量编制人员和在册人员30万人的建议。

2. 责成苏联国防部：

——1958年期间，转入预备役的军官有：已服满法律规定的最长服役期限并有权得到退休金者、伤病人员、未受过应有的军事训练和专业训练者。

士兵提前转入预备役；

——将被改编的工程兵部队的士兵作为应征军工转入军事施工队。

3. 改变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1956年5月25日第720号决议规定的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西莫夫海军军事学校的招生办法，规定：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和纳西莫夫海军军事学校招收苏

联陆海军现役军人、军官、将军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
子女，他们应是身体健康、有能力从事军事工作、年龄在 14~15
周岁、中学七年级毕业的少年。

4. 责成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区和州劳动人民
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企业、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在转为预
备役的军官和超期服役军人到达居住地后的 1 个月内，参照他们的
专业和工作经验，为他们安置工作。

5. 责成各部、主管部门以及机关的领导，向转为预备役的军
官提供入学和专业培训班的优先权。在学习期间，除有退休金的人
员外，要向转为预备役的军官发放补助金，补助金额为他们受训后
所任职务工资（月工资）的 75%。

6. 责成各边疆区、州、市和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
会优先保证转为预备役军官的居住面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 1948 年 8 月 26 日命令，给他们划出建造私人住宅的土地，并按
国家价格批给他们建筑材料。

7. 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本决议就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减少预算拨款和物质技术供给提出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布尔加宁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A. 科罗博夫

1958 年 1 月 6 日

№09416

谢罗夫关于外贝加尔军区一些军官 对裁军组织措施不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年3月1日)

特别卷宗

绝密

第541-c号

莫斯科市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兹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今年2月12~17日对外贝加尔军区现役军人的通信进行了抽样检查。在被检查的一百多封信件中发现，苏军军官对有关裁减苏联武装力量的组织措施表示了不满，并对自己今后的命运表示出担忧。

以下是从信中摘录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心情不好。30万人也涉及到我们……我没了职位，也没有了好的出路。或者到基层去任职，或者是离开部队。对人的同情心根本谈不上，上学院差不多也指望不上，退休金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已经暗示，退休金还会降低，战争将不再进行，等等。我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才满20年。显然，所有这些措施永远不会结束的，应该尽快离开这个‘组织严厉’的部队，或许，可以在地方好好安排一下生活。……在生活中出现这样急剧的变化，这样对待活着的人是令人不愉快的。过后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的。

……很多军官在咒骂，愤怒，同时也抱有希望。普罗托波波夫和雅科夫还写了呼吁书：“军官同志们！俱乐部每天都反复教唱那首歌《你好，处女地!!!》。可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自愿者……”

发信人：彼得连科，外贝加尔军区。

“……我们单位也在 30 万人之列，现在，我正在将这么多年来在此积累的东西抛售出去。所有这一切都得抛弃。多么痛苦，多么难以割舍。（刚刚建成的）修理厂是军区最好的。一言难尽。5 月前夕我将结束这里的工作。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样呢？……”

发信人：A.П. 达维多夫，雅斯纳亚车站，邮政信箱 22145。

“……这是何等的残酷，一个人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军队，而在差一年半就要服役期满之际，却被抛出船外。但是，一切设想都不能保证什么，事故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我还得充满希望地活着……”

发信人：A.Н. 索洛维奇克，赤塔市，巴利亚宾娜大街 16 号。

“……据初步消息，很多军官要转业，返回永久居住地，干什么呢，也就是说，在那里能找到工作吗？我的整个青春年华都是在部队度过的，而现在，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像少先队员那样……”

发信人：B.Ф. 什库特，达乌利亚车站，邮政信箱 25441。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去哪里，在哪里找到安身之处。我们并不气馁，但却是整夜整夜睡不好觉，因为未知的未来使我们惊恐不安。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奥妙之处，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富翁，可我们的弟兄们既没有钱，年龄大了也没有住处……”

发信人：瓦纳诺，赤塔州，第 76 骑兵侦察小分队。

“……现在，部长会议关于裁减 30 万人的决议在我们身上实际已经有体会了。……这种对于干部变化无常的做法，对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所有的人都已经厌烦了，决意回到地方去过稳定的日

子。我觉得，趁自己年青，尽快离开部队，给自己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使自己好好地生活……”

发信人：П.И. 科罗廖夫，赤塔州，哈拉诺尔车站，邮政信箱45536。

“……这些措施带来的恐慌我们已经经受好多次了，但是，这次我们仍然没有逃脱这场运动。我们师要解散。我们的团（据传闻）总共才留下5个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要转入预备役。……应该说，我们还有衣服穿，有鞋子穿，可是你看看我们这里的转业军官吧，他们有2、3个孩子，既没有衣穿，也没有钱，什么也没有，而只差一年半到二年，所以不能领取退休金。所有人的心情都很坏。现在简直是全体复员。为什么要这样呢？……”

发信人：И. 图尔金，奥洛维扬纳亚车站，邮政信箱83204。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 谢罗夫

1958年3月1日

№09417

希金和佐洛图欣关于军官中的 不满情绪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8 年 3 月 6 日)

特别卷宗

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关于在外贝加尔军区的一些军官不满武装力量部队裁减 30 万人的组织措施的通报，我们兹报告如下：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减陆海军的决议，规定在 1958 年期间将下列军官转入预备役：已经服满法律规定的最长服役期限且有权得到退休金者，伤病人员，未受过军事和专业训练者。

苏联部长会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各区、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企业、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在转为预备役的军官和超役军人到达居住地后的 1 个月内，根据他们的专业和工作经验为他们安排工作。

责成各部、主管部门以及各企业和机关领导，给予转入预备役的军官优先入学和参加有关专业培训班的权利。在学习期间，除有退休金的人员外，要向转为预备役的军官发放补助金，数额为他们受训后所任职务工资（月工资）的 75%。

各边疆区、州、市、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优先保证转入预备役军官的居住面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8月26日命令，给他们拨出建造私人住宅的土地，并按国家价格批给他们建筑材料。

据国防部的资料，按照苏联部长会议上述决议，应有72000名军官转业，其中大约有35000人将完全没有退休金，而这些人中大约有8000人已经在军队分别供职17、18、19年。

初步拟定，外贝加尔军区部队中大约有500名军官转业，远东军区有2300名军官转业，境外部队中将大约有4000人转业。这些军官中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住房保证。

裁军的工作正在进行。今年的1月和2月，已经裁减军官大约4000人。

苏联国防部和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已指示各军事委员会、政治机关、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热诚关心转入预备役的军官，深入详细地向他们讲解裁军的意义，向他们说明苏联政府决议为预备役军官规定的生活保证、工作安排、住宅保障和其他一些优惠的办法。

在今年的2月苏共中央各行政机关于召开的行政机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行政机关于、商业财政机关于、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边疆区党委、州党委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于为1958年退伍军人安排工作和住宅的任务。今年的3月份，苏共中央各行政机关于的特派员分别赴白俄罗斯、外贝加尔、北方和敖德萨各军区，向各军事委员会、指挥员和政治机关于了解军官转入预备役方面的工作。

我们认为，应责成苏联国防部和总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解释裁军措施，对各军区和舰队执行政府决议进行监督。

今年 4~5 月份，苏共中央党机关部和行政机关部将派特派员赴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州党的组织，在退伍军官的工作安排和住房保证方面给予地方机构以协助。

约·希金^①

B. 佐洛图欣

1958 年 3 月 6 日

^① 希金，约瑟夫·瓦西里耶维奇（1906~1973），苏联军事和党务活动家，上将。自 1950 年 3 月起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机构工作。

№09418

马利诺夫斯基关于武装力量裁减工作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9年1月8日)

绝密

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8年1月6日决议，国防部必须在1958年对武装力量人员裁减30万人。

与此同时，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第258-126、514-242、553-267、865-407、872和1119-539号决议，实行了紧急措施，减少裁减人员10332人。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上述决议已全部完成。武装力量共裁减289668人，其中军官42388人，军士和士兵247280人。此外，因1958年秋军校毕业入伍的学员21116名，还有21116名军官转入预备役。转业的军官总计63504人。

被裁减的289668人中，41000人为从德国撤回在苏联境内撤消部队的军人，17000人为从匈牙利撤回在苏联境内撤消部队的军人，其余231668人为苏联境内各部队和机关的军人。

退役军人分为：

按军衔

——将军——313人；

——上校——4734人；

——中校——10767人；

——少校——13588 人；

——大尉——12427 人；

——上尉——12289 人；

——中尉——8960 人；

——少尉——426 人；

按服役条例规定的退役原因：

——因年龄的原因——11488 人；

——因疾病的原因——23129 人；

——因裁减编制原因——20630 人；

——因健康状况不可能继续工作——4426 人；

——受过军官荣誉法庭审判的——1742 人；

——因移交地方各部和主管部门——431 人

有退休金保证的转业人员 40825 人，占转业总人数的 64.3%。对无退休金的退役军官支付两个月的职务薪金和军衔薪金，并保证自转业之日起在一年之内支付军衔薪金。

把在武装力量中服役作为自己毕生职业的退役军官，通常是不愿意离开部队的。最担心退役的是有家庭、没有在地方就业的专业以及没有退休金和住宅的军官。

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 1955 年 9 月 1 日第 1640 号决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和州党委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为转入预备役的军官安排工作，并提供住房保障。

国防部有资料表明，转入预备役军官的工作安排，特别是住房保障还不能令人满意。截止到 1958 年 10 月 1 日，据兵役委员会统计，转入预备役的军官中，有 3916 人还没有安置工作，有 11674 人没有得到住房。没有安置工作的转业军官中，有 2081 人没有退休金。如果加上按以前实施的组织措施而退役的军官，没有安置工作的总计为 4736 人，没有得到住房的有 47674 人。

安置工作和住宅保障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引起了转入预备役军官的很多怨言。写给国防部的抱怨信就有5000多份。强烈表示不满的是那些在工作安置方面遇到了困难和没有住房的转业军官。

考虑到苏共中央和国防部1955年9月1日第1640号《关于转业军官工作安置和住房保障》的决议的执行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国防部请求提醒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必须就地采取补充措施，执行这一决议。

国防部认为，在报刊上宣布已完成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裁军30万人的决议是适宜的。^①

罗·马利诺夫斯基

1959年1月8日

^① 塔斯社的报道稿是1959年1月30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的，于1959年1月31日发表。